国家人文历史

NATIONAL HUMAN HISTORY 真相 · 趣味 · 良知

原《文史参考》

5/第8期/总第80期 人民日报社 主管主办 4月下



改变中国历史的豫湘桂战役

国民政府形象一落千丈，美英用中国利益交换苏联出兵，改变战后政治格局

1957年"开门整风"
毛泽东决心整顿共产党

乔冠华：踏上联合国讲台的新中国第一人

善后大借款卖国？

传承千年的紫砂神韵

007御用座驾阿斯顿·马丁





邮发代号2-339 RMB 10.00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目录

封面文章

- 改变中国历史的豫湘桂战役
- 怎样评判豫湘桂战役
- 一号作战日军的殚精竭虑之作
- 豫中会战国军力战而败
- 长沙会战日军重锤砸“天炉”
- 衡阳保卫战守住中国军人的荣誉
- 桂柳会战在泥潭中挣扎的胜利者
- 都梁：国民政府没解决好国与民的关系

编读

- 编读

年历

- 年历

排行

- 排行

外刊

- 外刊

图志

- 图志

段子

- 段子

贵姓

- 贵姓

史记

- 1957年“开门整风”毛泽东决心整顿共产党
- 高华：再探林彪事件幕后
- 善后大借款卖国？
- 土豆的悲喜剧

人物

- 乔冠华：踏上联合国讲台的新中国第一人
- 乔冠华最后的日子
- 中国最有名的“农民”吴仁宝
- 昆汀•塔伦蒂诺混搭出的电影图腾
- 父亲吴祖光：生正逢时，不了了之

财富

- 优雅与性能的代名词007御用座驾阿斯顿•马丁
- 1美元上的国家符号

艺术

- 大都会精品巡礼 微缩千年美术史道法自然 中西观照
- 《止杀令》丘处机让成吉思汗放下屠刀？

生活

- 传承千年的紫砂神韵
- 死刑存废之辩

旅行

- 百年纽约中央车站六十年前险被拆
- 探秘十三陵新开六陵（下）无力挽回的王朝背影
- 满堂客家大围岭南乡间的家族城堡
- 刀鱼之味

专栏

- 杨荣甲的考察与建言
- 袁世凯亮剑国际
- 一线城市降房价秘笈

视野

- 何方口述：我与张闻天的最后一面
- 少提盛世才是高

题酷

- 题酷

填字

- 填字

书情

- 书情

学问

- 学问

艺文

- 艺文

创意

- 黎明女神陶盘
- 鱼饰花瓶
- 贝壳高脚杯
- 马
- 北极熊
- 衣橱

改变中国历史的豫湘桂战役







在豫湘桂战役范围内的国军兵力约250万人，是日军用于“一号作战”兵力的5倍，尽管武器装备与官兵素质大大低于缅北、滇西的国军，但如果指挥得当，奋力抗敌，豫湘桂战役也不至于败得这样快和这样惨.

怎样评判豫湘桂战役

作 者:荣维木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秘书长

发生在河南、湖南、广西的豫湘桂战役，是中国抗日战争中最大的一次军事失败。1944年4月开始，至12月结束，在8个月的时间里，中国丧失了百余座城市和6000余万人口的大片国土；损失了厂矿总数的三分之一；丢掉了年产粮1.2亿石的重要粮区；在作战中，中

国官兵伤亡50万人，丧失空军基地7个，机场36个；日军以伤亡7万人的代价打通了南北大陆交通线，并将国民党统治区东西分割开来。这种结局，暴露了中国正面战场抗战的弱点。无怪蒋介石在战役后悲哀地说："1944年对中国来说是在长期战争中最坏的一年"，"我今年58岁了，自省我平生受到的耻辱，以今年为最大"。

显然，国民党并没有讳言豫湘桂战役失败对中国抗日战争造成的消极影响。不仅当时国内舆论发出一片谴责，美国盟军也表示了极大不满。以至于有人提出，美国在雅尔塔会议出卖中国利益来换取苏联早日出兵中国东北，就是因为豫湘桂战役的失败使其怀疑国民党的抗战能力。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豫湘桂战役失败大量消耗了国民党军队，却为共产党军队在敌后发展创造了空前的条件，两相比较，这也是后来中共在内战中很快取得优势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观点是否合理，已经不能单纯地以战役视角和军事视角来判断了。

首先来看战役与战争的关系。战争的胜负是由无数个局部战役较量来决定的，而不同的局部战役之间又有着很大的关联性。这里所说的局部战役还可以扩大理解为，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局部战场。豫湘桂战役正是在这样的关联性中发生的。1943年，日本在太平洋战场接连失利，海洋交通线岌岌可危，南洋军队补给几近中断，为弥补海洋运输不足，日本于1944年开始实施"一号作战"计划，以打通中国华北、华中、华南至越南、泰国的大陆交通线为作战目标。为此，日军动用了51万兵力，远远超过武汉会战时的35万兵力，并再次进行国内动员。如前所述，日本最终实现了作战目标。但是，日本虽然打通了大陆交通线，却因战线延长和兵力分散而无法有效地利用大陆交通线。而战役与战争的关联性更表现在豫湘桂战役进行的同时，中国军队已经在缅北和滇西向日军发起了反攻作战。缅北、滇西战役从1943年10月开始至1945年3月结束，进行了17个月，中国军队解放了缅北大小城镇50余座，收复云南西部失地83000平方公里，击毙日军48000余人，并且成功地打通了中国与盟国间的陆上交通线。如果说豫湘桂战役的失败确实引起了国内外舆论的谴责，那么缅北、滇西战役的胜利却给国民党军队争来了脸面。前者，招致了包括罗斯福总统的非议；后者获得了盟军的极大赞赏。曾任中国驻印军总指挥的史迪威评价说："中国军队是极好的。"1944年11月的美国《皇冠》杂志发表一位记者的述评说，缅北战斗"表现出中国军队忍受无限艰难的伟大，世界上任何军队都望尘莫及"。

豫湘桂战役和缅北、滇西战役虽然是在远隔千万里的不同地域进行的，但却是在同一个战争和同一个时间段共同进行的，都与战争的进程密切关连。当然，战役对于战争的影响存在着消极与积极的显著

区别，但仅以褒贬之词来判断美国在雅尔塔会议对华政策转换的原因，却不尽合理。事实上，雅尔塔会议对于中国利益的出卖，不仅关系到换取苏联早日出兵中国，也关系到欧洲战场英美盟国与苏联的合作，甚至关系到战后美苏力量的相互制衡。因此，即使没有豫湘桂战役的失败，在本国利益优先的原则下，强国牺牲弱国的交易也要进行下去。

其次来看军事与政治的关系。豫湘桂战役的惨败，有军事上的原因，也有政治上的原因，更多的时候，两种原因是纠合在一起的。

先从军事上来看。现在很多台湾学者认为战役失利的重要原因是当时精锐部队用于缅北、滇西，造成了中原战场兵力不足。而实际上，在豫湘桂战役范围内的国军兵力约250万人，是日军用于“一号作战”兵力的5倍，尽管武器装备与官兵素质大大低于缅北、滇西的国军，但如果指挥得当，奋力抗敌，豫湘桂战役也不至于败得这样快和这样惨。首先，在大战之前，国民党最高指挥层虽然发现了日军的异动，却没有意识到大战的来临，直到豫中战斗开始后，才意识到日军的战略用意。其次，在指挥方面，无论是最高当局与下属部队，还是各作战部队之间，都呈现不协调的情况。如日军南进后在皖鄂等地兵力单薄且分散，最高指挥当局并没有利用机会命令当地中国军队出击以干扰日军的作战部署。又如衡阳保卫战是湖南会战最大的一次战役，守军付出了巨大牺牲抗敌40余天，却迟迟得不到友军的支援，最终丧失了里应外合的歼敌时机，湖南很快沦陷。而指挥的失当也严重地影响了官兵士气，如广西作战，日军在中美空军的不断袭击之下居然能以每天30公里的速度向前推进，不仅占领了广西，还打到了贵州独山。《扫荡报》记者评论说：“独山失守，表现了军方的无能”，“敌军尚在数十华里之外，我军已仓惶逃走”。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罗斯福总统的报告也认为，中国所处的严重困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军方处置不当和玩忽而造成的。

再从政治上来看。上述军事指挥的错误，有些是不合常理的。如作战部署和兵力配置，本来国民党可以调动更多部队抵御日军进攻，但为了“预防共党扰乱后方”，很多兵力却用来监视八路军了。最为明显的例子是，当日军开始进攻湖南的时候，军事委员会讨论作战计划，是把预防日军和预防中共并列为两个议题。有人统计，国民党军对付日军与监视中共的兵力之比大约为七比一。对此，美英盟国也大为不满，指责国民党以数十万部队监视中共而影响了对日作战，认为除非中国的一切力量，包括正在对付中共的军队在内，都用来对日作战，中国在战争结束前是不可能起什么作用的。众所周知，国民党和共产党确实有着不同的政治诉求，但是，抗日战争并不是任何一个党

派的反侵略战争，如果把党派利益放在首位，显然会伤害到民族的整体利益。当然，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也没有讳言发展壮大自己，“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是这一时期中共的重要目标之一，因为只有壮大人民力量，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与此形成对照的是，豫湘桂战役显示了国民党并没有意识到民心的作用。蒋介石在战役后哀叹，“我们的军队沿途被民众包围袭击，而且缴械！”这是为什么呢？他检讨了原因，这就是“部队里面军纪的败坏，可以说到了极点！在撤退的时候，若干部队的官兵到处骚扰，甚至于奸淫掳掠，弄得民不聊生”！而极具讽刺的事情是，在国军被袭的同时，居然有民众为日军运输物资。这样的仗，失败也就成了必然。

前面提到，有人认为从中国内部来看，豫湘桂战役的结局转换了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以至于在日本投降后共产党很快就打败了国民党。从表面上看，此说不无道理。由于豫湘桂战役使日军兵力更加分散，因此在国民党军退出的地域，共产党的军队有了空前发展的空间。并且在事实上，敌后战场也很快地发起了对日军的大规模反攻，收复了大片国土。共产党的力量确实是壮大了。但是，从总体对比来看，直到日本投降，国共两党各自力量，无论是从军队数量、武器装备、占据国土面积的大小与经济好坏，仍然是前者占绝对优势，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48年三大战役前后。单纯地把豫湘桂战役的结局作为国共两党力量对比转换的关键，有失偏颇。至于为什么在三年内战中共产党很快占据了上风并最终打败了国民党，起决定作用的并非军事原因。国民党在政治经济方面的政策失误、国际局势的影响、尤其是人心的向背，都是导致国民党最终败在共产党手下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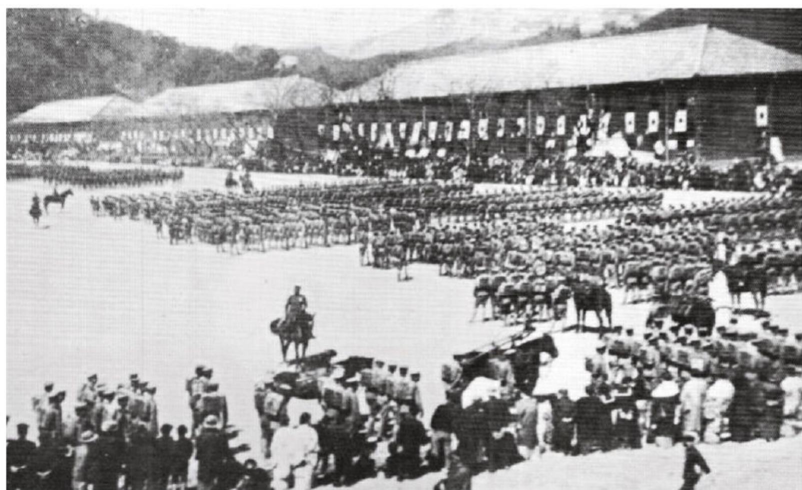
一号作战日军的殚精竭虑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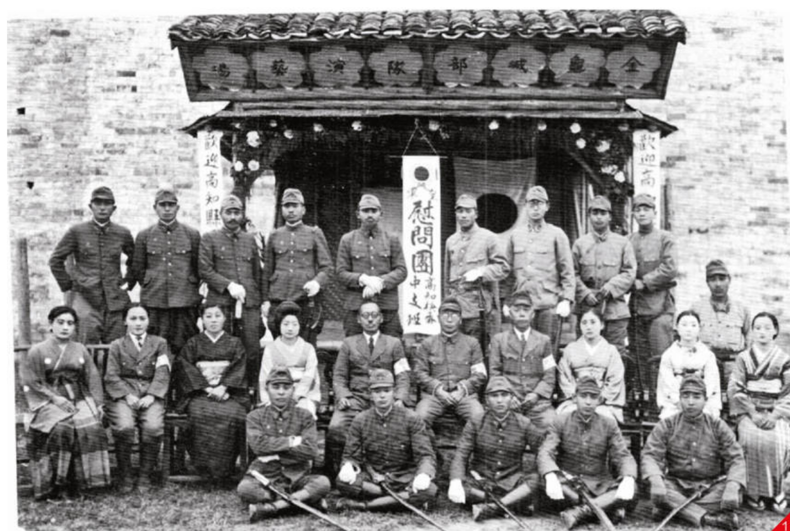
作 者:萨苏










金龜城部隊演藝場
歡迎高知縣
慰問團
中支班
歡迎高



/ 日军作战准备，新兵在进行重机枪训练

1

943年，是第二次大战关键的一年。这年四月，三国轴心中最薄弱的意大利率先支撑不住，被迫退出战争；九月，盟军在塔拉瓦登陆，全歼柴崎少将以下守岛日军，在日本的绝对国防圈上打开了一个缺口。随着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局势的逆转，反法西斯盟军的胜利已经如同地平线上的晨曦隐约可见。

相比之下，这一年中，中日两军激斗了六年之久的大陆战场，却显得较为沉寂。侵华日军被大量抽调到太平洋战场，中国在滇缅路断之后彻底失去了获得外援的地面通道。加上1942年大饥荒的影响，两军仅在常德等地打了几场局部战争，都有些打不动了的迹象。位于河南与安徽两省交界处的界首镇因为国统区与沦陷区之间的走私贸易而呈现病态的繁荣，守军却不闻不问。流了大量的血之后，难免有些中国人窃窃自问——是否可以就这样等来胜利？

风暴往往就是在这样似乎祥和的气候中酝酿。在日军大本营，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战正在酝酿，各种准备工作紧锣密鼓。这便是日军即将发动的打通大陆交通线之战，其代号为“一号作战”。

面对挽救危局，日本人旧案重提

这次战役规模空前，其进攻起始线即长达两千八百公里，动用十八个师团又六个独立混成旅团，其中包括日军视若珍宝的第三坦克师团。日军直接投入兵力超过四十万人，加上辅助人员则超过七十万，

并动用大量技术兵器。这次战役日军计划先从武汉和河南两面夹击，击穿作战地域跨越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乃至贵州。这是日军自侵华战争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作战。

而这个一号作战计划的制定和实施，似乎有些纠结。这是因为在此前一年，日军于1942年否了一个大规模的对华作战方案，这便是日本陆军制定的五号作战方案（也曾被编为五十一号作战）。这次作战预定1942年秋实施，目标在于直逼重庆，迫使中国屈服。但是，该计划策定之后不久，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便屡遭重创，经过中途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两场血战，盟军从战略守势开始转入战略攻势。海陆两线同时开战和资源不足的恶果开始展现，兵力的捉襟见肘迫使日军暂时叫停对中国的战略进攻。

然而，时隔一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局势更加不利的情况下，却依然决定发动对中国的一号作战，比五号作战规模更为庞大，这不禁让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地方在于，在这场作战之中，日军的表现极为疯狂。按说由于作战区域扩大，损失增加，日军新增兵员的作战素质应该有所下降。但在一号作战中，这些从市民中征召的“二等兵”或“三等兵”斗志顽强凶狠，表现出了与日军职业老兵几乎同样的战斗力。

如果看明白日军在一号作战中体现的战略意图和动员方法，就会明白其中缘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争夺南洋（即今东南亚和太平洋诸岛）地区的资源，日军把大量部队投入这一地区。然而，随着日军在西太平洋的制空制海权逐渐丧失，盟军的潜艇部队在航空兵配合下深入东方海域，日军从本土到南洋的海上通道几乎被切断。在南洋的日军逐渐成为一支孤军，在盟军的猛烈进攻下危如累卵。

一号作战的战略目标固然包括打击中国军队，瓦解国民政府抗日信念的内容，但其首要目的，则是打通平汉线和粤汉线，为日军获得一条纵贯南北的“大陆交通线”，以便通过中南半岛和南海与被切断的南洋日军建立新的联系。与此前日军在华的历次作战不同，一号作战的成败不仅决定着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战略态势，而且也决定着南洋数十万日军的生死。故此，在日军的资料中，将“一号作战”称为“起死回生之战”。

同时，一号作战还有一个目的，便是摧毁和占领盟军在中国华中、华南地区的各个航空基地。此前，美国在华空军指挥官、名将陈纳德提出，盟军可以通过中国的基地实施对日战略轰炸，达到迫使日

本投降的目的。这一作战方案得到中国方面的有力支持。

在1942年到1943年间，中国成为对日战略轰炸的重要后方，从衡阳、全州、株洲等地起飞的盟军重型轰炸机频频飞临日本本土和伪满洲国、日占台湾等地，对日本的军事和工业、民用目标实施打击，给日方带来了巨大损失。战后，军史学家评价盟军战胜日本主要依靠战略轰炸、越岛进攻和潜艇封锁三大法宝，可见“陈纳德轰炸”的战略意义。

不惜损害军工生产的拼死动员

在战局不利的时刻发动会战，在官兵中强调其目的既是为了拯救己方官兵，又是为了帮助本土摆脱遭到战略轰炸的命运，日军在发动一号作战时进行了充分的战术动员，这种动员带有强烈的悲壮色彩，并使日军官兵迸发了超越其极限的战斗力。

为了实施一号作战，已经在整体战局上呈现颓势的日军可说殚精竭虑。

日军面临的首先是兵力的调集问题。1943年中，在华日军主力“支那派遣军”合计兵力二十五个师团，调动十八个师团投入进攻必然造成其他地区兵力捉襟见肘。为了能够达到战役目的，日军从关东军抽调大量部队南下，投入华北、华中战场。日军大本营原计划1944年度从中国抽调十个师团加入太平洋战线，在一号作战的影响之下，这一计划被迫取消。同时，在华的日军若干师团在1943年时建制不全，技术兵器不足，被列为乙种甚至丙种师团。为了提高其战斗力，日军积极将参战部队扩充为甲种师团，并增加重型火炮等技术装备，以提高其作战水平——日军一个乙种师团兵力不过一万四千，而甲种师团所辖兵力能够达到两万三千以上，这一充实大大提高了日军参战部队的战斗力。不过，这迫使日军从本土大量征集适龄人员参战，其中很多人员来自其工业特别是军事制造业。这种技术工人的流失，使日本本土的生产能力受到较大影响。削弱了关东军，使太平洋战场日军得不到增援，减少了其本土劳动力，而且由于中国顽强而持续的抵抗，使一号作战中“借”来的日军部队有借无还，基本被钉死在湖南、两广等战场。从这个角度上说，日军在中国战场尽管较为成功地发动了这一战役，达到了一定的战术目的，但从战略上说，实际破坏了自己的战争潜力。当战争末期关东军面对盟军攻势时，其战斗力已经不堪一击，这一恶果，在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时已经种下。

大量增兵造成兵员素质下降，是日军面临的头疼问题。日军解决的办法一方面是对新入伍士兵进行残酷的训练，使其在较短时间内具

备战斗力。由于太平洋战场毕竟是岛屿战争，一次性投入的兵力有限，使日军仓促间仍能抽调出一定数量的老兵充实各部队。特别是日军从甲午战争前就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国家动员体制，因此，其征集的人员大多经受过初级的军事训练，特别是一些年龄较大的预备役官兵，往往参加过战争，有一定的战场经验。在这种有利条件下，日军新兵的训练较为顺利。特别是地空协调，以及有针对性的攻坚、快速机动等训练均得到较好贯彻。

另一方面，日军使用各种手段，大力鼓动参战部队士气。除了充分说明此战挽救南洋数十万官兵性命，保护本土不被轰炸的重要性以外，日本天皇裕仁甚至在1943年令其只有十四岁的皇太子明仁（即今天的日本平成天皇）着陆军士兵服装照相，以此鼓舞军心。日本各地也纷纷派出慰问团，前往在湖北、广东、华北等地驻扎的日军部队中进行“慰安旅行”，以提升各部队作战情绪。

在这种努力之下，日军在1944年初，于华北、华中、华南集中了较为充足的兵力，统一编成第六方面军，发动一号作战已经具备一定条件。

把最好的装备和军官调往中国

人员数量以外，日军还调集了大量技术兵器到达一号作战地域，以图通过装备上的优势压垮经过六年抗战、正内外交困的中国军队——由于缺乏自己的工业，滇缅公路还没有重新打通，中国军队只能通过杯水车薪的驼峰航线获得有限补给。这些有限的补给又大多被留给云南准备入缅作战的远征军部队，因此1944年初华北、华中、华南地区中国军队的装备水平与日军本来差距就很大。而这次战斗日军竟然调动了运输汽车一万三千辆，马六万七千匹，其在中国派遣军的航空兵团，油料储量够半年之用（实际由于交战持续了一年之久，加上中美联合空军的英勇作战，日军航空兵在战役后期完全难以保障战场制空权），步兵单位弹药的储量则多达两年。考虑到中国军队必将采用坚壁清野的战术，日军出动了大量舟艇部队和道路桥梁修整工兵部队，以保证其前后方道路的通畅。一号作战计划中，上至指挥部的有线无线电台，下到军靴的修理，堪称包罗万象而有条不紊，其完备程度令人叹为观止。据统计，这一次日军的动员规模，超过了日俄战争时日本全军动员规模的两倍以上。特别是，由于考虑到这一战役的重要性，日军还在中国战场首次动用了师团建制的装甲部队——坦克第三师团参加本次作战。这也是日军在整个二战中唯一一次以师团级的装甲部队投入进攻作战。这个师团拥有坦克部队两个旅团四个联队，机械化步兵一个联队，其他部队三个联队，战斗力极强，是日本参考欧洲战场闪电战效果后建立的大规模装甲部队。和这样的日军交手，

无疑对中国军队来说是一个新课题。

有了充足的兵力和精良的装备，并不代表能够合理运用。日军在选定一号作战指挥官的问题上下了很大工夫。最终，熟悉中国战场的宿将冈村宁次被任命为第六方面军司令官，他直接指挥华北日军向南进攻，以便与华中日军会师，完成打通平汉线的任务，这也是一号战役第一阶段的战略目标。随后，在华南的日军则在第23军军长田中久一的指挥下向北进攻，策应华中日军打通粤汉线。由此可见，南北两路日军尽管遥相呼应，而华中日军的行动才是完成一号作战的关键。因为此前冈村宁次一直集中精力对付华北的八路军，从中国南方已经离开一段时间，对在这一地域作战有些陌生。因此，日军尚需要选择一名类似于足球队中场灵魂人物的将领来掌控这一地区的战斗。最终，一个前一年刚刚吃了些苦头的将领被大本营选中了。这就是原日军在华中部队的指挥官，第十一军军长横山勇中将。

横山勇，出生于日本东北的千叶县，出身于一个军人世家。1909年5月27日以优异的成绩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1期毕业。由于在学校期间表现突出而与同期的石原莞尔、饭村穰并称为“第21期的三羽鸟”。横山勇曾长期在中国东北地区担任关东军指挥官，1942年12月22日被调往中国南方。这是因为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冢田攻大将在安徽省大别山区被击毙，大本营调他前去接任。此时，他在第11军已经任职一年多的时间。

尽管名字中带一个“勇”字，但横山勇的外貌更像一个文官。他主持了1943年的常德会战，但战果并不丰厚。由于中国军队第七十四军五十七师的顽强抵抗，几路日军围绕常德激战月余，最终只占领了这个城市一天就被迫撤离，没有达到夺取湖南中国产粮区的战略目标，而且损兵折将，伤亡惨重。既然如此，为何日军仍然使用横山勇担任这一作战的总指挥官呢？这主要是因为横山勇被认为是对中国军队战法较为熟悉的日军高级将领之一，他长期服役于关东军，被临时抽调来参加一号作战的关东军部队对其较为尊重。同时，横山勇也是日军中有名的“智将”，善于从战争中吸取教训。事实上在一号作战中横山勇的确不负“智将”之名，他在制定作战计划时充分研究了中国将领薛岳在长沙屡试不爽的“天炉战”战法，并提出了很有针对性的放开大道、两翼齐飞之布阵方略，果然遏制住了“天炉战”的长处，使中国军队被迫放弃扼守了数年之久的长沙阵地。

不过，实战中，中国军队抵抗之顽强也出乎日军意料，由于中国衡阳守军第十军奋勇抗击，日军两次总攻都拿不下这座要隘，因此也曾产生过临阵换将的想法。以至于一度将另一名悍将坂西一良派到前线，随时准备接替横山勇的职务。

除了以上各点以外，日军还广泛在战前采取欺敌措施，部队运动到进攻出发地的经过十分隐蔽，例如，连战前参加最高作战会议的日军步兵部队指挥官都不知道坦克第三师团即将参战。同时，大批经过精心训练的日军便衣部队在战斗开始前便渗透入中国军队的后方进行侦察袭扰，使日军在战斗开始阶段便达到了战场遮断的目的。

面对日军的紧锣密鼓，中国方面却因为侦察情报工作的滞后和无休止的内斗而忽视了日军即将发起进攻的信息——蒋介石和史迪威正为争夺中国战区的领导权斗得不可开交。因此，日军1944年2月打响“一号作战”的时候，立刻给前线的中国军队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豫中会战国军力战而败

作 者:隋寄锋



/ 抗战时期《读卖新闻》发行的战地宣传照片：在洛阳的日机械化部队



/ 抗战时期《读卖新闻》发行的战地宣传照片：日军飞机轰炸河南的东桃鱼俯视图

豫中会战

1944年4月18日—5月25日

日本	兵力	中国
14万人		40万人
冈村宁次	指挥官	蒋鼎文、汤恩伯



2



3



4

自中条山会战后，华北战场将近三年没有发生大的战事，过久的“和平”使国军失去警觉；再加上1942年罕见的旱灾，使河南民生困苦，军队补给不足，有限的兵员和物资又被史迪威优先补充给远征军。因此，第一战区各部的战力已经跌到了谷底。

国军节节败退

豫湘桂会战首先在河南打响，日方总指挥为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主力为第12军，包括战车第3、第37、第62、第110师团，独立混成第7团、骑兵第4团，共5个师团又3个旅、1个飞行团，总计14.8万人——当初日军扫荡华北，只出动了7万人就使八路军损失惨重。中国方面参战的有第15、第19、第28、第31、第14、第4、第36、第39集团军，共8个集团军、1个兵团共17个军约40万人。

蒋鼎文被称为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早年追随孙中山，曾参与东征陈炯明。1942年1月接替卫立煌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汤恩伯曾率部参加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等，1942年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

兼鲁苏皖豫边区总司令。

蒋、汤共事之初就矛盾重重，蒋鼎文自恃是革命元老，对汤恩伯颐指气使，但后者常常阳奉阴违。蒋鼎文的司令长官部设在洛阳，直接指挥豫西四个集团军，汤恩伯的副司令长官部驻叶县，下辖豫中和豫南的四个集团军。正副长官互相拆台的局面，无疑给了日寇可乘之机。

1944年4月18日凌晨，日军第37师团配属独立混成第7旅从中牟渡过黄河，夜袭第28集团军暂编第15军河防阵地，守军仓促应战，阵地很快失守。次日，日军第110、第62师团向第28集团军第85军邙山头阵地发起攻击，整个28集团军守备的黄河南岸阵地全线溃败。日军顺利渡过黄河之后，全力发动攻势，第37师团攻陷中牟，第62师团攻克郑州，第一战区的正面防线就此被彻底撕碎。至23日，日军相继攻陷新郑、尉氏、汜水、密县等地。

此时，驻守安徽的日军第13军一部，从正阳关、凤台向阜阳运动，摆出了进攻河南的架势，吓得豫东国军不敢动弹。与此同时，正面日军以3个师团又2个旅团的强大兵力迅速包围了平汉路的重镇许昌。

吕公良血战许昌

许昌是国军在平汉铁路上最北端的阵地，地势平坦，易攻难守，蒋介石电令蒋鼎文以两个师的兵力防卫许昌，但汤恩伯实际只派出15军的第29师驻守许昌，师长为吕公良。

筹备守城期间，吕公良的妻子带着女儿来到许昌，但吕师长忙于军务，只是把她们安置在师部住下。当吕公良抽出时间与家人相见时，他对妻子说：“我这次受命固守许昌，同日军必有一场恶战。我已抱定与许昌共存亡的决心。假如我为国牺牲了，乃是全家的光荣，你们定会受到国家的抚恤、民众的尊敬。你要多多保重，万望把儿女们抚养好，一切都拜托你了。”

1944年4月28日夜，日军出动第37师团、第62师团等8万人，分三路围攻许昌，国军29师奋起还击。日军在北路、西路和南路都遭到顽强阻击，在许昌东南角的塔湾，有班长王合义腹部中弹，肠子都流了出来，还坚持战斗；有连长吴超赤膊上阵，一手拿枪，一手提刀，与敌人拼杀。国军将士死战，但日军空中有轰炸机掩护，路上有坦克支援，逐步攻入许昌。

南门失守后，团长李培芹在前往师部汇报情况的路上，看到有部队后撤，当即对空连放机枪，喊道："不准退，都给我顶住！"随后与士兵同赴南门，率军反攻。连长黄正道是副师长黄永淮的侄子，他从南门撤退时正碰上叔叔。黄副师长拔枪命令道："坚决顶住，后退者枪毙！"黄正道遂转身返回战场，为国捐躯。

许昌危在旦夕，吕公良召集各级军官，商讨突围。吕公良一面含泪焚烧军旗，一面对官兵说："若我们突围成功了，要同日军继续战斗。若失败了，要抱定不成功，便成仁，生为中华人，死为中华魂的决心，不投降，不受辱。"

5月1日凌晨，29师开始突围，团长杨尚武、李培芹等阵亡，吕公良和黄永淮负伤。天亮后，黄永淮与30余名士兵一起被俘，他目睹日寇残杀同胞后，忍无可忍下夺过一名日军士兵的枪，打死了一个敌人，其后自己也被击毙。

吕公良身中几枪后让警卫员先走，自己则倒在路边。战后有农民路过时发现了血泊中的吕公良，但为时已晚，不久吕师长去世，时年41岁。此前日军误以为击毙了吕公良，为其立了一块碑，上书："勇将新编第二十九师师长吕公良之墓"。

败军被武装起的百姓追击

日军攻克许昌后，又一路西进，攻占了郊县、襄城、临汝， 围歼了汤恩伯部的主力第13军。一路沿平汉路继续南犯， 占领了临颍、哪城、遂平。蒋鼎文担心自己遭到合围，带着大量物资，率所部仓皇逃往伏牛山。汤恩伯见友军撤退，只好率部突围。

汤恩伯部在溃败时军纪很差，曾在第13军任团长的方耀后来回忆说，有些士兵公然闯进民宅，翻箱倒柜地抢东西。一些败军所到之处，就地掠夺粮食和猪牛羊，留下一张据说可抵征购粮的"白条"。败军所为激怒了老百姓不假，但赤手空拳终究是打不过有枪有炮的丘八老爷。所以将国军（如第31集团军一部）缴械的其实是"武装民众"，他们或是地方士绅的私人武装，或是中共游击队。

豫西"宜、洛、渑、陕四县联防"的领导人贺澎三也回忆说，"漫山遍野尽是国民党溃退军，到处抢劫。被激怒的豫西老百姓，为了保全性命，不得已起而攻打国民党军，这样一来，蒋军不敢进村庄，钻空子逃窜。群众高呼缴枪，国民党军成营成团都乖乖地缴了枪。有的自己丢掉枪支，徒手逃命。"

河南百姓怨恨政府军是有缘由的，正如黎东方先生在《细说抗战》一书中说的，河南一省地方虽大，但西部山区生产的粮食很少。自战争爆发以来，河南被国军几十个师与日军几个师团挤满。即使没有各种灾害，也让河南民不聊生了。

在河南国军溃败之际，日军第12军继续南下，与由信阳附近北上之第11军宫下旅团在确山会师。日本人终于打通平汉铁路。趁河南国军溃败之际，驻山西的日军第1军一部从垣曲强渡黄河，攻占河南英豪、渑池后，沿陇海铁路东西分进。此举不但截断了陇海线，还一口气扫荡了洛阳以西的后勤基地。

李家钰断后殉国

5月6日，蒋鼎文从洛阳撤到新安。10日夜，他又带着幕僚和参谋人员，从新安向西南撤退。5月11日，蒋介石打电话给李家钰："其相兄！新安以东部队很多！铭三（蒋鼎文字）去后！希望你将总司令部移到新安铁路以南地区！就近指挥照料战区各部队……其相兄重托了！"李家钰出身川军，主动请缨抗日，他曾慷慨赋诗："男儿仗剑出四川，不灭倭寇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是青山。"李家钰先奉命在晋东南与八路军协同作战，1939年升任第36集团军总司令，下辖三个军。

1944年春，第一战区长官部得到日军将要发动大举进攻的情报时，蒋鼎文在洛阳召集高级将领，商讨对策。军官们坐在一起，云山雾罩地讲了半天，没有商量出任何结论。李家钰说，战事一旦爆发，洛阳将很危险，"因为我们兵力虽是强大，但在配备上，不仅涉及细部，没有重点，而且一切部署，都要经过上级决定后，才敢行动。这样遥控部署，就失去了灵活性，将来也难免有胶柱之虞。"他在会上还建议先发制人，派出飞机轰炸日军的桥头堡——邙山头，但未被采纳。

李家钰接到蒋介石电话后，决定率部掩护友军撤退，他对麾下将士们说："我们南渡以来，吃了河南老百姓四年的饭，现在不能见了日本人就跑。否则，怎么对得起老百姓！日本人有什么可怕的，他们来了，我们就同他们打。别的部队怕跑在后面挨打，我不怕，我愿殿后。"

当时李家钰手上能动用的兵力只有四个团，他在向秦家坡后退时，因身着黄呢大衣，目标显著被日军发现，遭遇伏击。他在指挥作战时中弹牺牲。战事结束后，有士兵找到李家钰的遗体，看到总司令穿的圆口布鞋上布满枪眼，手里还拿着笔记本和钢笔。同时阵亡的还

有第36集团军总部副官处长周鼎铭少将、步兵指挥官陈绍堂少将等。

《李上将家钰传》说，李家钰率部“节节抵抗，迟滞敌军，我潼关内抽调的各友军，得以兼程出潼关以东，迎头痛击日军，收复灵宝、虢镇、陕县一带，战局才转危为安。”国民政府追授李家钰为陆军上将，蒋介石为其题写了“勋烈常昭”四个字。

蒋鼎文、汤恩伯被撤职

洛阳是国民政府在河南的政治中心，日军对其志在必得。5月5日，日军开进龙门，开始部署进攻洛阳。守卫洛阳的是刘茂恩麾下第14集团军的第十五军，军长武庭麟；城内进行巷战的是李家钰36集团军下属的一个师。

洛阳保卫战极为惨烈，如在5月12日，日军以2000余人，战车70余辆，大炮数十门的兵力向七里河桥等阵地发起进攻。中国守军先以手榴弹杀伤敌人，后双方在此展开白刃搏斗。至次日守军弹尽援绝，阵地上一连官兵全部牺牲，阵地才被攻陷。

双方在洛阳城厢的争夺最为激烈。守军在城外挖了宽6米、深7—8米的城壕，壕内引来流水，成为一条护城河。城内各条街道也都挖有2米深的壕沟，边上堆有麻袋、沙土或砖石。自22日起，中国守军撤往城内，与来犯日寇进行最后的战斗。

24日拂晓，日军出动飞机轰炸洛阳，同时以五六千兵力进攻东城。中午时分，120门火炮向城内轰击，大量工事和房屋被摧毁。有了炮火掩护，日军组织战车300余辆，分六路猛攻。下午5时，指挥部与各处守军失去联络，士兵们各自利用房屋与敌巷战。25日，洛阳失守。事后统计，在洛阳保卫战中，国军打死打伤日军万余人，击毁战车60余辆。中国守军伤亡同样惨重，突围后官兵仅剩2000余人。

豫中会战历时37 天，四十万中国军队竟挡不住十几万日军的进攻而一败涂地。丢失城市38 座， 损失兵员20 余万。所幸胡宗南派出5个军支援，才没让日军兵进潼关，威胁陕西。

蒋介石震怒之下，要求追查战败原因。他责令蒋鼎文辞职，撤了汤恩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和鲁苏豫皖边区总司令的职务。对于豫中会战失败原因，陈诚总结为“四不和”：将帅不和、军政不和、军民不和与官兵不和。白崇禧则在战术上归结出两个原因，一是“就数量而言，我军兵力较敌为优，而于质量上，则不若敌精炼，装备方面更逊敌一筹”；其二就是“制空权操于敌手，且缺乏平原作战之利器，故于

平原地形之作战，遭遇困难”。

（参考资料：《中原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亲历记》、《我所知道的汤恩伯》、黎东方《细说抗战》、马宣伟《血染秦家坡的李家钰将军》、贾天运《洛阳保卫战述略》等）

长沙会战日军重锤砸“天炉”

作 者:文亭



/ 1941年11月，第三次长沙会战之前，日军轻型坦克在湖南北部渡江

从1939年起，长沙就是日军不可逾越的城市。1939年9月、1941年9月和1941年底，日军三次进攻长沙，均被国军击退。尤其是第三次长沙会战，在日军驻足于长沙城下时，周围各路国军对日军实施反包围，成功切断了日军的补给线，迫使日军只能空投补给。无奈之下，日军被迫撤退，国军转入反攻，对撤退日军进行阻击、截击、尾击作战。日寇狼狈逃窜，死伤惨重。此战，日军被毙伤5万余人。

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使身在黄山别墅的蒋介石喜笑颜开，镇守长沙的薛岳也得到了国军将领所能拥有的最高奖赏——青天白日勋章。不仅如此，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向薛岳颁发了一枚独立勋章。英国《泰晤士报》也评价道：“12月7日以来，同盟军唯一的决定性胜利就是华军之长沙大捷。”

长沙，中国军人的福地，更是薛岳的福地。

日本人长了记性

1944年4月，日军攻取河南，打通平汉铁路后，就将注意力集中到了长沙。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还亲自坐镇武汉指挥全局。对于攻克长沙，第十一军军长横山勇已有了万全的准备。这一次，迎战日军的还是第九战区司令官薛岳。

薛岳，又名仰岳，在国民党军事派系中应属粤系。早在1910年就加入中国同盟会，曾担任孙中山警卫团的营长。北伐时期在李济深第

4军任师长。抗战开始后，薛岳主动请缨杀敌，率部参加了“八·一三”上海抗战。1939年代理第9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指挥两湖和江西部分地区的防务。

以往三次长沙会战，薛岳均以“天炉战法”迎战，屡试不爽。“天炉战法”是一种“后退决战”的战术，要领就是诱敌深入，然后予以包围歼灭。所谓“天炉”就是将兵力在作战地带，布成网状的据点，以伏击、诱击、侧击、尾击等方式，分段消耗敌军的兵力与士气，最后，把敌军“拖”到决战地区，再进行决战，一举歼灭。就长沙地区而言，从岳阳下来，近150公里的铁路沿线，却有4条河流横跨其间。薛岳便以此地复杂的地形，巧妙地排兵布阵。此战术造成日军成军以来大规模会战的惨败纪录。经此三战，指挥长沙大捷的薛岳被日本人称为“长沙之虎”。

日军三战三败，也不会不长记性。1944年5月，横山勇集中了8个师团又1个旅团的强大兵力。同时，在详细研究了之前三次长沙战役失利的原因后，拟定出一个全面包抄薛岳的作战计划。该作战方案不仅包括总体作战计划的拟订，而且具体到每一战斗的方案细则的制订，兵力配置、作战进度、后方兵站、警备以及气候与地理环境等，均作了周详的考虑和部署。

前所未有的强敌

对于日军的军事集结，国军方面也不是毫无准备。军令部第二厅（情报厅）将各方情报整理分析后认为：1944年 3月中旬至5月中旬，武汉方面日军增加兵力约六七万，计约3个师团。实际情况是，日军为实现“一号作战”之湘桂战役的胜利，总共投入150个大队的兵力，比1938年武汉会战时的140个大队的兵力更大。

相比之下，国军最精锐的八个军被抽调去参与缅甸作战，总体战力大打折扣。特别是第九战区的军队，常德会战之后，战力都还没有恢复，兵员与装备严重不足。从主观上看，驻守湖南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因三战三捷而麻痹大意，以为日军“一时不敢再问津长沙”，第九战区许多高级军官都以为“日军兵力因抽调太平洋和东南亚战场，在中国大陆力量薄弱”故而疏于防范。

5月26日，日军第十一军各部队兵分三路向鄂南、湘北之国军发起攻势。36万日军，在优势火力的支持之下扑向国军阵地，攻势之强大远远超过国军的预估。28日，在重庆军事委员会举行的最高幕僚会议上，军令部长徐永昌认为：“此番最显著之迹象，敌军质的方面虽不见甚精良，而量则普遍俱有增加，中国战场（除滇西、滇南外）现

约有敌军34个师团，为武汉会战以后之最高峰。”

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国军内部发生了分歧，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主张主动放弃粤汉路，退守湘桂路，在湘桂边区或桂林地区与日军决战。军令部长徐永昌则主张粤汉路沿线及两翼组织抵抗，节节抵抗消耗日军。鉴于第一战区蒋鼎文和汤恩伯在河南战场抵抗不力，迅速败退，已引起国内舆论的纷纷指责和国际舆论的讥评，如粤汉线再不战而退，必将承受更大的压力。因此，蒋介石支持了徐永昌的方案。

从纯军事的角度看，退守湘桂路，可赢得一个多月的准备时间，其间可从其他战区抽调兵力，从容部署防御阵地，取胜的可能性更大。白崇禧曾形象地比喻："鄂北与广西桂林相距约七百公里，对攻者来说，如同橡皮带一样，拉得愈长，就愈薄弱，超过了极限，就可能绷折。" 最终，蒋介石命令第九战区各部在长沙、浏阳之间与敌决战。

由于对日军的强大攻势估计不足，国军开始仅从第六战区抽调了少量部队增援，没有从其他战区调集兵力。薛岳请求抽调第三、六、四、七战区的兵力增援长沙，遭到蒋介石的拒绝。按当时中国战区的划分，鄂南、湖南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是薛岳；广西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是张发奎；广东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是余汉谋；鄂西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是孙连仲。这四个战区中，第九和第四战区是此次湘桂战役的正面战场；第七及第六战区处于战场边缘。薛岳主张在第一时间抽调邻近战区兵力肯定是有道理的，但蒋介石考虑到分属各战区的部队如临时集中于一个战区，很可能造成混乱，故而未能及时下决心。薛岳只好以第九战区现有兵力勉强迎敌。开战数天之后，蒋介石才意识到此次日军攻势之凶猛，可惜为时已晚。

薛岳大意失长沙

日军按预定作战路线，穿过第九战区的西侧，然后冲向第四战区的中枢，以第九、第四战区国民党军为主要攻击目标。日军在制定作战计划时考虑到：攻克长沙是这次作战的关键，自应全力以赴，并认为"此次攻击，兵力雄厚"，长沙一举可破。

正因为兵力雄厚，日军从一开始就动用强大兵力：第一线部署5个师团并列于湘北、鄂南之华容、岳阳、崇阳一线，另以3个师团部署于第二线监利、蒲圻和崇阳一线，共约15万人。进攻一开始，右翼日军便渡过洞庭湖趋沅江、益阳；左翼日军从通城兵分两路，直扑平江、渣津；中央日军沿粤汉路向汨罗江推进。日军在东西约120公里，纵深约50公里的地区展开规模宏大的野战，这是薛岳没有想到

的，战场之广也超出了“天炉战法”的既定范围。

不明情况的薛岳依然按照前三次长沙战役的思路，使用他看家的“天炉战法”：在湘江东、西两岸，步步阻击，消耗敌军，而将主力部署于两翼，诱敌深入后，在长沙附近围歼日军。这一沿袭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战略部署，早已被日军看穿。此次日军早有防备。横山勇一反过去惯用的孤军深入的战法，以战斗力最强的骨干兵团部署于两翼，致使薛岳的外侧作战难以成功。日军还使用优势的第二线兵团保持纵深阵势，对战略要点实施重点突破。战至6月1日，日军中、左路强渡汨罗江，突破河防阵地后，分路向捞刀河、浏阳河进攻。在日军优势兵力的打击下，守军采取边抵抗边后撤的战法，撤至浏阳附近山区待机。至14日，日军相继攻占沅江、益阳、浏阳。

外侧作战不利，薛岳只好转入内线防御，而沿湘江两岸南下的日军很快进逼长沙。日军以第34、第58师、第68师一部攻击长沙，而薛岳仅以战斗兵员不过1万多人的第四军守备，守备的兵力与阵地绝不相称。无奈之下，薛岳只好命令第四军军长张德能以2个师守长沙城，以1个师守岳麓山。

岳麓山是长沙城的钥匙，耸立在湘江西侧与长沙城隔江相对。攻占岳麓山就可以居高临下，俯瞰长沙城。因此，欲守长沙必先守岳麓；岳麓失守，长沙必危。可是，守备长沙的第四军兵力实在单薄，只得派出第九师防守岳麓山，该师所有战斗兵不过3000人，而防区竟达50里之广。

6月16日，日军以优势兵力猛攻岳麓山阵地，危机之下张德能临时从长沙城抽调兵力增援岳麓山阵地，由于在战斗激烈之时仓促调动，渡江船只准备不足，反而自乱阵脚，动摇军心，导致长沙迅速失陷。情急之下，蒋介石下令枪决逃出长沙的第四军军长张德能，但仍然无法挽回湖南战局的溃败。

衡阳保卫战守住中国军人的荣誉

作 者:纪彭



/ 进攻衡阳前，日军决死队在写遗书



/ 1946 年以前的东条英机肖像，现存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

要打通“大陆交通线”日军有三个要地必须攻克，即长沙、衡阳、桂林。因此在攻克长沙之后，日军继续南下，兵锋直指衡阳。由于横山勇掌控绝对充裕的作战兵力，因此决定在日军包围长沙的同时，也对衡阳进行长距离的奔袭。

日军本可以出其不意地迅速攻占衡阳。但出乎意料的是衡阳竟然是一座坚固的堡垒。驻守衡阳的第10军在军长方先觉的带领下，坚守阵地长达47天。使衡阳几乎成为中国的“斯大林格勒”，差点把日军精心策划的攻势，搞成惊天大逆转。

不怕死的方先觉

1944年6月18日，亦即长沙失守之当日，军事委员会举行最高幕僚会议，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主张放弃在长沙、衡阳之间的抵抗，将防守衡阳的兵力调往桂林，着手桂林防卫战。军令部长徐永昌则主张，必须在长沙、衡阳正面作持久抵抗，两翼则相机与日军展开决战，以消耗日军。徐永昌的意见再次被蒋介石采纳。

6月20日，日军下达进攻衡阳的作战部署。三天后，日军兵临衡阳城下，并以2个师团猛攻衡阳。25日，重庆军委会电令方先觉的第10军死守衡阳。所谓的第10军，根本不能称为一个军。在纸面上，第10军虽有3个师的兵力，实际上各部尚未从常德会战中恢复过来，总

兵力只有一个半师。好在，第10军有方先觉。

方先觉，黄埔三期。在战场上真刀真枪地从排长干到军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方先觉被任命为预备第10师师长，参加了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和三次长沙会战，可谓久经战阵。

方先觉不怕死，更是出了名。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方先觉就曾接到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电话。薛岳问道："阵地能守几天？"方先觉回答："能守一个星期。"当被问到如何"守"时，方先觉坚定地说："一线守两天，二线守三天，三线守两天"。挂下电话，方先觉写下遗嘱。负责转交遗嘱的副官张广宽在看过后，决定将其公之于众。于是在第二天的《长沙日报》以："方师长誓死守土，予立遗嘱"为头版大标题，将遗嘱全文刊登：

"蕴华吾妻：此次我军奉命固守长沙，任务重大，长沙的存亡，关系抗战全局的成败，我决心以身殉国，设若战死，你和五子的生活，政府自有照顾……希吾妻勿悲！夫子珊，民国三十一年元旦。"

时隔两年半，这份遗嘱恐怕仍然有效。不同的是，这一次守衡阳，方先觉不只守了7天，而是坚守47天。

横山勇遭遇钢铁阵地

经三天激战，日军先后清扫了衡阳外围阵地，占领了湘江东岸的机场，并迂回至衡阳之南，截断衡阳守军的退路，从衡阳之西、西南形成了对衡阳的包围。

随即，日军发起总攻，但横山勇明显感觉到，这个阵地不好打。日军以优势兵力攻击城南正面战场的第10军阵地，该阵地迅速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绞肉机"，仅张家山高地一处，双方便反复易手20多次，阵地上留下了上千具鬼子的尸体。在惊人的损失面前，7月2日，日军被迫暂停进攻。

经过一周休整，日军于7月11日晨再次发动总攻击。这一次大量炸弹、燃烧弹和毒气弹向衡阳城倾泻下来，紧随其后的是漫山遍野的日军攻击部队。经过一天的猛攻，付出极大代价的日军还是无法接近守军核心阵地。战至7月16日，日军再次停止了进攻。日军战史称："我军再度发起总攻击，与上次一样，仅夺取极小部分阵地外无所进展，损失却更惨重，大部分步兵连已由士官代理连长，战况并不乐观，于是攻击再度停止。"

此时，日军还不死心，17日，又对衡阳进行了猛烈轰炸，并试图压缩包围圈，但收效甚微，不得不在19日再度停止进攻。21日，日军又佯装退兵，想引诱守军出击，方先觉自然不会上当。无奈之下日军只好空投下大量“归来证”，想诱降第10军将士，第10军的弟兄们置之不理。

蒋介石咆哮，东条英机下台

衡阳能守到此时，已经超出了蒋介石的预期。在河南溃败与长沙失陷的打击下，国民政府遇到了抗战以来最大的危机。国内外舆论对中国军队的失败表示失望，这使得作为国军最高统帅的蒋介石感到莫大的压力。7月中旬，美国总统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提出了史迪威直接指挥中国全部军队（包括中共军队）作战的方案。

罗斯福的这一提议深深地刺激了蒋介石，7月21日，在军事会议上，他痛心疾首地说：“自从这次中原会战与长沙会战失败以来，我们国家的地位，军队的荣誉，尤其是我们一般高级军官的荣誉，可以说扫地已尽。外国人已经不把我们军队当作一个军队，不把我们军人当作一个军人！这种精神上的耻辱，较之于日寇占我们的国土，以武力来打击我们，凌辱我们，还要难受！”据徐永昌记述，蒋介石当时“声色俱厉，数数击案如山响”。

可战争就是个神奇的玩意儿，胜负往往就在弹指间。斗转星移，到了7月下旬轮到东条英机哭了。日军在衡阳城下裹足不前，甚至造成了东京的政治地震。当时，东条英机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面临辞职压力，急需日军再来一个大胜利方能保住首相的位子。为此，东条给横山勇下了死命令。日军被迫重新调集所有的兵力，围攻衡阳。但方先觉的第10军也不是吃素的，日军不得不陷入肉搏战，双方在充满血水的壕沟之中厮杀；每天都在焚烧腐烂的尸首。几天下来，日军只向前推进了2公里。直到7月底，日军仍无法攻下衡阳。此时，日本又在缅甸和塞班岛连遭惨败，天皇终于对于战局感到震动，在元老重臣集体的施压下，东条被迫辞职。

衡阳：中国的抗战纪念城

围绕衡阳的攻防战已经到了最后时刻，为了解救第10军，国军各部均全力支援，无奈日军在衡阳外围设下多面埋伏，各部援兵始终无法突破日军阻击阵地。第10军也只好靠一些美军的空投物资，勉强维持。27日，中国空军向衡阳城内投下蒋介石的手令：“命令第10军坚守待援。”

仗打到这个时候，日军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惊人的伤亡迫使横山勇一度考虑，这么打下去是否值得。此时的衡阳已经是一个符号，是意志力的比拼，谁都输不起。最后横山勇决定，把第11军的全部家当拿出来赌。他再次调整部署把最后的预备队——第13师团和第58师团也投入作战，准备给方先觉最后一击。

8月2日，日军对衡阳发动最后一波的攻势。同日，蒋介石再次通过空投向方先觉下达命令“此次衡阳之得失，实为国家存亡所关，决非普通之成败可比……各路增援部队，今晨皆已如期到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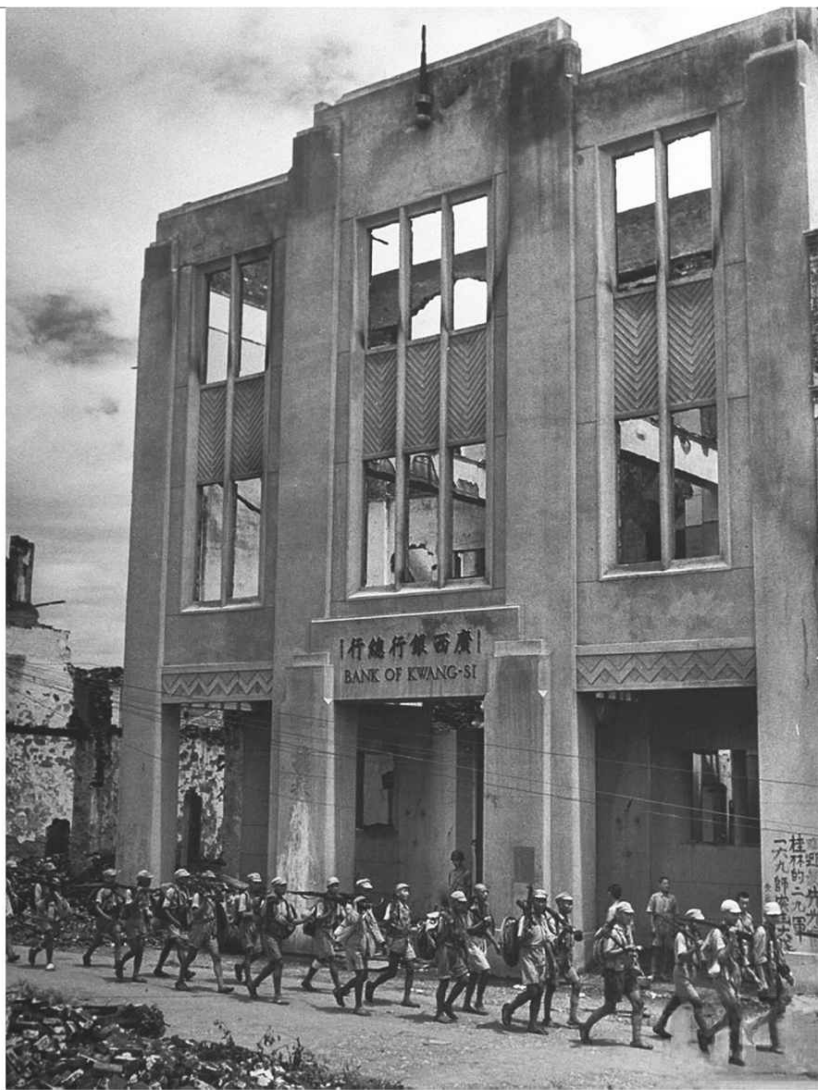
此时，横山勇带病督战，四个参战的日军师团长，更是不敢怠慢，全部亲临一线陪同，准备随时把老命搭上。各师团纷纷组织敢死队，发起集团冲锋。日军第57旅团长志摩源吉少将竟然亲自担任敢死队队长，带队冲锋，战死衡阳。第58师团长毛利末广中将负伤后不肯就医，躺在担架上指挥作战。

战至8月8日，守城官兵终于弹尽粮绝，而攻城日军也损失惨重，无力再战。双方经过交涉之后，在日军允许保持军队建制与荣誉，以及救助受伤官兵的条件下，守军结束了孤军拒敌的抵抗。衡阳之战以交涉之“终战”而结束，而非投降日军。第10军的作战精神也获得日军的敬意。此战第10军所部伤亡15000余人，其中阵亡约7600人，被俘约2600人；日军伤亡约19380余人（日军陆军部官方数字：12186），其中高级将领战死390名，负伤520人。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把衡阳定为抗战纪念城。1947年8月10日，衡阳抗战纪念城在岳屏山顶举行命名奠基典礼时，蒋介石亲自宣读训词：“我第10军残余部队，喋血苦守此兀然孤城者，历时47日之久，此为全世界稀有之奇绩，而我中国有道德之表现与发扬，亦以此为最著。”

桂柳会战在泥潭中挣扎的胜利者

作 者:纪彭



/ 1945年8月，国军第二十九军第一六九师进入被日军蹂躏过的桂林市区

1944年，对于日本人来说，已经是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中美两国的空中力量已经完全超过日军，整个中国战场的制空权已经基本掌握在盟军一边。从桂林、柳州、衡阳等地起飞的盟国轰炸机，频频攻击日本人的后勤补给线，给日军造成极大困扰。

1943年11月25日，陈纳德的航空队对台湾新竹机场的空袭，使日本人惊恐万分。试想，如果中美空军封锁了台湾海峡，日本本土与太平洋战场的联系就被切断，不仅东南亚的战略物资无法运回国内，就连在南方的50万大军都会陷入绝境。

于是，1944年1月，日本大本营制订了用于自救的“一号作战”，目标有两个：“一、打通大陆交通线；二、摧毁盟国在华南的空军基地。”随着长沙、衡阳相继失陷，日军兵锋指向了他们最后一个目标——桂林，如果夺取桂林和柳州，就完成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略构想，同时也可以把盟国空军基地扫平。

经过4个多月的奋战，日军在河南、湖南两个战场取得了胜利，歼灭了几十万国军。此时他们距离年初制定的战略目标已经越来越近。可东条英机却没能熬到“一号作战”胜利的那天，1944年6月16日，美军对马里亚纳群岛（东条规定的绝对国防圈）发起攻击。在马里亚纳海战中，小泽治三郎指挥的日本联合舰队再遭惨败，航空兵几乎损失殆尽。7月9日，美军占领塞班岛，B-29轰炸机群开始直接空袭日本本土。此时，失去了天皇信任的东条英机召开了最后一次内阁会议后，递交了首相辞职书。

当1944年即将结束时，日本人终于胜利地打通了大陆交通线，扫清了华南的美国空军基地。但是，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国军仓促应战

1944年8月8日，衡阳沦陷。白崇禧立即建议把原本救援衡阳的各部迅速回撤，做好防守桂林的准备。从日军的战略意图看，占领衡阳后必将西进，攻占桂林。但蒋介石为了防止撤退中部队的溃散，也为了保证国际观感，还是决定把部队留在衡阳附近待机。直至8月下旬，才放弃反攻衡阳的企图，调整部署。

正当国军各部重新部署之时，日军已经完成了休整，并再次调整部署，成立第6方面军，以冈村宁次为司令官。横山勇的第11军所辖第3、第13、第37、第40、第58、第116师团共6个师团，加上战车、重炮联队于8月29日由衡阳沿铁路向湘桂边界推进。当16万日军杀向桂林、柳州时，国军尚未做好准备。

经过长衡会战，国军各部都已损失很大，表面上看国军在桂林和柳州地区有11个军。实际上，第97军很晚才投入战斗，第10军则是从衡阳逃出的小股部队组成，几乎是一个空番号。剩下的9个军大都不满员。桂系第31军和第46军还算齐装满员，共计有近5万人。中央的第93军13000人左右，第79军6000来人，从广东到广西来的粤军第64军有4000多人，第20军、第26军和第62军都已经打残了，每个军就3000多人，简直和一个完整的步兵团差不多。最可怜的第37军只有1700来人。因此11个军的部队，加在一起只有约12万人。

在9月11日召开的军事委员会上，白崇禧再次力主撤全州之兵以保桂林。他认为，全州难以坚守，不如集中力量保桂林，并担保桂林可守三四个月以上。徐永昌则以“全州弹药，足供三个月之用，且全州地形较衡阳为佳，尤利于守” 为由力主守全州。这一次，蒋介石总算接受了白崇禧的主张，但为时已晚。

日军靠缴获过日子

日本方面投入桂柳会战的兵力有16万，但经衡阳之战也都是疲惫之师，尤其是后勤补给已经陷入绝境。

为了实施“一号作战”，日本人在物资贮备上并不缺乏，但此时日本人已经失去了制空权，后勤补给线频遭打击，几乎瘫痪。据《大东亚战争全史》记载，“（1944年9月）我空军兵力不足，加之补给不易，推进基地困难；敌我双方实力，在数量上大约是750对150。”日本人不禁伤感地写道：“（1942年）以前对华作战时，我方始终以绝对优势的空军力量完全掌握制空权，相形之下，现在（一号作战期间）正好颠倒过来。（1944年）夏，当第11军向衡阳方面追击时，在敌空军力量处于优势的情况下，我第一线部队和后方部队都被迫不得不在白天隐蔽，而只能在夜间作战。” 因此湘桂作战一开始，日军的后方联络线就一直遭到美国空军的袭击，无论陆路水路均被切断。

没有了后勤补给，日军的攻势举步维艰。还好，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并不是只帮共军，对日本人也一视同仁。在藤原彰所著的《中国战线从军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在豫湘桂战役后期，实际上打通大陆交通线已经没有多少战略意义了”。可是“我们身处第一线的作战部队反而对新的大规模作战抱有很大的期望”，“那是一种对于日军尚未践踏的土地进行侵略的希望和期待。因为一旦侵入到那里，就能得到丰富的物资”。

在“缴获物资”的支持下，在“未来可能的缴获物资”的激励下，11月9日，日军第40、第58、第37师和第34师团一部，向桂林城发起总

攻。同日，日军第23军第104师团、第11军第3师团及第13师团突破国军防御阵地，攻向柳州。战至11日，日军攻克桂林。据日军第11军统计，桂林战斗中日军缴获各种口径的火炮156门、重机枪110挺、轻机枪359挺、步枪2737支。

仗打到这时，攻守双方都只剩下最后一口气。此时，日军南方军第21军一部从越南突入中国，向广西扶绥进攻，日军沿黔桂铁路进攻的部队攻至贵州独山，国军各部被迫撤退。至此， 日军大陆交通线全部打通。

毫无意义的胜利

日军虽然成功打通了大陆交通线，并摧毁了大部分盟军在中国的机场，基本达到了战役目的。但从战略层面看，所有的目标都落空了。日军无力保障大陆交通线畅通，由于兵力进一步分散，战役后不久，日军便不得不撤出部分地区；日军虽然攻占了盟军在华南的机场，可是在“一号作战”期间，美军攻克了塞班岛，在中国的B-29轰炸机全部转场塞班岛，对日本本土的轰炸一天也没停止。日军集中最后战力的孤注一掷，换来的却是战略形势的进一步恶化，反而加速了自己的败亡。

经过8个月苦战，日军在取得胜利之后，反而造成在整个中国战场兵力严重空虚，兵力进一步分散，机动力量进一步减少，为敌后活动创造了更大空间。在豫湘桂战役之初，国军刚开始溃败时，5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在河南地区组织抗日游击队和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7月至10月，八路军、新四军先后建立和扩大豫东、豫中、豫西等抗日根据地，恢复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加强了华中与华北、陕北战略区的联系。八路军和新四军一路建立根据地。可以说，豫湘桂之战是在抗战的最后时刻，改变了中国国内的战略力量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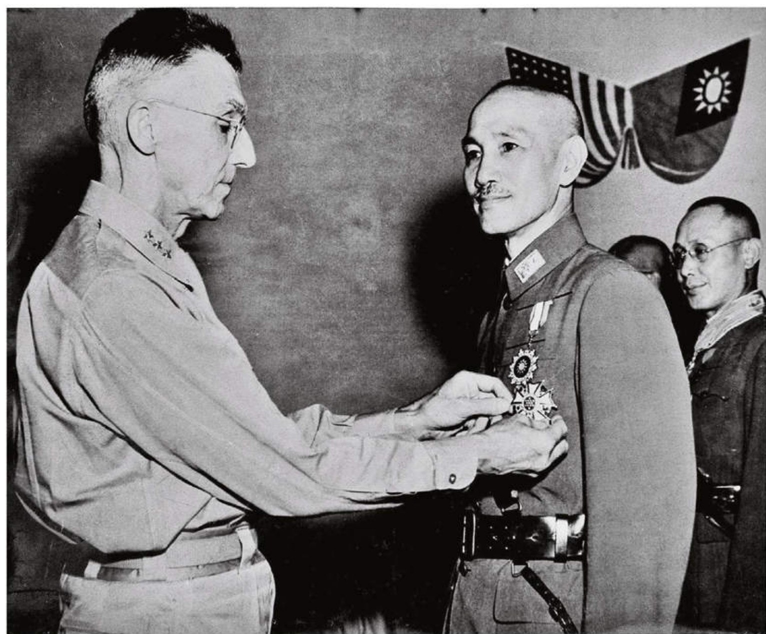
豫湘桂战役，使美国人丧失了对蒋介石的信任，对国军的能力产生了严重怀疑。1945年1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罗斯福要求“俄国在其能力范围内尽早参加进攻日本”，以减轻美国的负担。在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狮子大开口，获得了外蒙独立、中东铁路和租借旅顺口等重大权益。自己种下的苦果只有自己吃，蒋介石不禁感叹道：“国土丧失之广，战地同胞流离痛苦之深，国家所受的耻辱之重，实为抗战中最堪悲痛一页。”等到8个月之后，日本人突然投降时，蒋介石才发现，国军各部尚未从豫湘桂的惨败中恢复过来，而他的“新对手”已经从豫湘桂战役中获得了足够的筹码。

都梁：国民政府没解决好国与民的关系

作 者:李响



/ 1944年10月24日，豫湘桂战场某处，国军展示缴获的日军装备



/ 1944年，史迪威（左）给蒋介石授勋。二人的矛盾是影响豫湘桂战役走向的因素之一

《大崩溃》

都梁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2年11月

首度还原豫湘桂大战血战日军的历史画卷，悲恸描述衡阳保卫战的每一个细节，深度思考中日两国的昨天以及未来， 前人所犯的错误，我们还会再犯吗？前事不忘，警世之作！

都梁：上世纪50年代出生在知识分子家庭，少年参军，退伍后做过教师、公务员、公司经理、石油勘探技术研究所所长。已出版《亮剑》、《血色浪漫》、《狼烟北平》、《荣宝斋》等小说，并将这些作品改编为同名电视剧剧本。

《亮

剑》迄今重播四千多遍，创了中国电视剧播放纪录，李云龙家喻户晓，但创造这一角色的都梁，是一个有点陌生的名字。都梁不爱接

受采访，不在媒体刊登照片，他怕走在街上被人认出来，“这日子就没法过了”。有记者问他真实的姓氏是什么，他说：“既然我现在以都梁‘问世’，大家就叫我都梁吧”。

1999年，都梁嫌市面上没有好小说，朋友说有能耐你写一个。都梁那时是个“下海”的退伍军人，从未搞过文学创作，他当即和朋友打赌说“写就写”，一年后赌出一部《亮剑》。

2009年，都梁觉得中国没有《战争与和平》、《战争风云》那样的史诗军事小说，很“不过瘾”。为了过瘾，他想干脆自己写一部。

“潜水”三年，毫无动静。最近，都梁突然浮出水面，携一本52万字的《大崩溃》，再现豫湘桂会战国军抗日悲壮史。都梁自言，这次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国军消极抗战是极左时代的观点

都梁很早就开始关注豫湘桂会战。抗战八年，正面战场上中日双方进行了二十二次大会战，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中国军队胜少败多，但还没有哪一次会战像豫湘桂战役这样，雪崩般大溃败。而且这场溃败发生在距离抗战胜利只有一年的时候，当时日军已是强弩之末。都梁感到奇怪，决定到史料里一探究竟。

原计划用两年时间，写部40万字的小说。结果，仅在海峡两岸查阅辨别史料，就花了一年多。然后开始动笔，写到40万字时，发现远远打不住。这场战争的复杂和宏大超出了他的想象。“大国幕后交易出让中国利益，战后国共政权易手，包括二战遗留的钓鱼岛问题，都与豫湘桂战役密切相关。越写越感到，豫湘桂非同小可，它对中国战后历史乃至世界格局影响之深，直到现在我们都没有完全梳理出来。”

都梁声明，他不是历史学家，“充其量只是个业余作家”，小说中的观点和史实肯定有不少错误，需要读者指正。他尽可能在小说中表现真实的历史，还原当年的细节。都梁举例说，在影视剧里，国军军官总是一身笔挺美式军服，皮靴锃亮，泡酒吧，喝咖啡，吃西餐；远征军、中央军那样的精锐部队，装备武装到牙齿。而在都梁的考证中，实际情况是超出现代人想象的。当时的中国军队除驻印军外，从远征军、中央军到地方部队连鞋子都发不起，下级军官和士兵一律穿着自己打的草鞋。军装也是三年一发。“质量不怎么样的粗布军装穿在整日摸打滚爬、行军作战的士兵身上，而且要穿三年，会是什么样状况？”《大崩溃》的主人公满堂、铁柱两兄弟刚刚被国军抓壮丁

时，部队发给他们的军装上面满是弹孔和血迹，是从死人身上扒下来的衣服。“从这些细节上可以看到，当时的中国军队面对强敌处于何种艰苦卓绝的状态。”

都梁在《大崩溃》里写道：“一个排长的军饷只有法币38元，以当时的物价，集市上一碗面条就得3元，38元的军饷还不够买两双好点的草鞋。俗话说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可怜堂堂的国军竟成了捡破烂的叫花子。”

《亮剑》写的是“土八路”，《大崩溃》则完全着眼于正面战场。都梁的“粉丝”都对他的题材转变感到好奇，想知道他对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表现如何评价。都梁说，“应该承认国民政府抗战意志还是很坚决的，国军消极抗战恐怕是极左时代的观点。”但他发现，近年来一些人的观点走向另一个极端：只强调正面战场，认为八路军在敌后基本没有作战，保存实力，游而不击。“过去说国民党躲在峨眉山里不抗战，等胜利了才下山摘桃子，现在又有人说是共产党在胜利后下山摘桃子。”都梁认为这种史观是片面狭隘的。“历史问题哪里有这么简单？用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去看待历史是不会有什么益处的。”

对于抗日影视剧中将日本军人一律“妖魔化”的做法，都梁也不认同。“延安就有日本战俘组成的‘日本反战同盟’，还有些日本人在战争一开始就是反战的。”《大崩溃》有一个线索式的配角人物，日本下级军官山田圭一，他出身于信仰佛教的家庭，同情中国无辜百姓。都梁强调，山田圭一并不代表着日本普通国民在这场战争中的普遍状态。“据我所知，当时的日本国民绝大多数都是自觉自愿地投入到战争中，整个大和民族处于一种狂热状态，富于理性的思想者是极为罕见的。”

主要写战争，其次是人物

从《亮剑》到《血色浪漫》，都梁的作品一直以情节引人入胜、人物鲜活生动而著称，以致评论界有观点认为，都梁的作品只是“好看”，非正统意义的“文学”。《大崩溃》的题材背景决定了这部小说与都梁以往作品都有本质区别。《亮剑》是以人带史，主要是写人物，写主人公在历史事件中的命运。“这类手法比较讨巧，也容易被很多读者接受。书中所有人物都是为李云龙的存在而设置的，就是连历史事件都是为他服务的，这样的人物不出彩才怪。”

而《大崩溃》要把一场规模空前的战争在小说中表现出来，都梁表示“才能有限”，无法用以人带史的手法囊括一切。他选择以史带

人，主要是写战争，其次是战争中的人物。

都梁认为，这种全景式的写法会牺牲小说的“好看”程度。“主人公的人物形象鲜明度肯定不如李云龙。但我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赫尔曼·沃克的《战争风云》、《战争与回忆》，都没有太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写史必然损失鲜明人物和故事情节，没有哪一个作家能逃出这个命运。”

翻阅整本《大崩溃》，主要女性角色只有两个，且出场率较低，恋爱情节所占篇幅很小。《亮剑》被称为“男人写给男人看的男人戏”，《大崩溃》更是如此。都梁承认，如果一些女性读者偏爱细腻的情感描写，这本书恐怕不是为她们写的。

在《大崩溃》中，都梁设置了两组虚构人物作为主角：蔡继刚和蔡继恒兄弟，满堂和铁柱兄弟。蔡氏兄弟一个是弗吉尼亚军校毕业的少将，一个是西南联大历史系投军的飞行员，他们代表了国军最优秀的青年军官，有勇有谋，满怀救国之志。通过他们的眼睛，都梁让读者从高处俯瞰整个战争的形势、民族的命运，使读者近距离观察薛岳、方先觉、吕公良、李家钰等国军抗日名将，体会他们在战场上的艰难和悲壮。同时，都梁也借蔡氏兄弟，冷眼旁观国军的派系斗争和政治纠葛，批判了国军败退的内部原因。

如果蔡氏兄弟是正面战场精英阶层的代表，佟满堂和史铁柱则是广大草根战士的典型。在小说中，1938年花园口决堤使史铁柱父母双亡，他被佟家收留，从此佟满堂成为他的异姓哥哥，两人情同手足。两兄弟出场不久，就用粪叉菜刀抢劫了汤恩伯的汽车、枪械和美国罐头，分给饿极了的乡亲们。日军为收买百姓给村里发粮，满堂、铁柱便认准“皇军够意思”，不像保长、县长“那帮鳖孙就知道抢老百姓的粮食”。都梁借蔡继刚的口感叹道：“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比战场上的失利更令人沮丧。”

满堂和铁柱后来被国军抓了壮丁，时时刻刻想着开小差，又被日军抓去成了战俘。死里逃生回乡，看到亲人已被日军杀害，两兄弟终于决心跟着国军抗日，杀日本鬼子报仇。他们心中没有蔡氏兄弟那样清晰坚定的家国情怀，只有朴素的是非观和正义感。

“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数百万军人大部分都是像佟满堂、史铁柱这样的农民组成的，如果我写抗日战争，这种人物是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除了查阅史料，都梁也通过采访亲历豫湘桂战役的老兵获取历史细节。“这些老兵当年都是非常年轻的普通士兵，对于战争走向、战略方针这些宏观的事物并不懂，但他们能讲出在战争中

的切身感受。”

拼老命也要写完豫湘桂

都梁认为，造成“大崩溃”的最重要原因，是当时的国民政府没有解决好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他对满堂、铁柱这样的老百姓深怀理解和同情。“当时的中国还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大部分中国民众也缺乏国家与民族的概念，常年的战乱和天灾人祸使他们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政府部门除了收税，对自己的人民所能提供的帮助是很少的。这样就带来一个恶果，民众在最需要国家的帮助时却感受不到国家的存在，而国家遭到外敌侵略时，政府又要求民众担负起对国家的义务，去拿起武器流血牺牲。这种不公平的治国方式在战时不可能得到广大民众自觉自愿的参与。”

小说中，两兄弟对“国家是个啥”的讨论耐人寻味。满堂说：“国家在哪儿呢？咱摸不着看不见，过日子遇到难处了，你还没地方找它。等国家遇到难处了，它该找咱了，咱不去还不成。”铁柱说：“打鬼子你扒黄河干啥？鬼子打招你了，俺家又没招你？哥，这事可是那什么……国家干的吧？”满堂回答不了弟弟这么复杂的问题。带着疑问，铁柱惨烈地牺牲于衡阳保卫战，为“国家”献出了生命。

都梁认为：“一个成熟的现代国家，国家与民众的关系应该形成这样一种理念：人人为国家，国家为人人。一个国家的强大与否和这种理念的形成有很大的关系，关键的问题在于官方和民间各种力量能否有效合作。”在钓鱼岛问题白热化时，都梁在网上看了网友的议论。他感到，“时至今日，抗日战争已经过去六十七年，国家和民众的关系仍然没有完全解决好，这个关系解决不好，再遇到战争，我们仍有失败的可能。”

都梁认为，当今年轻人接受的抗战历史教育非常不足，应该让后辈人全面、客观地看待历史。

有朋友劝过他，小说还是不要用“大崩溃”这个名字，结合当今的国际形势，应该用一个鼓舞人心，令人振奋的名字。都梁拒绝了这个建议。“历史就是历史，它绝不会因为你个人的好恶而改变，况且惨痛的历史往往可以使后人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

《大崩溃》的结尾，都梁写下“第一部完”四个字。“坦率说我也快崩溃了”，写作过程艰难，几乎“要了半条老命”。他常常感到身体透支，力不从心，遇到瓶颈时恨不得砸了电脑。第一部写了豫中会战和长衡保卫战，在第二部中，他将写完桂林保卫战、柳州保卫战，直至

独山战役。“《大崩溃》的第二部何时能完成？我也不知道，但只要我还活着，豁出去拼着那剩下的半条老命也要完成。”

编读

《国家人文历史》第八期和读者见面了！自从过了春节，《国家人文历史》又变得太平起来。解放军、宋教仁、斯大林，还有这期的“豫湘桂会战”都是比较“硬”的主题。

说起这一期的豫湘桂会战，小编我就悲从中来，国军真是太不争气了。当年，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秘书长王子壮在日记写道：“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实在对不起民众”云云。许多国民党高官感叹：“论选举，肯定选不过共产党，论打仗，也打不赢”。一个原本有朝气的党，怎么就变成了一个唯利是图又死气沉沉的利益集团？这不能不叫人悲叹～

@墨者邢槐：最新一期的《国家人文历史》是改名以来我最喜欢的一期，我们一般讲辛亥革命讲到推翻清朝的破坏工作便戛然而止，然后跳到袁世凯“盗取革命果实”。但正是中间的这段空白，才是辛亥革命的建设性所在，只有了解这段建设历程，才能真正去谈辛亥革命为何没有完全成功。

值班编辑：这一期杂志做出来之后，新浪历史、东方历史评论也做了相关的选题，一下子把宋教仁案和中国第一届国会炒热。至今仍有许多志士仁人为中国民主进程在那一年的中断而扼腕。迟云飞老师在接受我们国历沙龙邀请时说：“希望我们做这个题目，能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尽到一点力。”

@GutenbergProject：在近期关于宋教仁有关的杂志出版中，人民日报社主办的这期《国家人文历史》最为全面。虽为杂志，不是专业论文，还是值得关注中国政治进程的人留意。相信看完，不少人对孙中山、袁世凯，以至那段在教科书中都很少提到的历史了解更多一些和全面一些。我还极少在一次飞机航行中没看完一期杂志。

值班编辑：《国家人文历史》已经在大部分的机场和高铁上铺货，旅途中的无聊时光就靠这个吧！我们呈现的历史不是学术化的脸孔，但会尽量做到真实又靠谱，更不会刻意遮掩和歪曲史实，请各位朋友多多指教。

@苏雨农：《国家人文历史》一篇文章介绍白蛇传故事的发展历史，从吃人的蛇妖到法海不懂爱，很有意思，摘录如下：最早的白蛇故事是勾引书生，将其化为血水；到了三言二拍的作者时期，首次写

了追求人间幸福的白娘子，其后故事又在民间丰富和演化，增加了盗仙草、水斗、断桥等情节。

值班编辑：这篇文章原本规划为4页，作者找了大量有趣的资料。临到用时，由于版面有限，差点给毙了。还好几个编辑力挺，才保留了2页的篇幅。主编大人啊~你要听听群众的心声！

年历

4月下April

16

1963年4月

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写出著名的伯明翰狱中来信。

/1963年，马丁·路德·金在伯明翰监狱

17

1943年4月

二战欧洲苏德战场爆发“库班大空战”。德军为夺回库班的梅斯哈科苏军登陆场，向苏军滩头阵地实施猛烈反冲击。

18

1943年4月

日本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座机被美国陆军航空队于所罗门群岛的布干维尔岛上空击落，山本身亡。

/山本五十六在军事会议上

19

1933年4月

罗斯福取消金本位制，旨在禁止除属于外国的一切黄金的出口，使美国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保持平等的货币基础。

20

1653年4月

英国军事将领奥利弗·克伦威尔用武力解散英格兰联邦的残缺议会，自任“护国主”。

/奥利弗·克伦威尔武力解散残缺议会

21

前753年4月

古罗马神话中，罗穆卢斯和瑞摩斯两兄弟这天在帕拉蒂尼山开始建立罗马城。因最初建在景色秀丽的七座山丘之上，也被称为“七丘之城”。

22

1993年4月

东北工学院更名暨恢复东北大学校名。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先生受聘为东北大学名誉校长。

23

1853年4月

沙皇尼古拉一世命令俄美公司占领库页岛，同年8月，建立了以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命名的哨所，并宣布库页岛主权为俄国所有。

24

1993年4月

南非黑人解放运动领导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主席奥利弗·坦博病逝于约翰内斯堡。

25

1953年4月

美国生物学家沃森和克里克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核酸的分子结构：脱氧核糖核酸的结构》一文，首次提到DNA的双螺旋形结构。

26

1913年4月

袁世凯为了筹集战争经费，消灭南方国民党的势力，以办理善后为名，未经国会讨论通过，擅自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

/袁世凯发行的善后大借款债券

27

1903年4月

上海开展拒俄运动，抗议沙俄的侵略行径。清朝却以“名为拒俄，实则革命”，勾结帝国主义进行镇压。

28

1913年4月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散文家杨朔出生，今年诞辰100周年。作品多歌颂新时代、新生活和普通的劳动者，代表作有《荔枝蜜》。

/1961年，杨朔在漓江

29

1993年4月

海峡两岸授权民间团体的最高领导人汪道涵和辜振甫，在首次“汪辜会谈”后，签订《汪辜会谈共同协议》等4份文件，两岸关系取得新进展。

30

1803年4月

美国从法国以1500万美元购买路易斯安那地区，疆土隔夜加倍。

/1803年4月30日至1804年3月27日美国疆土

4月下April

16

1963年4月

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写出著名的伯明翰狱中来信。

/1963年，马丁·路德·金在伯明翰监狱

17

1943年4月

二战欧洲苏德战场爆发“库班大空战”。德军为夺回库班的梅斯哈科苏军登陆场，向苏军滩头阵地实施猛烈反冲击。

18

1943年4月

日本联合舰队总司令山本五十六座机被美国陆军航空队于所罗门群岛的布干维尔岛上空击落，山本身亡。

/山本五十六在军事会议上

19

1933年4月

罗斯福取消金本位制，旨在禁止除属于外国的一切黄金的出口，使美国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保持平等的货币基础。

20

1653年4月

英国军事将领奥利弗·克伦威尔用武力解散英格兰联邦的残缺议会，自任“护国主”。

/奥利弗·克伦威尔武力解散残缺议会

21

前753年4月

古罗马神话中，罗穆卢斯和瑞摩斯两兄弟这天在帕拉蒂尼山开始建立罗马城。因最初建在景色秀丽的七座山丘之上，也被称为“七丘之城”。

22

1993年4月

东北工学院更名暨恢复东北大学校名。著名爱国将领张学良先生受聘为东北大学名誉校长。

23

1853年4月

沙皇尼古拉一世命令俄美公司占领库页岛，同年8月，建立了以沙俄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命名的哨所，并宣布库页岛主权为俄国所有。

24

1993年4月

南非黑人解放运动领导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主席奥利弗·坦博病逝于约翰内斯堡。

25

1953年4月

美国生物学家沃森和克里克在《自然》杂志上发表《核酸的分子结构：脱氧核糖核酸的结构》一文，首次提到DNA的双螺旋形结构。

26

1913年4月

袁世凯为了筹集战争经费，消灭南方国民党的势力，以办理善后为名，未经国会讨论通过，擅自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

/袁世凯发行的善后大借款债券

27

1903年4月

上海开展拒俄运动，抗议沙俄的侵略行径。清朝却以“名为拒俄，实则革命”，勾结帝国主义进行镇压。

28

1913年4月

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散文家杨朔出生，今年诞辰100周年。作品多歌颂新时代、新生活和普通的劳动者，代表作有《荔枝蜜》。

/1961年，杨朔在漓江

29

1993年4月

海峡两岸授权民间团体的最高领导人汪道涵和辜振甫，在首次“汪辜会谈”后，签订《汪辜会谈共同协议》等4份文件，两岸关系取得新进展。

30

1803年4月

美国从法国以1500万美元购买路易斯安那地区，疆土隔夜加倍。

/1803年4月30日至1804年3月27日美国疆土

排行

2013年全球最受员工爱戴的CEO

美国知名职业网站Glassdoor近日公布了“2013年全球最受员工爱戴的CEO排行榜”，Facebook创始人兼CEO马克·扎克伯格的支持率从去年的85%上升至今年的99%，成为“全球最受员工爱戴的CEO”。在今年的榜单中，靠前的位置基本上都被高科技公司、咨询公司和金融机构的CEO所占据。前50位中，仅有一位女士上榜，即排在第42位的“维多利亚的秘密”CEO雪伦·特尼。

1.马克·扎克伯格 所在公司：Facebook

员工评价：“他自上而下创建了Facebook这个开放的社区，员工们彼此信任，同时有着很强的社区意识和驱动力，而这些都是我们的杰出的CEO灌输给我们的。”

2.比尔·麦克德莫特（左）和施杰翰 所在公司：SAP

员工评价：“公司拥有相当丰厚的福利制度，两位CEO都非常优秀。”

3.鲍达民 所在公司：麦肯锡

员工评价：“在应对不同行业、不同案例、不同人群的过程中，员工能够获得丰富的经验，而公司的老员工们都乐于帮助新人。”

4.吉姆·特利 所在公司：安永会计师事务所

员工评价：“公司拥有灵活的工作时间和项目安排，同时还有大量的学习机会，而上司也乐于教导员工。”

5.约翰·斯克利福斯克 所在公司：西北互助人寿保险公司

员工评价：“公司拥有完善的管理制度、优秀的管理能力、合理的销售周期，同时非常关注与客户的接触。”

6.弗兰克·杜泽 所在公司：高知特

员工评价：“公司高层能够高瞻远瞩地带领公司前进，而弗兰克·杜泽是一位富有领导魅力的CEO。”

7.乔·图斯 所在公司：EMC

员工评价："公司高层管理有着相当强的工作能力，能够为公司带来丰厚的盈利，而公司对员工的关心更是无微不至。"

8.保罗·雅各布 所在公司：高通

员工评价："他能够让工程师保持积极向上的工作心态，并以此来推动公司的发展，在高通，每个员工都可以自由尝试并提供他所认为正确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9.理查德·戴维斯 所在公司：美国银行

员工评价："他是一位出类拔萃的CEO，我曾见到过他并因此而倍感荣幸，目前他还是大学里的兼职讲师。"

10.皮埃尔·纳特米 所在公司：埃森哲

员工评价："在埃森哲，你的职业咨询师或主管居然会对你和你的职业进行投资。"

全球"最具文化活力品牌"排行榜

美国咨询公司Added Value2013年3月21日发布一份被认为最"有梦想、鼓舞人心、大胆和令人激动的""最具文化活力"品牌排名，谷歌、苹果和三星位居前三。该报告对15个行业部门、160个品牌的"文化活力"进行了分析，共有10个国家的6.2万多人对其调查作出了回应。业界人士指出，这份报告将增强股东的担忧情绪。

1.谷歌（Google）

2.苹果（Apple）

3.三星（Samsung）

4.宜家家居（IKEA）

5.微软（Microsoft）

6.索尼（Sony）

7.宝马（BMW）

8.奥迪（Audi）

9.可口可乐（Coca-Cola）

10.ebay

2012年度中国当代水墨画家

最具学术影响力十强

这一榜单由香港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研究中心及中国当代美术批评家、权威媒体于2013年1月30日公布。主要参照中国当代水墨画家的学术地位、社会影响力、画作成交价、

增值幅度等四项主要指标。

1.黄永玉

2.石齐

3.范曾

4.贾又福

5.陈老铁

6.陈平

7.史国良

8.吴山明

9.方增先

10.韩美林

外刊

埃及，世界的主人

法国《趣味盎然·历史》 /2013.3-4

如果要评价古埃及法老们的丰功伟绩，拉美西斯二世创造的辉煌不能不谈。作为古埃及第十九王朝法老，拉美西斯二世在执政的六十七年间将埃及带入了强盛时代，社会文明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从小受到父亲塞提一世的熏陶，拉美西斯便知道自己是要改变埃及历史的君主。孩提时代，拉美西斯进入“法老学校”学习，10岁时就在军中任职，15岁时已跟随父亲驰骋战场。作为国王必须获得的技能：以军事手段征服敌人，这是拉美西斯统治王国以及在世界树立自己影响力的根本战略。在位期间，拉美西斯二世进行了一系列的远征，包括恢复埃及对巴勒斯坦的统治，和中东地区建立起一种特殊的外交关系。

公元前1283年，拉美西斯与地处小亚细亚的赫梯国王签署的停战条约，成为人类历史上现存最早的国际条约，也是历史上第一次两个强国为争夺境外地区的霸权和划分势力范围而进行的停战交涉。

为了让臣民和世界记住他的成绩，拉美西斯非常注重宣传，热衷在王宫、神庙等建筑墙壁上刻下战争的恢弘场景，以及塑造各种雕像和撰写碑文，以此展示埃及军队的强大实力和国王统治的壮举。如今，这些雕刻在辛拜勒神庙、卡纳克神庙、卢克索神庙的艺术品已经成为宝贵的遗产。

拉美西斯二世不仅在军事和建筑上有着非凡的才能和兴趣，在治理国家方面也有过人的胆识和魄力。保障劳资关系的工作合同首次出现，给农村寡妇发放食物补贴，官员根据绩效考核升迁，甚至外国雇佣兵如果做出特别贡献，可以奖赏其土地使他一夜间成为埃及的地主。法老是代表神的旨意在爱护他的子民，所有资源、物产以及产品的拥有和再分配都是法老独享的权力。建设一个互助、平等、自由、文明的社会，打造“埃及梦”成为拉美西斯二世的治国目标。

此外，在第十九王朝时期，埃及妇女的地位获得大大提升。她们拥有和男性一样的法律地位以及财务独立权利。婚姻提倡的自由和平等，让女性在家庭中不再是男性的附庸，更多成为家庭的主人。当时甚至流传这样的说法：女人最好要自由地生活在埃及，不要成为希腊

闺房里的囚徒。

尼日利亚电影从独立到走向世界

在电影王国，美国好莱坞和印度“宝莱坞”拥有很大的知名度，而知道“瑙莱坞”的人似乎就没有那么多了。

如果仅以数量衡量，“瑙莱坞”甚至已经超过好莱坞，跃居第二位，仅次于“宝莱坞”了。“瑙莱坞”这一称呼最早由《华盛顿邮报》记者提出。

1902年，世界第一部电影问世后仅仅过了8年，电影便传到了尼日利亚。1960年，殖民统治者离开了，尼日利亚迎来了独立，电影从此开启了一个新的视野和天地，不断步入辉煌，走向繁荣和发达。

目前，尼日利亚每年生产2000多部电影，平均每周就有30部新电影问世。全国有电影院上千家，电影从业人员超过20万，这一数字仅次于农业领域的工作者。“瑙莱坞”的电影已经占据尼日利亚全国GDP的6%左右，占非石油出口总值的11%。电影已经形成了尼日利亚一个庞大的“产业链”。

尼日利亚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就出台了《电影法》，从而为电影的发展奠定了法律的基石。拉各斯、阿布贾、埃努古等地，是“瑙莱坞”电影的主要拍摄地。

约翰·列侬在蒙特利尔

1969年5月26日，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加拿大蒙特利尔。伊丽莎白女王酒店的1743房间里，约翰·列侬和小野洋子开始了为期一周的“为和平而卧床”行动。蒙特利尔并非这对情侣的首选地点。他们之前已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为蜜月举行过一次类似活动。他们想接着移师美国，但美国方面以列侬拥有大麻为由拒发签证。他们还考虑过巴哈马群岛，但那里气候炎热而且远离媒体。

18岁的摄影爱好者罗伊·科尔伍德幸运地参与了全过程。他回忆说，列侬穿着睡衣接待了一批又一批记者和粉丝，谈论爱情、宗教、战争及和平等话题。很多人认为是小野洋子拆散了甲壳虫乐队。科尔伍德说，小野洋子当时看起来不习惯与众人相处，总是不离列侬左右。列侬则安慰她：“放松些，如果你不想说话，就别说。”

科尔伍德说，能和自己的偶像在一起，看他开展着自己所崇拜的活动，那种充满魔力的情景无以言表。今天这首歌已经家喻户

晓，“但每次唱起它，我都兴奋得浑身起鸡皮疙瘩。”

从花花公子到甲胄君王

英格兰国王亨利五世曾在短短数年间创造了巨大战功，1420年他逼迫法国国王查理六世同意，由他迎娶法国公主凯瑟琳并成为法国王位继承人。不过后来法国在圣女贞德率领下发起了反攻，亨利五世因病于1422年去世，英法未能实现统一。

亨利五世在1403年的一场战斗中中箭，箭头直入左脸颊6英寸。他的医生详细记录了取出箭头的过程：首先医生用裹着接骨木髓的布条塞入伤口，然后放入更多在玫瑰花蜜中浸泡过的布条，防止伤口愈合，以便下一步处置；接着医生顺着箭头进入的路线，放进一对头上带钩、四边光滑的夹子，让夹子钩住箭头上的圆孔（箭头需要通过这个圆孔才能固定到箭身上）；左右挪动箭头，最后将其从骨头中拔出；最后用白葡萄酒作为消毒剂清洗伤口，放入布条，布条里裹有用沸水煮过的白面包屑做成的膏药，并添加了大麦粉、蜂蜜和树脂。放入的布条数目随着伤口慢慢缩小而逐渐减少。整个手术过程约20天，但亨利五世用一年时间才康复。

老罗斯福总统的西部锤炼

1884年2月，26岁的西奥多·罗斯福同一天痛失两名亲人：母亲和妻子。几个月后，他决定辞去纽约州议员职务，抛下还在襁褓中的女儿，独自去西部荒野游牧。他戴着牛仔帽、骑着马、别上左轮、扛着长枪，在北达科他州沿路猎杀飞禽走兽。这段经历彻底改变了他对人生的看法，以及他自己的人生。两年后当他重返东部时，体格更为健壮，多年的哮喘病消失，更重要的是，他变得无比自信，精神充沛，勇于主动迎击各种挑战。

1897年罗斯福被任命为海军部助理部长，他积极促动了美西战争的爆发，让美国作为海洋强国崛起。他还辞去公职，组成了一支西部牛仔、印第安人和常青藤老校友参加的志愿军，在古巴带头冲锋陷阵。1900年他当选为副总统，第二年总统遇刺身亡，43岁的西奥多·罗斯福成为当时最年轻的美国总统。三年后他以压倒性的选票连任。

罗斯福承认，“如果我没有去过西部，我当不上总统。”这段经历让罗斯福赢得了西部各州民众的好感。罗斯福本人也从西部的经历中汲取了重生的力量。

胡安·德·波旁从未加冕的国王

胡安·德·波旁出生于1913年6月20日，是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的第三个儿子。1931年西班牙爆发革命后，阿方索十三世被迫退位并逃亡国外，胡安·德·波旁也开始了辗转于意大利和葡萄牙之间的流亡生活。由于两位兄长分别是血友病患者和聋哑人，胡安·德·波旁成为了王位继承人。1945年，他在瑞士洛桑签署《告西班牙人民书》，宣布佛朗哥是独裁者，并表示支持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然而，由于佛朗哥依然牢牢把握着西班牙国内的政权，1948年夏天，胡安·德·波旁不得不开始与对方进行对话，并同意将自己的长子——年仅10岁的胡安·卡洛斯送回西班牙接受教育。

1960年代末，西班牙未来的局势渐渐明朗，佛朗哥宣布将在死后恢复西班牙的君主制，胡安·卡洛斯将成为国王。作为阿方索十三世的直接继承人，胡安·德·波旁多次对此表示不满。拥护父亲与拥护儿子的两派人士陷入了对立。不过，最终做出让步的还是父亲。1975年11月，佛朗哥去世，胡安·卡洛斯加冕成为国王。

日耳曼人

罗马著名的历史学家塔西佗（约公元58年—公元120年）撰写的《日耳曼尼亚志》详细描述了日耳曼人的特点、风俗文化和地理情况。

在此书中，塔西佗称日耳曼人有着“充满野性的蓝色眼睛，微红色的头发，擅长进攻的强壮体魄。”他们可以忍耐寒冷和饥饿，却不喜欢“艰苦的条件和工作”，对于“饥渴和炎热”则是十分害怕。作者将日耳曼人和罗马人描述为完全不同的两种人。但谈到勇气和集体生活方面，塔西佗运用了很多积极的词汇。

塔西佗详细描绘日耳曼人与生俱来的重视自由，对于日耳曼人知足的美德，对婚姻的忠贞，女性的勇气和对家庭的重视等的描述也充满敬意。此外，书中还提到日耳曼人是喝啤酒的民族，喜爱组织狂欢活动，他们的举止通常是人性化的——例如在发怒的时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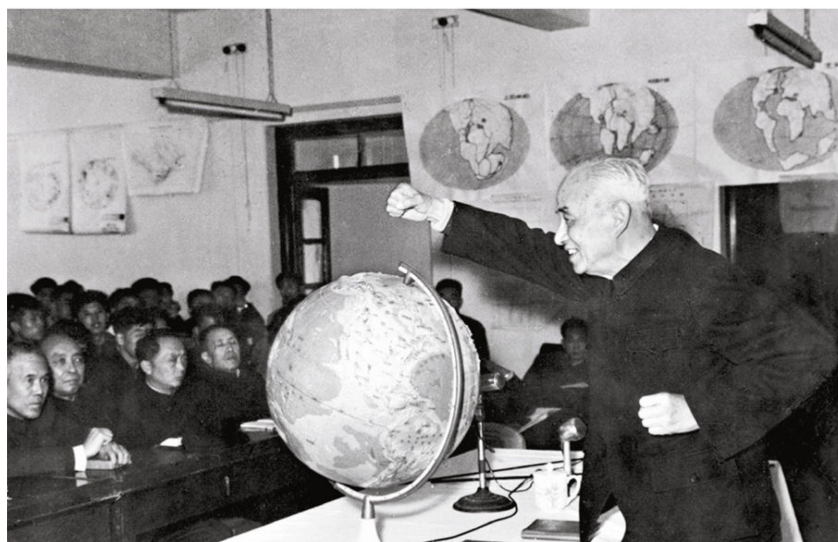
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对《日耳曼尼亚志》进行了研究分析，但塔西佗究竟为什么写了这本书，还是一个未解之谜。有人认为，塔西佗希望通过日耳曼民族来给自己本民族的腐败和堕落提出警醒。

图志



资料图片/佚名

资料图片/佚名





[1]



[2]







[美龄的外交寒冬]

直至1946年1月，苏军仍盘踞东北不撤军。蒋介石十分焦虑，派出“外交王牌”宋美龄前往长春“慰问”苏军，精通俄语的蒋经国（右三）陪同。当时长春气温零下二十多摄氏度，历来生活在温暖地区的宋美龄很少体验这样的严寒，穿了一身华贵貂皮。宋美龄亲美反苏，此次出马勉为其难，苏联方面的接待也与她二战时的美国之行不可同日而语

1[小超献唱]

邓颖超爱唱京剧，非正式场合的聚会上，周恩来会特别提议让“小超”唱一曲过戏瘾。20世纪60年代初，梅兰芳（右一）到西花厅做客，在周恩来一再鼓励下，邓颖超亮了一嗓

2[老帅交锋]

1953年，彭德怀自朝鲜战场回国不久，朱德邀请他去十三陵水库郊游。随行的著名摄影师侯波为他们拍了这张照片，并写解说：“朱总彭总相持不下，小平同志观棋不语。”朱德出门总要带两样东西，一是猎枪，二是行军床。要是彭德怀去，朱德必带小板凳和象棋。他们两个从井冈山时代就是棋友

[“皇帝”新生]

1962年3月，获得特赦不久的溥仪（右二），作为特邀代表，在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的小组会上发言。他在发言中说：“过去的溥仪已经死去了，现在是属于人民的新生的溥仪。我一定为祖国和人民贡献我的一切，直到我死，脉搏停止……”

[大师科普]

1965年6月，在中国地质科学研究院的地质力学进修班，李四光给来自基层地质队的学员们讲课。他正在讲解，地壳的运动是由于地球自转速度的不均匀而引起的

段子



/ 20世纪90年代彭丽媛在某义演晚会上

散叶：

习近平与彭丽媛的初次见面

1986年，24岁的彭丽媛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大她9岁、时为厦门副市长的习近平。为了考验对方是不是只重外表，彭丽媛特意穿了条又肥又大的军裤，没想到习近平穿得比她还土气。习近平问的第一句话是："声乐分几种唱法？"当彭丽媛回答后，他又老实地说："很对不起，我很少看电视，你唱过什么歌？""唱过《在希望的田野上》。"习近平"哦"了一声，说："这歌我听过，挺好听的。"习近平后来对彭丽媛说："和你相见不到40分钟，我就认定你是我的妻子了。"

张春桥谄媚江青

1972年，政治局召开了江西会议和浙江会议。有一天，江青和张春桥进入会议室，还没有说开会的事，江青就说："这么大的会场，空荡荡的，换个小点的地方嘛。"张春桥马上从会议室出去，亲自找会议楼的工作人员带领他选择另外的会场。大家搬过去就位后，开始发言。江青又说房子里有风，张春桥站起来，跑到窗户前查看何处漏

风。他没有发现漏风的地方，说可能是窗户的朝向问题，便让会议楼的工作人员再次领他去找窗户朝南的房子。转移到第三个会场后不久，江青说她还没有吃早饭。张春桥便出去让服务员找厨师为江青备餐。不一会儿，服务员将饭送来，江青不肯在会议桌上当着大家的面吃，张春桥就陪她出去另找吃饭的房间。江青吃完饭后，不想返回大家等候她的这间会议室了，张春桥又招呼人们换到江青吃过饭的地方。人们跟着张春桥过去一看，还是江青认为“有风”的那间会议室。

牛汉与艾青“互吻”

1976年，艾青与牛汉在一个副食店相遇，二人都惊叹对方还活着，不仅当场拥抱在了一起，艾青还在牛汉脸颊上亲了一下。1993年，牛汉去看望病重的艾青，他对这位诗坛前辈说：“我得回报你一个吻。”艾青听后点点头，牛汉于是就走过去在艾青脸上“叭”地亲了一口。

毛泽东让丁玲开列文武百官

在延安的时候，丁玲常去找毛泽东。有一次，毛泽东问丁玲：“你看现在咱们的延安像不像一个偏安的小朝廷？”丁玲回答说：“我看不像，没有文武百官嘛！”毛泽东先把毛笔和纸推到丁玲面前，然后说，“来，你先开个名单，再由我来封文武百官就是了。”丁玲没有开名单，只是报人名。毛泽东一边写名字，一边在这些人的名字下面写官职，这个是御史大夫，那个是吏部尚书、兵部尚书，还有丞相、太傅，等等。写完之后，毛泽东突然又对丁玲说：“现在文武百官有了。既然是个朝廷，那就无论大小，都得有三宫六院呀！来，来，你再报些名字，我来封赐就是了。”一听这个，丁玲马上站起来说：“这我可不敢！要是让贺子珍大姐知道，她肯定会打我的。”

冯玉祥帮助郝梦龄后人

1939年，冯玉祥散步时，看到有两个小男孩在重庆街头叫卖茶水。冯玉祥走过去询问他们家里的情况，两个孩子回答：“河北藁城县庄合村人，姓郝。”冯玉祥又问：“你们那儿有一个姓郝的，叫郝梦龄，你们认不认得？”他们回答：“认得，他是我爸爸。”原来这两个孩子正是抗战中牺牲的第一位军长郝梦龄的儿子，他们出来卖茶水是为了攒学费。冯玉祥将此事上报国民政府，以后郝家就可以拿着交学费的收据找政府报销了。郝梦龄的四个子女后来都上了大学。

陈云三次反对修房

从1949年进京，陈云在西城区的老房子里住了将近30年。由于房屋年久失修经常漏雨，有关部门提出要大修，陈云不同意：“房子大修要花许多钱，只要不漏雨就行了。”后来，后勤部门考虑到房内很多墙皮脱落，走道和楼梯上的地毯已经磨光，又提出要大修，陈云依然不同意。唐山发生大地震后，陈云的办公室南墙被震出一米多长的宽裂缝，后勤部门请技术人员检查后发现，整个楼房结构都存在安全隐患，于是就提出把老楼拆掉，再在原址上建一幢新楼。陈云说：“虽然是老房子，也比老百姓住的房子好，这样好的房子都拆掉建新房，会脱离群众，影响不好。”工作人员最后只好动员陈云离开旧居，搬进了中南海。

声音：

卓别林

1978年，卓别林刚在瑞士下葬，他的棺材就被两个小偷盗走。盗墓贼向卓别林家索要60万美元的赎金，卓别林的妻子欧娜说：“我丈夫永远活在我心里，他的遗体在哪并不重要。”不久警方抓获了盗墓贼，寻回了卓别林的遗体。如今他被葬在六英尺厚的水泥下面，以防再发生盗墓事件。

卫立煌

抗日战争期间，卫立煌曾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他看不惯官太太们穿旗袍上街。卫立煌在一次集会上，对官员夫人们说：“你们要转变到战时生活，把你们的旗袍剪成短袄，不然日本飞机来了，跑警报也不方便。要是你们不剪，我就下命令给洛阳警察局长，看见大街上有穿旗袍的，都强迫给你剪短。”后来这些官太太们在见卫立煌时就都换上短装，而平时如故。

周恩来

1949年，中共请黄炎培当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说：“1946年我才68岁，已觉得年老了，做不动官了。如今72岁了，还能做官吗？”周恩来说：“在新政府任职，不同于在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由全国各党派一起千斟万酌制定的《共同纲领》， 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剧本’，我们编了‘剧本’，自己怎能不上台唱呢？”

邓小平

1972年12月，邓小平出行，到原来的中央苏区参观。在毛泽东旧居，邓小平说：“毛主席在当时，也是受排挤、受打击的。”在瑞金制糖厂，邓小平听完汇报，要到车间去，工厂的人说有两条路，其中近路不好走。邓小平说：“不要紧，为什么有近路不走，偏要走远路？中国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走。”

伽利略

伽利略发明了天文望远镜，通过观测天体，证明了哥白尼的“日心说”。1633年，意大利宗教裁判所逮捕了伽利略，不准他与任何人接触。法官每过4小时轮换一次，持续拷问了伽利略50多个小时，把他折磨得精疲力竭。最后伽利略被迫在为他写好的悔过书上签字时，嘴里还默念着：“可是，地球还在转动。”

成龙

在2013年政协的小组会上，成龙发言说：“我们内地的执法太不严了，一帮导演到了新加坡不敢抽烟，可是到了珠海，在有警告的情况下依然抽！”说到这里，成龙有点激动地拍了拍桌子道：“所以我们的执法一定要严！”现场当时一片沉寂。成龙环顾了一下全场说：“我的话，能传出去吧？”话音一落，笑声四起 。

微言：

@思想聚焦：段祺瑞做总理时，有人找上门来闹事。原来，段一生清寒，不置产业，在北京始终租房居住。后来袁世凯跟人玩牌，赢了一套房子，就把房子送给段。可是输掉房子的人没给袁世凯房契，等袁世凯死了，输家的儿子就拿房契来闹。总理段祺瑞没有下令维稳，而是认栽服输，乖乖搬走，把房子还给对方。

回复

@同声翻译bill的艺术世界：有意思， 原来一直以为段是大坏蛋， 不知道是否有段写的书或者传记， 有空的时候想拜读下。

@中沃-sun：同期，段祺瑞是瞧不起冯国璋的，冯吝啬贪财，当年进皇宫把皇家鱼池的鱼都给捕起卖了8万银元，通过很多方式敛财，众人皆知。

@腹针薄智云：无论官大官小，明白道理才好！如果靠权霸道，加倍偿还迟早！

@历史之碎：1948年，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合影。有人评价当时的中研院："生物组接近世界最高水平，数理组与世界顶尖水平不相上下，人文组几乎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从12月开始，中央研究院部分机构向台湾搬迁。在第一届81名院士中，迁至台湾的仅有傅斯年等12人，在国外的有胡适等12人，其余50多人留在了大陆。

@历史袁老师：北洋政府通缉罪犯张勋，新任大总统徐世昌发布命令："免于追究"，张勋晚年投资工商、金融业，生意颇火；在家乡对贫苦学生体恤有加，赈济灾民和孤儿。孙中山说："叛国之罪当诛，恋主之情可悯。虽以为敌，未尝不敬也。"对一个人的结论，应该把政治立场和人格区分开，不要非黑即白。

贵姓

董

人数排行第 二十九

香港船王世家

文 | 隋寄锋

在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董姓占全国汉族人口约0.61%，为中国第二十九大姓，在全国都有分布，尤以河北、山东、山西、云南、辽宁、浙江等省最为集中。

董姓是黄帝后裔

黄帝后人中有一支以“己”为姓，在舜帝时有飂叔安， 生子董父。董父为舜养龙，故号为 “豢龙氏”，被封在鬷川（今山东定陶县），赐姓董。还有人说，董姓出自姬姓，飂叔安为黄帝之后颛顼的裔孙。颛顼后人中有祝融氏，董姓即为“祝融八姓”之一。总之，董姓当为黄帝后裔是没有问题的。

相比于上古史的缥缈，董姓的另一个来历显得更为靠谱。据西汉史游《急就篇》及宋人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说，东周大夫辛有的两个儿子到晋国，主管典籍，职责是“董督晋史”，所以称他们为董氏。辛有的后裔，世袭晋国太史，负责记录历史，其中有一位名为董狐。当时晋国正卿赵盾谋杀晋灵公不成，只好逃亡，当他跑到国境边上时，听说弟弟赵穿杀了晋灵公，于是又回到朝中执政。

董狐在史书上写下“赵盾弑其君”几个字，赵盾不服，说国君明明是赵穿杀的，为什么赖在他头上。董狐回答：“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作为晋国的大臣，你不为国君报仇，责任不还在你吗？孔子称赞董狐是“古之良史”。后人就以“董狐直笔”比喻不畏权贵，秉笔直书。

董狐的后人董翳在秦末时为都尉，作为章邯的副手与起义军作战。后投降项羽，被封为翟王，子孙遂居陇西（郡治在今甘肃临洮）。董翳在成皋之战中被刘邦击败，于汜水之畔自杀。

董姓中也有一些来自于少数民族，明初，蒙古族呼勒都古德氏有取汉姓为董氏者；满族的董鄂氏、栋佳氏、珠格氏、珠赫呼氏、朱胡氏等都有人改姓为董。

蜀汉政权中的董姓名臣

西汉末年，有一支董氏族人从中原迁居蜀地，定居广汉。东汉灵帝时，族人中有董扶官至侍中，精通谶纬。他预见天下即将大乱，就对太常刘焉曰："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于是刘焉就上书请为益州牧。董扶也随之而去，为蜀郡属国都尉。刘焉死后，其子刘璋继为益州牧。刘备入蜀，赶走刘璋，占据西川，果然成就了帝业。诸葛亮曾向广汉人秦宓询问董扶的才能，秦宓回答："董扶褒秋毫之善，贬纤介之恶。"

蜀汉政权中有名臣董和，字幼宰，本为南郡枝江（今湖北枝江）人，后前往益州，先后被刘璋任为江原长、成都令。他为官清廉，且执法严厉，使得豪强畏惧。刘备入蜀后，任董和为掌军中郎将，与诸葛亮共同主事。董和当官二十多年，但是家无余财。

董和之子董允因为被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言及而为人熟知。董允字休昭，在刘备立刘禅为太子后，他与费祎同时被任命为太子舍人。刘禅即位后，董允、费祎为黄门侍郎。诸葛亮北伐期间，蒋琬负责处理丞相府的政务，董允则主持宫中事务。刘禅曾想在民间广选美女充实后宫，董允进谏说："古者天子后妃之数不过十二，今嫔嫱已具，不宜增益。"最后刘禅只得作罢。刘禅宠幸宦官黄皓，但董允常常直言进谏后主、斥责黄皓，使得他们不敢胡作非为。因此董允在世期间，黄皓的官职一直只是黄门丞。

少年时，董允和费祎齐名，董和不知道两人高下。后来董允、费祎一同参加司徒许靖之子的葬礼，董和给了他们俩一辆破烂的马车。到了许家，董允看其他人车子都很光鲜，觉得没有面子，仿佛受了侮辱，但费祎安然自若。董和知道后对儿子说："吾常疑汝与文伟（文伟是费祎的字）优劣未别也，而今而后，吾意了矣。"

蒋琬因病不能理事后，费祎继任为大将军，掌握蜀汉政权。董允以侍中兼尚书令，作为费祎的副手。董允与诸葛亮、蒋琬、费祎并称为蜀汉"四英"。

香港船王世家

董姓最显赫的家族出现在现代，就是世界七大船王之一董浩云。

董家祖先出自古晋国，先是南下到福建，后又逃难往浙江定海。其后人董瑞昌娶妻陶氏，育有两子一女。他们全家迁居上海，先开印刷所，又经营五金店，家境小康。

董瑞昌之子董浩云生于1911年，他幼年时即说："地球表面四分之三是海洋， 我们应该有雄心征服海洋。"1927年，董瑞昌生意不顺，董浩云被迫辍学。当时正赶上天津航业公司招聘， 董浩云就过去做了一名海员。董浩云在公司勤奋工作，并且与老板的女儿顾丽珍相恋，做了乘龙快婿后很快就跻身公司高层。董浩云上任后的第一把火，就与英国公司竞争，开辟了从天津到塘沽的45里新航道。

1937年4 月，董浩云创立中国航运信托公司，不久他与顾丽珍的第一个孩子降生，那就是董建华。抗战爆发后，董浩云旗下船只不是被日军征用，就是毁于战火，只好带全家移居重庆。1947 年，董浩云在上海创办复兴航运公司，发展了国内河道和近海航运，同时将业务瞄准了远洋航运。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几次中东战争为董浩云带来大量的客户。在鼎盛时期，董浩云拥有各种船只149艘，总吨位达1100万吨。《纽约时报》称董浩云是"世界最大独立船东"。

董浩云的家庭教育也很成功。董建华在英国利物浦大学机械系读书时，生活简朴，乘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往返于学校和家之间。董建华毕业后，父亲让他到美国通用公司当了四年的普通工人。董浩云曾问儿子："小华， 你能明白我为什么要让你进'通用'吗？ "董建华回答："我明白，因为'通用'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公司，其总裁阿尔弗德雷·斯隆创立的现代企业管理原则， 我想也肯定适用于我们这个国际型的航运企业。我相信，我在'通用'可以学许多东西。"1969年，董浩云创办东方海外（国际）有限公司。

1979 年，董建华出任东方海外主席，董浩云退休。1982 年，董浩云病故，董建华全面接管家族产业，应对因急剧扩张而留下的200多亿港元的巨额债务。霍英东雪中送炭，注资1.2亿美元。董建华因此得以重组公司，实现了扭亏为盈。

1996年，董建华弃商从政，当选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其弟董建成接任东方海外主席。董浩云对董建成的培养与董建华不同，他让董建成在利物浦大学毕业后，到美国深造，获得麻省理工学院机械工程硕士学位。董建成主掌下的东方海外，其业绩从2003年起大翻身，营业额增长31.9%，达到32. 41亿美元。

董浩云长女董建平长期在香港经营艺昌画廊，丈夫金乐琦祖籍萧山，任美国艾睿电子原件有限公司董事、TNT公司董事等职。次女董

小平的丈夫彭荫刚，其父彭孟缉曾任台湾“陆军总司令”等职，彭荫刚为台湾伟联集团董事长。三女名为董亦平。

链接：本家亲戚

董仲舒：（前179-前104）：西汉今文经学大师，汉景帝时为博士，后向汉武帝提出“天人感应”、“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说，使儒家学说成为后来两千多年的正统思想。

董宣：湖阳公主的奴仆仗势杀人，被公主包庇。董宣拦住湖阳公主的车，将奴仆抓住处死。光武帝令他向公主叩头谢罪，董宣拒不低头。光武帝令人强按之，也不能使其俯首，因而董宣被赞为 “强项令”。

董晋：（723-799），河中虞乡（今山西永济）人，唐朝宰相。其人有施政才能，官至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董源：（？-962），字叔达，钟陵（今江西进贤）人，南唐画家。他工山水，尤其善画溪桥、渔浦、洲渚交相掩映的江南景色。有《夏景山口待渡图》、《潇湘图》、《夏山图》、《溪岸图》等传世。

董其昌：（1555-1636），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明万历十七年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为官不辟权贵，不徇私情。他在书画创作、收藏和鉴赏上都很有成就，他下笔柔中有骨力，转折灵变，层次分明，清隽雅逸，以平淡天真取胜。

董小宛：（1624-1651），著名才女，明末“秦淮八艳”之一。容貌俏丽，善书画，通诗史，后来嫁给清初才子冒襄为妾。

董必武：（1885-1975），湖北黄安（今红安）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共六大至十大的中央委员，七、八、九届政治局委员、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董福祥：（1839-1908），甘肃固原（今属宁夏）人。同治年间，他参与镇压陕甘回民起义，官至提督。后随刘锦棠进兵新疆，平定阿古柏之乱。八国联军侵华时，董福祥率军护卫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西逃。

1957年“开门整风”毛泽东决心整顿共产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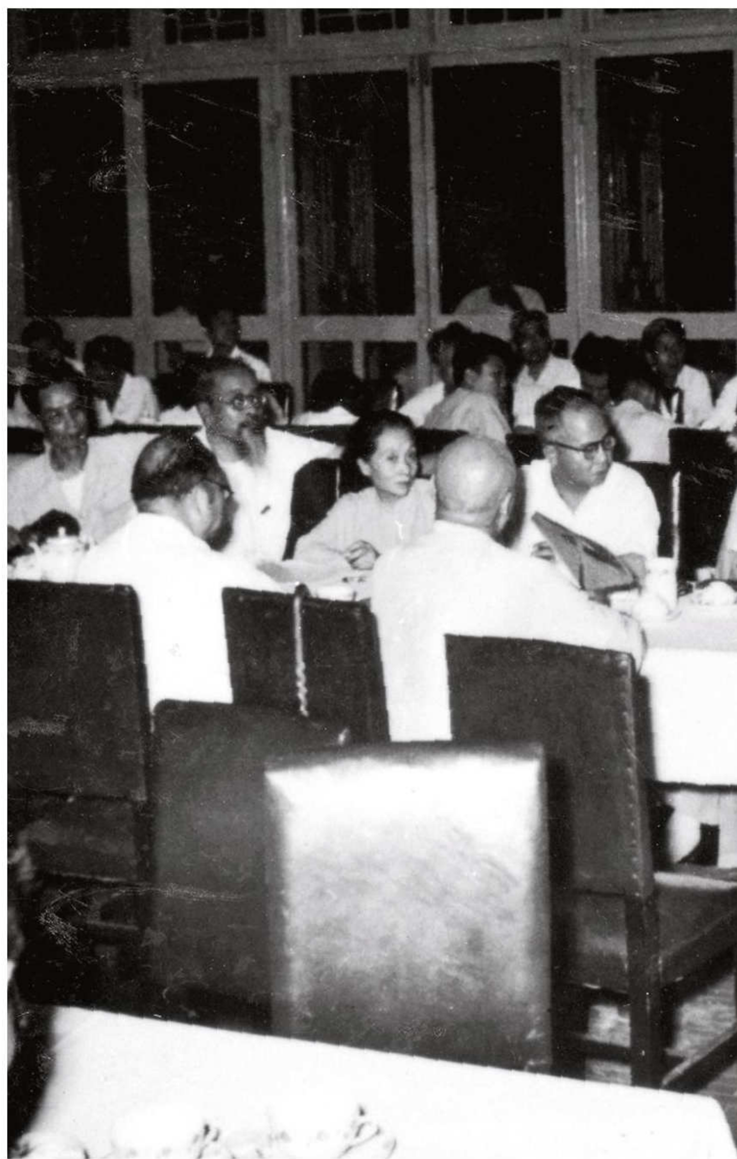
作 者:沈志华



/ 上海汽轮机厂的领导在1958年的整风中及时答复群众提出的意见并在工作中进行改进。 图为汽轮机车间公布职工意见处理的结果



/ 1957 年，在民盟中央整风座谈会上，史良（站者）指责罗隆基（右一）





/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

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反应积极，虽然对鸣放还有顾虑，但普遍表示拥护和赞同。而在党内，从各地汇报的情况看，大多数干部还是对“双百”方针的提出是否正确、是否适时有怀疑，不敢放、不愿放、不想放

在共和国史研究中，1957年最受国人关注的就是整风反右运动。就打击的对象和运动的方式而言，整风和反右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过程，毛泽东最初提出整风，是希望通过“和风细雨”的方式打击共产党内脱离人民大众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接着想要借助党外知识界的力量完成这一任务。后来却变成以“急风暴雨”的方式打击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和社会上一切对执政党不满的言论和行动的反右派运动。

毛泽东着手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1956年的“波匈事件”，特别是在匈牙利出现的动乱，使毛泽东和

中共领导人意识到，已经取得胜利的政权还有丧失的可能。但他们也认为，经过镇反、肃反，国内的反革命分子已经基本上不存在了，因此不会出现与国外反动势力结合的危险。于是，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决定以此作为指导思想，采用民主的方式开展党内整风运动。

在“波匈事件”中，毛泽东看到了对中共政权可能造成威胁的三种情况，即党内外知识界的“奇谈怪论”、群众闹事和党员干部的官僚化和特殊化，其中最令人担心和关注的是后两者。尽管谈到有人（特别点名是民主人士）可能会反对中共政权时言辞尖刻，但那毕竟只是极个别的情况，因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情况也确实如此。据新华社的报道，当时中国社会上大量出现的罢工、罢课、退社和游行请愿等现象，究其根源都在于执政党本身的错误和问题。特别是“波匈事件”以后，关于中共干部官僚化和特殊化的报告骤然增加。如“江苏省少数基层干部作风恶劣、横行霸道”，“内蒙古农村干部强迫命令非常严重”，江苏省少数机关“强占民房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天津国营工厂“干部的命令主义、惩办主义作风严重”，等等。

进入1957年后，情况更加严重。据新华社报道中共莆田县委召开三级扩大干部会，与会的504名区、乡主要干部中，70%左右都有强迫命令、贪污腐化的情况，致使党群关系十分紧张。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也暴露得更多。浙江省吴兴县部分乡干部强迫命令作风严重，已经发展到违法乱纪的程度：如乡干部捆绑、吊打群众，私设监牢和公堂，任意关押村民，甚至游街。还有报道说，湖北省部分农村干部中存在较严重的“六比四怕”思想，即比地位、比待遇、比名利、比享受、比阔气、比排场；怕下乡、怕进落后社、怕进山、怕劳动。

现在，毛泽东不得不把注意力重点转向如何从根本上解决大量的人民内部问题。

整风动员引起两种根本对立的反应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作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毛泽东本人说，他这个讲话所谈的问题已经“在心里积累了很久”。

毛泽东首先指出，匈牙利事件不会在中国重演。在这个前提下，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必须采取与以往革命不同的方式予以解决。毛泽东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几个口号，就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令毛泽东担心的是，许多党的干部，包括高级干部，“实际上不

赞成中央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3月1日下午作总结报告时，毛泽东有针对性地回答了一些问题。毛泽东指出，政府有缺点应该批评。人民有批评权，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有人提出，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但又说可以罢工罢课，岂不是自相矛盾吗？毛泽东答，大民主就是群众运动，阶级斗争。过去我们好些做法是这样，如肃反、土改。现在社会改变了，遗留的问题主要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工商业改造、知识分子改造，是小民主。有人说这个“小”不够，再来一个小，就是小小民主，和风细雨比较好。毛泽东解释说，现在我讲的是有些机关、工厂、学校、合作社连那样的小民主、小小民主都没有，就只有官僚主义，这样就逼出一个大民主，所以出来罢工罢课了。宪法没有罢工的条文是不好的，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在全国范围内提倡罢工罢课。我们是提倡用批评的方法解决问题。只有对那些个别的、严重的、顽固的官僚主义，才用罢工罢课来解决，首先还是反官僚主义。

不过，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对于他所倡导的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氛围中的整风运动，党内外的反应却截然相反。

对毛泽东讲话反应最热烈的是知识界和民主人士。《文汇报》总编徐铸成回忆了在政协礼堂听到毛泽东讲话录音后的感受：“从录音里听到他在讲话时，不时引起哄堂大笑，并听到刘少奇、马寅初等同志插话，真是轻松愉快，谈笑风生，我们听了录音，也感到兴奋、舒畅。”民主同盟副主席章伯钧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后也是“兴奋异常”，立即在民盟以个人名义进行了传达，民盟还印发了讲话记录稿。翻译家傅雷当年在给家人的信中把自己的感觉和理解讲得更加具体：“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民盟副主席罗隆基认为，这是“扫除党与非党间隔膜，加强团结的对症良方”，“不仅可以减少郁积，消除隔膜，并且是是非愈辩愈明，真理愈争愈显，百川异流，总是同归于海”。

毛主席的讲话已经引起了党内外知识分子、干部和群众的普遍重视，但大多数党员干部对毛泽东的讲话抱着怀疑的态度。在3月25日召开的北京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很多干部对毛泽东的讲话表现出忧虑和怀疑。讲到“双百”方针，“大家都赞成放，但仔细地研究一下，有些人仍然有种种顾虑”，他们“怕天下大乱；怕以后工作不好做，不好领导；怕放了毒草，群众会中毒”。有人说：“百花齐放，放就是收，放了紧接着要收。”甘肃省委报告，对中央的方针“党外比党内接受得快，情绪高”，党内则受到“很大震动”，部分干部，特别是党员干部，“在思想上还有程度不同的怀疑和顾虑、甚至抵触情绪”。在高级

干部中，“思想基本搞通”的只是少部分人，大多数人“是原则上通了，也认为中央的方针、政策完全正确，表示拥护。但遇到具体问题，特别是与本单位和自己有直接关系的具体问题时，就不通了”。还有极少数人“抱有很大的抵触情绪”，认为“革命几十年都没叫人监督，现在革命胜利了反倒要叫人监督了，真想不通”。甚至有人说，“党外人士、知识分子现在更嚣张了，不把他们整下去总不甘心”。山西省委的报告更加具体：毛的讲话在各级干部中传达后，“争辩之多，是空前的”。他们提出，如此强调扩大民主“是否会助长极端民主化”？认为“闹事没好人，好人不闹事”，“不承认闹事的主要原因是由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也有个别人“公开表示怀疑和反对”，他们提出“这次毛主席报告的精神是否右倾了”，认为“毛主席的报告替民主人士、知识分子、资本家和过去的地主、富农说的话太多了，而替劳动人民说的话太少了”。上述情况，在黑龙江、广西、四川、广东、浙江等省（区）委的报告中，都有普遍的反应。在农村基层干部中，怀疑、抵触和反对的情绪更加激烈。由于感到“党给群众撑腰，不给干部留脸”，不少基层党员干部工作消极，想躺倒不干，甚至有的提出退党。

所有这些材料，无论是来自上层还是基层，无论是党内报告还是新闻报道，反映的情况都是一致的。面对如此难堪的局面，毛泽东感到，必须亲自出马，再次进行动员。

毛泽东决定提前进行“开门整风”

毛泽东好像有个习惯，只要心情不快或办事不顺，就往南方跑。这次，毛泽东选择了津浦线。从3月17日到4月上旬，毛泽东先后到了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等省市。所到之处，都要召开座谈会，对当地党员干部发表讲话，走一路，讲一路，毛泽东自己说他“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这次沿途演讲，实际上成了全党整风的思想发动。这次南方之行对毛泽东的触动很大，并引起了他新的思考。他了解到，对他在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党内外的反响完全不同。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反应积极，虽然对鸣放还有顾虑，但普遍表示拥护和赞同。而在党内，从各地汇报的情况看，大多数干部还是对“双百”方针的提出是否正确、是否适时有怀疑，不敢放、不愿放、不想放。这种反差表明，党内的思想认识已经跟不上形势的变化，甚至落在民主党派的后面。对于这种状况，毛泽东十分不满。

为了推动整风，他回到北京后一口气亲笔起草了几个中央文件，指出：“党的整风指示，日内即可发出，即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发扬正确的思想作风，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的思想作风。”与此同时，毛泽东继续关注并鼓励党外的鸣

放。他建议《人民日报》转载《光明日报》《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重拟题目《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并代写了编者按。按语说：“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

中共中央办公厅于30日发出关于整风的指示文件，紧接着又第二次发出修改稿，文件中没有明确表露开门整风的意图，而只是提出欢迎非党人士参加整风，但毛泽东实际上已经开始动员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了。就在中共中央文件下发的当天，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二次（扩大）会议，议题就是整风动员。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主要领导人和26位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这次讲话，毛泽东显得情绪激昂，比前几次更加放得开，重点在于鼓励非党人士给共产党提意见。整风即将开始，毛泽东有些得意地说：“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凡是涉及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讲到大鸣大放，毛泽东更加乐观：“现在报纸天天在讨论矛盾问题，有人担心人民政府会被推翻，但已经二三个月了，政府并未被推翻，而且越讨论，越发展，人民政府就越巩固。现在高教部和教育部被攻得厉害，越攻越好，把矛盾分一下类。攻就趁此机会，只要找出证据，就能站住脚，几年甚至几十年解决不了的问题，一辩论，可能在几个月内就可以解决。”至于邀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毛泽东说：“规定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最近两个月就是这个方式，就是整风办法，我攻你，你攻我，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此即整风，已经整了两个月。”这个说法，与整风指示中说的方式已经有些区别了。为了鼓励党外人士站出来讲话，对于当时正在争论的一些问题，如“民主人士只有职而无权无责”，“教授治校”，“共产党有术无学，不能领导科学”等，毛泽东或多或少表示他本人是赞同民主人士的意见的。比起中共中央的文件，以及毛泽东本人以前的历次言论，这番讲话更具鼓动性和影响力。不过，积极起来响应的还是在党外，而不是党内。这就难怪运动开展起来以后，虽然说是共产党整风，但真正积极参与其中的却大都是知识界的非党人士。

5月1日，中共中央的指示公开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全党整风运动便开始了。如上所述，毛泽东决心对执政党发动一次整风运动的思维逻辑是：经过“三大改造”和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反革命虽然还有，但是不多了，旧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大多数虽然还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但拥护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他们对政权已经没有威胁，而思想改造则是一项长期的任务；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解决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党内，在执政党本

身；只要通过整风，改变执政党的作风和形象，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政权就会巩固，就会发展。然而，一旦这个逻辑的前提发生变化，他的估计和自信受到打击，所谓整风就必然会转向另外一场斗争。

摘自沈志华：《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

高华：再探林彪事件幕后

作 者:高华

毛泽东派8341部队进驻毛家湾

林彪一出山就打人。八届十一中全会，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一出来，刘少奇就倒台了。林彪最大的敌人就是邓小平，毛主席在八届十一中全会还没有真正下定决心要把邓小平打倒，而且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选新的中央常委的时候，邓小平的得票是全票，排行第四名，毛林周邓，邓的得票非常高，这让林彪感到巨大的威胁。本来中央还要让邓小平分管一个工作，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外国共产党联络工作。八届十一中全会刘少奇是完全罢官，挂名常委，不安排任何工作，回家反省，小平同志是有工作的。但是林彪发表讲话，他看到机会来了，一讲话把邓小平打下去。打下去后邓小平说现在他已经不能工作了，要和康老交待工作，把他的工作转给康生。所以林彪一出手就非常厉害，看到机会来了马上把他认为自己最大的威胁邓小平打下去。而毛主席没有加以制止，“就让小平同志锻炼锻炼吧”。

林彪一上台就发表了一个讲话，他说文化革命就是要罢官，实际上就是罢官运动，罢哪些人呢？有三个标准，第一个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第二个是不是突出政治，第三个是不是有革命干劲，这三条标准，是我们选拔干部的标准，以及是罢官标准。另外林彪在8月13日的讲话中提出了一个大节和小节的问题，林彪说我们要看大节，不要看小节，小节什么男女关系偷鸡摸狗都没有关系，只要大节忠于毛主席，这是最大的大节。林彪一上台谈了几个罢官问题和大节小节的问题。可是会议刚刚开完没有多少天，林彪突然又消极起来了，用我的话说他做甩手掌柜了，因为他看到毛泽东已经作了对他的制约。第一个，林彪是被毛主席任命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可是毛主席给他选了一个中央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元帅，毛泽东不让林彪自己选秘书长，给他配了一个秘书长，具体军队日常工作是由叶帅管。第二点，毛主席多少年来对徐向前元帅是考察的，当然毛主席也关心他的身体，关怀他，但是从来不让他进政治局，可是徐向前元帅竟然在“文革”爆发的1966年进入政治局，叶剑英同志也进入政治局。不是你林彪一个人提拔，我还提拔军中其他几个老同志，这几个军中老同志都跟你林彪一点关系都没有，毛主席作了布局。再一个，林彪当了副主席了，家住在毛家湾，毛家湾今天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所在地，它的对面是北京一所著名中学——北京四中，“文革”前是北京高干子弟云集的中学。毛家湾驻地，林彪当了第二号人物是不是有一个

林彪自己的卫队？没有的，过去的林彪驻地的安全保卫工作由中央军委办公厅的警卫处来保卫。今天由于林副统帅当了第二号人物了，毛主席派了8341部队和中央军委办公厅警卫处联合保卫，8341部队进驻林彪大院。林彪是多么聪明的一个人，本来还好，他主持军委工作，他的驻地就是军委同志来管的，现在毛主席派了一个警卫局副局长天天住他家。于是，林彪万事没有自己的意见，主动交权，一切听毛的。1966年一上台，个把月不到，就什么事都不管了，完全消极啦。

林彪利用“文革”清除异己

在“文革”初期阶段，林彪的名声非常大，对林彪的宣传是铺天盖地，引导老百姓相信林副统帅是大权在握。现在看起来这可能是毛主席拉住林彪为“文革”造势，其实林彪只有一个副统帅的名字，角色并不突出。那么，林彪是不是真正做到清心寡欲了呢？不是，这个人很厉害。林彪利用“文革”这个机会，报复和清除异己。林彪利用毛泽东的猜疑心，主席年纪大了，好疑，年纪更大了，更疑，借毛主席的手排除异己，这是林副统帅的一个基本方面。林彪为什么要打倒医生傅连璋？毛主席在江西的时候得过一种疟疾，当时病得很重，傅连璋救了他。傅曾经是长汀的一个医生，这个人当时不是共产党员，是一个基督徒，他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发一句话，凡是长征的人都可以入党，所以傅同志才入党的。20世纪50年代初，毛命傅同志去给林彪检查身体，傅看出林彪扎了一个吗啡，所以毛主席对林彪的身体非常了解。傅同志本来是不愿意讲的，这件事情林彪是非常不愿意传出去的。1966年7月开始，林彪和叶群下令，邱会作的总后勤部对傅连璋进行残酷批斗。傅连璋向毛主席发信，说历史上我救过你一次，这次你能不能救我一次。毛泽东最后批示，说，“此人似无大罪”。话的意思，似乎应予保护，林彪看这个讲得不是很坚决，没有大罪有小罪，所以我们这个傅同志1968年死在囚中，死在水泥地上。傅是真的被林彪害死的。还有一个清除贺龙。今天还有很多人称清贺龙是毛的意思。毛是要清贺龙，但在这个问题上，林和毛达成了一致，两个人都要清贺龙。

林彪明批朱德，背后尊敬

林彪对贺龙是必欲除之而后快，对陆定一夫妇一定要整，对于傅连璋是一定要整的，对其他的人，他还是有自己看法的，他对江青集团残酷地对待彭德怀和刘少奇有不同看法，当然这个看法只是在家里有，他又不公开讲。1967年7月，红卫兵包围中南海，要求中央把刘少奇交出来，交给群众批斗。数十万人包围中南海，在这时候，林彪在北京听秘书读一个关于蒯大富的文件，林彪说，刘少奇是党中央副

主席，蒯大富反对刘少奇就是反党，那已经是刘少奇被打倒的1967年7月，他在家里突然脱口说出这番话，他对毛整彭和刘整得这么厉害，是有保留的。林彪对刘少奇没有特别行动，都是顺着毛、江的态度走的，对陶铸被打倒无能为力，对彭德怀没有特别加以打击。打彭是由江青亲自领导的，派戚本禹进行直接指导的。林彪对徐向前和刘伯承也是看毛主席的脸色，二月逆流以后，对徐向前有打击，但是出手不狠。林彪在对朱德的态度上是双重的，他每一次骂朱德的时候都是选毛主席在的时候骂，私下里去看朱德时则对朱德毕恭毕敬，他在“文革”中也看过朱德，看朱德的时候非常尊敬朱德。但是在会上，只要毛主席在，他马上批判朱德，以表他献给毛主席的一颗忠心啊。对周总理，1966到1969这三年基本上不妨害，不能说一点没有，但基本不妨害。一般情况下，也尊重总理的意见，在“文革”中基本上没有和总理发生过冲突。

对康生，他特别地在意康生，敬而远之。他知道康生的厉害。

林彪对一些部下的倒台都是有同情的，“文革”中对部下被打倒也和江青吵过架，但是林彪区分不同的情况，除了对极少数他的亲信伸出援手，其他一概不管。叶群有一个亲戚被康生打成反革命，但是林彪和叶群都不救。陶铸被打倒以后给林彪写过一封信，林彪看过以后沉默不语，叶群害怕出事，马上把这封信烧掉。这是事实，就是在林副统帅权势熏天的时候，也还是每天有紧张感。

叶群如何成为林彪的当家人

叶群这个人物在林彪的身边特别重要，她是个所谓知识分子出身，属于1937-1938年去延安的革命女性，那时去延安的女性很多，她是其中之一。叶群在延安整风中被整过，整的时候不知道是神志昏迷还是半真半假，曾经把面盆当成尿盆，用一个盆，那个时候比较困难，这个盆洗脸用，打饭用，尿盆用，三用，也就是说被整得不轻。当时叶群曾经是王明担任校长的中国女子大学的校部机关的一个科长，所以从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一定要找一棵大树，找一个大锤，终于找到了林彪。她是有文化的，懂俄文，曾经在50年代翻译过俄文的东西，在50年代漫长的十年中，跟她的夫君一同韬晦，闭关不出，深刻地研究宫廷政治，深有心得，夫妻共同在读书。林副统帅读书不是在“文革”，“文革”期间基本不读书，他读书是在50年代，苦读，天天读书，研究宫廷政治学，而且是夫妇共同把书读。

叶群和江青有共同点也有差异，两个人都有野心，都有文化，当她们跟夫君结婚以后，都还增加一个新特点，就是作风霸道，本来不霸道，但与权力接近了以后就霸道起来了。这两位都会说话，一方面

这两人都会讲意识形态的大话，江和叶是一样的，都会说，满嘴大话，同时又有农民革命女寨主的风格。江青自称老娘，叶群自称姑奶奶，这是很有意思的革命文化中出现的情况，所以既会讲革命的意识形态的文化，马恩列斯毛都会讲，同时也会讲寨子里面的语言，跟她们的先生都学会了很多。但是林彪在这方面说得很少，林彪是不太说的。

那么，叶群和江青的不同点在哪里？江青完全不能当毛的家，江青是听毛的，当然，江青能影响毛，这是肯定没问题的，但是，江青不能左右毛，毛太英明了，谁都不能骗他。而叶群基本可以当林彪的家，林叶是夫妻店，林彪在50年代漫长的赋闲十年里面，已经形成了对叶群的依赖性，他们两个在家里冷冷清清，但应该讲夫妻是共患难的，他对太太形成了高度依赖。而叶群是很聪明的一个人，对宫廷政治学很有研究，林彪从多年的经历中间相信叶群的判断力之准确，而且林彪身体不好，精神倦怠，成天没有兴趣，又不喜欢吃，也不喜欢玩，这个灰暗的人生啊。成天研究宫廷政治学有什么意思？比如我们的贺龙元帅对食品对体育等都有一些爱好，可是他们两个都没有，天天枯坐在房间研究二十四史，所以心情灰暗，而且需要叶群打理内外事务。“文革”中叶群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第一点，控制林彪接触的信息，林彪所有的信息都是由叶群控制的。第二点，给林彪的意见和批示“把关”，这都是林彪同意的，因为林彪知道他太太有这个政治敏锐性，所有的文件都一定要等他老婆看了以后才能送给毛主席。一定要迟一个小时，甚至要迟一天，等太太的意见，他对他太太的这个政治敏锐性有很高的评价。每一次上天安门，叶群给林彪的意见把关，把关的核心是捧毛、捧江，给他的所有意见都要加上捧毛主席、捧江青的内容。我们现在知道林副统帅每一次上天安门都是叶群导演的，就是只能比毛主席早一分钟到，为什么呢？早到太多的话抢毛主席的风头，迟到的话，对伟大领袖大不敬。对这个一分钟的把握是很难很难的，叶群不知道费了多大劲，林副统帅跟随毛主席八次检阅红卫兵，非常非常吃力的一件事，你早到五分钟十分钟在那儿干吗啊？你是不是结党营私啊，你是不是跟别人打招呼，要拉拢人心啊？所以叶群给林彪设计的是早到一分钟的策略，这是我讲的第二点。第三点，协调和毛、江的关系，因为林彪有的时候和江青打交道的时候需要叶群协调。第四点，代表林彪指导军中重要的人事事务，叶群是管军队的，这个女人不简单，她是军委办事组的女当家，林彪看起来是个当家的，但所有指示都要经过她。

叶群参加军委办事组是毛的意见，毛对叶群的揽权都知道，但是不加以制止，他是把叶群看成林彪的替身来看待的。

林彪被吓出一身大汗

林彪在1967年“文革”高潮的这一年，深居简出，除了跟随毛主席出来露个面以外，很少有接见军队高层同志的行为，他避嫌。1967年5月发生了一件事情，对林彪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冲击，毛主席开个玩笑，让林彪吓出一身冷汗。林彪本来就怕出汗，那一次吓得浑身出汗。1967年5月，为了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一个革命文艺演出，毛主席和林副统帅一起看革命演出，部队文艺战士满怀热情满怀忠诚，一致高呼“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毛主席碰一碰林彪，“下面到你了”，这句就果真是“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毛主席就是这样碰了一下林彪，林彪便吓得一身大汗。回去以后林彪就有重要行动，下令林办人员把北京市能看到的所有关于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的东西全部刷掉，当天晚上给周总理和中央文革写信，要求从一切政治文告，一切文艺节目中坚决地把永远健康全部拿掉，要求传达到全部的群众组织。就是毛主席碰了这么一下，让我们的林副统帅这一天晚上不得休息。其实毛主席这碰一下并不是偶然行为，毛主席极其在意对林彪喊永远健康的。

机会来的时候，林彪迅速出手，这是他在“文革”期间的一个基本特点，机会不来，装聋作哑，变成了一个逍遥派，深居简出，在家里什么都不管，机会来的时候，该出手时就出手。第一个机会来了，1967年3月份，林彪想搞军内走资派，毛主席经过权衡以后加以制止，林彪缩回去了，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武汉事件，这一次事件对林彪的震动很大。1967年7月20日，武汉的陈再道，那个所谓发生的打谢富治和王力事件，所谓武汉兵变等，毛主席在武汉受惊了，坐飞机到上海，给毛主席开飞机的司机就是驾驶256号飞机奔苏联去的潘景寅飞行员。1967年从武汉飞上海是毛主席一辈子最后一次坐飞机，就是潘同志开的，潘同志最后与林彪在温都尔汗摔死了。1967年7月20日武汉事件发生的时候，林彪兴奋异常，本来是在后台的，突然一下子走到前台了，因为毛主席在武汉整个转移到上海，林主持了中央文革碰头会，过去没有他的机会，过去开碰头会是毛泽东指定周恩来主持，所以林副统帅从来不能主持会议的，这一次林彪终于可以主持会议啦。7·20事件后，7月22日，林立果出台，以红尖兵的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提出揪军内走资派。7月24日，林彪给江青写信，给中央文革写信，提出明天的大会我还是应该参加，这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林彪从来是不愿意开会的，更不愿意开大会。7月25日，中央文革、周恩来预定，开一个百万人的欢迎谢富治和王力的群众大会，声讨武汉地区逃匿的走资派，这次大会，林彪一定要参加。7月25日，林彪实现了一个他很大的理想，第一次在毛主席不在的时候站到天安门的中心，他就是要这个感觉。那么，林第一次登上天安门，成

为主角，所有这一切，毛主席在上海高度重视。7月下旬，林彪作出姿态，他说，寄希望于小将，他平常看不起戚本禹那几个年轻人。为什么要这样做？一方面，他已经开始感觉到7·25他登上天安门犯忌讳啦，后悔啦，赶快要修补和江青的关系，怕江青在毛泽东面前告他一个刁状，再一个他知道那几个宠儿是毛主席喜欢的，向毛主席表忠心。破例地，他主动约见中央文革的几个成员。毛主席对林彪7月20日到8月1日这十多天的行为，高度警惕，毛在上海，自言自语道，“什么永远健康，人类永远健康吗？什么永远健康！”没有一个人接他的话茬，旁边是杨成武等人。他已经开始放话了，对林彪开始不满了，更重要的一个行为，毛让杨成武回到北京传达他的最新最高指示，绕开林彪向周恩来传达，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要杨成武在8月1日建军节作致辞，撇开国防部长林彪。由于1967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40周年，大家很看重的，40周年大会致辞，毛泽东不要林彪作，要杨成武作。第三点，要杨成武不要告诉林彪他的谈话，毛在上海对林彪登上天安门已经是有感觉的了。

而早几个月前，1967年3月，从一件小事情上能看出，毛主席还是支持林彪的。1967年3月，周恩来在和毛主席作汇报的时候提到我们现在应该开个军级干部会议，关于部队支左的问题要统一一下看法。这件事情，康生和江青向林彪告状，说周总理不应该绕过林彪直接向毛主席汇报，应该通过林彪向毛主席汇报，毛泽东也同意应该先告林彪再转毛泽东。于是总理写了一个沉痛的检讨，原话是保证决不再犯，向林彪作检讨。3月份还要经过林彪，到了7月份、8月份，毛主席指定不要经过林彪，把林彪又当成一个摆设了。这个事情使林彪7月20日以后高涨的政治热情迅速冷却了下来，又变成了一个甩手掌柜。毛主席还是在控制一切，1966年到1969年军队的所有重要决策，都要报江青领导的钓鱼台，军队的决策林彪是不能直接报上去的，都要先报江青，也就是等到毛主席和江青同意以后才能推行，林的讲话也得由钓鱼台事先审查，军委办事组人员的组成也是毛定的，所有的重大决策都来自于毛。但是，当毛需要林彪的时候，也会考虑林彪的意见，适当地满足林彪的要求。就是说，林彪要打倒哪个，毛主席经过圈黑以后，同意适当满足林彪的要求。平常很骄傲的林彪在这段时间能放下自己的身段，在1967年他居然将自己写好的稿子、写好的信事先让戚本禹去看，因为戚本禹是江青的宠儿，权势熏天，林彪地位这么高，本可以不理戚的，但是林彪为了调整好他和毛泽东、江青的关系，竟然信要先给戚本禹。

（未完，本文根据高华在香港科技大学的讲座整理，有删节，小标题为编者加）

善后大借款卖国？

作 者:杨津涛







1 / 1913年4月，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代表在北京汇丰银行前合影。这五位代表与袁世凯政府的赵秉钧、陆徵祥、周学熙签署了2500万英镑的《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
2 / 1915年，去世前一年的袁世凯
3 / 1913年，在上海和香港发行的汇丰银行证券

在历史教科书上，袁世凯政府1913年4月签订的“善后大借款”被作为“反动军阀”卖国的罪证。然而事实上，当时北洋政府财政上极为窘困，在与银行团几番据理力争后还是被迫签订了条件苛刻的借款合同。刚刚选举产生的正式国会对于政府的擅自借款也发起了一场攻防战，履行着监督政府财政的职责。

政府借款何其难

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归国，有记者问：“您这次回国，带来了多少饷？多少枪炮？”孙中山回答道：“我空着两手回来，可是我带回来国人最需要的东西，就是革命精神。”后来他就任临时大总统，因为关税控制在外国人手中，财政捉襟见肘。胡汉民回忆说，一次安徽前线告急，孙总统大笔一挥——拨款20万，他不知道当时的国库中仅有10块银元。

临时参议院在南京成立时，黄兴在演说中表示，“兵事非有财力不可，既无税可收，则非借外债不可”。临时政府规划中的借款有四

笔，但最后只有一笔谈成，另外三笔都被参议院给否决了。在表决以赋税做抵押的华俄道胜银行150万元借款时，同盟会籍议长林森在14名参议员到场的情况下表决，以8人投票赞同而通过借款。在各界非议孙中山违法借款的舆论压力下，他不得不电告财政部长，“借款案暂缓签字”。

袁世凯接手临时政府后，要筹钱还是只能借外债。国务总理唐绍仪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谈判，希望获得一笔60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解决革命后的一揽子问题。在协议达成前，银行团先给中国政府小额“垫款”，以解燃眉之急。后来发生北京兵变，银行团借口政局不稳，要求中国同意“以盐税为担保”、“聘任外国专家整理盐政”、“中国进一步承诺除了通过四国银行团的中介，决不商谈其他款项和借款”，才能继续洽谈借款事宜。

唐绍仪的态度相当强硬，明确回绝了银行团给出的条件，声明“中国此后借款，皆自有选择之权”。他曾转而向比利时银行借款，但在四国银行团的干涉下流产。此后财政总长熊希龄代替唐绍仪与银行团谈判。

1912年5月，熊希龄改变策略，暂时答应了银行团监督垫款使用的要求，大借款谈判得以继续。同盟会重要人物戴季陶在《民权报》上发表题曰《杀》的短文，声言：“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此四人者中华民国国民之公敌也。欲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

所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在野之人可以肆无忌惮地抨击当局出卖国权，但执政的人必须考虑如何把政府维持下去，如何让新生的共和国尽快去掉“临时”两个字，取得西方各国的承认。

国会要管政府的钱袋子

1912年6月，四国银行团又加入了日本和俄国，成为六国银行团。银行团对给予借款的条件没有变化，还是要求监督中国盐政和借款使用。熊希龄一度想通过减少借款数额来降低银行团的条件，但在银行团的阻挠下失败。

唐绍仪内阁辞职后，借款事务改由新任财政总长周学熙主持。谈判在艰难地进行着， 到了1913年3月，美国新一任总统威尔逊发表声明，宣布美国政府退出六国银行团。威尔逊说，“对华借款条件几乎干涉了中国行政独立的各个方面。”而这种行为“有悖于美国政府赖以生存之各项原则”。于是银行团剩下五国，即英国汇丰银行、法国东

方汇理银行、德国德华银行、俄国华俄道胜银行和日本横滨正金银行。

不久宋教仁案发生，袁世凯与国民党的矛盾激化。黄兴发电报给北京国民党总部说："大借款如成立，袁氏势力益形雄厚，未易与之亢角。现闻大借款有不日成立消息，请本党诸公力行设法反对，以免本党之失败。"

1913年4月26日，内阁总理赵秉钧、外交总长陆徵祥、财政总长周学熙在没有通过国会表决的情况下与五国银行团签订了大借款合同。国民党籍的参议院议长张继、副议长王正廷带领议员守候在东交民巷，想拦阻赵秉钧等签字，但没有成功。

对于大借款的签字，袁世凯方面给出了几点回复，首先说了政府的困境，然后援引熊希龄主持的另一项小额借款的例子说，国会可在政府借款后追认。但国民党籍国会议员们不想就此善罢甘休，他们想通过法律手段否决大借款。与此同时进步党籍议员站在政府一方，历陈大借款的合法性。在参议院、众议院随后的投票中，大借款的合法性都被否决。

进步党籍议员想要推翻前面的决议，提出要对大借款案进行二读和三读。在进步党籍众议院副议长陈国祥主持的会议上，国民党籍议员谷钟秀大骂其是"袁氏走狗"和"亡国议长"。然后即有人将墨盒扔向陈国祥，打在了他身后的五色旗上。卢元弼大呼："打死此狗议长"，一拳打在陈国祥坐的椅子上。国民党、进步党两党就"善后大借款"案在众议院和参议院争吵了一个多月时间，最后不了了之，等于是默许了政府借款。

大借款的利率是5%

1913年，宋教仁遇刺后，国民党抨击"善后大借款"是为袁世凯打内战做准备，后来的历史教科书大都沿用了这一说法。但事实上，这笔借款在扣除了汇费、经理费等一系列费用外，其他款项的用途包括偿还政府外债（主要是庚子赔款）、赔偿外国人在辛亥革命中所受损失和政府的各项行政费用，此外所剩无几。

丁中江在《北洋军阀史话》中记录，善后大借款"总额为2500万镑，利息五厘，实收八四折。用途指定六项： 一、偿还已到期的各种款项，包括民国元年、民国二年到期的庚子赔款，六国银行团垫款，四国银行团'币制实业借款合同'的垫款，华比银行借款，五国银行团零星小借款，共约570万镑。二、赔偿各国因中国革命所受的损失

200万镑。三、赎回各省政府所欠五国旧债287万镑。四、各省军队解散费300万镑。五、 民国二年4月至9月中央政府行政费及工事费550万镑。六、全国盐务整顿费200余万镑。”其中没有包括军费开支。

这笔借款的担保是“盐税、关税及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四省的中央税”，借款期限为47年。此外还有三项条件：“一、在借款期内，中国政府不得向五国银行团以外任何银行团借款。二、凡领款凭单，须由审计处所属稽核外债室华洋稽核员会同签押，方能核准。三、盐务署下设稽核总所，由中国总办一员、洋会办一员主管。”

在今天看来，5%的利息率高得吓人，但如果比照当时的情况，其实并不算很高。英国财团给本国的政府的贷款，其利息通常是3%，而给信用较好的外国政府则要8%。1913年11月的《申报》说，法国借给墨西哥为期40年的贷款，利息率是6%，比中国“善后大借款”还要高。

既然是借款就不能没有东西抵押，而当时中国能押的也只有盐税。中国的善后借款债券在欧洲发行得很好，很大一个原因是中国以盐税抵押，外国人知道你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可以放心大胆地买。外国雇员对中国盐政的监督，客观上帮助中国建立起一套现代税收管理制度。在此之后，中国的盐税收入逐年增加。

这一笔“善后大借款”条件确实是十分苛刻的，如熊希龄说，“银行团非常可恶，对于借款限制用途极严”，但是“国事危迫”，也就只好屈从了。民国初年的“老好人”黎元洪说过一句话，看似是滑头地两面不得罪，但其实话并没有错。他说：民初“财政困难，全国一致，建设之初，厄此漩涡，主外债者救目前以垂画后来，拒外债者忧后来而急筹现在，政见虽殊，爱国则一。”无论是主张借款，还是反对借款，大多数人都是指望这笔借款为国家发展助力。

（参考资料：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民国初年的进步党与议会政党政治》、马陵合《民初国会与外债问题》、贺水金《重评善后大借款》、陈礼茂等《妥协与抗争：熊希龄与善后大借款》、《共和十年：纽约时报＞民初观察记》等）

土豆的悲喜剧

作 者:郭晔旻

土豆，学名马铃薯，现代世界除了谷物以外，用作人类主食的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今天，马铃薯只是餐桌上的大众食物，而在人类文明史上，如同美国知名环境史学家 W.H.麦克尼尔所说：“马铃薯改变了世界历史，这并非荒唐事……我们习以为常的食物，是如何以剧烈的方式改变了世界历史。”

土豆不“土”

中国是当今世界马铃薯生产的头号大户。2010年，全世界共生产了3.24亿吨马铃薯，其中中国独占7500万吨。马铃薯在中国不但产量高，名字也多，广东叫“薯仔”，山西叫“山药蛋”，江浙称“洋（阳）山芋”，福建谓“荷兰薯”……北京方言的“土豆”最终成为俗称正名，这个颇中国式的名称，几乎让人忘记了“土豆”并不“土生土长”，相反是个渡海而来的“外来户”。

土豆的原产地，在遥远的南美洲安第斯山区。印第安人种植马铃薯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马铃薯的丰歉直接影响着他们的生活，因此印第安人将马铃薯尊奉为“丰收之神”，如果某年的马铃薯严重减产，就被认为是“怠慢”了马铃薯神，必须举行一次盛大而残酷的祭祀仪式，杀死牲畜和童男童女为祭品，乞求马铃薯神保佑丰收。当第一批欧洲探险家到达秘鲁的时候，发现当地人种植一种名为“papa”的奇特的地下果实，“煮熟后变得柔软，吃起来如同炒栗子一样，外面包着一层不太厚的皮”。这就是今天为人熟知的马铃薯。

随着西班牙殖民者对安第斯山区的征服，马铃薯也被贪婪的殖民者作为一种“战利品”带回了欧洲。1565年，西班牙远征军向西班牙国王菲力二世呈献了一箱包括马铃薯在内的南美洲农产品，最初的马铃薯居然是以它妖娆的枝叶和艳丽的花朵受到人们青睐的，西班牙王室将马铃薯种植在塞维利亚近郊的花园里，由此开始了它在欧洲跌宕起伏的命运历程。

在登陆欧洲之后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马铃薯还只限于园圃栽植，没有找到真正属于它的家，并且基本上是由植物学家在贵族或宫廷的庄园里栽种的。与此同时，欧洲人对马铃薯的食用价值几乎一无所知。据说，西班牙人最初尝试生食马铃薯的块茎，味道当然

是乏善可陈；法国人奇怪地去吃它结出的浆果，不用说那酸涩的味道使人摇头；苏格兰人甚至认为马铃薯会导致麻风病和不道德，理由是欧洲人以前从未吃过块茎类食物，《圣经》中也没提到过马铃薯。滑稽的是欧洲人却立即爱上了另外一种来自新大陆的食物——甘薯（红薯）。它在哥伦布第一次航行发现新大陆后就被带回了西班牙，西班牙的国王和王后迅速就喜欢上了这种新食物——显然《圣经》里同样没有提到过甘薯。可是因为甘薯甜美的味道更适合欧洲人的口味，至少到17世纪80年代，欧洲上流社会仍然把食用添加了大量香料和糖烹制的甘薯作为一种时尚。

马铃薯作为粮食作物在欧洲大陆得以广泛传播，很大一部分功劳要归之于一位平凡的法国农学家巴曼奇（Parmenti），是他认识到马铃薯良好的食用价值：它可以制作面包，而且容易蒸煮。1770年他的一篇关于马铃薯淀粉营养问题的论文在征文中获奖，并被法王注意到，据说他为一次宫廷宴会用马铃薯为食材烹调了二十多种美味菜肴。就连日后上了断头台的路易十六和他的那位同样倒霉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也为马铃薯的推广出了一把力（不幸的是法国老百姓只记住了她的那句“人民若无面包，那就改吃蛋糕嘛”）。国王和王后在衣服的纽扣上别上马铃薯花作为装饰，并采取了一个狡猾的办法推广马铃薯的种植，令人在王室的土地种上马铃薯，并派最精锐的士兵看守，晚上则把士兵撤走。当农民意识到这些庄稼的价值时，就来偷走了王室所种的马铃薯。到法国大革命推翻波旁王朝的统治时，法国的大多数农民都已经种植马铃薯了，其他欧洲国家也纷纷效仿——连以崇尚美食闻名的法国人都吃马铃薯了，那马铃薯一定美味——当历史迈过十九世纪的门槛时，马铃薯已经传遍了全欧洲。

盛世的助推剂

明末清初，随着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到来，原产美洲的大批农作物也被欧洲殖民者通过海路带到了东方。素来秉承“民以食为天”的中国人很容易接受任何可以填饱肚子的农作物，从不去考虑这种作物在先哲的著作里是否有所提及——马铃薯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登陆了中国。

清前期自康熙帝在康熙二十年（公元1681年）平定三藩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内地都没有发生大规模社会动乱。所谓“承平日久，生齿日繁”，更多的人口意味着需要更多的耕地，清代耕地的增加，主要就是向山要地。原因在于，经过我国历代人民的农业开发，当时的平原地亩多已垦辟，再要增加耕地，就只能开垦那些贫瘠的山区土地了。

汉代以前，我国主要粮食作物是粟（小米）和黍（黄米），汉以

后逐步演变为南方以稻米为主，北方以小麦、粟和高粱为主。而在山区，这些中国原有的作物都没有了用武之地，幸好中国农民新装备的美洲作物武器库中，正有玉米、甘薯、马铃薯这“三剑客”适应性较强、耐旱耐瘠，才使得过去并不适合粮食作物生长的广大砂砾瘠土、高岗山坡、深山老林等地成为宜种土地，缓解了困扰古代中国几千年的人地矛盾与庶民百姓的吃饭难问题这一死结。

正如光绪年间的《奉节县志》所记：“包谷（玉米）、洋芋（马铃薯）、红薯三种古书不载。乾嘉以来，渐产此物……农民之食，全恃此矣”。随着玉米的栽培推广，长江流域以南的山丘荒野地带和不宜种植水稻的旱地被迅速开发利用，而在黄河以北地区，玉米则逐步取代了原有的低产作物，成为主要的旱地农作物。甘薯的推广，则使大量滨海沙地和山区的贫瘠丘陵得到开发利用。相比于玉米、甘薯，引入中土较晚的马铃薯更胜一筹，它更易种、耐寒、耐瘠，那些土壤贫瘠、气温较低、连玉米都养不活的高寒山区，只能种植耐“地气苦寒”的马铃薯，所谓“其深山苦寒之地，稻麦不生，即玉黍（玉米）亦不植者，则以洋芋代饭”。

在马铃薯得到广泛种植的乾隆中期以后，中国人口从乾隆六年（1741年）的1.4亿，几乎是直线上升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前所未有的顶峰4.3亿，短短100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人口增加了2倍，但同期中国耕地面积却只增加了不足26%。要是没有马铃薯（与玉米、甘薯）帮忙，无论大清皇帝们是如何天纵圣明，只怕也是难为无米之炊了。马铃薯不但易种，而且高产，不但亩产高达两三千斤，而且“三月种，五月熟；取子再种，七月又熟；又种，九月又熟”可以达到“一岁三熟”，是理想的抗灾备荒作物。对于在饥饿中挣扎的古代山区老百姓来说，不啻“天降嘉谷”：“近则遍植洋芋，穷民赖以为生”。无怪乎山西省的农谚曰：“五谷不收也无患，还有咱的二亩山药蛋”，而甘肃的俗谚更把马铃薯视为“甘肃三宝”（洋芋、沙锅、大皮袄，现在有甘肃人戏称家乡三宝为洋芋、土豆、马铃薯）之一了。

成败皆由土豆起

差不多在不起眼的土豆助推了古代中国的最后一个人口“盛世”的同时，同样的人口大爆炸也发生在了欧洲。诚然，工业化革命是在欧洲率先展开，许多欧洲国家以此实现了工业、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变革。但挖出的煤、炼出的钢都不能当饭吃，在化肥和机械化收割尚是镜中花水中月的彼时，欧洲人口膨胀依靠的同样是极其丰富的马铃薯供应。

在近代欧洲，没有比爱尔兰与土豆关系更密切的了。这是一个贫

瘠的岛屿，谷类植物在这个岛上长得不好，小麦几乎就不能生长。虽然从1801年起，这个岛屿在法理上成为“大不列颠与爱尔兰联合王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在伦敦看来，爱尔兰不过是自己的一块国内殖民地，爱尔兰变成了英格兰人的爱尔兰，岛上稍微肥沃一些的土地都被英格兰的地主所占据了。到 1751-1775 年，在自己的国家，爱尔兰人却只拥有 5%的土地。贫瘠的土地、一无所有的爱尔兰农民、能适应恶劣环境的马铃薯，三者碰到一起立即展示出威力——在英国殖民者不要的土地上生产出令人不可思议数量的食物。几英亩贫瘠的土地所生产出的马铃薯，足以养活一大家人和家里的牲畜。而现代科学证明，除了碳水化合物所具有的能量外，马铃薯还能提供相当多的蛋白质和维生素，它所缺乏的只是维生素A，这通过喝牛奶就可以补充了——马铃薯还在无意中终结了坏血病。而马铃薯的食用比种植它还要简单：挖出来，放在锅里煮，或者干脆把它们扔到火里烤，而后吃掉。

到十九世纪初期，马铃薯几乎成为爱尔兰人的唯一食物。在农村，农业工人每天消费的马铃薯为6.3公斤，妇女和十岁以上的儿童大约为5公斤，小一点的儿童的消费量为2.3公斤。马铃薯的高产和只需少量的劳力，使得爱尔兰人口从1700年的200万，猛增到1841年的820万，达到4倍多。

中国的老子有句话“福兮祸所伏”，这句话也在爱尔兰得到了验证。1845年，一场灾害悄然而至，且来势凶猛，仿佛一夜之间，那些郁郁葱葱的马铃薯田就变成“草木皆烂，荒芜一片”。导致马铃薯枯萎腐烂的瘟疫来源于一种被称为马铃薯晚疫病菌的真菌，这种真菌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中发育，靠风或水携带自己的孢子来繁殖，受感染的马铃薯变黑，在地底下枯死。1845年的夏天，爱尔兰多雨阴霾的气候特别有利于这种真菌的发育。短短几周之内，这种凶猛的真菌靠着风的传播，席卷了这个小岛，当年底，爱尔兰的马铃薯产量减少了三分之一。第二年情况更糟，超过四分之三的马铃薯田绝收，对于以马铃薯为生活来源的爱尔兰人民而言，灾难已经降临了，“你可以在几乎每个人的脸上都看到沮丧和泪水。”

面对来势汹汹的“马铃薯瘟疫”，自己国土上的灾难对于大英帝国政府却仿佛是发生在另一个星球。大名鼎鼎的《泰晤士报》居然有闲心大肆声讨马铃薯这种“最不可靠的作物和最差的食物”，顺便事不关己地建议爱尔兰人接受另外一种不同于马铃薯的生计手段。当岛上到处都是吃不饱肚子的穷人时，“爱尔兰的码头上还堆满了一袋袋的玉米，准备出口到英格兰去”。如此冷漠的态度连外国人都看不过去，但当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丹阿卜杜拉·迈吉德一世宣布将给予爱尔兰农

民 1万英镑援助时，要面子的维多利亚女王却请求他只提供 1000 英镑，原因是仁慈的女王陛下本人只给灾区捐助了象征性的2000 英镑。当英国政府从美洲采购来的价值10万英镑的援助物资（玉米和麦片）终于到达爱尔兰时，数百万几乎毫无任何购买力的爱尔兰人根本买不起这些按照1便士1磅进行销售的粮食，只能坐以待毙。

当“马铃薯瘟疫”终于过去的时候，1851年，爱尔兰只剩下了655万人口，比十年前减少了近四分之一。这场饥荒差不多饿死了100万专吃马铃薯的爱尔兰人，并且迫使大约200万人被迫逃离连岁饥馑的家乡，在那些日子里，“在离开旧大陆赶往大西洋彼岸碰运气的人中，有五分之四是爱尔兰人”，这是十九世纪最重要的人口流动之一。与爱尔兰人口一样遭到重创的还有爱尔兰古老的民族语言爱尔兰语（盖尔语）和盖尔文化。爱尔兰语已经在爱尔兰盛行了两千年，此时却像潮水一样突然退落下去。尽管受到英语的巨大冲击，但在1845年，还有400多万爱尔兰人使用爱尔兰语。但到了1851年，使用爱尔兰语的人口已骤减了一半，因为受灾最重的农民阶级恰恰是使用爱尔兰语最广泛的群体。更悲惨的是，“马铃薯瘟疫”带来的饥荒使得贫穷、落后和爱尔兰语之间画上等号，加速了爱尔兰语的消亡。到1901年，只剩下居住在岛屿西部偏远地区14% 的爱尔兰人还在说爱尔兰语。甚至时至今日，虽然曾得到了独立后的国家机器的全力拯救，爱尔兰语的命运依然犹如风中之烛，徘徊在生死之间。

炸薯片与“土豆烧牛肉”

由于大饥荒和移民潮，如今爱尔兰本国的人口不过400多万，反倒是在新大陆的后裔人丁兴旺。时至今日，在美国3亿人口中，爱尔兰裔美国人就有5500 万，仅次于德裔美国人。来到美国的爱尔兰移民筚路蓝缕，一步步融入了美国主流社会，先后出了肯尼迪、尼克松、里根和克林顿4位总统，逃荒的老祖宗们恐怕想不到争气的后代还有让昔日骑在头上的唐宁街主人卑躬屈膝的这一天。

随着爱尔兰人的到来，让他们爱恨交加的马铃薯也登上了新大陆的土地，同样赢得了美国人的青睐，至今在美国的一些地方如新罕布什尔州还是把土豆称为“爱尔兰薯（Irish potato）”。到了上世纪20年代，随着马铃薯自动削皮机的发明，马铃薯片从小规模制作变成销售量最大的零食。一个美国南方的旅行推销员赫尔曼·莱（Herman Lay）带着皮箱在美国南部的杂货店叫卖此机器，之后他更创立了公司，令他的名字“乐事（Lay's）”几乎成为马铃薯片的同义词。从1960年代开始，通过遍布世界的麦当劳连锁店，马铃薯片开始流行起来。在大众眼里，“薯片”已经与硅谷的“芯片”、好莱坞的“大片”一起，成为了美国文化软实力的标志；而在抱怨人们情愿放弃美味可口但制作

复杂的法国大餐去吃麦当劳，然后利用空余时间去逛街的法国人眼中，薯片更是俨然贴上了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标签。

但这并不是马铃薯与政治第一次“结缘”。老一辈的中国人都很熟悉毛主席诗词中的那句“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念奴娇·鸟儿问答》）。讽刺的是那位在联合国大会上都能够脱下皮鞋猛敲桌子的光头赫鲁晓夫。1964年4月1日在匈牙利一个工厂发表的一次演说中，他把“福利共产主义”说成是“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菜”。在那个时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共产主义，起码也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怎么能够几颗土豆再加几块牛肉就打发了呢！于是，中国的文章严厉抨击了这种“土豆烧牛肉”的“假共产主义”。

如今看来，这仿佛就是一个愚人节玩笑，土豆简直是躺着中枪。赫鲁晓夫的原话是“到了共产主义，匈牙利人就可以经常吃到‘古拉西’了”。所谓“古拉西”（goulash，来自马扎尔语的“香草gulya”）是一道匈牙利名菜，即把牛肉和土豆加上红辣椒和其他调料在小陶罐子炖得烂烂的，汁水浓浓的，然后浇在面条上，很好吃，对照到中国菜里可能也是毛氏红烧肉之类的美味。谁知翻译到中国报纸上，因为“古拉西”没有合适的译法，先是写成“洋山芋烧牛肉”，然后改成了“土豆烧牛肉”，堂堂国菜沦为地摊小吃不说，还变成“中苏论战”的话题之一，在历史长河中翻起了小小浪花。

这就是马铃薯，印第安人对全人类的馈赠。因为养活了更多的人而改变了整个世界，也由于养不活人而改变了世界，作为食物传遍了世界，又在政治宣传中为全世界所知……一个在历史进程中产生巨大作用的小东西。

乔冠华：踏上联合国讲台的新中国第一人

作 者:周斌



人物PEOPLE



/油画，1971年11月15日，中国代表团正式在联合国会议大厅亮相。有记者请乔冠华讲讲当时的心情，他开怀大笑。张长庚作于2003年5月

“乔的笑”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头条，爽朗的大笑，被一位记者抓拍下来，成为标记中国人重返联合国的典型视觉标签，并且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成为大历史的注脚

闪

光灯频闪，带有世界各国台标的话筒争相伸到面前，里三层外三层的记者围堵一个圈，争抢着拍照提问。这是1971年11月15日上午10时，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上发生的一幕。记者们围堵的中心人物是中国赴联合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先生。

有记者问："乔团长，你能不能讲讲你现在的心情？"乔冠华听后没有回答，却仰头大笑，笑得淋漓尽致，感染了会场里的记者。笑过后，乔冠华说"我现在的心情不是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了吗？"

这次代表中国在联大会议上亮相是乔冠华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乔冠华代表中国发言后，前来与他握手祝贺的几十个国家代表居然在走廊排成了长队，而乔冠华则一直面带笑容，不时呵呵大笑，给全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乔的笑"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头条，爽朗的大笑，被一位记者抓拍下来，成为标记中国重返联合国的典型视觉标签，并且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成为大历史的注脚。

今年，这张著名照片的主角——乔冠华先生迎来了他的百年诞辰，在苏州东山的墓园里，墓碑前放满了悼念的鲜花。

"三天以后，巴黎将不战而降！"

1913年3月28日，乔冠华出生于江苏盐城东乔庄的一个地主兼工商业者家庭，从小就有过目成诵的神童美名，16岁考入清华大学，20岁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由于联系日本共产党，被日本政府发觉后驱逐出境。

1935年乔冠华又获得资助，留学德国图宾根大学。德国哲学从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到卡尔·马克思，以体系繁茂、晦涩艰深著称，乔冠华却只用了一年多就以优异成绩获得德国哲学博士学位。

在图宾根大学读书时，正是二战爆发前夕，欧洲的战争气氛浓厚，各国都在备战，局势日趋紧张，军事议题也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

乔冠华对军事也很有兴趣，开始研究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三卷本《战争论》，并经常对着地图反复思考国际形势。1937年，日本大举侵华，乔冠华放弃了德国的优裕生活，同时也打消了研究哲学的念头，毅然回国，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担任了《时事晚报》的总编辑，用笔作武器，撰写政论、国际评论文章。

1940年5月，德军开始大举进攻号称固若金汤的法国马其诺防线，一大群中外记者聚在香港一家咖啡店里，讨论时事，同时也交换对战局的猜测和设想。精通日、德、英语的乔冠华只是一边抽烟，一边听他们争论。听了一会，他站起来打断所有人的争论，大声说："刚才听了诸位的许多高见，似乎还抱着很大的希望，实在大局已定……我可以告诉大家，三天以后，巴黎将不战而降！"

乔冠华的预言让所有的记者吓了一跳，著名记者爱因斯坦、根塞·斯坦、罗吟圃等也都不以为然，但乔冠华非常肯定地掐灭烟头，说："这不是一句话可以回答的，诸位请看以后的报纸好了。"

咖啡馆预言过后刚三天，法国果然投降了，巴黎上空飘起了纳粹旗帜。 乔冠华准确预言了欧战战局，一举成名。

乔冠华随即发表了《法国的崩溃》一文，用诗化的语言写道："25日太阳出来的时候，在西线依然是美丽的河流，美丽的田野，但西线消逝了。"

顶得上两个坦克师

哲学博士的深度与游学日德的经历让乔冠华的军事分析视野开阔，笔锋犀利，《历史的报复》、《报复的历史》、《斯大林的大手笔》、《站在胜利的门前》、《沉寂不是和平》、《时代终究是变了》等许多文章让乔冠华的笔名"乔木"名动一时。文学家冯亦代曾回忆自己每天都要读《时事晚报》署名"乔木"的政论，"每读一文，心头如饮一瓢清泉，不仅彻凉，而且眼睛也跟着放亮起来……我对他狂热倾倒，只不过是当时年轻人中的一员而已。" 当时有两个笔名都叫"乔木"的才子，都是江苏盐城人，都有一手好文章，人们习惯把在香港、重庆活动的乔冠华称为"南乔"。

1939年乔冠华由廖承志、连贯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对他的文章很赞赏，当初延安在接到乔冠华的入党申请时，毛泽东曾对人说过："你们读过香港一个乔木写的文章吗？他写的文章可是好啊，有分析，有气魄，文章有如千军万马，我看一篇他写的文章足足等于两个坦克师哩！"周恩来也认为乔冠华人才难得，中共中央顺利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十几天后，香港就宣告沦陷。中共南方局指示乔冠华与廖承志、连贯、夏衍等人尽力营救滞留在九龙的文化界和民主人士。

乔冠华等人化装成香客通过了封锁线来到牛池湾，翻过九龙坳，走过羊肠道，直至夜色降临，从企岭乘武装船只偷渡到大鹏湾，又走了一段山路， 才脱离险境，见到来接应的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紧接着他们连夜开会，决定分别在惠州、老隆、韶关、东江粤北一带设立秘密接待站。乔冠华奉命留在韶关，以完成接送每隔几天从香港、东纵疏散过来的人员。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等近百名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就这样被安全护送到东江纵队游击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香港大营救”。

因为叛徒告密，廖承志被捕，特务押着他到韶关上了一条小客船。乔冠华远远站在河边，刚要上前打招呼，廖承志转过头大声痛斥叛徒，乔冠华一看不妙赶快走掉了。不久，军统局发出逮捕乔冠华的电报，幸亏有友人报信，乔冠华得以撤到重庆周恩来身边。1943年，在重庆，乔冠华与周恩来外事秘书兼中共新闻发言人龚澎结婚，毛泽东形容是“千里姻缘革命牵”。

1946年，乔冠华筹建并负责管理新华社香港分社。1949年新中国成立，乔冠华开始从事外交工作，历任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副部长、部长之职。

在外交部工作，乔冠华仍然保持写作时喝一点酒的习惯，几杯酒入口，思维更能摆脱原有的羁绊，常常才思泉涌。后来，同事们也都熟悉了他这个特点，看见“乔老爷”工作时手边有一小杯茅台之类的好酒，也不以为怪。事实上，茅台、雪茄、浓茶这三样常伴随知识分子思考的东西，都是乔冠华的爱好。酌一口酒，一面摇晃着脑袋自言自语地把自己的构思过程念出声来，类似于西方流行的 “大声想”（thinking aloud），这样旁边的人就可以与他一同思考，随时讨论。

1970年毛泽东要起草一封贺信，外交部起草的文章被毛泽东形容为“文章硬如铁，读得满嘴血”，随即点名叫“乔老爷”重写一篇。当晚的餐桌上，乔冠华多摆了一瓶好酒，一个晚上，写出了气势磅礴的“5·20声明”初稿，毛泽东看完很满意。

板门店谈判智囊

周恩来总理特别器重乔冠华的外交才华。新中国甫一成立，外交政策委员会组建，周恩来任主任，就指任乔冠华为副主任。1951年，年仅38岁的乔冠华又被任命为朝鲜板门店谈判中方代表团高级顾问，此时，他还是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

停战谈判日期正式开始于1951年7月10日，在朝鲜期间，中朝谈判代表对外公布是：朝方是南日、李相朝，中方是邓华、解方，但幕后的谈判负责人是李克农和乔冠华，为安全起见，代号分别为“队长”和“指导员”。两个人，经常是李克农口述大意，乔冠华倚马成文。不过乔冠华也发过牢骚，在一次酒醉后，他摔了杯子，抱怨自己辛辛苦苦写就的雄文最后都只署了李克农一个人的名，感到委屈。不过事后，乔冠华被周总理批评，被责令去向李克农道歉。李克农却说人无完人，优点和缺点往往是连在一起的，为乔冠华开脱，事后两人和好，合作更为默契。

在谈判期间，中方九名军事警察在板门店西南面松谷里以北高地巡逻时，被三十余名韩国武装人员偷袭，带队的排长姚庆祥当场牺牲。

中方强烈抗议，并为姚庆祥烈士布置了灵堂，举行追悼大会。李克农觉得虽有这么多的挽联，仍难以表达人民的愤慨之情，于是对乔冠华说，“老乔，还是请你想一想，是否再写一副更为醒目的挽联。”

乔冠华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思索，不一会就脱口而出一副挽联：“世人皆知李奇微，举国同悲姚庆祥。”将姚庆祥与时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李奇微对仗，很能揭露事件的本质，李克农连声称好。

果然，在追悼会上，这副挽联引起了各国新闻记者的注意，使韩国军方枪杀姚庆祥、破坏谈判的事实传播到海外，在道义上置美韩谈判对手于不利的境地。

谈判陷于困境时，中央指示：“准备破，不怕拖，坚决回击，留有余地。”中方谈判人员也做好了长期对敌斗争的准备。但由于大家来时还是盛夏，没料到谈判会拖到冬季，因此随着天气转凉，缺少御寒衣物，乔冠华急了，给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写了一封催办函：

“炳南仁兄左右：开城秋深矣，冬装犹未至，东北在咫尺，奈何非其事？既派特使来，何以不考虑？吾人忍饥寒，公等等闲视，口惠实不至。难道唯物论，堕落竟如此？日日李奇微，夜夜乔埃事，虽然无结果，抗议复抗议，苦哉新闻组，鸡鸣听消息。嗟我秘书处，一夜三坐起。还有联络官，奔波板门店，直升飞机至，趋前握手见。又有新闻记，日日得放屁，放屁如不臭，大家不满意。记录虽闲了，抄写亦不易，如果错一字，误了国家事。警卫更辛苦，跟来又跟去，万一有差错，脑壳就落地。千万辛苦事，一一都过去。究竟为谁忙，四点七五亿。遥念周总理，常怀毛主席，寄语有心人，应把冬衣寄。”

难以想象王炳南拿到这封催办函时哭笑不得的表情，不过“乔老爷”的不羁风格倒是显露无遗。谈判中断后，周恩来特意安排乔冠华的夫人、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龚澎前去板门店探亲，回京后，龚澎生下一个女儿，取名“松都”，意为在朝鲜松山怀孕、首都北京出生。

1953年2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商量是否需要主动提出复会，在谈判桌上谁先主动谁就会吃亏，谈判双方有时甚至需要掷硬币决定谁先打破僵局。乔冠华认为美国人事实也挺不了几天。对此，乔冠华分析提出我方应该“一动不如一静，让现状拖下去，拖到美国愿意妥协并由它来采取行动为止。”

果然在乔冠华提出分析报告的第三天，即1953年2月22日，美国人绷不住了，联合国军新任总司令克拉克致函中朝方面，提议交换战俘。4月26日，板门店谈判在中断了六个月零十八天后终于重新启动。

1953年7月27日，经过两年多的外交斗争，谈判终于圆满完成。

王府井卖报

“文革”时期，乔冠华受到严重冲击。当时，北京王府井附近的一长段街道两旁都是报摊，而卖报的摊贩有很多都是中年以上的老同志，乔冠华也被迫在街边卖报。冯亦代回忆，“有次我远远看见他形销骨立的样子，心里颇为不平，但只能将不平之气藏在心头罢了”。因重庆“二流堂”被批斗的唐瑜回忆，他当时也被迫卖报，发现乔冠华后眼睛一亮，看到他的报摊似乎生意不佳，便挤过去商量。两人一起把报头主题吆喝出来，结果生意还真好了些。

王府井附近比较繁华，出入的外国人也比较多，乔冠华恳求造反派：“我还是代表中国政府的外交部副部长，这样抛头露面，在热闹的市中心出卖打倒自己的小报，有失国体呀！能不能让我到僻静些的背街后巷去卖？”这个要求没有被批准，于是乔冠华在造反派看得不严时干脆“溜了号”，他在白区工作过，有的是斗争经验。乔冠华把报纸点好数，按每份两分钱算出总价，然后找一家僻静的小酒馆喝酒去了，挨到快到收摊时间，拿出一元钱让酒馆换成角票、硬币，伪装成卖报所得上交造反派，造反派惊奇乔冠华的报摊生意还挺好，说“你这个修正主义分子，倒会卖报赚钱！”

1970年5月，与乔冠华相濡以沫的妻子龚澎突然在家中晕倒，不能动弹，到医院诊断为脑动脉血管破裂。乔冠华日夜守候在她身边，悉心照料病人。7月，龚澎的友人、著名旅美作家韩素音回国，前来

探望，她回忆道："龚澎的丈夫乔冠华当天晚上就和我见了面。我们两个人相对望着，都哭了。"

妻子去世后，乔冠华孤独一人，在家中经常一个人拿起放大镜看龚澎的照片，边看边哭。有一次哀痛难忍时，他给时任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的符浩打电话："我很寂寞，我受不了啦！老符，你若有空过来聊聊吧！"

"大国家，大人物"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通过了恢复我国联合国代表席位，秘书长吴丹邀请我国派团出席联大会议。外交部门虽然对这个喜讯已有准备，但却没想到来得这么快，对是不是要派团出席都拿不定主意，因为在抗美援朝中与联合国军打过一仗，又是在"文革"氛围中，联合国一直被宣传成为受美苏操纵的"资产阶级反动派的讲坛"，谁都不敢去，外交部讨论后，甚至主张暂不派代表团出席联大。

毛泽东指示："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

联大如果能够成行，这将是红色中国首次在联合国这种高级别国际组织上亮相，能代表中国出席将是一名外交官的闪耀勋章。

乔冠华主动请命，据说，外交部的一些同事为此觉得"乔老爷"好事争先，太不谦让了。最后还是毛泽东拍板，让"乔老爷"做团长。

乔冠华听到任命后非常兴奋，能代表亿万中国人民站上发言席是多么了不起呀。乔冠华又点起了香烟，喝起了茅台酒，连熬数夜赶写了出席联大的第一篇主发言稿。

出发前两天，陈毅老总不顾病体专设家宴为乔冠华饯行，临行前一天，毛泽东也会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说道："到联合国，要采取阿庆嫂的方针，不卑不亢，不要怕说错，当然要搞调查研究，但不能什么都调查好再说。"

在首都各界的四千多群众以及六十多个国家的驻京外交使节的欢送下，乔冠华率团抵达纽约联合国驻地。一下飞机，乔冠华就马不停蹄，先是拜会了本届大会主席、印度尼西亚的马利克和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又连续拜会了二十三个提案国的代表，乔冠华态度谦和，真诚沟通，一举打破了国民党代表散布的所谓"预言"，即"北京的人将使这个世界组织回到冷战时代，并将用狂热的、骂人的话来破坏会议讨

论。”各国代表对中国代表团的首次出现印象良好，连乔冠华的外籍司机都认为他是个和蔼、友好的人，从来没有皱过眉头。

乔冠华走上发言台时，他穿着藏青色中山装，身材修长，目光有神，还未张嘴，全场就爆发出长达半分钟的掌声，乔冠华不得不两次高举右手向众人示意感谢。在联合国的议题中，乔冠华还驳斥了苏联提交的裁军提案，轮到苏联代表马立克登台辩解时，已经坐到台下的“乔老爷”听了一会就忍不住放声大笑，笑得马立克连辩解也没了底气。

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在各个社交场合，乔冠华一直在笑，有时是微笑，有时是开怀大笑，有时是讥讽的笑，他的笑也感染了其他人，他的个人魅力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外界对中国人的刻板偏见，对新中国在联合国舞台上开展外交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纽约一家大报对中国代表团的报道题目是“大国家，大人物。”大人物就是指乔冠华，乔本人的活动和他的个性特点也登上了外媒头条，纽约市长特意宴请了乔冠华及其他中国代表团成员。乔冠华的成功外交也得到了国内的肯定，1971至1976年一共六届联大，乔冠华都是中国代表团的不二人选。完成使命回国后，乔冠华收获了平生以来最多的鲜花和掌声，也登上一生外交生涯的顶峰。

1973年底，乔冠华与民主人士章士钊的养女章含之结婚，1974年11月起任外交部部长，两年后改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顾问，淡出了新中国的外交舞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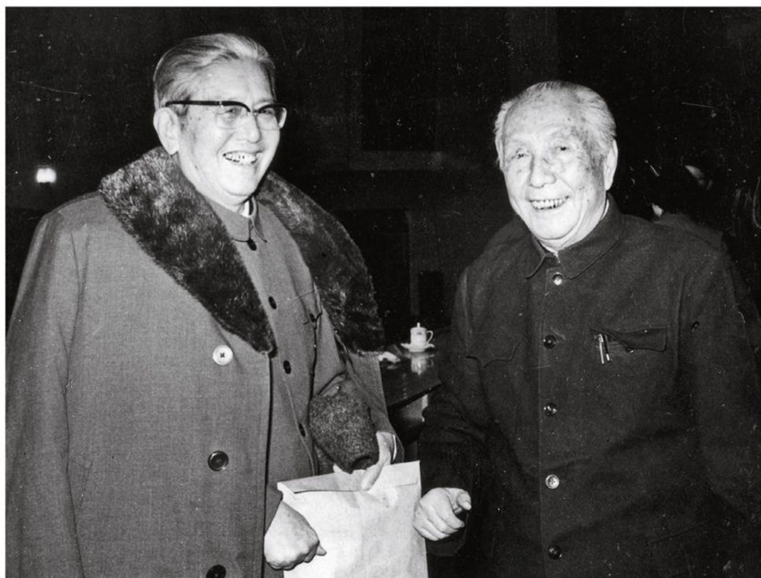
1983年9月22日上午，因癌症抢救无效，乔冠华在北京医院与世长辞，享年70岁。

鸣谢乔松都女士、乔宗淮先生对本文提供的帮助。

（参考资料：罗银胜：《才情人生：著名外交家乔冠华大传》；乔松都：《乔冠华和龚澎——我的父亲母亲》；张容：《一言难尽乔冠华》）

乔冠华最后的日子

作 者:张彦



/ 1983年3月12日，担任对外友协顾问的乔冠华（左）与对外友协副会长楚图南

1

945年踏入社会以后，我选择的职业是当记者。初到国共谈判的所在地重庆，接待我的就是中共代表团负责外事组工作的乔冠华和龚澎同志，他们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重庆谈判破裂，乔冠华和龚澎转移到香港，利用这个“中间地带”的特殊条件，开展大量工作让世界了解中国正在进行的解放战争。将近三年时间，我是他们的助手，同住在香港英皇道173号3楼，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才离开了他们，走上外宣工作岗位，但仍然亲密无间。

随着国内政治已走向越来越复杂化。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乔冠华在外交部也成了被批判的对象。但1975年，毛泽东主席决定刚刚复出的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合国特别会议时，仍然指定乔冠华为助手，可见其受到的重视程度。

1976年9月乔冠华前往纽约出席31届联合国大会时，他带去的是经过政治局通过的发言稿。在发言之前，他已经根据毛逝世后代理主席职位的华国锋电报，删去了“按既定方针办”这句话。但是，国内有报纸发表这个发言稿全文时，不知什么原因，却并未删去。“四人帮”垮台后，在外交部的大字报上，乔冠华被批为“替‘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舆论”。1976年底，他接受了组织的审查。不管最后的审查结果如何，他的外交生涯结束了。

在漫长的审查期间，乔冠华还做了肺癌切除手术。去看望乔冠华的人却发现，他自己依然十分坦然。他喜欢在四合院的老梨树下散步与思索。1982年元旦后没有几天，乔冠华约我们夫妇去他那里聊聊，信抬头他写的是我几十年前在地下党时期使用的代号名字“DONALD”，他说：“要说的话太多了，见面再谈吧！”那天，尽管他已经有病在身，他还是和过去一样健谈，不时放声大笑。

后来事实证明，乔冠华在联大发言中并没有说“按既定方针办”。1982年12月，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委托习仲勋、陈丕显在中南海约见乔冠华，详细地询问了他的病情，并代表中央对他说了一番肺腑之言：“过去的事情一风吹。一笔勾销。你是党内老同志，受点委屈要想得开。”陈丕显还以自己为例，讲了受过不公正对待的经历说：“我们入党几十年，差不多都经过这样、那样的挫折，受过委屈，你也不要计较了。你有那么多丰富的外交工作经验，还要为党的外交事业多做工作。”不久，乔冠华被安排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担任顾问。

进入1983年以后，乔冠华的病情恶化，癌细胞进一步扩散，9月2日最后一次住进了北京医院。9月21日，习仲勋代表中央到医院看望乔冠华。紧接着，文化界著名领导人夏衍——这位与他相交半个世纪的知心友人匆匆赶到他的病床前，作了最后的谈话。老乔没有说别的，只是念念不忘文天祥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第二天上午10时40分，他终于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仅仅70岁。

乔冠华的丧事，根据家属建议，只举行了简单的遗体告别，生前好友自愿参加。1983年10月25日，前往北京医院的街道挤得水泄不通，人头涌动，汽车堵塞。来悼念这位风云人物的人络绎不绝。有头面人物，也有布衣百姓；有青年学子，也有国际友人。

乔冠华去世以后，他的骨灰存放在山清水秀、景色宜人的苏州太湖之滨的东山。将乔冠华的骨灰安葬在这个山顶是他的生前至交李灏夫妇选定的，墓地是吴县人民政府赠予的。这里又是他的故乡——江

苏。他的老友黄苗子题写了墓志铭，写的正是那一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几年后，我和老伴捧着鲜花前去给乔冠华扫墓时，华侨公墓的管理人员告诉我们，因为乔冠华安睡在这里，许多海外友人也跟着来此长眠了。常有一些不知名的人士在乔冠华墓前献上鲜花、果品，并鞠躬致敬，以寄托他们的崇敬和爱戴。老乔可以安息了。

2009年春季，苏州杨湾华侨公墓负责人提议，将山坡上年久失修的乔冠华墓地挪至同区西侧100米平坦处安放，并在原地保留过去的墓碑。就这样，在苏州公墓第一墓区，人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墓志铭：天生丽质双燕飞 千里姻缘革命牵（乔冠华和龚澎）。

（作者：张彦，1922年生，高级记者，原《今日中国》杂志社第一副总编辑。现为宋庆龄基金会名誉理事，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常务理事）

中国最有名的“农民”吴仁宝

作 者:史丹顿



/ 20世纪60年代时任华西村书记的吴仁宝（左二）访农家

2013年3月18日，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原党委书记吴仁宝因肺癌逝世，享年85岁。这位“天下第一村”的领导者、全中国最有名的“农民”的葬礼上，国家最高层次的领导人都送来了花圈，使他身后拥有一份与一个村党委书记不太相符的哀荣。

在他的领导下，华西村由一个贫穷的小村子成为一个富甲一方、名为乡村的“城市”。他的身份很特殊，他是华西村所有企业的实际董

事长，他还是政府官员序列中的一员。自1957年，吴仁宝成为华西村书记后，他还当过江阴县委书记、江苏省政协常委等。吴仁宝执掌华西村几十年来，在亦官亦商的模式下开辟了华西村政经一体式的金光大道。

原来党也会犯错误

吴仁宝1928年出生，从小给别人放牛做长工，一贫如洗。新中国成立后，吴仁宝热烈拥护当时的每一项政策，大跃进、放卫星、刮五风，紧跟党走。1958年，浮夸风，他虚报了亩产3700斤，当得知别人报了1万斤时，当即怒指对方做假。但吴仁宝后来意识到，这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1994年，吴仁宝接受采访时说道，1962年，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公开承认了施政上的一些错误，强调要实事求是。这次大会让吴仁宝意识到，原来党也会犯错误，也会有不实事求是的时候，从此对党的农村政策服从但不盲从。

一开始，当吴仁宝感觉上面传达下来的政策不切实际时，就立刻硬顶回去，最后被上级恶评为“骄傲自大，目中无人，独立王国，这还了得”，险些被革职。但吴仁宝很快就调整了对策，上面不管什么政策，当领导面一定会坚决答应，做到“口头落实”，背后不一定执行，靠这种灵活方式维护村里利益。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农业学大寨，吴仁宝已经是村支部书记和江阴县委书记一肩挑了，他真的带领群众“白天干了不算，晚上还要干，晚上干了不算，第二天天不亮就要下地”。吴仁宝自己也下地干活，而且干得比一般农户还要多，因此获得了“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

1975年10月26日的《人民日报》文章中写道：“华西大队认真学大寨十一年，过去粮食亩产超一吨，今年可达2400斤……吴仁宝同志向自己提出了五项要求……四是百分之八十的力量用于抓农业，百分之十的地方财力用于农业机械化，把各行各业纳入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他把自己的蓝图编成了一首诗：九十万人民心向党，七十万亩田成方，六万山地换新装，五业发展六畜旺，社员人人喜洋洋。” 看到这篇报道，81岁的江阴老乡、文学家叶圣陶激动不已，写了很长一首赞美诗，其中提到“仁宝同志江阴众，英雄业绩维仔肩，更思举国数千县，孰不能如江阴焉”。

但学大寨的现实是，华西被称作是“做煞大队”，邻村的姑娘流

传“嫁女不嫁华西郎”乡谚。全村人拼死干活，农业总产值也只有24万元。于是1969年吴仁宝私下里抽调20个人在村里偷偷办起了小五金厂，三年后产值就抵上了种粮收入。这一时期，正在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但是吴仁宝本能的经济理性仍让他冒险把小五金厂偷偷开了下去。四儿子吴协恩回忆说：“田里红旗飘飘、喇叭声声，检查的同志走了，我们转身也进了工厂。”到了1978年，吴仁宝盘点过华西村的家底，共有固定资产100万元，银行存款100万元，另外还存有三年的口粮，这在全国的乡村中已经是富甲一方了，当时中国一包烟的价格是0.2元，百万级的购买力对一般人简直是天文数字。

吴仁宝这么做的后果是一边受表扬，一边挨批判。70年代末期，《人民日报》在头天刊发“农民热爱这样的社会主义”，次日的中央内参上就有大字标题：“华西村是个假典型”。

视“南巡”为商机

华西村人杨永昌回忆，吴仁宝“每天坚持阅读报纸、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晚上收看新闻联播，及时了解中央政策和经济情况，心里清楚得很”。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政治漩涡中几经沉浮的吴仁宝已经比很多同时代人要成熟得多。中央推行分田承包政策，吴仁宝并没有立即采纳，而是到河北、河南多地考察，回来后，只甩了一句话：“领会中央政策，闷声发大财。”

在主旋律的共鸣中奏出独唱调并非易事，压力之大，恐怕只有吴仁宝自己知道，为了给自己寻找政策的合法性，吴仁宝从中央政策中愣是找出了“宜统则统，宜分则分”这样一句话为自己辩护。

华西村不分田，而是集资创办了一个打农药用的喷雾器厂，到1984年，单这一个厂就净赚了200万元。

1992年，邓小平南巡，也就在那一年，“不管黑猫白猫，抓到了老鼠就是好猫”成为坊间最流行的话。吴仁宝根据多年的政治经验，立刻嗅出经济政策调整的商机。

吴仁宝把全村的干部全部召集起来开会，一直开到凌晨两点，目的是讨论他对于宏观经济即将上行的判断，当天会议后下达了动员一切资金，囤积工业原材料的指令。为此，吴仁宝率人四处奔波高息借贷，另外又利用华西村先进的名声到处要指标、跑铝锭。大儿子吴协东透露，“村里当时购进的铝锭每吨6000多元，三个月后就涨到了每

吨1.8万多元”。这次精准的商业预判，为华西村实现了早期的原始积累，也为吴仁宝树立了绝对的权威。

解读中央的宏观政策为华西村的微观经济服务，吴仁宝一直是这么做的，也一直没有失过手。2007年底，国内出现通货膨胀的趋势，中央新闻中，关于经济着陆的讨论越来越多。吴仁宝也感觉身边的物价上涨得很快，2008年初，他召集村里的干部和各个企业的负责人到北京开会，讨论分析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最后吴仁宝提出，生产性企业立即削减库存产品，同时停止购进原料，必须先有订单后生产。2008年发生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很多扩张太快的企业都遭受重击，华西村的企业却安然无恙。这一役，再一次使吴仁宝成为全村人佩服、倚靠的对象。

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如同在经济上收放自如一样，吴仁宝在华西村的高度权威也一点不妨碍他在对外交往上谦逊亲和。

一度与华西村同样富裕且出名的天津静海县大邱庄，二省并称是“北大南华”，大邱庄的禹作敏出名后逐渐态度骄横，排场很大。据说，吴仁宝还专程派人劝过禹作敏，但没起作用。禹作敏最后因妨碍公务、窝藏、行贿等罪名锒铛入狱。

1994年，吴仁宝还带着富了的华西村人专程到昔日最耀眼的村庄大寨考察，贴心地为大寨人送去了羊毛背心，吴仁宝亲自为大寨的老支委梁便良扣上羊毛衫的扣子。在与大寨铁姑娘郭凤莲会面后，吴仁宝公布了他带来的对口支援项目。在虎头山陈永贵的墓碑前吴仁宝三鞠躬，并在发言中使用“共同富裕”的政治术语来解释这次考察行动。

吴仁宝还特别在乎强化“中央——村”这样的呼应关系，中央有“一国两制”，华西村就有“一村两制”（集体制、个人制）；中央有“三个代表”，吴仁宝就亲自为华西村艺术团编了三部表现“三个代表”的戏剧；吴仁宝指定华西村大楼设计高度为328米，因为当时北京最高建筑就是328米，这样华西村就可以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了。

吴仁宝的四个儿子也使用伟大领袖名字中的单字命名以示纪念，分别叫东、德、平、恩。吴仁宝因为幼时家教很严，所以对自己孩子也很严格，5个孩子，个个被他打过。还没人敢去劝，弄不好连劝的人也要挨打。

现在除孙女吴芳2012年当选江阴市副市长外，大部分吴家人都被

吴仁宝召回村里，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占据了华西村党委将近一半的书记、副书记职位，在这个党、村、企合一的村庄，实际上把握着整个华西村的经济命脉。

吴仁宝每天晚上十一点上床睡觉，凌晨三四点起床，梳洗完毕后就开始看报看电视新闻，看到感兴趣的内容会随时召开干部会议。吴仁宝在村里没有办公室，很多会议都是在他家的客厅里开起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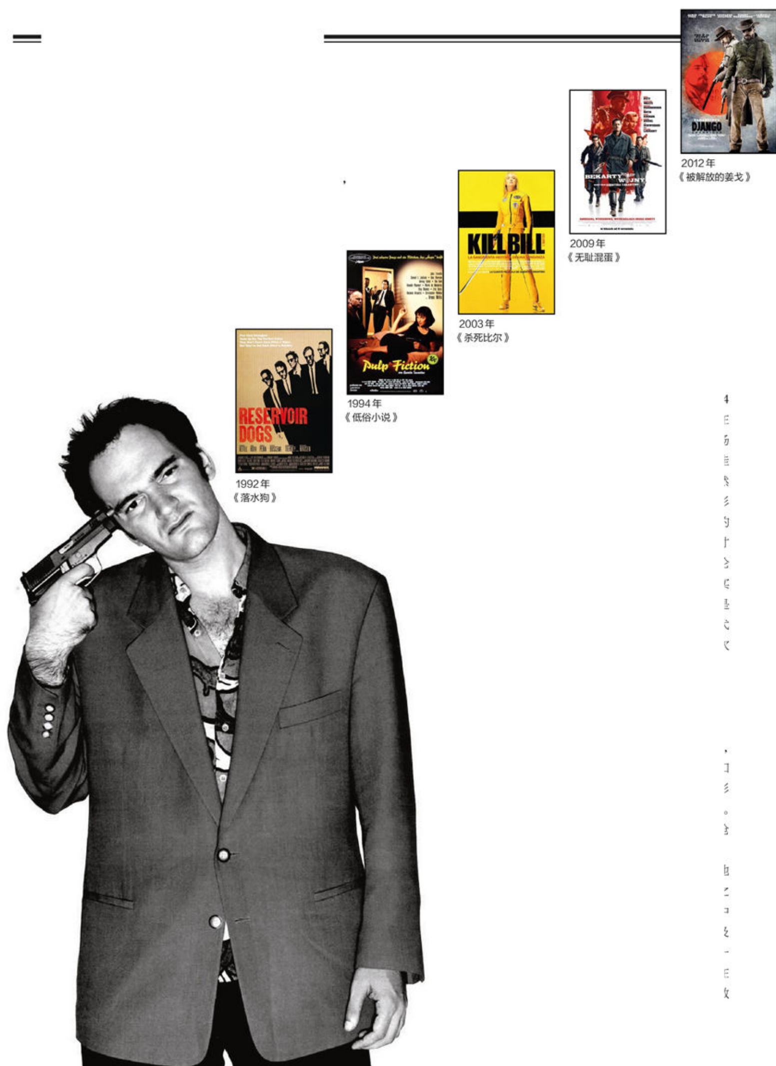
在去世前，八十多岁的吴仁宝每天的工作主要是为一拨拨游客演讲，接受各路记者的采访等，听他作报告是到华西村旅游的必看节目。虽然吴仁宝讲的方言必须依靠孙媳的“翻译”，但每当他以一个农民的身份，用生活的俏皮词汇宣讲华西村是如何紧跟中央、走向胜利的故事时，听报告的人们总是会发出会心的大笑。

吴仁宝最后嘱咐“仪式从简”，“应该是考虑到党中央正提倡节俭”，因此追悼会村里只放了一排花圈，而不是事先计划的一片花的海洋，这大概是吴仁宝一生中最后一次敏锐地把握中央精神吧。

（参考资料：吴晓波：《激荡三十年》；冯治：《吴仁宝吐露心曲 为什么要干到80岁》）

昆汀•塔伦蒂诺混搭出的电影图腾

作 者:时间之葬



近些日子，一部美国电影即将于4月11日在国内上映的消息，在年轻电影观众当中引发了一场不小的热潮。这就是最新一届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得主——《被解放的姜戈》。然而对于那些热切期待着

这部电影上映的影迷而言，奥斯卡根本不是他们疯狂追捧的原因，影片背后那个看着监视器的家伙才是这一切的理由。这理由叫作昆汀·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这个名字，其实早已超越了导演的含义与层面。他更像是一个创新与叛逆并存的精神偶像，一整代年轻人的象征和代表。这是他的电影首次在中国内地主流院线上映。

名字来自于电影角色

昆汀·塔伦蒂诺生于1963年3月27日，父亲是意大利裔，母亲拥有爱尔兰血统和印度血统。父亲托尼·塔伦蒂诺是个电影发烧友，还曾经一度有志成为专业演员。他给昆汀起的这个名字就源于一部叫《枪之烟火》的电影中的角色。

昆汀作为导演最为人熟知的一点是他自己就是一个疯狂的影迷，在成为导演之前观看了大量的世界各地经典电影，其中不乏人们闻所未闻的冷门小众影片，以及当年在美国少有人问津的外国电影。这一切都是由于他16岁从高中退学之后，便在曼哈顿的著名音像店Video Archives里做店员。曾经有人问他去不去上电影学校，他总是回答："不，我只去看电影。"后来的事实证明，大量观看电影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法，正是在看过的不计其数的电影中，昆汀找到了自己的创作灵感。

在做音像店店员的业余时间里，昆汀还参加了演艺学校的课程去学习表演。22岁时，他完成了自己人生的第一部剧本。在此后的两年内他连续创作出了两部正式的电影剧本《真实罗曼史》和《天生杀人狂》，后来分别被好莱坞著名导演托尼·斯科特和奥利弗·斯通拍成了颇受赞誉的影片。

《低俗小说》成了年轻人的图腾

到了1991年，积累了一定经验的昆汀拿到了出售《真实罗曼史》剧本所得的5万美元，决定拍摄自己的第三个剧本《落水狗》。该片也是他的导演处女作。然而5万美元的经费对于一部电影来说实在捉襟见肘，此时曾出演过《基督最后的诱惑》等片的著名演员哈维·凯特尔在看过《落水狗》的剧本后，不但马上同意担任主演，还为影片带来了130万美元的投资和众多演员的加盟。最终电影顺利拍摄完成，并且于1992年在圣丹斯电影节首映。影片上映后立刻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昆汀鬼才般的电影天赋和风格化的暴力美学都成为他后来最著名的标志。与此同时，片中出现的大量粗口（有影迷统计，"fuck"一词出现了多达252次）和暴力镜头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这一年，昆汀除了带着影片往返于各电影节宣传、领奖外，开始着手创作下一部作

品《低俗小说》。

对于昆汀而言，1994年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年。此时，他编剧的《真实罗曼史》和《天生杀人狂》都已经上映。两部影片的不俗品质吸引了诸多业内人士的关注和讨论，昆汀作为一名优秀编剧的口碑已在业内树立起来。同时，他导演的第二部影片《低俗小说》在当年的戛纳电影节夺取了最高荣誉金棕榈大奖。这样一来，全世界都开始对这个“痞子”另眼相看。

《低俗小说》不仅得到了电影业内人士的一致肯定和褒奖，也收获了一亿多美元的不俗票房，这部影片后来甚至成了全世界年轻影迷顶礼膜拜的对象，有着图腾一般的神圣地位。片中主演塞缪尔·杰克逊杀人时宣读《圣经》的段落以及特拉沃尔塔和乌玛·瑟曼跳的扭扭舞都被影迷们不断模仿。而该片所采用的环状叙事结构也颠覆了好莱坞电影一根筋到底的传统叙事模式。影片的影响更是波及到了电影领域之外，片中采用的配乐引发一股复古的音乐潮流，而电影中的服饰和发型也成为了一种时尚。更有一批疯狂的影迷自发组织了一个名为“Quenish”的宗教组织以表达对昆汀的崇拜……

“抄袭”香港、日本老电影

在导演了他的第三部影片《杰基·布朗》之后，2003年，昆汀为全世界奉献了一出充满另类风格和刺激快感的经典大作——《杀死比尔》。

《杀死比尔》当中大量采用了中国的武侠和日本的武士元素，其酣畅淋漓的暴力杀戮画面，让西方观众眼前一亮。正是在这个经典系列影片里，他对东方文化，尤其是香港和日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老电影的迷恋展示无余。影迷们可以看到许多他借鉴经典影片的桥段和镜头，尤其是香港邵氏、吴宇森的电影以及日本剑戟片《修罗雪姬》。昆汀自己直言：“我喜欢拍那种把什么东西都混在一起的片子，我从中得到乐趣。有写实主义的东西，也有夸张的东西。两者我都喜欢。其实我的每部戏都是这儿抄点，那儿抄点，然后把它们混在一起。如果不喜欢的话，观众大可不看，我就是到处抄袭桥段的。伟大的艺术家都这么干。是抄，不是什么他妈的致敬。”如此一来，观众对昆汀电影的最大兴趣除了故事以外，就是看他又“抄袭”了哪些电影。

作为资深影迷的昆汀自己到底收藏了多少录像带？这恐怕是很多影迷好奇的一个问题。可惜昆汀从没有数过自己到底有多少部电影的录像带和DVD。但确定无疑的是，他藏有一些如果不到戏院看就没有机会再看的电影。

在电影中死得变态离奇

昆汀的每一次创作都更像是一次肆意的玩票，他拍片的最大乐趣就是把电影变得好玩起来。各种对传统的颠覆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充斥在他的电影中。在他2009年推出的《无耻混蛋》中，他的疯狂甚至可以彻底颠覆历史。纳粹元首希特勒在他的影片里竟然因为一个女人的复仇计划而被炸死在了一个电影院里。与他合作的许多顶级明星（如《无耻混蛋》中的布拉德·皮特和《被解放的姜戈》中的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也一改往日的银幕形象，被彻底地颠覆。昆汀坦言自己很享受这种“玩弄观众于股掌之间”的乐趣。他也常常以配角的身份出现在自己和好友罗德里格斯的影片中，这些角色往往形象猥琐粗鄙，而且死得变态离奇，从中也可见他幽默的自嘲精神和骨子里的恶趣味。在《被解放的姜戈》中他也有这么一个角色，大家不妨在看片时仔细辨认一下，看看银幕上的“痞子范儿”。

新片《被解放的姜戈》依然是一次对历史的重新解读和对电影传统的颠覆。影片作为一部通心粉西部片，却完全不按传统通心粉西部片的牌理出牌，主角不再是风度翩翩的牛仔，而是一个黑人奴隶。影片用昆汀最擅长的暴力手法直观展现了奴隶制下美国南方农场主对黑人奴隶惨无人道的摧残和压迫，而奴隶姜戈的反抗手段则是快意恩仇的以牙还牙。高潮部分更可以被称作一幕“以血浆谱写的华丽歌剧”。据说影片几乎将不做删减引进，想必这是令那些本已热血沸腾的影迷更加血脉贲张的原因。

二十多年来，昆汀正是这样我行我素地拍他想要的电影，而且他将一直坚持自己的电影哲学和美学一路走下去。昆汀认为：“学院会帮助你怎样去把画面与音效同步、也会教你一些运用镜头或剪接上的小把戏……但我始终认为，若你要成为一个出色的艺术家就得靠自己。”

父亲吴祖光：生正逢时，不了了之

作 者:吴欢


张祖道/CFP

/ 1963年，北京，剧作家吴祖光的六岁女儿吴霜在画画。左起：新凤霞、画家张正宇、吴霜、吴祖光



/ 1963年，吴祖光新凤霞夫妇合影

吴欢：书画家，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剧作家吴祖光和表演艺术家新凤霞之子。

1953年出生，齐白石以“吴欢无不欢”之意为他取名吴欢。

吴欢自己说：“在我身上，一半是书香门第，一半是民间艺人。书香门第，写写画画；民间艺人，江湖义气、嘻嘻哈哈，不愿变成学者的样子。”

吴欢的主要著作有《驴唇马嘴集》、《吴欢论坛》、《西皮流水》、七十万字力作《奇侠》，以及小说、电视剧、政论、杂文等二十余种。主要书画作品有《吴欢书画》、《吴氏三代书画选》等。

今

年是著名剧作家吴祖光逝世十周年。

吴祖光曾被周恩来称为“神童”，他十九岁就因写出了抗日戏剧《凤凰城》而名满全国，是中国现代戏剧界以革命战争题材成名的第一人。他在世时曾有人对他说：“你空有满腹才华，奈何屡遭坎坷，生不逢时。”吴祖光答道：“自清朝被推翻以来，我经历了民国、共和国，各种各样的好事、坏事、怪事都遇上了，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国

家越来越好，哪里是生不逢时？当然是生正逢时。”从此他给人题字时，只写四个字“生正逢时”。

吴祖光祖籍江苏常州宜兴，据常州图书馆所藏光绪年间的宜兴北渠家谱记载，吴家历史可上溯到明代，这份家谱最后的名字是吴祖光之父吴瀛。吴瀛（1891-1959）字景洲，是故宫博物院的创建人之一，上世纪二十年代即参与了民国政府对紫禁城文物的清点和审查工作。吴瀛的父亲吴稚英（1864-1913）曾在张之洞的幕府任职，吴稚英的父亲吴殿英（1842-1907）则在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期负责军务，帮助张之洞创建和训练湖北新军，这支军队后来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因此种种渊源，吴家自晚清、民国以至新中国，与国共两党的诸多元老人物都有复杂关联。吴祖光之子吴欢说：“中国有一批非常重要、最早觉悟的晚清官宦士绅阶层，他们在国民党和共产党建立之初，就意识到中国将发生巨变，因而积极地支持革命活动，吴家就是其中的一支。但是，国共两党在写史的时候却因年代久远，情况复杂，是非难辨，而忽略不计了。”

到了1949年之后，国民党退守台湾，共产党在大陆建立了新政权，这些与国共两党都交情匪浅的“社会活动家”的命运，也随着时代巨流跌宕起伏。吴欢正在重新整理家族遗留下来的大量史料，以纪念父亲吴祖光逝世十周年——2003年4月9日，吴祖光以八十六岁高龄离世，这一天居然也是吴祖光夫人新凤霞的忌日，她在1998年4月9日完成了人生谢幕。“父母生前受了很多委屈，主要是在五六十年代的政治运动中。”吴欢说，“今天我们不应该忘记那段历史。”

吴家与国民党的深厚渊源

我家的事要从辛亥革命说起。我爸爸吴祖光祖籍江苏常州府宜兴，1917年生在北京一个大官庄蕴宽的家里。庄蕴宽是吴祖光祖母庄瑜厦的弟弟、吴祖光的舅爷，南方人叫舅公。我爸小名“韶韶”，庄蕴宽对他这个侄孙特别喜欢，还专门作诗一首：“韶歌清澈又铃圆，此是新生雏凤缘。寄取初三天上月，一弯眉似我参禅。”妙的是诗中竟然有个“凤缘”，预示我爸后来娶了我妈新凤霞。

庄蕴宽这个人非同小可，庄家是清朝状元家族，祖上做过乾隆帝师，故宫博物院前院长郑欣淼在纪念我爷爷吴瀛的文章中称庄蕴宽为民国的大政治家。据孙中山秘书冯自由日记，庄蕴宽在1902年，作为清朝知府级以上的官员，是第一位宣布支持孙中山、黄兴发动革命的人物，距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提前了九年，黄兴日记中也有多处提到庄蕴宽。庄在晚清曾任广州常备军统领、广西梧州知府，后接替郑孝胥任广西边防督办，相当于军区司令。后来国民党的大人物李宗仁、

白崇禧、李济深都是他在广西一手培养起来的童子军。

旁观者清，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写道：“为辛亥革命铺平道路的主要力量是清朝的改革者，不是革命者。”此论有一定道理。当年晚清腐败，满汉矛盾激化，全国十八省官宦体系率先觉悟，其中革命党的人数甚少，影响力并不大。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建的湖北新军发动辛亥革命，促成民国建立才是当时的真相。连孙中山都称赞：“以南皮（张之洞）造成楚材，颠覆满祚，可谓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

庄蕴宽是全力支持黄兴的清朝旧臣。吴祖光之父吴瀛二十岁就当了舅舅庄蕴宽的秘书，跟着他反清。黄兴家跟我家关系一直很好，黄兴的长孙黄伟民至今与我来往密切。而吴祖光的祖父吴稚英、曾祖父吴殿英也都是张之洞的湖广系人马。按现在的说法，吴瀛是个功在民国的干部子弟，所以后来才有资格参与创办故宫博物院。而在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大典上贵为主席、向全国宣布“故宫”成立的，并不是执政总理段祺瑞，而是庄蕴宽。

吴祖光祖母庄瑜厦是位能诗善画的才女，丈夫吴稚英过世后，她带着儿子吴瀛随弟弟庄蕴宽来到北京，所以吴祖光就出生在庄家。

吴祖光家族姻亲中还有一位更大的人物，他叫赵凤昌，是张之洞首席幕僚，南怀瑾曾说他“控制了晚清东南半壁的金融”。赵凤昌是吴瀛的表姨夫、庄蕴宽的表姐夫，人称“民国诸葛”。辛亥革命时，孙中山从外国回来，首先到上海拜会赵凤昌；黄兴更是经常向赵请教大计，连袁世凯都敬他三分，也请他出山辅佐，却被赵凤昌以身体原因婉拒了。国民党元老陈其美对赵凤昌也甚为敬重，言必称师。当年陈其美因反清被抓起来，是赵凤昌救了他的命。

孙中山成立临时政府所需的大笔资金，就是以赵凤昌为首的江浙沪财团供给的。但是在国民党编的民国史中，对赵凤昌只字未提。蔡元培生前就撰文抱不平说：“国民党对不起两个人，一个是赵凤昌，一个是陈范。”

陈范出身湖南大官宦人家，是清末新闻界反清大案《苏报案》的主角，他也是我家的一位姻亲：陈范的弟弟陈韬娶了庄蕴宽的妹妹庄曜孚。陈范还有个侄女很有名，就是被毛主席称为“革命母亲”的陈云凤，陈云凤的儿子就是共产党烈士夏明翰。论亲戚关系，夏明翰是吴祖光的表哥。

这便是吴祖光家族和国民党的早期渊源。这样说吧，我家是晚清最早觉悟的官宦体系中有代表性的家族之一，遗憾的是国民党写历

史，专写他们党内的人，对帮过他们大忙的晚清老臣几乎不提。

吴瀛帮助青年毛泽东“驱张”

我家和共产党的渊源，应该是从我爷爷吴瀛这辈开始的。

吴瀛祖籍明朝宜兴吴家，清朝转到常州，清光绪年家谱里的名字记到他为止。吴瀛早年随父辈住在武汉，在张之洞创办的湖北方言学堂读书，学的是英文，这里后来成为湖北洋务运动的中心。吴瀛在共产党系统内最早的朋友，是曾在黎元洪的湖北军政府秘书班子里任职的共产党元老董必武，两人在解放后还有来往。“文革”后我家的四合院被七家造反派强占，我妈又被迫害成残疾躺在床上，正是董必武夫人何莲芝找国管局为我家要房、安排住处。

瞿秋白跟我家也是亲戚关系，瞿的奶奶和吴祖光的奶奶是堂姐妹，所以瞿秋白是吴祖光表兄。早年瞿秋白在常州庄家念私塾，后来去北京，也是先到庄蕴宽家报到拿钱用。那时的情景跟现在一样，敢来北京混的，都有“托儿”。

在中共党史和毛泽东年谱中，都有对共产党早期一个重要活动地点“李氏芋园”的记载。这是一个很大的庄园，“李氏芋园”里留宿着毛泽东母校长沙第一师范的几位先生：修身教师杨昌济，历史教师黎锦熙，国文教师袁仲谦，数学教师王立，以及校长张干、学监主任方维夏和教育实习主任徐特立等。毛泽东正是在“李氏芋园”初识杨开慧，并展开追求的。

这个“李氏芋园”当时的女主人，正是吴瀛的大姐吴琴清，她的夫君则是法国文学翻译大家李青崖。李青崖留学比利时，最早接触西方先进思想。学成归来后，他将一批先进的文化人请入“李氏芋园”老宅，并于1919年与徐特立等人成立“健学会”，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长文《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用“东方的曙光，空谷的足音”这样热烈的语言来为其造势。李青崖还支持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在园内组成哲学小组，并主办留法预备班，自任教员。

民国初建，局面混乱，湖南督军张敬尧在境内鱼肉百姓、为非作歹，引发全省人民愤怒。毛泽东成为学生领袖，首先组织了以“驱逐军阀张敬尧”为目的的赴京请愿团。临行前，吴琴清、李青崖特意嘱咐毛泽东，到北京去找吴瀛帮忙。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到北京，时任北京市政府坐办（相当于秘书长）的吴瀛，立即把毛泽东等人的食宿安置在他北海团城办公

室对面一箭之遥的北长街20号（原北长街99号）福佑寺内。

青年毛泽东以出众的才华和滔滔雄辩，向吴瀛介绍了张敬尧在湖南的种种恶行，令吴瀛感愤不已。吴瀛即刻去找了自己在政府担任审计院长要职的舅父庄蕴宽，又请庄出面去找时任总统徐世昌和国务代总理靳云鹏。徐世昌知情后，亲自出面对张敬尧谎报政况请求增兵的说法予以驳斥，总理靳云鹏则直接命令对张敬尧剥夺军职，张敬尧遭到北洋政府全国通缉，“驱张运动”获得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吴瀛姐夫李青崖成为毛泽东钦点的上海文献委员会主任和上海文史馆常务副馆长，吴琴清则是上海文史馆馆员。

除了早年帮助过毛泽东，吴瀛和北大教授、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也是好朋友，并在李大钊牺牲后不顾“通共”嫌疑，毅然在家中收留了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据我所知，李大钊儿子李葆华是被周作人家收留的。

正是由于吴瀛和共产党的这些关系，导致后来吴瀛在国民党内断送了政治前途，屡受打击，甚至被撤职起诉。

吴家捐赠文物给新中国

我爸和周总理的友谊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结下的，这事不新鲜了。1945年，吴祖光在重庆编辑《新民晚报》副刊，首发了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雪》，帮共产党提升了文化影响力，形成了巨大的正能量。周恩来为这事多次说：“吴祖光是我在文化界最好的朋友。”中央文史馆馆长萧乾先生也曾说过，这种事只有吴祖光敢干。

曾经担任周恩来总理秘书的郭英叔叔告诉我：“新中国成立初期，你爸妈结婚的请柬是交到我手上转给周总理的。总理忙，去不了，所以主动提出在中南海家中为你爸妈补办一次小型婚宴，还请了老舍、曹禺两家人作陪。”这个待遇，全国文艺界只有我爸妈风骚独领了。

1955年，为支持国家的文博事业，我爸爸动员久病在床的爷爷吴瀛，把我家一大批古代字画文物捐给了国家，其中包括唐伯虎、文征明、董其昌、郑板桥的字画，那批东西价值连城，总共有241件。此事故宫博物院有案可查，我现在手里还有故宫博物院开出的清单。此外，我妈还把她新中国成立前演戏挣的全部家当，一共112件演戏的行头、凤冠、戏装，全捐给了中国评剧院。

总之我家该捐的都捐了，我爷爷吴瀛后来连看病买药的钱都没有，我爸爸在1957年“反右”时被抓走，送到北大荒“劳改”。我爷爷吴瀛贫病交加，没钱买药，可以说他是穷死的。爷爷去世时，我爸想回家奔丧，组织上都不允许。我妈新凤霞晚年坐在轮椅上经常自言自语，也多次对我说过：“为什么你爸爸一生爱共产党，跟共产党干革命，把咱家的财产全捐了，他们还要欺负咱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尤其讲究一个“德”字，我爸妈很不凑巧的是，刚好在上世纪中叶，碰上了一个“缺德”的时段。

习仲勋团结胡乔木和吴祖光

关于上个世纪的所谓“左右”之争，今天看来也是整个社会进程，在政治上从不成熟渐趋于成熟，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我父亲和胡乔木先生的关系在社会上流传很广，其中有些说法是不准确的。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下，吴祖光和胡乔木虽然各有坚持，但都是为了共产党好，都是为了国家利益。平心而论，重大政治决策亦非乔木老所能左右，社会上关于他“极左”的传 说并不公允。

说到我爸和乔木老，自然就要提习仲勋老先生。因为正是在习老的斡旋下，胡、吴二老才化解了矛盾，重修旧谊。

习仲勋老先生在胡、吴之间斡旋，也确实不易，因为这两位情况都很特殊：我爸爸的情况前面介绍了，他自恃和共产党渊源深厚，想说什么说什么，谁都不怕。乔木老则更加根正苗红，他是毛泽东最信任的中共党内“第一支笔”，其影响力之大可以想见。对比之下，我爸爸当然是下风头，或者说根本不是一个量级。但我爸的个性极强，北京话叫“死扛”，其实就是甘心吃硬亏的意思。今年“两会”上，冯骥才先生就对我说：“你爸爸真有胆子，当年政协会上他就敢说：‘法规一定要建立，否则中央领导犯错误谁监督？’”

说回习老，在老一辈的政治家中，会打仗的很多，客观来说真正有文化的并不多。习仲勋之所以不同于其他政治家，重要的在于他老人家思想文化结构非常完整，堪称“道兼文武”。调解我爸和乔木老这两位大文化人，没文化显然不行。所以第一要有善良、厚道的性格，第二要有渊博的文化和历史知识，第三才是政策水平。

习老能主动站出来帮我爸爸说话，说白了是救命。为什么要救我爸爸？因为习仲勋是位有担当、有气魄的大政治家，他考虑的是党的形象问题，他要竭尽所能团结党的朋友，不让他们再受伤害。习仲勋

有深厚的文化积累，他清楚并了解我爸爸的历史，他懂我爸爸。同时他更清楚，有些高层人物不了解我家的历史，还有些则是明哲保身，视若不见。所以只有他站出来，我爸爸才能得救。于是他真的站出来了，当然他也一定考虑到了，如果救不了我爸，他也会受到误解和株连。对此显然他是无所顾忌的，这就是习仲勋之所以是习仲勋，而不是其他人的伟大之处。

果然，习仲勋说服了胡乔木，也感动了胡乔木。习仲勋促成吴祖光登门拜访胡乔木，化解了两人多年矛盾。后来乔木老登上我家四楼来回访我爸妈，正式和我爸妈“订交”重修友谊。乔木老病重时，我爸也走不动路了，还让我陪着去胡家看望，此事后来被传为佳话。

正因为能调解吴祖光和胡乔木的恩怨，习仲勋也在大批文化界人士心目中建立起了崇高的威望。君子成人之美，习老善莫大焉。我父亲吴祖光在回忆录中曾充满深情地写道：“自从‘反右’之难以后，我完全断绝了与党和任何国家要人的来往，这其中唯一的例外，是长期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仲勋夫人齐心是一位非常关心戏曲艺术的热心观众，我经常在剧场和她相遇。这几十年来发生的多少政治变化，没有阻断我和仲勋的交往……”

齐心阿姨跟我妈新凤霞也是好姐妹，对我妈甚为关怀。我妈活着的时候曾嘱咐我：“做人要宽容，不要结怨，谁害过你当天就要忘记，谁帮过你一辈子别忘记。”她到死都感激习老先生和齐心阿姨。

天下事何妨不了了之

原本我对家族历史所知甚少，不过是近年来常州宜兴家乡史学界出于研究需要，尤其201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百年，挖掘出很多陈年往事，纷纷找我查证，结果都与吴氏家族及相关联姻亲属有关，我也被全国政协和中央统战部确认为辛亥革命后裔，受邀参加了“辛亥百年”庆典活动。这才引发了我对家族史的兴趣。

不研究不知道，这一百年来，我的父辈、祖辈真是受了太多冤屈，他们曾经帮助过国民党，也曾帮助过共产党，但国民党认为我爷爷吴瀛通共，把他撤职起诉；共产党则认为我父亲吴祖光是国民党的人，也给整肃了，连带我妈妈新凤霞也被迫害。我家这一百年的坎坷历史，实际上是由于清朝被推翻之后，历史大变局尚处在混乱之中，国共两党初创，还在探索，功过互见。我的先人由于在两党最高层政治漩涡中沉浮，两边关系都密切，说也说不清。如今海峡两岸日渐交融，我这个孙辈成了受益者，国共两党都对我礼遇有加。共产党这边，江泽民主席曾在中南海家里请我吃饭，胡锦涛主席曾请刘延东大

姐关心问候我，温家宝总理亲自给我写过信。国民党那边，马英九为我爸爸题词尊称“老神童”，连战主席、吴伯雄主席、王金平主席都在台北设宴款待我。这些情况反而弄得我这个晚辈很不好意思，我知道往事已矣，一笑言欢，正应了齐白石老人当年给我取名的含义：“无欢无不欢也！”

什么是历史？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打架和好，再打架再和好；少打架，多和好。最后懒得打架，只讲和好，如此而已。“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再大的矛盾，也被化为无形，从中华民族的大义上讲，这就叫“不了了之”。

优雅与性能的代名词007御用座驾阿斯顿•马丁

作 者:雷蕾



/电影《金手指》中詹姆斯·邦德(肖恩·康纳利饰)和他的座驾阿斯顿·马丁DB5



1923



1926



1930



1932



1940



1949



1971



1972



1984



2003 - 今


KE02 EWW











DB5
1964年007电影《金手指》中惊艳登场，销量突破1200辆，比前几代总和还高



Volante
DB6升级版，欧洲第一辆自动操作引擎盖的汽车，是英国威廉王子婚礼用车



DB9
2004年投产，采用独特的超轻及超强航空专用咬合铝材料，C形尾灯成为阿斯顿·马丁的标志



DB4 GT-ZAGATO
有“全球最优雅的跑车之一”的美誉，从1959年到1963年仅生产了19台



DB6
配有Mk2版发动机，于1965年上市，1969年出演007电影《女王密使》



DB7
1993年伦敦车展上首次亮相，阿斯顿·马丁历史上销量最高的车型



The New DB9
即将上市



1

阿斯顿・马丁遗产基金会/图

财富 FORTUNE

优雅与性能的代名词 007 御用座驾阿斯顿 · 马丁

皮尔斯 · 布鲁斯南在拍电影的同时就爱上了这辆车。拍摄结束后，他花了 16 万英镑购置了一部同样的车。阿斯顿 · 马丁公司还很有幽默感地发言说：“当然，布鲁斯南的车里没有安装弹射座椅、火箭发射装置或者装甲设备。”

本刊记者 | 雷蕾



/ 阿斯顿 · 马丁 DB5，1964 年电影《金手指》中邦德座驾。电影中它全副武装，包括防弹车身、喷油嘴、烟幕发射器、机枪、旋转车牌、跟踪装置接收器，还有最著名的弹射座椅

1957年，007系列小说原著作者伊恩·弗莱明爵士在创作第三部作品时收到一封读者来信，信中建议给詹姆斯·邦德配上一部阿斯顿·马丁的跑车，因为他需要“足以符合体面身份的正派座驾”。在英国人心目中，这名代号007的军情六处头号特工高贵中略带野性，他衣着考究，时常手持一杯马丁尼，身后跟着一位美丽性感的女士，享受优雅生活的同时时刻准备着拯救世界。能够配得上邦德，又来自英国本土的，自然只有豪华跑车阿斯顿·马丁。

自1913年诞生起，阿斯顿·马丁（Aston Martin）的创始人就坚持

这样的理念：汽车的制作应该遵循最高的标准，愉悦驾驶和拥有。百年岁月中，阿斯顿·马丁坚持手工制造，几乎没怎么赚到过钱，几番濒临破产，但从没放弃过追求完美。在阿斯顿·马丁汽车的身上，永远都体现着一种优雅与速度的完美结合。精雕细琢的细节、不断提升的卓越性能，外加少得可怜的产量，造就了名副其实的会移动的奢侈品。

为赛车而诞生的血统渊源

在英国白金汉郡阿斯顿·克林顿山的山脚下，至今矗立着一块记录阿斯顿·马丁来历渊源的纪念碑：1914年4月4日，来自英国的年轻赛车手莱昂内尔·马丁，驾驶着他的11号赛车，经过0.56英里曲折的山路，在享誉一时的阿斯顿·克林顿攀爬赛中首个登上顶峰。“阿斯顿”和“马丁”这两个词，历史性地碰撞在了一起。

时间回到1913年，有钱的赛车手莱昂内尔·马丁拥有高超的赛车技术，渴望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赛车；汽车工程师罗伯特·班福德，对造车兴趣浓厚，却苦于资金短缺。两人一拍即合，在伦敦的卡洛街开了一家名为班福德·马丁的公司。

起初，公司和欧洲同期大量涌现的小车行没什么区别：没有能力制造自己的车，除了出售别人的品牌，有时也替人搞搞改装车。1914年马丁在阿斯顿·克林顿攀爬赛中摘冠时，驾驶的就是自行改装的Singer牌赛车。正是那场赛事的胜利，使马丁他们坚定了“制造属于自己的车”的决心。遗憾的是，1915年3月第一辆班福德·马丁汽车制造成功时，“一战”已经爆发，并且战势对英国所在的协约国很不利。马丁和班福德卖掉了机器设备，和很多英国适龄男子一样走上从军救国之路。

好不容易等到战争胜利，厂房重建起来，班福德却因为个人原因退出了公司。所幸，马丁在战前的战绩还没有被人忘记——著名赛车手和工程师Count Zborowski伯爵慷慨解囊，资助了大量资金。1922年，马丁为伯爵制造了一台赛车去参加极为重要的法国格林匹治大奖赛，这台车非常争气，创下了当时的世界速度和耐力赛纪录。同年的5月24日，马丁公司出品的另一辆赛车“邦尼”在布鲁克林的赛事上打破了10项世界纪录，平均时速达到每小时76.04英里，在手工制造的汽车时代，这个速度是相当不错的。

1923年，马丁把公司和产品改名为阿斯顿·马丁，并设计出了第一款LOGO——由A和M两个字母重叠组合成的标志，喻示公司的赛车能够在各项比赛中取得圆满的胜利。可惜单凭赛事的胜利无法带来销售利润，战后的经济萧条使得人们无暇去关注赛车运动，更少有人有

能力去购买运动型车，那一年，阿斯顿·马丁只卖出50多部。

转型：性能与优雅并重

1924年，耗资太大又经营不善的阿斯顿·马丁宣布破产。几经易手后，莱昂内尔·马丁于1926年离开了公司。随后的阿斯顿·马丁陷入了“易主——新车型取得赛事辉煌——资金困顿被转卖”的命运循环。

转折性的历史时刻在1947年到来，英国最大的拖拉机制造商戴维·布朗（David Brown）无意中看到《泰晤士报》刊登的一则收购广告，于是花费20500英镑买下了濒临破产的阿斯顿·马丁，成为这家公司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主人。

布朗生性爱冒险，热衷赛马、玩马球、驾赛车和摩托，还是有资质的飞行员，他一方面继承了阿斯顿·马丁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研发民用车的转型思路，一方面为公司注入了新的动力——以制造豪华车和高性能车型而闻名收购的拉贡达（Lagonda）公司也在同一年被他收入囊中。得益于拉贡达的合作，阿斯顿·马丁生产出DB1、DB2、DB2-4、DB Mark III、DB4、DB4 GT Zagato、DB5、DB6等系列车型。其中除了DB1是在战前车型Atom基础上诞生的之外，随后的车都有着优良考究的设计，为阿斯顿·马丁赢得了不少口碑，渐渐恢复了元气。DB这个冠名无疑是对戴维·布朗这位战后萧瑟年代拯救者的致敬。

1950年诞生的DB2搭配了一台拉贡达直列六缸引擎，在5000rpm时能输出105马力，最大扭矩达到182牛米。这在当年已是性能出色的超跑等级：1951年在素有“最辛苦、最乏味的单项赛事”之称的勒芒24小时耐力赛中，DB2包揽了3升级别赛的前三名，极大地提高了公司的声誉。DB2内饰的用料极为考究，真皮和桃木的元素将其装饰得像豪华车一样。后来，这成了阿斯顿·马丁的一贯理念：要速度，也要优雅。

007促成最成功的新车发布会

真正让阿斯顿·马丁在全球范围内名声大噪的，是1964年007电影《金手指》。这部电影拥有太多第一：第一个死去的邦女郎，邦德第一次用上各种特殊设计的特工装备和第一部全副武装的特工专用车——阿斯顿·马丁DB5。

在之前的007电影《诺博士》中，邦德开的车可能很多人连听都没听说过——一个现在早已不存在的英国本土汽车品牌Sunbeam，定

位于廉价小型跑车。邦德的粉丝们感到很伤心，认为这跟007“高富帅”的形象根本不相符。

在第三部作品《金手指》中，作者弗莱明果断地给邦德选择了阿斯顿·马丁DB III作为御用座驾。后来随着DB车系的更新，邦德又换了DB4。而当1964年美国米高梅影片公司将《金手指》搬上银幕时，银灰色的DB5便闪耀登场了。

好莱坞投资方看中这部电影的市场潜力，投入巨资制作。不过当剧组向阿斯顿·马丁公司借车拍摄时，竟遭到了粗鲁的回绝：“不行，绝对没门，想都别想。”骄傲的英国人还郑重其事地回复制片方：可以用4500英镑全价购买一辆DB5。

假如制片方稍微动摇一下，影史上大名鼎鼎的一款植入式广告，可能就要变成捷豹或者雪佛兰了。好在制片方够坚持，最终让阿斯顿·马丁同意免费提供给他们一辆DB5二手研发用车。剧组对这辆二手车狠下了一番功夫折腾，光改装就花费了两万五千英镑，是新车价格的5倍还多。如此才有了人们在电影里看到的那样惊心动魄的追逐场面：飞驰战斗中DB5那鲨鱼嘴似的散热栅栏里会突然伸出四枚火箭弹，前灯罩中还有可伸缩的两挺轻机枪，引擎罩上会弹出反坦克炮，车内装着弹射座椅，车尾部还有一排机关枪，车尾灯可释放烟雾甚至钉子……

当邦德为这件新式秘密武器而惊喜时，电影院里的观众也被这第一次见到的全副武装的特工车惊得目瞪口呆。这种登场方式可谓迄今为止最炫酷最拉风的新车发布会，凭借在电影中的出色表现，DB5成了如同邦德扮演者肖恩·康纳利一样优雅、勇敢的代名词，很快走出欧洲成为世界各国车迷心目中的超级轿车，4500英镑的高价也没能阻挡这款车销量突破1200辆，比前几代销量总和还高。而以DB5为原型的汽车公仔也成为当年销量最大的玩具。1966年英国女王访问阿斯顿·马丁公司时，还从DB5设计室获赠一台电动汽车模型，这台DB5车模带有包括自动换牌器以及起烟器在内的全部额外装备，是献给安德鲁王子的礼物。

回到现实中，把007 放在一边， DB5也绝对是一辆非常有派头的GT跑车。DB5 的基础车型DB4，车身设计由一家意大利公司完成，遵循了意大利人对跑车的超轻量化设计原则。流线型的车身平滑优美，看起来既不像赛车那样充满攻击性，也不像普通豪华轿车那样笨重，而是保持了自己高贵中透露野性的优雅气质。4升的巨大引擎，可以轻易地超过200公里的时速，连当时风头最劲的法拉利也不得不视其为最强的竞争对手。不同的是，DB5驾驶起来比法拉利更方便轻松，

不需要那么高超的操控技巧。一位英国赛车老手在先后试过阿斯顿·马丁与法拉利两款车后说：“考虑到每个人都会变老，还是给我一辆阿斯顿·马丁更加自在一点。”

戏里戏外都成为邦德的爱车

进入20世纪70年代，几乎整个英国制造业都陷入了危机当中，戴维·布朗不得不于1972年将公司出售，DB系列从此被V8系列取代，长达22年。由于缺乏开发经费，V8系列的性能已经不再是同级别车型当中的顶尖水平，连造型也开始学美国人的外观设计，见棱见角，失去了阿斯顿·马丁的一贯优雅。其中1976年以V8为基础开发的拉贡达（Lagonda）四门豪华车，更被《时代周刊》说成是“史上最烂的50台车”之一。

1980年至1986年间，阿斯顿·马丁频繁更换主人。1987年美国福特公司收购了其75%的股份，1994年7月又收购了其余的股份。有了福特的强大资金做后盾，1994年阿斯顿·马丁迎来了粉丝们期盼已久的回归之作DB7。其流线型车身线条、大灯格栅都传承了老DB系列的精髓；搭载的3.2L直列六缸发动机使其具有340ps的最大马力和491Nm的最大扭矩，足以达到超级跑车的标准。

DB7的大获全胜使阿斯顿·马丁重新振作起来，光1994年一年时间里就生产了700多辆。在福特的帮扶下，阿斯顿·马丁进入了发展快车道，车型不断推陈出新。2001年诞生的V12 Vanquish，成为这段时间的巅峰之作，继DB5之后在007电影中大放异彩。

V12 Vanquish出现于2002年的电影《择日而亡》中，这是007进入新世纪后拍摄的第一部作品。影片中的V12 Vanquish装备有9mm机关枪，5枚寻热制导导弹，两把猎枪与一具弹射座椅，使邦德飞车与坏人追逐的场面格外惊心动魄。此外还装备了一套光学伪装，在按下一个按钮后，这辆车就会变得看不见，实在是技惊四座。

虽然量产的阿斯顿·马丁V12 Vanquish没有这么多神奇的功能，但是其搭载的6.0升V12铝合金引擎能爆发出最大马力为460hp，百公里加速仅为4.3秒；先进的一级方程式指尖操纵式换挡杆，可使换挡在250毫秒内飞速完成，比一眨眼的时间还短。最特别的是，Vanquish采用的是一种特殊的黏接铝材，相比其他车型更轻、车身更结实，加上流线型的车身设计既使这款车拥有极为动感的视觉效果，又保证了空气动力学效果。

Vanquish翻译成汉语就是“征服”的意思，不仅在电影中协助邦德

征服了各种困难，也征服了广大车迷们，成为了其心中完美的车型。主演皮尔斯·布鲁斯南在拍电影的同时就爱上了这辆车。电影拍摄结束后，他花了16万英镑购置了一部同样的车。阿斯顿·马丁公司还很有幽默感地发言：“当然，布鲁斯南的车里没有安装弹射座椅、火箭发射装置或者装甲设备。”

全手工打造的精雕细琢

2007年，以英国赛车企业家大卫·理查兹为首的一个国际财团以4.75亿英镑的价格从福特手中买下了阿斯顿·马丁的大部分股份，阿斯顿·马丁幸运地回归了英国本土。

2011年4月29日，在威廉王子与凯特王妃的“世纪婚礼”中，超过百万人目送威廉王子亲自驾驶一辆宝蓝色的阿斯顿·马丁DB6 MKll Volante跑车，与新娘一起离开白金汉宫返回自己的官邸。这辆车本是1969年女王送给查尔斯王子的21岁生日礼物，在豪华汽车日新月异的新世纪，一辆带着岁月和历史积淀的车显得更加弥足珍贵。

阿斯顿·马丁坚信，技艺精湛的工人做出的成品要远比程序化的机器制造的好很多。所以每一台阿斯顿·马丁的内饰，无论是包裹内里的真皮还是实木饰板，全部都由专业工匠手工缝制而成，总共下来所花的时间超过了70小时。即使是发动机，也都是采用纯手工装配而成，为了保证每一款发动机都能够稳定运行，并且发挥出最出色的性能，都会有一名专业的技师来专门进行调校，而每一名技师也会在发动机上留下他们的名字。

阿斯顿·马丁的高贵不只体现在表面上的精益求精，而是源于对于细节的精雕细琢，一种于平凡中见品质的文化。连车标阿斯顿·马丁也固执地采用最传统的手工制作。阿斯顿·马丁的车标是一只展翅飞翔的大鹏，喻示该公司像大鹏一样，具有从天而降的冲刺速度和远大的志向。每一枚车标都经由近两百年历史的Thomas Fattorini公司精心打造。代表了英国皇室至高荣誉的英国皇家勋章和大英帝国奖章，历来都是出自该公司高级匠人之手。

业界有句流行语说，“买日本车，买的是工具；选择德国车，选的是机器；而拥有英国车，拥有的是艺术。”阿斯顿·马丁绝对当得起这句话。虽然创始人莱昂内尔·马丁并没有将阿斯顿·马丁经营下来，但是他为阿斯顿·马丁提出的座右铭“只生产拥有高性能和完美外形的高品质汽车”却被很好地继承了下来，成为阿斯顿·马丁公司最引以为傲、最宝贵的财富。这也许就是历经坎坷、几起几落后，阿斯顿·马丁依然留存并成为了世界知名的汽车厂商的原因吧。

关于阿斯顿·马丁

你不知道的10件事

阿斯顿·马丁的品牌logo 曾有10种不同的版本，最新的版本是由2003年起开始使用

阿斯顿·马丁的翅膀徽章灵感来源于古埃及的圣甲虫张开的双翼

过去的100 年中，阿斯顿·马丁仅生产了6 万余辆跑车

据准确估计，90%以上阿斯顿·马丁生产的车仍然存世

在过去的100 年中，阿斯顿·马丁生产的车来自7 个不同的产地

阿斯顿·马丁的全球总部设在英国盖顿，这是公司首个专门建造的基地

阿斯顿·马丁车主俱乐部在1935年成立于伦敦的格拉夫顿酒店

One-77是阿斯顿·马丁所有车型中最独特、动力最强、也是迄今为止最贵的一款车型

生产一辆One-77所花费的人工时间是2700个小时

阿斯顿·马丁现有车型平均每台喷漆所花费的时间在50到70小时之间

1美元上的国家符号

作 者:李容





“1美元券”如今只有1993年一个版本。作为美国的基础货币，1美元券的正面是美国开国元勋、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肖像。他浴血奋战8年，率领大陆军团赢得美国独立，尔后解散军队，退隐庄园。1789年，他当选美国首任总统。两届任期结束后，他自愿放弃权力不再续任，再次隐退。华盛顿，半生戎马倥偬，赢得美国独立，首创民

主共和，被尊称为美国国父；1美元券的背面是美国国玺。美国国玺也有正反两面，正面是美国国鸟秃鹰，象征自由与力量，反面是未完工的金字塔，象征永恒。

华盛顿

美国第一人

乔治·华盛顿祖籍英国，其祖先漂洋过海移民北美大陆，在弗吉尼亚创下最初基业。1732年2月22日，华盛顿出生于这个种植园主家庭。他的父亲威严而有学识，母亲性格刚烈且固执。少年华盛顿11岁丧父。20岁时，其兄劳伦斯逝世，华盛顿继承了劳伦斯的山庄——维农山庄，拥有了3200公顷土地、近300个黑奴和少量白人契约奴。

1753年，华盛顿参军服役，开始其军旅政治生涯。1754年，他参加了法国人与印第安人的战争。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华盛顿率领大陆军团，赢得美国独立。独立战争胜利后，在其部下劝华盛顿当皇帝的喧嚣声中，他义无返顾地辞去总司令职务，遣散了自己一手创建的军队，以保证新兴国家的民主共和基础。

1782年，大陆军上校刘易斯·尼古拉写信给华盛顿说，如果华盛顿称帝，将会得到军队的支持。华盛顿严厉斥责尼古拉说：“我认为这个请求包藏着可能降临我国的巨大灾难”，并称“如果我还有一点自知之明的话，可以说你不可能找到一个比我更讨厌你的计划的人了……我恳求你，从你头脑里清除这些思想。”于是，他与一起奋战8年的将士们挥泪辞别，两手空空地返回维农山庄，回家去“学做一名好公民”。

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得知华盛顿拒绝称帝时，他说：“他将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那个时代，正是全世界盛行君主制的时代。法国有国王，俄国有沙皇，英国有君主，土耳其有苏丹……

1789年2月，美国根据宪法规定举行立国以来第一次选举，结果一致推选华盛顿为第一任美国总统。4月底，华盛顿在纽约市的联邦大厦宣誓就职，成为美国历任总统中惟一没有在白宫居住的总统。1792年，华盛顿在总统选举中再度当选，且获全票通过。为了不让国家的权力长久地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当他第二次总统任期届满时，华盛顿在总统选举前夕发表了著名的《告别辞》，宣布退出公共生活，为后世提供了民主总统的典范。

华盛顿是一位叱咤马背的将军，严肃坚毅的总统，却拙于词令。

他在费城宣誓就任第二任总统的仪式极为简单，就职演说只有短短的135个字，为历届美国总统演说中最短的一个。但是，他讲话坦率、真诚，且经常看着对方的眼睛，赢得人们的信赖。

“道德是一个民意所归的政府所必需的原动力。”这是华盛顿一生的信条。事实上，道德与自制，也是华盛顿人生中两个极其重要的词汇。他的血液里本身流淌着暴躁的因子，却凭借道德的力量及强大的自制力，将其克制掩饰得让人叹服。

画家吉尔伯特斯图尔特曾给华盛顿画了许多像，与华盛顿相处时间较多。他认为，“在华盛顿尊严表象的背后，掩饰的是极易冲动的性格”。他曾写道：“他的所有特征都说明了他具有最难以控制的感情，要是他出生在森林中的话，我看他会成为最凶猛的人。”然而，亚当斯的夫人艾比盖尔曾评价华盛顿说：“他彬彬有礼而尊贵威严，和蔼可亲而不轻浮冒昧，与人疏远而不目中无人，严肃端庄而不冷酷无情。”

华盛顿在儿童时代抄写下110条“怎样成为一名绅士”的行为准则，其中包括“与人交往，一言一行都表现出对对方的尊敬”、“不要在饭桌上剔牙，以及同别人谈话时不要离得太近，以免唾沫星子溅到人家脸上”等诫言。对华盛顿而言，人生是严肃的，这110条准则不是简单的抄写背诵，而是用其一生去遵行。

1797年3月，华盛顿退出政治舞台，重返维农山庄。1799年12月14日，华盛顿溘然逝世，年仅67岁。去世前两天，华盛顿在最后一篇日记上写道：“晨起降雪，厚3英寸，东北风，气温华氏30度。上午10时雪止。下午4时天晴。夜间气温华氏28度。”当日上午，华盛顿骑马巡视庄园，偶染微恙，尔后便因咽痛、呼吸困难去世。终其一生，华盛顿没有自己的血亲子嗣。他26岁时与已有两个小孩的遗孀玛莎·卡斯蒂斯结婚，一直将其孩子及孩子的后代视如己出。

华盛顿在世时，他的挚友克雷克医生代表一位作者请求为他立传。华盛顿谢绝了，他说：“我希望能悄然无声地融入山川大地，了断与尘世的一切纠葛。”

华盛顿去世后，他昔日的革命战争伙伴、国会议员亨利·李（Harry Lee）称赞：“他是一个公民，是战争中的第一人，也是和平时代的第一人，也是他的同胞们心目中的第一人。”

为纪念其功绩，美国首都以华盛顿的名字命名，并在市中心建立了高达169米的华盛顿纪念碑，供后人瞻仰。这座华盛顿的标志建

筑，整个碑身上却没有一个字母，仿佛在告诉人们，华盛顿一生的伟业是难以用文字来表达的。

双面美国国玺

一只白头秃鹰，展开双翅，目视右方，右爪握着带有13片叶子和13颗橄榄的橄榄枝，左爪抓着13支利箭，胸前配着悬浮的“盾牌”，嘴里叼着白色绶带，绶带上写着由13个拉丁字母组成的“合众为一”，头上悬着含有13颗星星的圆形蓝色天空图案。

这正是经常见于美国护照等官方文件上的美国“国印”，美国国玺的正面图案，也是美国国徽。它由富兰克林、杰斐逊和亚当斯3人起草设计，历经3个设计委员会14位成员6年时间的共同努力后，于1782年6月完成并启用。

图案的每一处设计，每一个细节，都蕴意丰富，可谓匠心独运。其主要形象是美国国鸟秃鹰，其正名为白头海雕，外貌美丽，性格凶猛，被视为力量、勇气与自由的象征。利箭与橄榄枝分别代表武力与和平。鹰头目视右方，象征着期望和平。秃鹰胸前的“盾牌”，实为盾形纹章，上部是13条蓝色横纹，下部是白红相间的竖纹，白七红六，代表美国国旗。悬浮的“盾牌”，没有支撑物，代表自我防御及自我依靠，即美国民众必须依靠自己的品德与力量。绶带上写着的“合众为一”显示美国不同肤色、不同民族大融合的特色。不断出现的数字13则代表1777年加入美国联邦的13个州。蓝色天空图案四周那金色光芒与朵朵白云，也蕴意着“光从云火出，圣谕神相助。”

不过，图案中有一处细节备受争议：代表13个州的13颗星星，恰巧组成了一个大的六角星，白星蓝底。而代表犹太人的“大卫王之星”也是六角星，蓝星白底。

美国国玺反面图案的主体是一个未完工的金字塔，象征着力量与永恒。它共有13层台阶，底层用罗马数字刻着1776。金字塔顶端为永远睁开的上帝之眼，取意自《圣经》，意为上帝保佑美国，神力永不消褪。眼睛左右两侧呈弧形排列着两个拉丁文单词，共13个字母，意为“他（神）认可我们开始”。与之相应，金字塔下方的彩带上也用拉丁文写着“时代新秩序”，蕴意着全新的美国时代开启。

大都会精品巡礼 微缩千年美术史道法自然 中西观照

作 者:黄薇



/《海狸河畔》,布面油画，54.6cm × 45.7cm，亨利·卢梭作于1908-1909年





/《从安康圣母教堂的门廊眺望威尼斯》，布面油画，91.4cm ×122.2cm，约瑟夫 · 马洛德 · 威廉 · 透纳作于约1835年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位于美国纽约5号大道上的82号大街，建于1880年，是美国最大的艺术博物馆、世界四大美术馆之一，共收藏有300万件展品。





/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道法自然——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精品展”部分展品

“道法自然”展中，伦勃朗、凡·高、莫奈、雷诺阿、塞尚等大师的画作前人头攒动，那些此前只出现在美术教科书上的杰作，如今穿越时空，真切呈现，不啻为一场感官的盛宴

自

2013年2月1日起，“道法自然——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精品展”已开展两个多月了，反响强烈。这一展览是继“启蒙的艺术”、“瓷之韵”、“佛罗伦萨与文艺复兴”三大交流展之后，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年推

出的重头之作。作为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的美国大都会，带来了127件顶级艺术珍品，荟萃绘画、雕塑、摄影等多种艺术形式，涵盖了4000年来描绘自然景观及百态生灵的经典之作。这也是大都会的藏品首次在中国展出，美方筹备展览时间将近两年。

国博也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引进展览。国博副馆长陈履生向本刊记者介绍，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先是在日本东京举办这一展览，国博于是与美日双方磋商，将展览从东京带到了北京，大大节省了引入成本。陈履生还透露，今年11月，国博将继续采用这种模式，与日方、法国卢浮宫合作举办“地中海的艺术”展。

“道法自然”展中，伦勃朗、凡·高、莫奈、雷诺阿、塞尚等大师的画作前人头攒动，那些此前只出现在美术教科书上的杰作，如今穿越时空，真切呈现，不啻为一场感官的盛宴。127件藏品折射出人类对自然认识理解的发展历程。比如在西方传统的自然描绘中，以风景为题材的绘画占有最为重要的地位，但 16世纪以前风景画并不是独立的画种，户外风景并不单独呈现，仅作为主题叙事发生时的背景。到文艺复兴时期，欧洲艺术家对描绘自然世界本身的兴趣才有所增长。

陈履生向记者介绍道，“道法自然”展览原来的英文标题是“大地·海洋·天空——西方艺术中的自然”，但国博方面认为过于直白，最后借老子《道德经》中的“道法自然”为其重新命名。陈履生说，中西不同的自然观，源自各自不同的文化，从而造就了艺术上的各具风姿，但从本质上来讲具有相通的内涵。在东西方文化传统中，人们都从自然中汲取力量，完善自我。最后“道法自然”这一展题，也得到了美方的肯定与赞赏。我们选取了三位艺术家的作品一窥堂奥，他们对于自然的独特表现各领风骚，也恰是自身人格精神的深刻投射。

透纳的威尼斯之行

确立风景画的地位

约瑟夫·马洛德·威廉·透纳（1775-1851），被公认为英国最伟大的画家之一，在英国人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地位。最新的《007大破天幕危机》中，文艺导演门德斯不忘向透纳致敬：邦德与Q博士相会时坐在博物馆里透纳的名作《退役的铁梅雷尔号战舰》前，年轻的Q博士借此揶揄邦德“廉颇老矣”。表彰当代艺术的英国最著名的艺术大奖“透纳奖”，也以他的名字命名。

展览中这幅《从安康圣母教堂的门廊眺望威尼斯》作于约1835年。画面上波光粼粼，蓝天白云，富有浪漫主义色彩。这是他1833年

逗留威尼斯后创作的作品。1835年5月，透纳在伦敦皇家学院展出此画，受到热烈欢迎，《泰晤士报》评价它是“最令人愉快的作品之一”。意大利每每引发他灵感，透纳1819年第一次造访意大利，回国后就开始把丰富的色彩和明亮的光线引入作品中，常被视为他画风转变的分水岭。透纳曾说：“描绘自然需要准确的观察力。”他的绘画往往是视觉经验的精准体现。《眺望威尼斯》中表现出了不同光影下复杂多变的水色，也许得益于透纳终其一生的最大爱好——钓鱼。

他在意大利的旅行中接触到最真实的自然，流行于18世纪末的崇高美学渗入其观念，他开始把大自然看作是一种崇高的力量，而不仅仅是当时流行的“美丽风景”。只不过他将古典的“伟大风格”的历史内容变成了风景本身。他作于1842年的代表作之一《暴风雪》，卷入风雪之中的船只是个暗色的影子，只剩下桅杆，细节都被晃眼的光与乌云的黑影遮住了，但大自然的勃勃生气和野性呼之欲出，而感受到人在自然的力量面前，不过是渺小的存在。据透纳本人说，他曾让水手将他绑在桅杆上4个小时，观察风暴的形态。

但是，透纳终其一生都是英国最受争议的画家。《暴风雪》比法国印象派画家莫奈的成名作《日出·印象》出现早了整整30年，它最初在皇家学院展出时，观众们大惑不解，一时哗然。也有评论家讥讽他肆意描绘暴风雪的画是“肥皂泡和石灰水”的堆砌。

透纳的母亲死于狂乱性精神病，对他不无影响，透纳一辈子性格倨傲孤僻，在墨守成规的英国艺术界，他绝对算得上异类。他作画精益求精从不马虎，不过方式粗犷，会用上浮石刮擦，有时直接往画上吐唾沫，故意不修剪指甲，方便画画时手指像爪子一样在画布上挥划。曾有一位绅士派头的同行来拜访他，握手时透纳一把抓住对方洁白的手掌大发雷霆，并断然评价道：“你是成不了什么气候的！”透纳不喜欢为自己画像，原因是“没有人会相信这么美丽的画作竟然出自一个丑陋的家伙之手”。据说透纳本人大鼻子、身高1.65米左右。透纳认为婚姻不能与艺术共存，他终身未婚，一位名叫丹碧的朋友遗孀，成为他终身的秘密情人。直到透纳离世后公布遗嘱，众人才知晓丹碧与两人所生的两个孩子的存在。

透纳与约翰·康斯特布尔（他的《从主教领地眺望索尔兹伯里大教堂》也在本次展览中展出）是当时英国最为知名的风景画画家，并称为“真正使英国风景画摆脱荷兰、法国或意大利绘画影响而走上自己独立道路的两个人”。但透纳更将风景画的地位提到与历史画、肖像画等同的地位。他晚期的画风自成一派，对色彩和光线的描绘，离主流的精致有度的学院派渐行渐远，为此备受同行和批评家的责难，说他在用“昏花的眼和草的手”画画。但他那表现光与空气微妙关系的绘

画，直接影响了莫奈、毕沙罗等印象派代表人物的创作，他被誉为“印象派鼻祖”。

透纳逝世后，英国风景画的黄金时代也就结束了。

《芙罗拉》怀念亡妻

晚年伦勃朗的涅槃

芙罗拉是意大利远古时所崇拜的司花女神，意大利人把每年4月28日至5月3日定为花神节，节日期间会有非常放纵的竞技会，常用玫瑰来装饰自己和动物。勃朗（1606-1669年）笔下的芙罗拉，头戴粉色花环，身着宽松的威尼斯式袍服，用袍子兜着仿佛是刚采摘下来的花朵。这幅画深受意大利著名画家提香代表作《花神》的启发。两者不仅题材一致，而且画中人的姿势也极为相似。伦勃朗对提香笔下代表着“美的标准和典范”的女神十分着迷，但他赋予了“美”更新的意义，他认为古典绘画中的女性过于理想化，而美应该贴近生活本身。他笔下的芙罗拉，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神话中人，更像是日常生活中衣着华丽、美丽端庄的女人，其模特正是伦勃朗的妻子撒丝基亚。

展览中的这幅《芙罗拉》创作于1654年，是伦勃朗的晚年创作。此前的17世纪30年代，他曾多次以妻子为模特绘画题为《花神》、《扮花神的撒丝基亚》等作品，前后气氛已然是两重天。早期的《花神》系列洋溢着青春的欢快，女神们的脸上蒙着淡淡喜悦的光辉，而晚年这幅《芙罗拉》显得安静肃然，“她似乎明白青春、美貌与爱情都像摘下的花朵一样，难以长久”。

画家的生活无疑是作品最好的解说词。1632年，26岁的伦勃朗因《杜普教授的解剖学课》声名大噪，订单纷沓而来。不久，他便定居繁华大都市阿姆斯特丹。就在这一年，他遇到了一位美术商的表妹撒丝基亚。撒丝基亚出身高贵，这对情投意合的情侣冲破重重阻力，三年后结为伉俪。

婚后的伦勃朗处于一生事业与生活的顶峰。撒丝基亚给他带来了一大笔丰厚的嫁妆，伦勃朗开始由着性子挥霍。他不仅收藏画作，还大肆搜购各式各样的雕像、花瓶、宝剑、地球仪、东方的奇装异服……1638年，他还在阿姆斯特丹的最佳地段斥巨资购入一套豪宅。撒丝基亚还是伦勃朗最好的模特。“她很有耐性，她总是说可以。”

1642年，大概是伦勃朗生命中最晦暗的一年。阿姆斯特丹自卫队集体请伦勃朗为他们画像。当时荷兰上流社会流行的肖像画，都是千

人一排，毫无重点，为的是让每个人的脸都能显露出来。伦勃朗不甘因循守旧。他选择将自卫队成员置于一个巡逻场景中，每个人姿态神情各异，整个画面充满故事性，匠心独到。他最知名的作品《夜巡》问世了，但遭到了空前的失败。

这种“艺术布局的新变革”，“把感情变为光线和阴影”的尝试，却惹来了全城人嗤之以鼻，更让队员们不满：花相同的钱为什么有人位于画面和光源的正中，而另一些人则隐于黑暗角落，连脸孔也看不清。《夜巡》被退货，伦勃朗也被告上法庭。当时一位嫉妒他的诗人写诗讽刺他为“黑暗王子”，伦勃朗终身未摆脱这个绰号。但他最引以为傲的“紫金色的黑暗”、“伦勃朗式布光法”，也成为后世不可逾越的高峰。

伦勃朗的声誉与订单自此一蹶不振，但他仍坚持自己越发自由的画风，不愿妥协。他说过：“比金钱更重要的是名誉，比名誉更重要的是自由。”就在1642年，爱妻撒丝基亚因肺结核逝世，对他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十二年后的这幅《芙罗拉》，仿佛是画家对往昔美好时光的一个悠长凝眸。

此后伦勃朗收入每况愈下，直至破产，晚景格外凄凉，因买不起画具，甚至把画过的画稿刮掉重新再画。尝过人世的艰辛炎凉，伦勃朗晚年的作品完全摈弃了以前取悦大众的种种习气，刻画人物精确深邃，进入到艺术炉火纯青的境界。他的一生也是艺术不肯向平庸服膺的一生。

亨利·卢梭

属于世界的童心

如今的艺术史上，亨利·卢梭（1844-1910）毫无争议地与塞尚、莫奈、德加、雷诺阿等并列为法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大师，但他生前却饱受歧视，穷困潦倒。不过，这位当了一辈子巴黎海关税务员的小人物，当初仅凭兴趣提起画笔时，也许更多是单纯的快乐驱使着他。

展出的这幅《海狸河畔》作于约1908-1909年，已属他晚年的作品。画中洋溢着春天的清新气息，景色明快通透，风格质朴，与其晚期偏爱的浓厚华丽的热带丛林风景画形成强烈对比。卢梭创作过许多热带丛林题材的画作，老虎、狮子、猴子、羚羊……各种珍禽猛兽和奇花异草构成了一个烂漫绚丽的奇异国度，充满了童心的妙趣。而这一切全都出自他的想象，卢梭承认：“（我）从未去过比巴黎植物园

的温室更远的地方。”据说他一定要开着窗子才能作画，因为脑海中葱郁的花草会让他感到窒息！

卢梭的绘画完全是自学的，他从未受过正式的美术教育。卢梭的作品自成一家，学院派要求的透视、比例、明暗、立体，在他的画里都难寻踪迹，他主要采用平面的二维空间，只在局部使用透视法，画面因失重而产生梦幻之感。但官方沙龙的评论家嘲笑他的画是“6岁小孩的胡乱涂抹之作”，保守的巴黎观众也感到很不适应。关于他的首次参展说法很多，卢梭本人曾说1885年他有两幅作品入选官方沙龙，但被愤怒的观众割坏，不得已退出了展览。

1884年，塞尚、毕沙罗等人发起了“独立沙龙”。虽然他稚拙的风景画、肖像画总是受到人们的哄笑，但印象派的画家们对他还是青睐有加。在“独立沙龙”展出的《嘉年华之夜》是他的早期代表作，这幅意境神秘的画引起了同行的关注，凡·高、雷诺阿和罗丹都曾对他的作品给予赞赏。

受到鼓舞的卢梭，为了全身心投入创作之中，甚至于1893年提前退休，拿着微薄的退休金追求艺术。有时为生活所迫，他不得不去餐馆演奏小提琴卖艺。

画如其人，卢梭的个性比较单纯憨直，他常常成为朋友捉弄的对象。有一次，高更就对卢梭说，政府决定委托您去画一幅画，他听了后就高高兴兴地到拨款办公室去打听具体事议。拨款官员说：“你弄错了吧，也许你的要求我们会考虑的，哈哈……”显然卢梭是在嘲笑声中尴尬地离开。1907年，卢梭因轻信他人而受骗，牵连到一桩银行欺诈案，所有人都认为这么天真的人不应该有罪；举证中，律师搬出他的丛林风景画，以强调被告的个性淳朴，最后法官也被打动，宣判免去他的牢狱之灾，只需交纳罚款。

这些作品没能将大半生处于贫穷之中的画家拯救出来。但卢梭对自己的信心在当时人看来匪夷所思，他曾对毕加索说：“我们是这个时代的两位伟大的画家，你用埃及风格作画，而我则用现代风格。”在他的时代，他的画几乎与任何人的都不同。卢梭作品中“原始主义”、“平面装饰”风格直接启发了后来的前卫艺术。毕加索就特别欣赏他。1908 年的一天，毕加索在巴黎旧货店发现了一幅卢梭的《M小姐肖像》，格外欣赏：“卢梭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代表着一套完整的思想……”他最后以五法郎买下了该画，店主的建议是“你可以用背面画画”。

这年底，毕加索和一帮前卫艺术家还专门请来了卢梭，开了一个

以他为主宾的宴会。这一晚也许是卢梭生命中最值得铭记的时刻，一群优秀的先锋派艺术家簇拥在他周围，向他表达敬意。1910年8月，亨利·卢梭意外割伤腿部，一个月后因败血症去世。

（参考资料：“道法自然”展解说词 ）

《止杀令》丘处机让成吉思汗放下屠刀？

作 者:上林



/《止杀令》剧照，众弟子给丘处机送行



/《止杀令》剧照，丘处机救小孩



/《止杀令》海报（海外版）





/《止杀令》剧照，耶律楚材、成吉思汗、刘仲禄（从左至右）

3月22日，去年10月就在釜山电影节上亮相的华语古装史诗片《止杀令》终于在内地上映。该片投资8000万元人民币，用半年的时间在山东、内蒙古、宁夏等六省区拍摄，采用中日韩三国幕后团队，改编自真实的历史事件——全真教道长丘处机西行万里，力劝成吉思汗止杀东归。

电影乍看上去卖相很不错：齐整森严的铁骑、制作精良的铠甲、讲蒙语的成吉思汗及其臣下、大量展现草原壮丽景象的俯拍和航拍……除了这些视觉上的优点，电影从情节上来讲节奏缓慢、平淡乏

味。平心而论，丘处机见成吉思汗这段历史本就没有太多戏剧性，虽说他年过七旬长途跋涉实属不易，但行走在蒙古帝国的疆域内，一路上有弟子和蒙古骑兵护持，沿途地方长官都给予了规格甚高的接待，也确实没遭遇太大波折。无奈，主创不得不添加戏剧冲突。电影中丘处机遇到过两次劫匪，片子前半段一路打打杀杀，和“止杀”这个主题没什么关系。还加上契丹女万里寻夫的桥段，完全是矛盾不够，爱情来凑。

电影在人物塑造上也相当失败，就拿主角丘处机来说，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战团用拂尘挡下蒙古兵的劲箭，但紧接着他又被一箭射中；一会儿他因为劝阻不了成吉思汗而喝闷酒，一会儿他又本事大得能呼风唤雨，使枯木发芽、起死回生；出发时说自己只有三百天阳寿，结果两年之后还生龙活虎。不知道导演到底是想要个凡人还是想要个神仙。

电影没有对成吉思汗的“止杀令”做出定义，是不杀生？还是不杀人抑或是不发动战争？电影把成吉思汗东归的原因归结为丘处机的劝阻和蒙古人的思乡之情，实际上，成吉思汗掉头东向的目的是去彻底讨伐西夏。对于蒙古崛起给欧亚大陆带来的战火和毁灭来说，成吉思汗西征只是开了个头，电影想用他来讲述热爱和平这一普世价值，显然选错了例证。另外，无论是用后来发生的历史来验证，还是翻看最早记载这一事件的文献，丘处机“一言止杀”的故事都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丘处机西行走了两年多

电影中耿乐饰演的护送丘处机的蒙古大将刘仲禄史有其人，名刘温，因为善于制作鸣镝（响箭）和精通医药而受到成吉思汗赏识，成为大汗的近侍。正是他向成吉思汗吹嘘丘处机活了三百多岁，有保养长生之术。1219年夏，准备西征花剌子模的成吉思汗已年近花甲，感到自己精力衰竭、老之将至。遂命刘仲禄携诏书，拿着“如朕亲行、便宜行事”的虎头牌请丘处机赴汗庭传道。当年五月，刘仲禄从位于阿尔泰山之阳的乃蛮故地出发，走了七个月才到达山东。

在见到刘仲禄之前，丘处机确实拒绝过金朝和南宋将领的邀请，不过那是后几年的事，早先恰恰相反。全真教自1187年王处一被金世宗请到中都传授长生之道起，就和金国皇室走得很近。丘处机在1188年受金世宗邀请到中都主持万春节大醮，在1211年奉金卫绍王诏书前往中都。1214年，山东登州、宁海州发生农民起义，金朝驸马都尉请丘处机协助招抚乱民，凭借丘处机的声望，登州和莱州等地很快恢复平静；金朝赐赠“自然应化弘教大师”。到了1215年，蒙古占领了金中

都，第二年金宣宗召丘处机赴汴梁，但丘处机认为金朝皇帝有“不仁之恶”，推辞不去，迅速与行将就木的金朝拉开距离。这一次成吉思汗来请，丘处机没多推辞，决定于第二年正月上路。

电影中丘处机不让弟子随行，余少群饰演的赵道安私自跟着师傅上路。这一改编颇不符合情理，哪个徒弟敢让年过七旬的师傅独自随蒙古人长途远征？历史上丘处机挑了十八名弟子随行，其中一名叫赵道坚，还有一个叫宋道安。此外还有在金庸小说《神雕侠侣》中出场的尹志平，此时他已51岁，当然还有写《长春真人西游记》的李志常。

1220年农历二月，丘处机抵达蒙古国统治下的燕京，也就是金国的中都，入驻玉虚观，得到当地官员的热情接待。此时，丘处机听说成吉思汗已经统兵西征花剌子模，而自己年事已高倦冒风沙，欲约成吉思汗来燕京会见。刘仲禄令曷剌急驰报告成吉思汗。当时刘仲禄还想为成吉思汗挑选处女，和丘处机同行。丘处机当即劝阻：“春秋时齐国人向鲁国进献女乐，孔子就离开了鲁国。我虽然是不知礼仪的山野之人，怎么能和处女同行。”刘仲禄作罢，但是由于没等到成吉思汗的诏令，丘处机不得不缓慢西行。当年十月，他在宣德州（今河北宣化）接到了诏书，成吉思汗说：“既然已经从蓬莱启程，可骑鹤游历西域。”还嘱咐刘仲禄：“无使真人饥且劳，可扶持缓缓来。”

一行人在宣德州过冬，直到1221年的农历二月才再次启程。在途经镇海城（今蒙古哈拉乌斯湖）时，丘处机接纳蒙古著名大臣田镇海的建议留下宋道安、李志常等九名弟子修建栖霞观，自己率其他弟子经回纥城、昌八剌城、阿里马城、赛蓝城，于1221年冬天抵达花剌子模的首都撒马尔罕（位于今天乌兹别克）。这里在一年前就已成为蒙古帝国的疆土。

蒙古军队在花剌子模的屠城

1221年四月，花剌子模旧都玉龙杰赤被术赤、察合台和窝阔台攻破。残军及妇孺誓死抵抗，巷战七昼夜，终于不支投降。蒙古军驱赶居民出城，挑选出10万工匠送往东方，5万壮丁编签军，妇孺尽为奴婢。其余居民被悉数屠杀。蒙古军队又掘开阿姆河，引水淹城，将玉龙赤杰夷为平地。

当年春天，成吉思汗抵达巴里黑（今阿富汗巴尔克），该市派出代表迎接占领军，并宣誓效忠，奉献了贵重高价的贡物。但成吉思汗为讨伐花剌子模摩诃末苏丹的儿子札兰丁，认为在军队后方留下人口众多的城市对己不利，以调查人口为名，将市民全部虐杀，城市化为

灰烬。

拖雷去攻取马鲁，城中居民投降，拖雷坐在一把金椅上目睹了对居民的集体屠杀，男人、女人、小孩被分配到各个军营中被砍头，最后只有400名工匠活了下来。接着拖雷又去惩罚尼沙普尔，这里曾在不久前倒霉地击退并杀死了蒙古大将、成吉思汗的女婿脱合察。这一次，尼沙普尔被拖雷攻占并彻底摧毁，脱合察的遗孀（据考证为成吉思汗四女秃满伦）亲自率卫士入城，杀死了目光所及的所有活人。为防止有人装死逃脱，拖雷下令砍下所有人首级，按男、女、儿童垒成了三座金字塔。

电影中成吉思汗的爱孙在战场上被一箭射死，其原型应该是察合台长子木阿秃干，这是在攻占范延城（巴米安）时的事情。电影上成吉思汗的亡孙还是幼儿，而木阿秃干当时已经成年并有子嗣。电影中成吉思汗亲自操控投石机泄愤，未免太过轻描淡写，历史上成吉思汗攻陷范延城之后，下令将人畜、禽兽全部杀绝，不留一个俘虏，不掠取一物。将城市毁成荒漠，不让那里生长任何生物。那里后来被称为“可诅咒的城市”。

1222年农历四月，丘处机途经铁门关抵达“大雪山”（今兴都库什山）八鲁湾行宫觐见成吉思汗。这里曾是蒙古骑兵唯一一次败于花剌子模的地方，一年前成吉思汗派大断事官失吉忽秃忽率三万骑兵去攻打纠集了十万兵马的札兰丁。由于蒙古军的人数少，智计过人的失吉忽秃忽连夜让每个骑兵的马背上绑一个毡子做的假人，但在英勇的札兰丁面前此法未能奏效。当第二天札兰丁军士看到敌人突然增加了许多，以为援军已到，便想逃跑。札兰丁大声命令：“还是我们的军队人多，从左右两面包抄过去！”鼓声大作，札兰丁率军冲出，企图将蒙古军包围在中央。蒙古军列阵于峡谷之中，兵力无法展开，只好撤军。但是地面凹凸不平，有许多坑洞，蒙古骑士纷纷落马，死伤惨重。最后只有几百人跟着失吉忽秃忽逃了出去。但札兰丁的优势并没有保持多久，在1221年年底，他就被成吉思汗彻底击溃，只身逃往印度，其家庭成员落入蒙古人手中，所有男孩都被杀死。

根据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在《草原帝国》一书中叙述，东伊朗再也没有从成吉思汗的破坏中完全恢复过来，就算到了15世纪，这些地区发生的帖木儿文艺复兴运动都未能使它们重现昔日的繁荣。

成吉思汗三次问道

初见丘处机，成吉思汗说：“他国征聘皆不应，今远逾万里而来，朕甚嘉焉。”丘处机答：“山野之人奉诏来这里，是天意。”成吉思

汗很高兴，赐丘处机入座，宴席中问："远道而来，有什么长生药给朕吗？"丘处机答："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成吉思汗欣赏他的诚实，在御帐的东边搭了两座帐篷供丘处机居住。成吉思汗问在场的田镇海："真人当何号。"镇海奏答："有人尊之曰师傅者、真人者、神仙者。"成吉思汗说："自今以往，可呼神仙。"

真正的问道是在1222年秋天，共进行了三次。成吉思汗让周围的人和侍女都退下，只留下太师耶律阿海和近侍耶律楚材，丘处机请求："刘仲禄往返万里，田镇海远程护送几千里。也可以进帐一起听讲道。"此二人这才有机会亲聆仙音，担任翻译的是耶律阿海。成吉思汗还命旁人做记录，下令写成汉字，以示不忘道法，他对左右说："神仙三次讲养生之道，很合我的意。你们不要把神仙所讲的话泄露到外面去。"也许是这个原因，《长春真人西游记》没有记载这三次讲道的具体内容。

《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丘处机对成吉思汗的进言有两次，一次是成吉思汗询问打雷的事情。丘处机答："我听说蒙古人夏天不在河里洗澡、不洗衣服、不造毡子。野地里的蘑菇也禁止摘采。这可能是因为畏惧天威吧。但这不是奉行天道的做法。我曾经听说三千种罪之中没有比不孝更大的罪过。上天特意是用打雷来警醒人们。我听说蒙古人的习俗大多不孝敬父母，大汗可以用您的权威来禁止人们这样做。"成吉思汗说："神仙的话正合朕心"，命令左右用回纥字把这些话记录下来，还召集太子、诸王、大臣们宣布："汉人们尊重神仙，就像你们敬奉上天一样。天让神仙对朕讲这些话，你们每个人都要铭记在心头。"

还有一次是成吉思汗打猎射中一只大野猪，但他马失前蹄跌下马来，野猪却不敢近前。左右随从拍马赶到，拥驾回宫。丘处机听说后进言："天道好生，今圣寿已高，宜少出猎。坠马，天戒也。豕不敢前，天护之也。"成吉思汗说："我已经反省了，神仙的劝诫非常对。我们蒙古人骑马射猎习以为常，所以不能一下子停止。尽管如此，神仙的话我将牢记。"从那以后，他两个月没再出猎。

到1223年初，丘处机几次向成吉思汗辞行，他辞谢了成吉思汗赐予的牛、马，说："只要给我驿马就足够了。"成吉思汗问使者阿里鲜："神仙在汉地有多少弟子？"阿里鲜答："很多。神仙来的时候，我见到官府在催督差发。"成吉思汗下诏豁免全真道的赋役，并派兵沿途护送，当年冬天，丘处机回到中原。第二年，他主持燕京的天长观。全真教大兴。

"一言止杀"故事的疑问

《长春真人西游记》在1228年问世，是记叙丘处机西行事迹最早最完整的第一手资料，但其中确无“一言止杀”的故事，稍微沾点边的只是成吉思汗听从丘处机劝阻，两个月没打猎，但和世传的在战争中减少或停止杀戮没什么关系。史籍记载，就在丘处机东返的1223年春，成吉思汗在吉尔吉斯山以北的忽兰巴什草原上召集了一次忽里勒台大会，与此同时，军队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狩猎娱乐活动。确如成吉思汗所言，作为游牧民族的蒙古，打猎是其生活方式，一时半会哪能抛弃。

著名元史专家杨讷在2007发表的文章《丘处机“一言止杀”再辨伪》中对《元史》及元人文集中记载的对丘处机建言止杀进行了全面质疑，他指出：除了《长春真人西游记》，1228年问世的《长春真人本行碑》和耶律楚材在同年写就的《西游录》中，都没有“一言止杀”的记载。值得一提的是耶律楚材，电影中由徐锦江饰演，和丘处机交好。历史上，当丘处机在中亚时，两人表面上关系不错，还经常联句和诗，后有书信往来。但丘处机一去世，耶律楚材就在《西游录》中表达了对丘处机的强烈不满，全书六千多字，竟然有三分之二是批判丘处机的。耶律楚材早年学儒，晚年信佛，他指丘处机为“老氏之邪”，说自己“友其身，不友其心。”还列举了看不惯丘处机的十件事情，第一条就是成吉思汗问丘处机年岁，丘处机答记不清了，耶律楚材认为这是作伪。

关于成吉思汗问道丘处机的内容，虽然当时成吉思汗命令秘而不宣，但也不是无迹可寻。《道藏》中就有一本书叫《玄风庆会录》，历来认为这就是耶律楚材对问道内容的记录，杨讷等学者都考订它刊行于1232年，属于比较早出的有关丘处机西行的史料。杨讷认为，该书不仅没有进言止杀的内容，相反倒有称颂成吉思汗征服战争的话语。丘处机称成吉思汗是“天人”，他进行的战争是“皇天眷命，假手我家，除残去暴”、“恭行天罚”，等于是赋予成吉思汗的征服战争以符合“天道”的合法性。书中也确有“恤民保众”、“治国保民”这样的话，但这些仅仅指对已在蒙古帝国治下人民的管理，并非劝成吉思汗停止对其他国家的攻伐。杨讷分析，“一言止杀”的故事大概出自窝阔台汗时期全真教徒的创造。

《长春真人西游记》其实也透露出一点丘处机对于蒙军暴行的无奈，1223年7月，丘处机从西域抵返云中（今山西大同），阿里鲜请求丘处机师徒帮助他招谕山东一些地区归降蒙古，以免被蒙军攻占后大肆杀戮。丘处机说：“虽救之不得，总比坐视其死好吧。”实际上蒙古一直执行的是“抗者诛、降者免”政策，并不以丘处机的出现与否而改变。后来尹志平拿着丘处机的招谕书去山东，许多地方放弃抵抗，

由此得以保全。客观上这也起了“止杀”的效果，只不过不是让征服者放下屠刀，而是让抵抗者屈膝投降。当然，丘处机借助成吉思汗对全真教的扶持态度，接纳了许多难民为教徒，拯救了两三万人的性命，这些功绩也不能否认。

如果抛开以上的文献考据，仅从成吉思汗东归后的行为来检验，恐怕丘处机就算是为“止杀”说了千言万语都没能遏制住世界征服者的杀心。1226年，成吉思汗亲率蒙军大举伐夏。他攻占黑水城，连下河西走廊的沙、肃、甘、凉诸州。成吉思汗恨肃州军民久久不降，攻克后下令屠城，只有106户民众幸免于难。当年十一月，蒙军进围西夏都城中兴府。

1227年农历五月二十五日，身在秦州的成吉思汗给丘处机颁下圣旨，将天长观改名长春宫（今北京白云观），并赐“金虎牌”，以“道家事一切仰神仙处置”，诏命丘处机掌管天下道教。诏书中还提到“朕常念神仙，神仙毋忘朕也。”显示成吉思汗对丘处机的礼遇极高。然而两人再也没有机会相见，当年七月初九（1227年8月22日），丘处机在长春宫宝玄堂逝世，享龄80岁。三天后（1227年8月25日）成吉思汗病逝于秦州清水，终年66岁。

临终前，成吉思汗在遗言中特别嘱咐：秘不发丧，中兴府出降后须将西夏国主与城中居民赶尽杀绝！

拖雷忠实地执行了其父的遗命。

链接： 电影与历史

确如电影所示（下图），成吉思汗西征只带了一名妻妾——韩国演员朴艺珍饰演的忽兰皇后。在成吉思汗众多的后妃中，她的地位仅次于大皇后孛儿帖，是第二斡儿朵（意为宫帐或宫殿，是突厥、契丹、蒙古等游牧民族的皇家住所和后宫管理、继承单位）之首。电影中她生下的孩子因为感染瘟疫而被拿去送人，后又被找到，但据考证，她的儿子阔列坚在西征时早已出生。阔列坚因为忽兰皇后被成吉思汗宠爱，被太祖成吉思汗视如嫡子，与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同等待遇。

传承千年的紫砂神韵

作 者:周冉





张波/CFP

/ 宜兴窑曼生款提梁紫砂壶。约十八世纪后期至十九世纪前期制造。现藏上海博物馆



【高璧】周良荣



【和壶】吴俊峰



【月照菩提】周伯娟



【知足壶】周伯娟

北京紫华艺术之家/图


4


5



据我所知，市场上是没有冒充紫砂材质的所谓假壶的。好多人问过我，从地摊上买了一个三五十元的紫砂壶，心里不踏实，会不会是假紫砂，其实紫砂泥是没有真假之分的，只有好坏之别

“人间珠宝何足取，宜兴紫砂最要得。”明清时起，紫砂就被认为是最理想的注茶器，有“茶壶以砂者为上”之说。如今，随着品茶赏茗在大众生活中越来越兴起，茶具中的紫砂壶地位也更受茶人的重视。紫砂泡茶，既不夺香又无熟汤气，茶香不涣散，色、香、味皆蕴，壶壁导热慢，保温性好，提拿均不烫手。寒冬腊月时突然倒入沸水也不会炸裂，可放在火源上炖烧不必担心开裂。

紫砂属于半烧结晶细陶器，介于陶与瓷之间，里面含有一定的气孔，壶壁又不施釉，具有良好的透气性，可以“注茶越宿暑月不馊”。一般饮茶讲究随泡随喝，喝完即将茶渣倒掉，否则壶中茶叶很容易腐败长毛，但在紫砂壶内存茶过夜或是更长时间，即使是夏天，也能保证茶叶不馊，不起苔藓。

紫砂壶壁有吸收茶汁的功能，使用时间越长，内壁增积茶锈，空壶注入清水也有茶香。每次使用后，茶水浸泡壶身，再轻拭壶面，便会“自发黯淡之光，入手可鉴”，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养壶。摩挲日久，一把好壶会达到“外类紫玉，内如碧云般润泽。”养壶之人看重的，是人与壶之间的情感交流，并借由壶与茶品出大千世界的沧桑味道，品出人生难得的悠闲惬意，这是其他艺术品或是实用品都无法企及的高度。

紫砂矿藏之荒？

宜兴自古陶土矿藏丰富，山林柴草密布，是名扬海外的紫砂之都。紫砂窑最初是手工开采，在山上找到眼口，见泥追泥，逐步深入，挖进一两米后，用黄石把洞口砌成一米多宽、一人多高的拱形，

用大锄手挖，簸箕装泥，扁担挑运。即使是这样简单落后的操作方式，一人一天也可以出泥一千到两千多斤。20世纪50年代，随着采矿公司的成立，这种手动单兵作业的原始开采方式才逐渐被机械取代。

紫砂泥的颜色千变万化，以朱、紫、米黄三种为基本色，其中又因烧制时的火候温度而显示出不同效果，如紫铜、香灰、墨绿等。细观每种泥色，里面又有白砂点点，宛若珠翠。制作时也有在泥中添加粗泥砂、钢砂的，近观珠粒隐现，与瓷器的细腻光泽恰然相反。

工艺美术大师徐秀堂曾在书中写道：人们常有这样的误会，以为紫砂泥如同我们日常见到的黄土，是粉状颗粒，洒上水便是泥团，其实紫砂泥从地下开采出来时，棱角分明，形状如同岩石。这种矿石开采后，一经风吹雨打，很容易风化。过去，采矿人把矿石卖给磨坊主，磨坊主将它们露天堆积，自然风化成黄豆颗粒大小，再用石磨磨碎筛出杂质。

紫泥粉碎的细度以过60目筛为宜，泥料过粗制作时费功；泥料过细制作时黏手，坯体表面会起皱纹，同时还会引起干燥，烧成收缩增大，降低烧成温度，则发生气泡缺陷。这些筛出的泥粉加适量水拌匀，被搓成湿泥块即可用于制作紫砂器。

2005年，宜兴政府一纸禁采令，让紫砂矿泥是否耗尽成为热议话题。坊间流传，黄龙山紫砂矿含量日益枯萎，若干年后陶都将无泥为继。对此说法，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赞华艺术之家紫砂工艺师吴俊峰却不以为然。他说，在宜兴，老辈人做壶一般是用多少采多少，后来为了收集受欢迎的泥料，开始每次尽量多拿一点，用不完就存在一边。“到了我们这一辈，观念完全不一样了，泥料都是十吨二十吨地往家拉，因为泥料保存简单，放在阴凉角落避风避雨就可以。之前几代人做紫砂，从来没感觉到泥料不够，现在因为开采过度，有的山整个掏空了，成了大水潭。政府看到这样的情况，就把黄龙山围起来，设立许可证制度。”吴俊峰说，并不是因为泥料稀缺，即将没有了，而是实行保护性开采，“事实上就是我们几十辈人以后，黄龙山的矿料也是用不完的。”

在众多紫砂矿泥中，紫泥矿藏最为丰富，底朝青、红皮龙是比较珍贵的品种，价值也更高。吴俊峰向记者介绍说：“区分泥料的好与不好，主要是通过泡养。好的泥料泡养之后，变化没那么大。再者就是物以稀为贵，我们祖祖辈辈做紫砂，很多品种大家同时在做，做到一定程度，有些泥料就会比较缺乏。这样的泥料（我们）如果在某种机会下碰到了，就会以很高的价格买下或调剂来用，但其实每个品种的泥料都是一样的。比如大红袍泥，这种泥可以说是绝版了，我最近

十五年都没有见过。有些商家打出‘大红袍泥重现江湖’的说法，几乎都是（不可能的）。”

吴俊峰表示：“据我所知，市场上是没有冒充紫砂材质的所谓假壶的。好多人问过我说，从地摊上买了一个三五十元的紫砂壶，心里不踏实，会不会是假紫砂，其实紫砂泥是没有真假之分的，只有好坏之别。”

紫砂壶制作全凭经验

紫砂壶的制作不同于瓷器，不是采用拉坯工艺，而是采用泥片镶接成型技法。工艺师先将一块紫砂泥拍成大约3毫米的泥片，再将泥片围成壶身，再裁出壶底和壶口，搓出壶嘴和壶把，用脂泥粘上。最后利用竹蔑只、明针、独果等器具将壶身整理光洁，至此，一把紫砂壶才算成型。

由于做工复杂且不借助任何模型，对壶的每个部分的比例、角度全靠工艺师自己凭经验拿捏，成品形态万千，“方非一式，圆不一相”。

“做壶其实是一个非常自由的过程，画好草图就可以开始制作，这样的壶是有唯一性的。有些壶作为礼品用，需要相同的外观，可以用模具只能框一个粗糙的大小，但所有的制作工序一个都不能少。这样的也叫手工壶。”吴俊峰说，便宜的紫砂壶也是手工壶，只不过在细节的处理上不如好壶，所谓的机械壶和半机械壶，指的是用拉坯灌浆的方式，最后喷浆上釉，表面很光滑，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脱离了紫砂的范围。“这种壶的成分跟紫砂壶是不一样的，要灌浆必须是流动性的原料，但紫砂泥都是成块的，这种壶比通常的紫砂要轻，里面是加了其他成分的。”

龙窑烧制紫砂最早使用的是煤，后来是天然气，现在一般用电窑。吴俊峰认为，相对而言，煤窑烧出的紫砂壶是比较好的，只是现在因为环境污染不准使用了，“就像我们烧菜一样，煤窑是小火慢炖，天然气窑就太爆了。”他说，天然气窑和电窑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但是冬天烧制比较金贵的泥料时，一般会选择天然气窑，可以防止紫砂接触冷空气。

紫砂壶中的文人气质

宜兴地处江苏南端，与浙江、安徽交界，唐代时这里盛产的阳羡紫笋、晋陵紫笋是进献朝廷的贡茶。每年春天贡茶成熟，太守要亲开

茶园，征集上万人火速采摘，日夜兼程送往长安，称为“急程茶”，有“天子未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的诗句。

明代重科举，盛文风，文人墨客吟诵风雅时常以品茶助兴，每一客，壶一把，任其自斟自酌，方为有趣。明人认为，壶内盛水半升，即480毫升的称为大壶。徐秀堂说：“壶形高者则壶口盖必稍敛，宜于沏泡红茶。因红茶在焙制过程中经过发酵，用高壶沏泡红茶，觉香浓郁。绿茶未经发酵，叶绿素没有被破坏，沏泡不宜深闷，故用扁壶沏泡绿茶，倾出时澄碧新鲜，更显出色香味的佳趣。”潮汕地区的功夫茶是半发酵茶，最适合容量极小的水平壶，香不涣散，味不耽搁。

紫砂壶的风雅，即使是明清的官窑瓷器也难以企及。思源壶，取义饮水思源；劲节清风壶，既表示其仿生竹节的形态，又是对竹刚直挺拔的礼赞；近代紫砂大师朱可心的报春壶，用梅花装饰，取意自毛泽东《卜算子·咏梅》的诗句“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元明时期的隐士孙道明曾在紫砂罐上写下五子草书：“且吃茶，清隐。”世间纷扰如过眼云烟，且品品茶，清静寡欲就好，这应该是最早出现的紫砂陶铭。秦时张良派刺客在今河南地界刺杀秦始皇，用的是圆形武器铁锥。晚清艺人韵生曾以此为原型，做成“博浪锥壶”，书法家赧翁题铭：“铁为之，沙抟之，彼一时，此一时。”昔日暗器变今日茶盏，桌几上的盛茶之物又多了几分历史的厚重。

文人雅士推崇名人名作，价值千金，他们把紫砂茶具当作珍玩品鉴的对象，任伯年、吴昌硕、黄慎等都曾为紫砂壶题铭诗画。有些文人还参与了紫砂制作工艺，采访中，另一位紫砂艺人周伯娟向记者展示了一幅紫砂壶制作前的设计草图，由铅笔绘制，画有壶成型后的大致形状，标有尺寸。“我们现在和清华大学的张守智教授合作制壶，张教授虽不懂做壶，但设计壶。”

紫砂壶中，文人风雅体现得最为极致的是曼生壶。陈曼生是清嘉庆年间的两任溧阳知县，擅长古文辞，精于雕琢，以书法篆刻成名，文学、书画、篆刻样样精通，才气过人，被称为中国历史上以壶寄情之第一文人。他曾与宜兴茶具制作名家杨彭年合作仿古出新，并亲自篆刻铭词，独创了名为‘曼生壶’的茶具。此后的紫砂壶开始大量反映文人士大夫的情趣，承载传统文化。我们在曼生壶上可以看到铭文、书画、篆刻和金石艺术等，独具文人风雅，客观上提高了紫砂与作者的社会地位。

陈曼生与朋友设计了多少壶形至今已无法统计，有说十八式，也有说二十式，他的存世作品海内外加起来超过百件，其中有不少伪

作。这些紫砂壶造型古意，文人气质突出，成为后代向往效仿的对象。

什么是好壶？

一把好壶的评判标准是什么？清代名人高熙在称赞制壶名手邵大亨的文章中曾提到一个有趣的标准：口盖直而紧，倒茶时人不必担心壶盖坠落。历史上著名制壶艺人时大彬的壶有“以手拔盖，绝不能动”的特点。看来壶盖与壶口的严丝合缝，是前人孜孜追求的一大好壶标准。除此之外，紫砂壶嘴的注水是衡量因素之一，嘴口不流涎，倾倒出的水柱光滑不散乱，好的壶注水有“七寸注水不泛花”之说，就是把壶提七寸高，倒出的水柱顺畅有力，不会四散。

紫砂壶依据泥料、工艺和造型等诸多特点，不同等级售卖价格也天差地别。一般粗货价格低廉，几十元钱可购。出自名艺人之手的工艺杰作则“贵重如珩璜（上好的佩玉）”。明周高起的《阳羡茗壶系》中说，“至名手所作，一壶重不过数两，价重每一二十金，能使土与黄金争价……”明人周澍写过“供春小壶一具用之数十年，则值金一笏。”笏是古代大臣上朝时所拿的手板，一般用象牙或竹制成，一笏应当算是很大一块了。日本明治时期的《茗壶图录》中更是提到，明制一壶值抵中人一家产。可见在古代，高端紫砂壶的价格早已脱离日常用具行列，而位居奢侈品名单中。现代社会，它们也屡屡在各大拍卖会上崭露头角。

2010春拍，一把创作于1948年的顾景舟制、吴湖帆书画“相明石瓢壶”，以1232万元成交，创出紫砂壶拍卖世界纪录。当年秋拍，明代时大彬的圈钮壶拍出了1344万高价，再次刷新了纪录。然而中国收藏家协会会长罗伯健说，作为一种投资品种，紫砂壶变现途径有限，要么是走向拍卖市场，要么是圈中人士的交易，“说到底，紫砂壶只是用来泡泡茶。你若喜欢，根据自己的实力买就是。大可不必为了投资而大费周章。”罗伯健说。

紫砂壶的保养

新买的紫砂壶，使用前可先用茶叶加滚水多烫几遍，也可用茶水煮，再用泡过的茶叶或棉布里外擦拭壶身。虽然紫砂壶可使茶叶长久不馊，但每次饮茶完毕还是应及时清理，平时使用时也要保持壶面清洁不留茶汤，否则擦拭后壶面会留有浮光。紫砂壶接触油脂类物质易养出带有花斑的壶，为藏家忌讳。紫砂壶养一段时间，就让其休息一两日，使壶壁气孔可以充分休息干燥，再次使用时吸收茶香效果更好。在紫砂壶由看上去暗哑粗糙变为光亮温润的过程中，一种成就感

在养壶者的心中油然而生。

死刑存废之辩

作 者:武云溥

《杀戮的艰难》

张娟芬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年4月

这是一本探讨死刑存废话题的书。作为台湾“废除死刑协会”积极推动者，张娟芬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不同死刑犯的犯罪成因，审判经过，以及执行经历，让人在杀戮与死神的边缘思考关于生命、公平、正义等一系列终极的命题。帮助读者对死刑制度及其残忍和不合理的地方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在谈论这本关于死刑问题的书之前，我想先提起两个曾经引发广泛争议的案子。

第一个案子的主角叫药家鑫，你一定听说过他的名字。2010年10月20日深夜，西安音乐学院大三学生药家鑫驾驶一辆轿车，在街上撞倒了骑着电动车的农妇张妙。只有21岁的年轻人药家鑫很慌乱，决定逃跑。如果他就这么跑了，也许这只是一起普通的肇事逃逸案，犯案者和受害人的命运都将不同。不幸的是，药家鑫在跑路前看到，被他撞翻的农妇张妙在地上呻吟，并且试图记下药家鑫的车牌号。药家鑫觉得“农村人很难缠”，为了避免此后的“麻烦”，他掏出一把刀，过去对着张妙连捅了八刀。2011年6月7日，药家鑫被执行死刑。

第二个案子的主角叫聂树斌，他的知名度可能相对低一些，因为他在1995年就死了。1994年他被石家庄市公安局逮捕，理由是聂涉嫌奸杀了石家庄液压件厂的一名女工。聂树斌提出上诉，河北省高院的终审判决仍然认定他罪无可恕，于是聂树斌就被执行了死刑。吊诡的是十年之后，奸杀案的真凶王书金出现了——2005年，身负多起案件的通缉犯王书金落网，他供述自己多次强奸、杀人，其中一次是1994年8月在石家庄液压件厂附近的玉米地里奸杀了一名妇女。王书金不知道，他供述的这起案件在十年前就结案了，有个叫聂树斌的青年替他当了死鬼。

说完这两个案子，问题来了：一、你觉得药家鑫该死吗？二、聂树斌为什么会死？

对于药家鑫，案件事实不存在争议，很多人觉得他显然该死：对这样残忍且无理智可言的罪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也有很多人认为，对于一个二十岁出头的青年而言，因为他一时冲动犯下的罪行而杀死他，是否像他杀死别人一样残忍？

再说聂树斌，这个案子至今仍在核查中，还有很多疑点未清。可是聂树斌早已不在人世，他很有可能是冤死的。死刑案件的误判在世界各国都屡见不鲜，相信每个法官都知道死刑判决的下达意味着什么。而且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如果同样触犯法律，达官显贵比普通老百姓逃脱极刑的几率更大，司法实践很难做到绝对平等，这其中有一些涉及自由裁量权的灰色地带。那么，为了避免无法挽回的错误，为了避免事实上的不平等，是否应该彻底废除死刑？

台湾作家张娟芬是积极的社会运动参与者，她指出了我们在讨论“废除死刑”这个话题时常见的若干误区。比如，废除死刑并不等于宽恕罪犯，而是要在监狱里继续对罪犯进行惩罚。即便一直把罪犯关在监狱里，也相当于用纳税人的钱在养着他，“为什么不打死他比较省钱呢？”张娟芬认为，这其实是一种强盗逻辑：省钱比人命重要吗？担心罪犯吃闲饭，为什么不让他在监狱里劳动创造价值呢？

《杀戮的艰难》就是这样一本充满案例和思辨的书，在台湾的“废死运动”中有过很多精彩的辩论，张娟芬把问题记录下来，一遍遍追问其核心：死刑真的无可替代吗？如何确保维护公平正义的法律，不会沦为民众“泄愤”的工具？这其中还包含了一层意思：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民意很容易影响法官的裁决。这也是我把药家鑫案再拿出来回想的原因，还记得当年微博上汹涌澎湃的喊杀声吗？药家鑫一度被说成家庭背景强大的“富二代”，事实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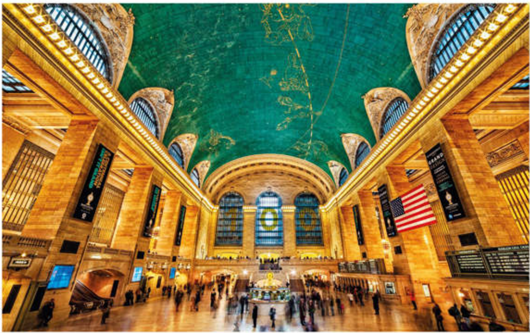
我们生活的世界并不太平，每隔一段时间，就能听说一些耸人听闻的恶性案件。比如前不久长春发生的盗车杀婴案，再次挑战了大众对于人性恶的想象极限。说实话，碰到这种案子，我的第一反应也是咬牙切齿喊声“杀”，但我不是法官，法官可得时时警醒自己，不能被愤怒冲昏头脑。杀戮并不是一了百了解决问题的绝招，死刑的教化作用其实很可疑，否则无法解释多年来已经有那么多人被处以死刑，新的罪恶为何还层出不穷？“杀鸡儆猴本来就是不对的。”张娟芬在书里写道，杀鸡只能够因为“鸡该杀”，不能因为“要杀给猴子看啊”。如果鸡会说话，鸡会问：“那为什么不杀猴儆鸡呢？”

百年纽约中央车站六十年前险被拆

作 者:周斌



/ 中央大厅里的“镇站之宝”——四面钟



/ 中央车站大厅的穹顶“星空穹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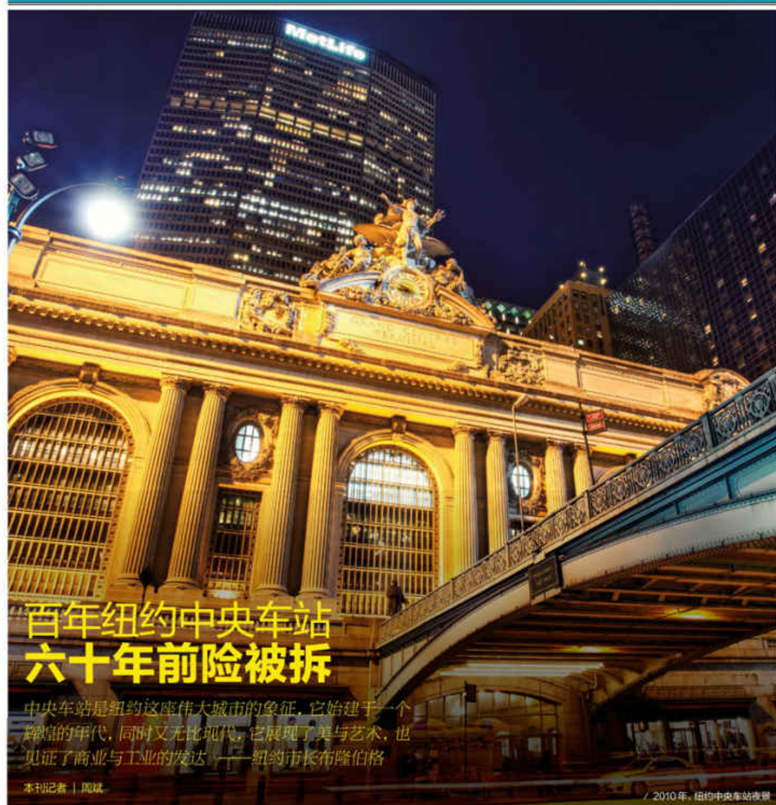












/ 2010年，纽约中央车站夜景

中央车站是纽约这座伟大城市的象征，它始建于一个辉煌的年代，同时又无比现代，它展现了美与艺术，也见证了商业与工业的发达。——纽约市长布隆伯格

到纽约的游客如果不去看一看中央车站（Grand Central Terminal），那真是一件憾事。在这座堪称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城市中，中央车站就像一颗历经岁月磨砺的宝石，熠熠发光。

2013年2月1日，在车站大厅中，西点军校的军乐队奏起了嘹亮

的曲调，中央车站迎来了它的百岁生日，一大早欢庆的人群就已经聚集来见证这一历史时刻。上午九时，在车站大厅临时搭起的舞台上，百年庆典活动拉开帷幕。

中央车站雄赳赳地矗立于美国纽约市曼哈顿的中城（Middle Town）42街与公园大道路口，是大都会北方铁路、纽约地铁7号线、列克星顿大道线（4号线、5号线、6号线）及S线交会的地下化铁路车站，是大纽约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美国最繁忙的铁路车站之一。

百年庆典的活动上，中央车站内的部分商店和饭店在这一天还特意将所有的价签换成了1913年的价格。乘客只花2美元就可以买到一条真丝围巾、花19美分就能买一块奶酪蛋糕、6美分能买一片黑麦面包。在庆典现场，面对商家的幽默感，乘客们全都微笑着敞开了腰包。

铁路大亨的纪念碑

中央车站是一片方形的布杂学院式（Beaux Arts）建筑，这是一种精英式的法国建筑风格，精细入发的雕塑、高大的立柱、硬朗的线条，阐释着十九世纪的力与美，一如古代城市耀武扬威的凯旋门，宏大、庄严，令人敬畏。

车站前最引人注目的是入口上方楼顶的一组雕塑。右边是智慧女神密涅瓦（Minerva），正低头掩卷；左边是代表道德的海格立斯（Hercules）；正中戴羽毛帽的是罗马神话中的商业之神墨丘利（Mercury），他张开胸怀，手指向远方，身后是美国的国鸟——一只展翅的鹰，脚下踩着一座巨型蒂凡尼大钟，为匆忙走路的人们指示时间。

与高高在上的雕塑不同，在入口前，略高于地面的地方还有一尊铜像，比常人要大，但却并不显眼。铜像所刻画的人物正是这座车站的缔造者——美国铁路大亨康内留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这位谢顶的金融家披着一件毛领大氅，比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车辆高不了多少，他抬着左手，食指跷起，表情深沉地注视着南面的市中心，仿佛还在为他的商业帝国而运筹。铜像边上浮雕刻着帆船和蒸汽船、火车、隧道、桥梁、引擎、电缆、船锚和车轮，代表着他人生的辉煌。

老范德比尔特1794年出生于纽约史丹顿岛上，是纽约的铁路大亨。当时纽约的巨富们都喜欢用自己的名字命名某个巨大有用的事

物，单单纽约城就有卡内基音乐厅、洛克菲勒大学、佩利公园，等等。范德比尔特也不能拒绝使自己名垂千古的诱惑。1869年，他开始在曼哈顿42街建造中央车站的前身中央港，作为他的铁路在纽约城的终点站。他还用10万磅铜为自己建了一座巨大的雕像，在30英尺高、150英尺长的筑物山墙上浮雕了自己的辉煌业绩。

老范德比尔特1877年去世，留下了1.05亿美元的财产，这笔财富相当于2005年的1580亿美元，死后由家族成员继承。

老范德比尔特的骄傲没过多久就因为一场事故黯然失色，那时的中央港主体建筑只有三层，还带有很大面积的多轨火车露天停靠区域。蒸汽机车行驶时产生的浓烟、煤灰使中央车站外部能见度很低，信号灯也难看清。1902年，一列进站的快车撞上了前车，事故导致17人死亡，38人受伤，在此之后，市内线路开始禁用蒸汽车头，启用电力车头，中央港的形制不再适用，必须改建。

1903年中央港被拆毁，负责经营的范德比尔特家族在原址重建了适用于电化机车的车站。新建的中央车站再一次展现了范德比尔特家族的商业智慧，他们将火车停靠场和铁路全部改到地下，原来铁路的位置栽上绿树，开发房地产，变成了现在的第四大道（即公园大道）。

中央车站带来的人气使第四大道迅速吸引了众多开发商，从车站门前的公园大道极目远眺，摩天大楼、豪宅云集，纽约最高级的使馆区、康芒多尔旅馆以及格雷巴尔大厦、克莱斯勒大厦、每日新闻大厦都建在这里。面对这片全曼哈顿岛地价最高的地区，寸土寸金这样的形容词也只能是黯然失色。

为纪念老范德比尔特，家族成员把他原来的铜像保存下来，放到了中央车站入口前。中央车站所有的装饰都采用范德比尔特家族的家徽，橡树叶和橡子意为“参天大树长自小小种子”，喻指范氏家族白手起家。

中央大厅里的“镇站之宝”

进入车站大厅，迎面而来的是挑高宽敞的空间，拱形的穹顶让人身在其中顿感渺小，大理石楼梯经过百年的打磨变得非常细腻、光滑。大厅中虽然也有照明，但并不太强烈，在空气湿润的时节，乘客甚至可以在大厅中看到阳光一束一束的线条。

大厅中最醒目的就是车站的镇馆之宝——四面钟。时间对于乘客

和车站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这个四面钟保证了大厅里任何一个方位的乘客都能获得时间。这部百年时钟是机械式的，至今仍在使用瑞士产的动力装置，不过它会定时由位于马里兰州海军天文台的原子钟进行校准，其精度高达每140万年仅有1秒的误差。它的最特殊之处在于钟的盘面是用昂贵的猫眼石制成，据说价值大约在1千万至2千万美元之间。

四面钟是给乘客看的，列车长们看的时间另有讲究，一般是比标准时间晚一分钟。因为乘客总习惯将事情拖延至最后一分钟来办，狂奔着去赶火车，列车长晚一分钟开车，既可以得到先上车旅客的谅解，也可以给迟到的人一丁点儿缓冲时间，所谓“快钟助慢客”中央车站因此拥有全美最低的滑倒、绊倒和跌倒发生率。更神奇的是，每班火车都迟发一分钟，总体的准点率却高达98%，令人佩服。

问询处是用柜台圈成的一个圆圈，没有出入口，工作人员出入走的是问询处下的秘密地道。据说，在中央车站，类似这样的通道还有不少，在车站的44个月台下，隐藏着一个可以直接进入华尔道夫旅馆（Waldorf-Astoria hotel）的通道，旅客下车后，可通过这个通道直接进入旅馆的电梯。当年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因私事到纽约，为了躲避记者，在中央火车站下车后，就是通过这条秘密通道进入华尔道夫旅馆的。不过这个通道并不开放，一般游客无缘得见。

据说，即使从车站的中央大厅向下走十层楼的高度，也不可能到达车站的最底部，这里有纽约市最大规模的地下室。二战期间，美国东部80%的步兵调动都要经过中央车站，为了防止敌人破坏，美军还派兵驻防地下室，一旦有人误入，此人就会被士兵扣留到战争结束。如果闯入者还带有沙子，士兵就将立即开枪射杀，因为地下室里的旋转变流器最怕沙子，一旦倒沙子在里面，就能毁掉整个地下室，造成铁路系统瘫痪。希特勒曾用两艘潜艇秘密运送了特工企图破坏地下室的各种设备，妄图摧毁这个铁路枢纽，但万幸的是行动被FBI及时挫败，其中两名纳粹特工被击毙，两名被逮捕。

星空穹庐与吻室

中央车站另一个让人叫绝的地方是它的“星空穹庐”。在中央车站，如果你不经意抬起头来，绝对可以收获惊喜。1912年，法国艺术家保罗·塞萨尔·埃勒（Paul César Helleu）根据中世纪的一份黄道12宫图，创作了一幅“星空穹庐”。车站棚顶的星图上标出了2500颗星星，其中有60颗配以照明，一通电源便满目生辉。不过星星的位置和人类从地面上所看到的刚好左右相反。范德比尔特家族的后人解释说这是从上帝的视角俯瞰星空。另外，星空位置也和真实位置不一样。

不过，美轮美奂的车站天花板上却有两处著名的“瑕疵”。首先，在“星空”双鱼座的上方有一个圆孔，这是美国太空总署（NASA）在美苏太空竞赛时的历史见证，当时NASA准备在车站大厅公开展示美国的火箭，但火箭运进来后才发现比棚顶高出六英寸，把棚顶戳出了一个小洞。在巨蟹座旁边、靠近子午线的边缘有一个黑色的四边形。这块“补丁”是特意留在那里的。因为1998年工人们维护被烟熏得黑乎乎的棚顶时，发现黑色污渍的成分居然全部是尼古丁，可见人们抽烟有多少。最终他们足足花了一年的时间才把棚顶清理干净，留这块补丁意在警示后人。这次维护翻修，光是清洗穹窿顶就花100万美元，为了置换大理石地，挖罄了一个意大利石材矿。

中央车站还有一个比特摩尔厅（The Biltmore Room），许多人不知道，它其实就是著名的浪漫之屋“吻室”（The Kissing Room）。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铁路的黄金时期，很多人来中央车站坐火车远行，火车总意味着分别，抑或是重逢，包括政要、名人在内的许多旅客下了车后，总是在这里与迎接他们的至爱亲朋拥抱接吻 ，吻室由此得名。

险被拆迁作商业开发

上世纪五十年代，日渐普及的航空和汽车成为中央车站的强大竞争对手，铁路在没落，富不及三代的范德比尔特家族已无力再保护这座车站，社会上不断有人提议拆了车站开发房地产。1968年，中央铁路公司计划拆除中央车站42街的一部分候车室，以兴建办公大楼，幸亏当时美国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强烈反对才作罢。此时的中央车站已经成为纽约人心目中的城市地标，被赋予了浓浓的文化意义，中央车站幸运地逃过被拆迁的命运。

1983年，中央车站被正式列入国家历史文物保护名册，以法律的形式保护了下来。

今天，中央车站已是纽约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之一，每年都会有大批游客为一睹其芳容而专程到中央车站买票乘坐一回美国铁路。

一百年后再来参观这座建筑物，你仍然能感到它的不同凡响。中央车站让人深切体会到建筑的生命与价值，如果我们向建筑倾注了心血、智慧与审美，它是不会辜负我们的；相反，如果我们视建筑为草木砖石，那么它就难免陷于粗鄙。笔者数次来到中央车站，仍然能够感受到它的美与便捷，令人感佩当年设计建造的超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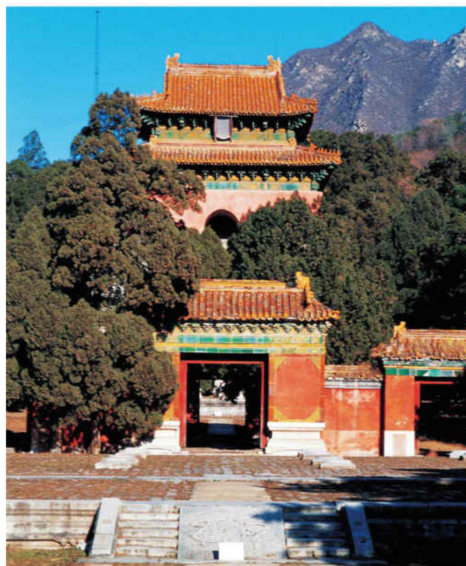
纽约市长布隆伯格在车站的百年庆典致辞中谈到，中央车站是纽

约这座伟大城市的象征，它始建于一个辉煌的年代，同时又无比现代，它展现了美与艺术，也见证了商业与工业的发达。

（参考资料：《20世纪初纽约城市的美化——纽约中央站的改造》；约翰·S·戈登：《伟大的博弈》）

探秘十三陵新开六陵（下）无力挽回的王朝背影

作 者:周冉





姓名：朱由校　在位：7年　生卒：1605–1627年
年号：天启　庙号：熹宗　现住址：德陵（图为明楼）
谥号：达天阐道敦孝笃友章文襄武靖穆庄勤悊皇帝

探秘十三陵新开六陵（下）
无力挽回的王朝背影

本刊记者 | 周冉



/ 永陵明楼

十三陵景区中，各陵间有一定距离，近的可信步而至，远的则要乘车数分钟才能到达。不管是为明朝建立规章典籍、整饬社会风气、开疆拓土的帝王；还是沉迷方术、亲近宦官、不理政事的昏君；抑或是空有梦想、后继无力的末世子孙，如今都融入这一捧土一片瓦中。守陵人与爱犬踏着落叶逡巡其中，送走一批批参观者，大门吱呀一声关上，空留寂寞的历史。

永陵：活着为自己修陵的朱厚熜

明十三陵中，永陵的建筑规模仅次于明成祖朱棣的长陵。作为皇帝活着时自建的陵寝，永陵不仅规制僭越，设计、用料和细节上都堪称奢华。这座豪华帝陵动工于嘉靖十五年（1536年）三月，此时，墓主人朱厚熜旨在巩固皇帝权威、摆脱傀儡统治、改换宗族地位的“大礼议”事件尚未完全平息，但皇帝的胜利已是定局。

朱厚熜与朱棣都是改变明代帝系父子传承关系的君主，不同的是后者是主动政变，前者则是被各方势力推举而出。明武宗朱厚照无子，按照宗亲排序，朱厚照堂弟、兴献王之子朱厚熜是最合适的人选。在朱厚照生母张太后看来，14岁的朱厚熜也是作为傀儡操纵的最好选择，于是极力促成此事。但事与愿违，她没想到朱厚熜是个“性刚，好自用”的人。

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二十二日，朱厚熜带着50人的官员队伍，从封地赴北京即位，到达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否定了辅臣杨廷和所拟的“绍治”（意为继孝宗而治）年号，改为“嘉靖”。一场与文臣集团之间声势浩大的斗争拉开序幕，斗争的主要议题是为已故的生父争“皇考”名分。朱厚熜认为“父母可易若是邪”！决不能认堂兄的父亲孝宗为父。

朱厚熜采用渐进方式，先提议称生父为兴献皇帝，生母为兴献皇后，后在反对声中妥协为本生父母，最终下旨称生父兴献王为皇考，孝宗为皇伯考，还一纸敕令将以杨廷和为首的、持反对意见的大批文官革职法办，甚至边戍充军。

世宗统治明朝45年，没有出现严重的宦官专权，对根深蒂固的皇族外戚势力，如张太后家族，也没有丝毫手软。本想控制年幼皇帝的张太后，却一天天看着对方羽翼丰满，嘉靖二十年（1541年）郁郁而终。

明朝的皇帝大都短命，16个皇帝中活到40岁以上的只有6个。皇帝坐稳了江山，就想设法让其长久。《明史》中说，朱厚熜自封地赴京继承大统，享尽富贵，唯独不知寿耳。对长生的追求很快转变成为对神仙方术的痴迷，他曾给自己取下多个长达三十几字的道号，嘉靖朝备受皇帝宠信的两位内阁首辅夏言、严嵩都善写青词（道家设法事时祭告天神的奏章表文）。朱厚熜还听信方士所言，折磨宫女炼制丹药，采阴补阳，激起众愤。宫中曾出现16名宫女不堪忍受，合谋刺杀皇帝的事情，刺杀虽未成功，但给朱厚熜的刺激不小，从此他躲到西苑潜心修道再不进宫门一步。朱厚熜在位45年，用人“忽智忽愚”，“忽功忽罪”，很可能也与长期服食含铅丹

十三陵景区中，各陵间有一定距离，近的可信步而至，远的则要乘车数分钟才能到达。不管是为明朝建立规章典籍、整饬社会风气、开疆拓土的帝王；还是沉迷方术、亲近宦官、不理政事的昏君；抑或是空有梦想、后继无力的末世子孙，如今都融入这一捧土一片瓦中。守陵人与爱犬踏着落叶逡巡其中，送走一批批参观者，大门吱呀一声关上，空留寂寞的历史。

永陵：活着为自己修陵的朱厚熜

明十三陵中，永陵的建筑规模仅次于明成祖朱棣的长陵。作为皇帝活着时自建的陵寝，永陵不仅规制僭越，设计、用料和细节上都堪称奢华。这座豪华帝陵动工于嘉靖十五年（1536年）三月，此时，墓主人朱厚熜旨在巩固皇帝权威、摆脱傀儡统治、改换宗族地位的“大礼议”事件尚未完全平息，但皇帝的胜利已是定局。

朱厚熜与朱棣都是改变明代帝系父子传承关系的君主，不同的是后者是主动政变，前者则是被各方势力推举而出。明武宗朱厚照无子，按照宗亲排序，朱厚照堂弟、兴献王之子朱厚熜是最合适的人选。在朱厚照生母张太后看来，14岁的朱厚熜也是作为傀儡操纵的最好选择，于是极力促成此事。但事与愿违，她没想到朱厚熜是个“性刚，好自用”的人。

正德十六年（1521年）四月二十二日，朱厚熜带着50人的官员队伍，从封地赴北京即位，到达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否定了辅臣杨廷和所拟的“绍治”（意为继孝宗而治）年号，改为“嘉靖”。一场与文臣集团之间声势浩大的斗争拉开序幕，斗争的主要议题是为已故的生父争“皇考”名分。朱厚熜认为“父母可易若是邪”！决不能认堂兄的父亲孝宗为父。

朱厚熜采用渐进方式，先提议称生父为兴献皇帝，生母为兴献皇后，后在反对声中妥协为本生父母，最终下旨称生父兴献王为皇考，孝宗为皇伯考，还一纸敕令将以杨廷和为首的、持反对意见的大批文官革职法办，甚至边戎充军。

世宗统治明朝45年，没有出现严重的宦官专权，对根深蒂固的皇族外戚势力，如张太后家族，也没有丝毫手软。本想控制年幼皇帝的张太后，却一天天看着对方羽翼丰满，嘉靖二十年（1541年）郁郁而终。

明朝的皇帝大都短命，16个皇帝中活到40岁以上的只有6个。皇帝坐稳了江山，就想设法让其长久。《明史》中说，朱厚熜自封地赴京继承大统，享尽富贵，唯独不知寿耳。对长生的追求很快转变成为对神仙方术的痴迷，他曾给自己取下多个长达三十几字的道号，嘉靖朝备受皇帝宠信的两位内阁首辅夏言、严嵩都善写青词（道家设法事时祭告天神的奏章表文）。朱厚熜还听信方士所言，折磨宫女炼制丹药，采阴补阳，激起众愤。宫中曾出现16名宫女不堪忍受，合谋刺杀皇帝的事情，刺杀虽未成功，但给朱厚熜的刺激不小，从此他躲到西苑潜心修道再不进宫门一步。朱厚熜在位45年，用人“忽智忽愚”，“忽功忽罪”，很可能也与长期服食含铅丹药有关。

求长生的人更在乎自己死后的归宿。嘉靖十五年（1536年）三月二十四日，世宗谒祭长、献、景三陵后，带领从臣和钦天监官员亲自到为他选定的万年吉地——十八道岭察看，下诏此地更名为“阳翠岭”。对永陵的风水，清代《帝陵图说》曾给予高度评价：“天寿蕞尔之山，而犹有佳城（“域”字之误）若阳翠岭者，非地灵之效顺，世宗之睿鉴，其何以得之！”

世宗本打算按照长陵规制营建，却又不好明说，只暗示：“陵寝之制，量仿长陵之规，必重加抑杀，绒衣瓦棺，朕所常念之。”大臣们心领神会，送给世宗御览的陵寝设计图只比长陵规模略小，廖文政等负责点穴的风水师提议地宫深度不能太深也不能太浅，需为一丈七尺，很快得到世宗同意，四月二十二日申时，建陵的浩大工程启动。

学者胡汉生介绍说：“永陵营建约为七到十一年，总计用银达800余万两。工程最紧张的时候，参加营建的三大营官军有4万人，陵寝建筑，如宝城、殿庑等在规模上超过了其前代献、景、裕、茂、泰、康六陵制度，仅比成祖的长陵略小一点。方院和宝城之外，有一道前七陵都没有的外罗城。其制‘壮大，甃石之缜密精工，长陵规画之心思不及也’”。

前七陵的明楼在明朝时均为砖木结构（清朝乾隆时修缮改为条石发券结构），而永陵的明楼全为砖石结构，无片木寸板。宝城城垛则选用花斑石垒砌，明代文献也称“花版石”，或“竹叶玛瑙石”。清代至民国时期，永陵都得到修缮，祾恩殿（已毁）现存明代重檐金柱柱础石鼓镜部分直径达1.2米，比长陵的仅少2厘米。

世宗是明代后妃最多的皇帝，共60多个，13岁的寿妃是其所纳的最后一位，当时世宗已60岁了。永陵入葬了一帝三后。朱厚熜的第一位皇后孝洁陈皇后是张太后在嘉靖元年（1521年）时操持册封，朱厚熜厌恶张太后，称其为“久恶之妇”，因而对这个皇后并不宠爱。嘉靖七年（1528年），一次有两妃进茶，世宗盯着二人玉手出神，陈皇后见状不悦，扔下杯子愤愤站起，世宗大怒，陈皇后因惊吓流产而死，草葬袄儿谷，其子穆宗即位后才迁葬永陵。也是从这一年，世宗借由为皇后选陵址之便，已开始留意自己的万年吉地。

皇后张氏，在陈皇后死后被册封，因替建昌侯张廷龄求情惹皇帝震怒被废，死于嘉靖十五年（1536）年。皇后方氏曾在宫婢之变中赶来营救皇帝，事发后，方皇后趁皇帝昏厥，快刀斩乱麻地处决了平时十分得宠、不幸牵连此事的曹端妃和王宁嫔。野史中记载，皇帝因此迁怒方氏，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宫中大火，世宗竟见死不救，方皇后遂崩。

《明史世宗本纪》中评价嘉靖朝："百余年富庶治平之业，因以渐替。"民间有"嘉靖嘉靖家家皆净"的谚语。嘉靖二十年（1541年）京南城一隅一日冻死80人。太原饥荒，百里不闻鸡声。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二月，户部主事海瑞抬棺上了一道披肝沥胆的《治安疏》，直言："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世宗看后大怒，心理遭受摧毁性打击，他命人把海瑞下狱，却未杀死，对人言说海瑞说得对，但自己是久病才修玄学不理朝。当年十二月十四日，嘉靖皇帝从西苑迁居乾清宫，当天死去，后人推测他死于丹药中的重金属中毒。出自张居正等人之手的遗诏中将皇帝的过错解释为："只缘多病，过求长生，遂至奸人乘机诳惑。"朱厚熜死后，如愿入葬他精心修饰的华丽陵寝。

庆陵："一个月皇帝"朱常洛

明光宗朱常洛是明代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八月登基，九月初一去世，在位仅29天，年号泰昌。朱常洛虽为神宗长子，但因母亲不受宠爱，18岁才出阁读书，此后长期辍学，文化水平不高。幼时曾在宫中被刺杀，幕后指使最终未查出，成为明代三大疑案之一。

光宗嫔妃众多，好女色，因宣淫获病，内医崔文升先是诊治为邪热内蕴，进通剂散。光宗当晚腹泻三四十次，再也起不了床，病情日趋恶化。奄奄一息的光宗出于坚强的求生意志，又服食了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献的两粒红丸，服第一颗时四肢和暖，思进饮食，于是当晚又服一颗，没想到次日五更，宫中就传来消息，皇帝已然过世。从大臣的奏疏中看，所谓红丸的主要成分其实就是红铅，"乃妇人经水"并无药效。最后崔文升发配南京，李可灼充军，此事草草收场。

明光宗朱常洛死后，长子朱由检即位，年号天启，后世称为明熹宗。光宗死后第二月，熹宗派遣大学士刘一燝和礼部尚书孙如游前往天寿山卜选陵地，不久，庆陵始建。

庆陵如今被分隔为前后两部分，需从两个大门进入，荒草丛生却难掩陵寝雕刻的精心细致。"陵寝修建成这样的规模已经不错了，毕竟才当了一个月的皇帝。"守陵人与记者聊天时说。如果守陵人所说是一座草率而为的帝陵吗？《钦定日下旧闻考》记载："光宗贞皇帝陵曰庆陵，在裕陵西南，俗称为景泰洼是也。先是景泰中建为寿宫，英宗复辟，景皇帝葬西山之麓，陵基遂虚。光宗上宾既速，仓卒不能择地，乃用此为陵。"由此看来，光宗陵寝是改景泰帝寿宫而成，确有应付嫌疑。

然而胡汉生认为：“景泰帝的寿宫早已被毁，已无现成玄宫可利用。庆陵的位置虽系原景泰帝陵的故址，但却经过了一番慎重的选择，并经反复斟酌，才确定了陵寝建筑的格局。当时负责选址的礼部右侍郎的李腾芳和工部侍郎王永光进行了一翻勘察后，上疏皇帝认为‘皇山二岭最吉’，同时附上形势图，熹宗看了图觉得很满意。”

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庆陵正式动工，七月二十九日玄宫合龙门，九月四日葬光宗及孝元、孝和两位皇后，共耗帑银150万两。修建中还有插曲，开穴过程中遇石，御史傅宗龙认为不可用。礼部集群臣会商，众人疑虑不敢确定。随后，大学士韩爌奉命带领精通风水术的制敕房中书官陈明晰前往陵地复视。陈看后认为，“偏右近唇，兼虞气脱。周视星峦形势，穴情仍在原处无疑”。最后，陵寝位置并无改变。

陵园规制初拟仿昭陵（穆宗朱载垕墓），后来大学士刘一燝复视庆陵工程，认为：“新陵营造规制，原题比照昭陵。今相度形势，似又宜参酌献陵（明仁宗朱高炽）。”于是建成了中隔小山，前有享殿，后有明楼、宝城的两处院落格局。

以往各陵玄宫均砖石并用，而庆陵则全用石料，且“后、中、前殿，重门相隔”。胡汉生指出：“庆陵陵园格局以及建筑的规模，虽基本仿照明献陵，但建筑的设计却显得更为精巧，装饰也显得更为华丽。祾恩殿的御路石雕雕刻着龙凤呈祥图案，明显是仿自永、定二陵。前院后门的琉璃花门两侧建有精美的琉璃照壁。这些又是十三陵中以前各陵都没有的，这与献陵的俭朴制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面的明楼宝城等建筑，则明显仿照昭陵修建。不仅哑巴院的月牙墙的高度接近宝城墙，而且，宝城内的封土也填得非常满，中间的圆柱形宝顶非常高大。”

此外，庆陵的排水系统设计独具一格。其他陵园都是用明沟排水的方式从陵前绕道排出，而庆陵则在明楼前修建平面为“T”形的地下排水涵洞，涵洞修建十分考究，全为大块条石起券，券顶高3米，券宽3.5米，总长200余米。

庆陵玄宫和定陵一样，设有安放帝后棺椁的棺床（宝座）。据《酌中志》记载，修建庆陵玄宫时，棺床的设计正好容纳光宗皇帝和孝元、孝和两位皇后的棺椁。于是，负责陵园营建的内官监管理王敬、翟应奎建议于设计尺寸之外，加尺若干。天启七年（1627年）十二月，迁葬孝纯皇后刘氏（崇祯帝生母）时，棺床才能恰好容纳一帝三后的棺椁，建陵人的先见之明给后来人行了许多方便。

德陵：凑钱修好最后一座

德陵是明代营建的最后一座皇帝陵寝，入葬的是明熹宗朱由校，他的继任者末代皇帝朱由检以自缢煤山结局，没来得及给自己修建陵寝。

熹宗朱由校幼年遭遇与父亲小时候如出一辙，从小不受父亲喜爱，15岁才出阁读书，没学到什么文化知识。因为光宗死得突然，朱由校太子还没当上直接做了皇帝。荣登帝位后，熹宗依旧不喜读书，玩起来却很有一套。

乳母客氏，自熹宗幼时便跟随左右，她与宦官魏忠贤结为对食，二人操纵朝政。魏忠贤看准熹宗玩乐正浓时呈上奏折，得到的往往是一句："朕已悉已，汝辈好自为之。"久而久之，朝中大小事竟都由魏公公做主了，魏氏得势后，各路鹰犬纷纷投靠，有五虎、五彪、十狗、四十孙之辈，爪牙遍布朝野，称为九千岁，众人只知有忠贤不知尊皇上。

因为权宦专政，天启朝阉党与代表文官集团的东林党人矛盾一触即发，内廷与前朝终于兵戎相见。左副都御史杨涟曾上疏皇帝直指魏忠贤的24条大罪，反被陷害贪污，处以酷刑。内阁中书舍人汪文言、工部郎中万燝等人，也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政治斗争中被残害致死，东林党势力元气大伤。

对于外面的大火拼，玩在深宫的熹宗并不了解，也不在意。天启五年（1625年）熹宗与客氏、魏忠贤在湖中游乐，途中贪玩改换小船，熹宗竟自己划起来，一阵大风把船吹翻，皇帝和两个小太监落水。众人顿惊失色，急忙下水施救，熹宗被捞上岸后吓得久久不语，病了数日，还落下了病根。天启七年（1627年）五月以后，熹宗突感不适，面无血色，常常困倦，脾气暴躁。兵部尚书霍维华献上"仙方灵露饮"，称此药可保人长生。魏忠贤命人如法炮制，即取上好大米，淘净蒸熟"内放银瓶蒸吸其汁饮之。"这灵丹妙药的成分仅仅为米谷之精，虽无药效也没什么不妥，谁知皇帝喝了一个月，突然全身浮肿，卧床不起。八月二十二日死于乾清宫。

由于客氏对后宫嫔妃的迫害，导致皇帝身后无子可继承大统。熹宗死前，立遗诏传位于五弟信王朱由检，即崇祯帝。十月，熹宗德陵在崇祯皇帝的主持下开始修建，其时大明朝的官员腐败，财政状况不堪，崇祯帝东拼西凑只拿出50万两白银。即使修建时一切从简，这个数字也是远远不够的。工部向皇帝建议：先修建地面建筑，剩下的钱财通过大小官员捐俸、向地方加派征收等途径补齐。

“明代营陵经费，初时取于国库，中叶出现了事例银，时有‘卖官营陵’的讥讽，到了营建德陵，则捐助、加派、无所不用其极。明代营陵费用的三部曲，是明朝经济由盛到衰的一个缩影。”学者胡汉生说。

除了银两上的不足，修建德陵还遭遇石料不济的问题。当时阉党首领魏忠贤已被新帝扳倒，声名狼藉，有人建议拆除各地魏忠贤生祠，以供石料，崇祯帝考虑再三，终因有损皇家声誉而没有采纳。

德陵经过五年的艰难施工，于崇祯五年（1632年）二月竣工。建成后的德陵，总体布局仿照昭陵，但宝城内的琉璃照壁和牌楼门前的三座门都仿照庆陵建造。照壁的壁身和门楼的门垛，不仅有华丽的琉璃岔脚，中间还有雕饰精美的琉璃盒子。德陵明楼内圣号碑的图案则与众不同，其他各陵圣号碑碑趺所饰图案一般以云龙为主，德陵则上枋雕二龙戏珠，下枋雕饰佛、道两家的吉祥宝物。

崇祯九年（1636年）五月，皇太极派遣武英郡王阿济格、饶余贝勒阿巴泰率领八旗劲旅向明朝进犯，攻入昌平后焚毁了德陵。清兵北撤后，崇祯帝下令重修。

德陵中本无皇后棺椁，太康伯张国纪之女皇后张氏与熹宗起初感情较好，但二人性格不合，熹宗每每拉着张氏嬉戏玩乐，不是碰一鼻子灰就是被应付过去，久之疏离不少。客氏曾以捶背为幌子，令张氏流产。张氏在崇祯十七年（1644年）农民军攻入紫禁城时自缢而死，清代顺治元年，统治者将其入葬德陵。

胡汉生说，按照清代《帝陵图说》中的记载，德陵的修建质量十分低劣，清朝康熙年间，德陵的祾恩门，檩椽几乎都快要折断，祾恩殿“不崇高，不坚致，湫隘狭小，效献陵而过之”。乾隆五十年（1785年）和五十二年（1787年）清廷曾对德陵进行修缮，但只修葺了中轴线上的明楼、棂星门、三座门、祾恩殿和祾恩门等建筑，其他建筑并未涉及。

德陵的祾恩门、祾恩殿因原建筑毁坏较严重，乾隆时期进行重建，从遗存的柱础石分布情况看，重建时都缩小了尺度。1920年2月，乾隆时改建的祾恩门被当地村民烧毁，祾恩殿亦在尔后的战乱中被拆毁。2002年，十三陵特区办事处对德陵残坏的建筑进行修缮，祾恩门则按清代的遗迹进行了复原。

崇祯皇帝朱由检卖官凑钱为兄长勉强修好了一座体面的陵寝，却来不及为自己操持后事，他本想选择河北遵化的马兰峪作为最后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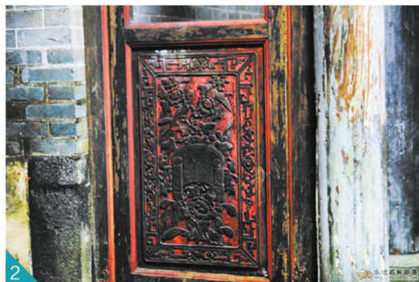
属，但苦无开工吉时也再无金钱，只好作罢，如同他空有中兴之梦，却无缘实现一样。清代嘉庆帝评价说：“明之亡，不亡于崇祯之失德，而亡于神宗之怠堕、天启之愚闇。”

登基17年后，朱由检在一片刀兵火海中拒绝逊位，自缢煤山，死时仅有太监王承恩殉葬。两天后，人们才发现这个僵硬的尸体，崇祯帝被抬到东华门示众，十几天后，大顺政权将他与周皇后合葬昌平田贵妃墓，即如今的十三陵思陵，从此世上再无大明王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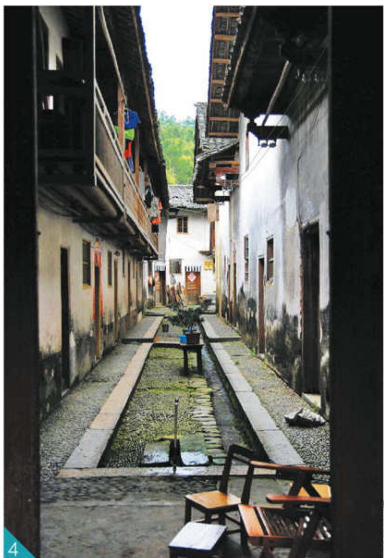
参考资料：《明十三陵研究》、《明朝十六帝》等

满堂客家大围岭南乡间的家族城堡

作 者:耿朔









一个细雨的早晨，我到了粤北第一古郡——始兴县，这里因保存着200多座客家围屋而闻名。客家民居是中国传统民居中举足轻重的一支，如果行走在南方赣、粤、桂、闽、台五省区客家人聚居的乡间，在稻田的视线之上，往往会遇见像堡垒一样的围屋。

它们的共同特征自然在一个“围”字：有着严丝合缝的高耸外墙，将大大小小的房间都围了起来。一般只在墙的上部开设小窗，有些窗窄得只能称为孔洞，从外头根本不能探知里面的天地，而里面的人却可将外来的“入侵者”看得清清楚楚。

聚族而居百余年

在始兴，最著名的围屋是隘子镇的满堂大围。它是当地现今保存良好的200座左右客家围楼中最完整的一座，也是全广东省最大的一处客家围楼。隘子镇在县域最南，由始兴县城上车，走一个半小时才到镇上主街。一出镇子，前面先有条小河，岸上一排竹篱，篱后繁茂的野草花齐齐向上，招呼远处的青山。

满堂大围稳稳当当坐在花后山前，典型的方形围屋，灰白色的外层长墙看上去有两层高，但也只能算它身后中心围的低调前缀。中心围拔地而起，清一色的水磨青砖砌成，四个角上设置了碉楼，笔直的线条和九十度的转角，如北方建筑那般规矩和厚重。就算我这样独自前来的访客，放在当年，一举一动也逃不出碉楼里那双眼睛。

满堂大围属于官姓家族。明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家住福建汀州府上杭县胜运里第一图的官福携家带口，迁徙到广东始兴县清化（即今天的隘子镇）落户生根。几百年来，子孙繁衍，散布在清化的各个村庄，官姓与张、华、饶姓等并为始兴当地的大家族。唐朝名相张九龄、抗日将领张发奎，皆出于此。

道光十三年（1833年），以经营木材生意起家的客家巨富官乾荣五十三岁，站在满堂村的土地上，决心建造一座最大的围屋。采用围屋这种造型，一是因为这是当地传统建筑，工匠好找，技术谙熟。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官乾荣放心不下那些老问题：虽历经数百年融合，土客关系、新老客家关系始终微妙；山寇、盗贼也永远是心头之患。官乾荣在北靠马尾狮山、面朝七道山岗、左右各有小河流经的地段上，开始建造防御色彩浓厚的方形围。

三年后的冬天，主体建筑中心围竣工，接着又开始在两边建造侧围，整个工程直至咸丰十年（1860年）才全部落成。从此官氏家族的这一支世代聚居于内，直到今日。

满堂大围由中心围、上新围和下新围三个独立部分并连而成，占地达13000多平方米，前方原先有个长方形的莲池，后来被填平。

三个围子都各只设一座门，大门在中心围，我从这里跨进去，迎

面是河卵石铺成的庭院，角落里有一处石井台，看上去还在使用。这个围子是回字形的，套了三重，主楼高四层，外墙以大型石条起基，往上是层层叠叠小青砖，据说是就近专门烧制的。墙体整齐排布着射击孔。这时我才注意到砖间石灰勾缝尚新，应是近年进行了不错的修缮。

围里最宽敞的厅堂是祠堂，客家围屋不管选取哪种布局形式，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 不管身居何处，祖宗不能忘。绕着祠堂，楼上楼下都是整齐划一的房间，以寝室为主，也包括了厨房、储藏间、仓房、厕所等。祠后是一个狭长的天井院，卵石之间青苔已深，新作的楼梯倒不俗气，居民在咯咯作响中走上去走下来。覆盖稠密青灰瓦的屋檐，错落在窗框里像一幅素描画。最后一进椭圆形的壮丁房画出优美的弧线，从前是下人住的。

上新围和下新围的格局大同小异，都是一周住房围绕中央的祠堂，据说整个满堂围的房间加起来有777间。这两边都没有经过修缮，大门立柱下有硕大的石柱础。有些屋子已经倾倒，露出木头梁架，但多数还有人住，门楣上贴着红纸，写着“添丁发财”一类的吉利话，门外堆着屋里放不下的物件，檐下挂出了要晾的衣服。

上新围的祠堂敞开着，里面尚有四块精雕木板可作细观，一位驼背的阿婆正在打扫卫生，我走到跟前连带比画地与其攀谈起来，从浓重的方言里大概明白：她姓田，84岁，十几岁从外乡嫁过来，一直住在围子里。

正在消逝的围屋文化

“闽南土楼”、“粤东围龙屋”、“赣南围屋”、“粤北围屋（楼）”等约定俗成的叫法，道出了客家民居几种主要类型的分布范围和建筑特征。但严格说起来，不同的类型并非恰好与省域对应。从形制布局和装饰风格上，它们彼此之间的界限并不是那么清晰，而是呈现相互借鉴、相映成辉的局面。

以土筑墙、以木建房的闽南土楼，巍然高耸，往往被视作客家民居中防御色彩最强的一种，很大程度上，它是外来客家人从当地土著闽南人的民居建筑中学来的。其中有一种，以同等长度的外墙围出最大内部空间的圆楼，从上世纪80年代印上邮票，到近年被列入世界遗产，早已为人熟知。同样甚为普及的是方形土楼，还有外观三凹两凸像个笔架的五凤楼，以及凹字形、半圆形、八卦形等多种变形土楼。它们不仅集中在闽南漳州和闽西南龙岩，还延伸到毗邻的粤东饶平一带，甚至还零星出现在赣南山区和海峡对岸的台湾岛。

赣南和粤北的主流都是方形围屋，也波及桂东的贺州，这种有着矩形平面的围屋也是以祠堂为中心，向外逐次起围，但会在内围或外墙四个边角上设置碉楼，最像堡垒。

几年前，我还曾去深圳的龙岗区看过那里的客家围屋。那是一座半圆形的围龙屋，是客家围屋中最常见的样式，它以粤东北的客家腹地梅州为中心，向外辐射到东江流域的河源、惠州，珠江口的深圳、香港，以及赣南的寻乌、龙南等地。围龙屋以包括祖堂在内的中央主体建筑为基准，向外画出一层层的同心半圆，每一层房屋叫作一“围龙”，也简称“围”。围数越多，房子就越大，据说最大的有五围之多，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围龙屋前还会挖一个半圆形的水塘，就像龙岗这座一样，和住宅对应形成一个整圆，正像一个太极。椭圆形围屋是围龙屋中的一个变种，即将原作水塘部分的前坪也围了起来。

龙岗的客家围占地颇广，但在四周现代高楼的围攻下，发出仅存立锥之地的叹息。我光是寻找通向它入口的道路就费了一番工夫，更凄凉的是里面人去楼空，辟作陈列馆，一到晚上就漆黑一片没有了声响。

那时我便想，要去看看还住人的客家围。听说粤北的始兴县的满堂围还住着同族四十余户人家，便把它作为旅行中的一站。在满堂围晃悠了一个上午，也不见第二个游客。官乾荣的后人们进进出出，依然宁静地生活在百多年的老宅里。我喜欢“满堂”两个字，冀望朴素，暖暖落到人心底。

刀鱼之味

作 者:南十方

这几天，有关刀鱼价格暴跌的新闻频频见诸报端电视，说起来，多数人刚看这新闻，恐怕都不太清楚刀鱼到底是什么鱼，甚至不少人会以为是日本秋刀鱼。

这其实也难怪，秋刀鱼堪称日本的国民食物，价格便宜量又足，而且20多年来随着日本文化横扫东亚，以致如今在北京，但凡是个日本料理餐厅，都不会缺了这个菜，如同寿司、生鱼一般平常。但刀鱼就不同了，它其实是产于长江的一种洄游鱼类，与河豚、鲥鱼并称为中国长江三鲜，是一种久负盛名的食材。

刀鱼由来已久，一般认为，《山海经》里提到的“鮆鱼”就是刀鱼。《说文解字》讲得更清楚：“鮆，饮而不食，刀鱼也。九江有之。”明代崇祯年成书的《正字通》曾记载，三国时期，魏武帝曹操吃了刀鱼之后，下令赐名为“望鱼”。这大约是第一个跟刀鱼扯上关系的名人。

而在此后千年间，有无数文人骚客都赞叹其美。资深吃货苏轼说：“还有江南风物否，桃花流水鮆鱼肥。”著名酒鬼陆游说：“鮆鱼莼菜随宜具，也是花前一醉来。”诗人刘宰评价更高：“肩耸乍惊雷，鳃红新出水，佐以姜杜椒，未熟香浮鼻。河豚愧有毒，江鲈渐寡味。”在他眼里，长江另外两鲜只配给刀鱼提鞋。

刀鱼味美，主要在于天时地利。每年清明前，自海中洄游入江的刀鱼，体内所含盐分逐渐淡化，上溯到江阴、靖江段时，盐分、脂肪比例恰到好处，肉质最为鲜美，而一过清明肉质就会大不如前。民谚云：“宁去累死宅，不弃鮆鱼额”，宁肯丢掉老祖宗的房子，也不愿意放弃刀鱼头，你说这味道得美成什么样？

越是好食材，烹饪方法越宜简单，刀鱼最适合清蒸。清代著名美食家袁枚的《随园食单》记载：“刀鱼用蜜酒酿、清酱放盘中，如鲥鱼法蒸之最佳”。讲到此处，袁老爷子还吐槽了南京人：“金陵人畏其多刺，竟油炙极枯，然后煎之。谚曰：‘驼背夹直，其人不活。’此之谓也。”看来这可是把袁爷气坏了。

不过另一位寓居金陵的剧作家李渔倒是颇为懂吃，在他看来，吃鲥鱼鲟鱼容易腻，唯独刀鱼“则愈甘，至果腹而不释手”。能从鱼肉中

吃出甘甜来，可见这鱼得多好。另外您瞅瞅，“至果腹”是什么概念，不就是把刀鱼当饭吃吗？要知道刀鱼一条不过几两重，他这一顿，真不知要吃掉多少。

由此不得不羡慕古人，今天中国人想吃条刀鱼，那可真不是件轻松的事情。最近刀鱼频频登上新闻，说因为中央改进作风，厉行节约，去年8000元一斤的刀鱼，如今已经跌到400元，刀鱼早就成了有钱人才能享用的名贵菜肴。就算是400元一斤，这“果腹”的成本也实在不低，真要如此，“不释手”的恐怕不是筷子而是钞票了。

更何况，这则新闻跟事实大有出入。刀鱼价格下降不假，但还不至于说从8000到400这么夸张，在上海老半斋吃一碗肉星儿都看不见的刀鱼汁面（就是刀鱼汤面），都要花上几十元钱。这需要厘清几个概念：首先，刀鱼分好几种，其中只有产自长江的江刀才是正宗，其他的湖刀、海刀都有滥竽充数之嫌，类似盘锦螃蟹到阳澄湖洗个澡就当大闸蟹。其次，不同重量的刀鱼，卖价差不少，刀鱼不大，一条一般也就2两，倘若单条能到3两以上，那么价格可就是天壤之别。所谓8000元一斤的刀鱼，是顶级中的顶级，至于今年400元的那种，不过是湖刀而已，根本就算不得刀鱼。

这也表明，刀鱼实在太稀少了。莫说是跟李渔所在的清代比，就是跟30年前都没法比。河流污染，过度捕捞，令刀鱼一年比一年少，人们在满足口腹之欲的同时，却也对物种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如刀江鲚白盈尺，不独河豚天下稀”，元代王逢对刀鱼的赞赏，在今天看来倒像是预言，长江三鲜中河豚和刀鱼，都已是卖出天价的稀罕物，至于鲥鱼，则是给多少钱也吃不到了。这的确是令人惋惜慨叹的事情。

日本的秋刀鱼，英语名Pacific saury，日语念作sanma，脊背青黑，腹部银光闪烁，通常三四十厘米，身姿精悍细长。生产季节在秋天，故名秋刀。夏末自鄂霍茨克海峡随千岛列岛寒流南下产卵，以动物性的浮游生物为食，因而脂肪含量丰富。小津安二郎有一个著名电影叫《秋刀鱼之味》，片中并没有秋刀鱼，只因拍摄过程中小津母亲去世，令他想起秋刀鱼的清苦味。

杨荣甲的考察与建言

作 者:丁东

中国领导人曾经把第三世界国家当成世界革命的希望所在，但其实对当时非洲的真实状况并不了解。直到1982年国务院总理要访问非洲，外交部才派了一个学术研究小组到非洲先期考察，给中央领导提供信息。他们用五个月的时间，驱车上万公里，足迹深入城市和乡村，既接触了官员，也接触了百姓，实实在在地接到黑非洲的地气。参与其中的杨荣甲以个人名义，写了一个内部报告《对（黑）非洲社会及革命等问题的看法》，将真实观点和盘托出，上报中央。

报告说，一百年前的非洲一类是“无国家社会”，仍处在传统的原始、半原始的部族社会阶段，一类是“有国家社会”，当时占据着黑非洲的大部分地区。他们的生产方式仍停留在原始、半原始的阶段。由于刀耕火种，生产力十分低下，一年几乎没有多少剩余产品。有些地区，至今还保留着母系世袭制。

19世纪后半叶，欧洲殖民者全面征服非洲，曾试图按照他们的需要改造非洲。他们用交通线将几个大城市与首都、海港城市相连，使之形成附属于宗主国的经济。非洲国家独立后，社会情况千差万别。例如扎伊尔、喀麦隆仍然保留着部族酋长制度。塞内加尔的传统君主制已被殖民者摧毁，目前仅剩下些残余，代之而起的是一套伊斯兰教派体制。刚果、几内亚、坦桑尼亚宣布废除了部族酋长制，但传统的部族酋长改头换面，仍有一定影响。农村以家族为单位的生产分配体制尚未真正解体。黑非洲国家历史悠久，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很短。现代政权机构控制着整个国家和城市，在广大农村，部族和传统势力仍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基础是刀耕火种的家族集体生产方式，主导却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经济。城乡差别极大，贫富悬殊甚巨，极少数人可能是亿万富翁，但广大群众，尤其是农村的居民，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仍过着半原始的生活。黑非洲国家基本上不存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人民民主革命形势。一些自称马列主义政党大都由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喜欢生搬苏联或中国文化革命的经验，口中讲的理论与本国的实际是脱节的。

非洲国家大多数群众是农民，要求改变现实的愿望并不强烈。他们未曾领略过私有制度的剥削与压迫，因为那里基本上不存在地主和封建领主。当时国内有人说，黑非洲国家可以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杨荣甲提出，这种看法不成立。黑非洲国家家族公

有的生产、分配方式仍占据统治地位。在生产力水平尚在半原始状态下，硬是改变生产关系，其结果必定与人们的愿望相反。

一些国家独立以后，政治上亲近苏联或中国，引进了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模式，经济上一团糟。刚果的“科学社会主义”搞到1979年几乎完全破产，几个月发不出工资。几内亚大搞“社会主义”，学习中国文革的经验，结果是其贫穷和首都景象之破败令人触目惊心。造成这种情况原因很多，但根本的原因要从非洲的传统社会中去找。这些国家的农村，家族公有的生产与分配方式仍占据着统治地位。搞社会主义的国营企、事业很难防止“大家吃、大家拿”，国营企业很快就变得无法管理下去。中国援助非洲国家的一些项目，人一走，不久就垮掉了。而非洲一些发展资本主义的国家，倒比搞社会主义的国家发展略快些。喀麦隆独立后经济之所以发展较快，其中重要的原因是真正注意了农业的发展，在城市注意了民族私人资本的发展。从喀麦隆的例子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在今天非洲的情况下，似应在农村采取有效措施扶持个体农户的发展，而不是搞什么合作化。在城市则应充分利用民族私人资本的积极面，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同时，对外则应在自力更生为主的基础上，力争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发展同各类国家的关系，包括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适当引进必要的外资和技术等，采取这样一种发展战略，似较为适合今天非洲的实际。当然，非洲国家情况十分复杂，要为其规定一个统一的发展模式显然是不合适的。

早在1982年，作为外交部普通工作人员的杨荣甲就敢于向中央提出这样“离经叛道”的见解，是需要勇气的。他这份报告以绝密文件的方式送上去以后，对中央领导人思考非洲问题产生了一定影响。胡耀邦总书记1985年接见非洲某国领导人时说，现在应当对他们说实话了，他们那里搞不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不能超越，还得主要搞资本主义，应当发展民族资本主义。

袁世凯亮剑国际

作 者:雪珥

1899年3月，40岁的中国少壮派将领、副部级（侍郎）练兵大臣袁世凯，在世界面前大大地露了一回脸。

各国外交人员和高级军官，应中国政府邀请，前往天津小站，观看了袁世凯所率新军的阅兵和演习，对袁盛赞有加。自此，英军高级将领贝思福爵士逢人就说：“我在中国遇到了一个人，那就是袁世凯。”著名的美国传教士、汉学家李提摩太，则在数月前，就写道：“袁世凯是中国最优秀的人，是一个注定要崛起的人。”

美国《洛杉矶时报》特约记者赫伯特，不仅引用了这两位名人的话，而且用整整一版，详细地介绍了袁世凯的这次阅兵和演习，并配发了袁世凯和他军队的照片，题为《中华帝国新军队》。

袁世凯的这次阅兵，在清晨举行。

8时30分，军机大臣荣禄等，在袁世凯的陪同下，登上了检阅台。5000名步兵已经组成了10个整齐的方阵，在他们的后方，炮兵和骑兵部队也列好了阵形。

方阵的前方，一名军官骑在骏马上，持剑肃立。他发出了阅兵开始的口令，在军乐声和口令声中，士兵们开始了各种队列的行进表演。他们动作一致，十分整齐，不断变换着队形，5000支最新式的来复枪，在他们手中舞动翻飞，枪刺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在一个小时之内，5000名中国士兵进行操演，整齐划一，宛如一人，报道认为，这足以向世界证明，“必须重新认识中国这个种族的潜力”。1小时的步兵队列操演之后，炮兵方阵隆隆驶过检阅台。每六门大炮组成一个排面，每门炮由六匹骏马拖曳，步调一致，从检阅台看去，这些炮车的轮辐都在一条直线上。骑兵方阵也伴随着整齐的马蹄声开过来，雪亮的马刀举成一片耀眼的小森林，威武雄壮。

当天下午则是行军演习。这次演习，被安排在离小站军营约3英里的旷野。演习部队分为两个阵营，一半扮演攻击方，一半扮演防守方，防守方由袁世凯亲自率领。演习几乎完全在实战状态下进行，枪炮声和呐喊声惊天动地。

对于这次阅兵和演习的意义，《洛杉矶时报》评价极高：

“中国首相荣禄，不久前在小站检阅了中华帝国军队——在中国的诸多事件中，这是一个极其强烈的信号，它标志着中华帝国对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足以击退蜂拥而至的欧洲列强军队的需求。正在觉醒。荣禄阅兵，是北京政府对这支新式军队的第一次关注。

这次阅兵，证明了中国人完全有能力完成此类属于现代文明的事物，将改变欧洲列强一贯的偏见。中国军队十分腐败，将领们普遍存在吃空饷的现象，但是，袁世凯却展现了自己“高贵的”品格——尽管他身居高位，经手巨款，却依然是个穷人。袁世凯的这支军队，素质之高得到了前去参观的西方人的交口称赞。这支军队，共有7000名步兵、500名骑兵、1000名炮兵、500名工兵。步兵装备了最先进的来复枪，骑兵则装备了轻步枪、左轮手枪及马刀，而炮兵有着40门野战炮、12门山炮和18门速射炮，具有强大的战斗力。

这支军队，还另外配备了3000名随军役夫，每10名士兵配备1个伙夫、2个杂役。另有一些外籍军事顾问，如葡萄牙人、比利时人、德国人、挪威人等，提供一些技术支持。袁世凯甚至认为，靠军校培养太慢，干脆自己在军中建立了学习班，对优秀的军官和士兵进行特别培训。袁世凯还建立了一支军乐队，训练有素，技艺精良。

这支军队，甚至还配备了一个设施齐备的红十字战地医院，每天能接待50-100多名病人。医院的4名本土军医，都能说流利的英语，都是基督徒，其中的领头人受训于英国医生，其余3名也都毕业于中华帝国设立在天津的医学院。更为难得的是，袁世凯的军队表现了极好的纪律，无论在军营还是外出，守法、安宁、自尊，极少惹麻烦，与充斥了流氓和无赖的旧式军队完全不同。袁世凯在军中严禁酗酒、赌博和吸食鸦片，违反者，前两次鞭笞杖责，第三次则是斩首。这种森严的军纪，甚至值得西方各国认真学习。

荣禄观看了袁世凯军队的队列和演习后，上奏朝廷，对袁世凯“西法练兵之成就，深致赞美之意”，认为其麾下的新建陆军，已成“北洋劲旅”。袁世凯以“勤明果毅，办事认真”，交部从优议叙，该军得力人员准袁世凯择优酌保。袁世凯在谢恩折中说：“披沥血诚，殚竭顶踵，勤修武备，勉策戎行。”

一线城市降房价秘笈

作 者:李开周

鄙人姓李，名叫开周，这个破名字跟河南的两个地名有关。哪两个地名？开封和周口。

我生在开封，往上扒四辈儿，祖籍却在周口。从居住地上说，我是开封人；从祖籍上讲，我是周口人。鉴于我既是开封人，又是周口人，所以爹娘就给我取名叫开周。

开封和周口离得很近，这两个地市的交界处有一个县，叫太康县。太康县是个农业县，大约有上百万农民，将近两百万亩耕地。十五年前，我去太康走亲戚，发现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那么大一个农业县，大片大片的良田居然撂荒，平整肥沃的土地上疯长着一人多高的野草，只有兔子和野鸡在里面出没，简直就跟古代帝王的围猎场一样。

太康的农民为什么不种庄稼而任凭良田长草呢？因为种庄稼太不划算了。那时候农业税还没有取消，农民负担非常重，种田除了要交公粮，还得缴纳名目繁多的提留款和统筹款，平均一亩地要交两三百元钱的税费。当时小麦亩产800斤，每斤才卖3角钱，辛辛苦苦种一亩粮食，收入还不够上交的。即使加上秋季的棉花，也勉强只够弥补买化肥和农药的投资，要是风不调雨不顺，还得赔本儿。所以很多农民不再种田，青壮劳力都进城打工了，只剩老弱病残留在家里应付那些上门催收公粮和税款的干部。

自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土地就公有了，农民不能卖地了，如果能卖，我相信那时候大多数太康农民都会把田地卖掉，因为田地已经从保障变成了累赘。同时我还相信，卖地的时候售价肯定很低，因为土地的价格跟它的产出是成正比的，既然种田无利可图，买地的一方凭什么要花大价钱？

早在民国时代，农民的负担就跟十五年前的太康一样沉重，农民种田就跟十五年前的太康一样无利可图，因而民国时代的农村土地也就变得非常便宜。有数据为证：从民国元年到民国二十三年，江南水田平均每亩成交价只有50块大洋，而甘肃、宁夏等偏远地区的旱地平均每亩成交价只有8块大洋。这些数据可以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编撰的《中国土地问题之统计分析》一书中读到。

要知道，民国前期大学教授的月薪在100块大洋到350块大洋之间，随便拿出一个月的工资，就能去农村买上几亩甚至几十亩地。甭说大学教授，就连民国时期进城务工人员当中薪水最低的老妈子，不算三节的红包、主母的小费和买东西时的回扣，一个月也能挣到两三块大洋（当年鲁迅曾为其母亲雇了三个老妈子，每人每月两块大洋），攒上一年的钱，也能回老家买几亩地。

我手头还有四十多张民国地契，其中一张地契是民国二十四年某刘姓地主在开封杞县高阳镇上买地的凭证，“四亩九分七厘二毫”的地块，“议定卖价一百八十七元”，一亩地不到38块大洋。还有一张地契是民国十年北京大兴康家营村某蔡姓地主卖地的凭证，“祖遗红契地四亩三分”，“议定每亩银洋一元六角”，一亩地只卖一元六角大洋，简直等于白扔。

但是民国大城市的地价和房价却高得吓人。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刊发过一则特讯，说上海、广州等地“价格高涨，突飞猛进”，尤其是广州，“较于二十年前，其增长固已不止二十倍”，最贵的地块已经卖到“每井七万元”。当时60井为一亩，每井7万块大洋，一亩地能卖420万元大洋，比最便宜的农村地块贵了几百万倍！

为什么大城市的土地会如此之贵？因为农村破产，土匪横行，稍微有些能力的人都涌进了大城市，居住需求和商业需求高得吓人，地价自然飞涨上去。同样道理，现在广大农村和小城镇的居住成本并不算高，而京广沪等一线城市的房价却居高不下，也是因为稍微好点儿的大学、机关、企业、医院都集中到了这些城市。换句话说，大城市房价太高，一定程度上是区域发展太不均衡造成的后果。

想改变区域发展过于不均衡的现状，目前只有两个办法：一是让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迎头赶上，二是把京广沪等一线城市的生活环境弄得特别糟糕，让它们跟小城市甚至偏远农村保持在一个水准。前一个办法工程量太大，后一个办法倒挺容易——只要以后北京的沙尘暴刮得再猛一些，上海黄浦江上漂浮的死猪能更多一些，天下就太平了。

何方口述：我与张闻天的最后一面

作 者:何方

1959年夏，8月20日，张闻天从庐山回到北京，当天晚上我便去看了他，还陪他们夫妇在院子里散了一阵步。张闻天本人都没想到事情会有那么严重，照样嘻嘻哈哈的。他说，以后不让做这种行政工作也就算了，研究国际问题来安度晚年也好，甚至说以后你们要戒烟，我要“戒舞”。

谈话间，通讯员送来了毛主席的信，上面写道：“我以极大热情欢迎洛甫（张闻天）同志看这封信。”他看后显得很高兴，并顺手交给我看。我告辞时还说过几天再去看他。哪知这竟是我与景山后街甲1号（张闻天的住处）的最后告别，也是和张闻天的最后一次谈话。

第二天，就开始通知开会批判了，紧接着外事会议一开，不但禁止我去张闻天家，而且连留在那里的行李和文具都不能自己去取，只能由外交部派车、找人帮我打点运回。过了几天，召开外事会议，会议开始后，结合文件的传达，大家开始揭发批判，说不限时间，一定要把这次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接着张闻天检讨，会议开始了批判。这样大轰大鸣了一个礼拜左右，每天去中南海开的外事会议就慢慢降温了，会议内容也变得很单调，集中攻击张闻天的“里通外国”问题。最后除主持人和会议记录外，就只剩下张闻天刘英夫妇、我们几个有干系的人和专门安排的一小批支撑门面、找岔子、施压力的积极分子了。别看人数减少了一大半，张闻天的压力反而更大，因为内容转到他最感痛苦的“里通外国”问题上去了。据其夫人刘英后来说，她以前没见过闻天落泪，这时却看他不住地流眼泪。拖拖拉拉开了两三个礼拜的会，由于张闻天要住院动手术，才只好停开了。

庐山会议精神和动员反右倾的报告相当温和，还特别讲到对张闻天身边工作人员的态度问题，说不能因为跟张闻天工作就受株连，要不然以后还有谁敢给我们当秘书？对我来说，听了这几句话，等于吃了一颗定心丸，以为这次运动会比较文明。可是事实很快就粉碎了我的幻想，不但会上会下压我揭发张闻天，要我对跟毛主席还是跟张闻天做出抉择，而且生活和行动也受到一定管制，例如晚上服用安眠药得由办公厅主任韩念龙经人每次给一片等。

说张闻天反党反毛主席，我的脑子还是转不过弯来，我在与张闻

天10 多年的相处中就是找不出“反”的证据。经过几天的思想斗争，我下决心同张闻天划清界限，站出来揭发批判张闻天。决心既下，接下来就是揭发的内容尺度了。大家对我的期望值最高，认为在整个外交部，除刘英外，只有我掌握的“材料”最多。我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最后自己内心定了这么几条：一是可以随大流无限上纲，但决不捏造事实；二是尽量多讲张闻天反对三面红旗的言论，不讲或少讲外交方面的问题；三是自以为关系重大、人们又无法得知的事情，就坚决不说。我的揭发内容，现在想来并没什么，反倒证明张闻天的正确。例如大跃进是大轰大鸣，比例失调严重、许多东西都买不到；大炼钢铁得不偿失、炼出来的不是钢是烧结铁；放卫星是胡闹，讨好领导、造假成风；区大姐（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区梦觉）说广东已经出现饿死人的事，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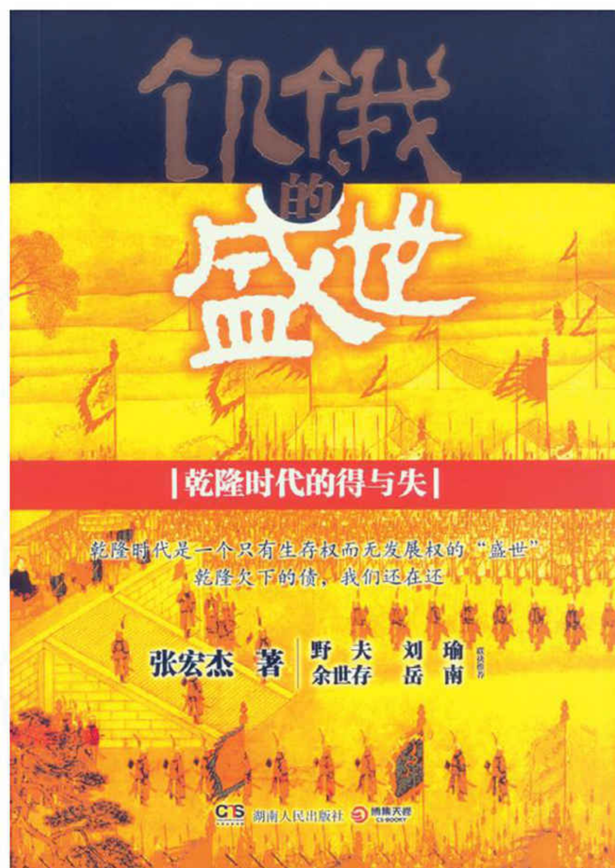
这些话现在看来无所谓，但在当时讲出来是很严重的。我的错误不但在于揭发了这些私下谈话，主要的还是把这些上纲为反对三面红旗，反对群众运动，和毛主席对着干。特别是我提到饿死人的问题，更引起人们的声讨，说是造谣。因为直到这时，外交部还没有人意识到中国已进入三年困难时期，而认为是形势一片大好。

我的揭发影响却是一般人不可比的：第一，没有人能够揭发出这么多和这么具体的问题；第二，我是被视为张闻天“亲信”的。所以当我的发言一结束，会议主持者就说：“洛甫同志，你已经众叛亲离了！”看得出来，张闻天对我的发言是有几分愤怒的。“文革”以后，刘英告诉邓力群：闻天对何方的发言感到非常难过，心里凉了一半。其实我在揭发的时候心里也很难过，思想斗争很激烈，后来也一直为这件事后悔，直到现在也没有解脱。由于此后我再也没能见到他，所以就永远失去了当面检讨的机会。

摘自《失落的巅峰：六位中共前主要负责人亲属口述历史》

少提盛世才是高

作 者:张宏杰



饥饿的盛世

——乾隆时代的得与失

张宏杰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2年10月

“盛

世”这个词是中国独有的。汉文化圈以外的史书中，找不出这两个字。所谓盛世，就是内无严重的政治腐败，外无迫在眉睫的敌国外患，社会治安良好，老百姓普遍能吃饱饭的时代。虽然历代中国人梦想盛世，但盛世的出现就是这样屈指可数，而且持续的时间也不长。有人统计过，数千年中国历史，盛世和治世累计加在一起，不过四百年左右，剩下的都是充斥着灾荒、动乱和腐败的平世、衰世、乱世。并且中国的盛世之前往往有一个漫长的极衰之世，这几乎是盛世出现的必要条件。

盛世难以出现，更难以保持。盛世的前奏是衰世，结局也是衰世。中国历史上的盛世都未能避免“盛极而衰”的结局。而且，盛世的倾颓，往往在极短时间内定局。汉武帝前期是汉代统治达到的最高峰。然而武帝在极盛之后，鞭扑天下过甚，很快导致了衰败。晚年更是天下大乱。唐玄宗开元、天宝之际，号称“全盛”，繁荣景象史所未见，但“安史之乱”的狂飙瞬间吹散了旷代繁华。乾隆盛世的政治清明与全面腐败更是只隔了瞬间。乾隆死前三年就爆发了白莲教大起义，清朝从此一蹶不振。

从盛到衰，如此迅速，其原因当然是这些盛世的出现依赖的是人治。盛世君主往往是英明与昏聩集于一身，理智与膨胀合为一体。他们既是辉煌成绩的创造者，也是王朝衰落的罪魁祸首。

西方历史上没有盛世这个词，这并不是说其他国家历史上没有过辉煌的时代，在西方历史上，它们往往被称为“黄金时代”，比如大英帝国的“伊丽莎白时期”。伊丽莎白统治英国四十五年。她登基时英国还是个贫穷衰弱的二流小国，而当她逝世时，英国已经成为世界头号海军大国。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她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王之一。与中国的盛世不同的是，“黄金时代”之后，英国并没有衰败。“黄金时代”成了一个国家长久上升的起点，在那之后，英国国势继续蒸蒸日上，在随后的几百年间一直领先于世界。

通过对历史的回顾，我们会很容易发现，重提“盛世”二字，许多时候已经不合时宜。一个蒸蒸日上、富于自信的政权并不需要通过自我宣传来为自己壮胆。相反，在一些有问题的时代，人们却常常会高唱盛世的调子。“盛世”不过是传统王朝统治合法性的有力证明。

实际上，汉代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中，从来没有帝王和大臣自夸为盛世。相反，那些底气不足的统治者却常把“盛世”挂在嘴边。宋高宗因动乱而幸得大宝，偷安一隅，大敌在侧，却无心进取。这种治绩，无论如何与盛世不沾边。然而宋高宗却常常自诩为“中兴”和“盛世”。在皇帝的鼓励下，大臣们称颂盛世之声铺天盖地，应接不暇。

他们说皇帝 “大功巍巍，超冠古昔”，“皇帝躬行，过于尧禹”。他们夸秦桧“心潜于圣，有孟轲之才；道致其君，负伊尹觉民之任”，“大节孤忠，奇谋远识”……这些当初精心撰写的谀词，今天听起来只是讽刺。

“盛世”是循环论的产物，而今天的中国历史已经摆脱循环。与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国家多元交错发展不同，中国历史是一个封闭的自我线性循环体，其线性发展的规律是一治一乱，一盛一衰。就是说，凡事发展到顶点后，无不向反方面运动。在传统政治中，一个社会如果达到了“盛世”阶段，那么就意味着眼前无路，只有尽量推迟那不可避免的衰败来临了。

全球化使中国人有机会吸收和借鉴其他人类社会创造的政治文明成果。虽然中国自我运转的规律仍然在深层次地起作用，但是无论是谁，都已经不希望中国再次回到盛极而衰的旧有轨道。正如梁启超说：古之天下所以一治一乱如循环者，何也？恃英雄也。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必到人民不倚赖英雄之境界，然后为真文明，然后以之立国而国可立，以之平天下而天下可平。

题酷

他9岁时开始写作，17岁时在“百花诗赛”得第一名，20岁时出版诗集，并得到国王赏赐的年金。他的一生几乎跨越整个19世纪，他的文学生涯长达60年，创作力经久不衰。作为浪漫主义的重要作家，他的小说篇篇动人，对读者具有永久的魅力。贯穿其一生活动和创作的主导思想是人道主义——反对暴力、以爱制“恶”。他死后举国致哀，被安葬在伟人墓园

很多人平常爱吃米饭，稻米在我国有着源远流长的种植史。你知道下列哪个地方的先民最早可以品尝香喷喷的米饭吗？（ ）

A.北京周口店 B.陕西半坡村

C.山东大汶口 D.浙江河姆渡

他坚持直笔记事，甚至敢于批评汉武帝“穷兵黩武，迷信神仙”，因此，他写的史书历来被视为“信史”。他是（ ）

A.司马迁 B.班固

C.刘知几 D.司马光

保罗·肯尼迪说统一的德国“是一个将西方民主国家现代工业力量，同东方帝国专制独裁的决策特点结合在—起的大国……是一个爆炸性的混合体”。他所说的德国是（ ）

A.极端沙文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国家

B.有封建军事色彩的资本主义国家

C.封建君主统治下资本主义工业国

D.工业高度发达的封建军事大帝国

1260年，教皇亚历山大四世在他的训令中，呼吁所有的基督教国家的君主们在共同的危险面前团结起来：“……愤怒的上帝将惩罚这些野蛮的鞑靼人……”“共同的危险”主要来自（ ）

A.匈奴人 B.突厥人

C.蒙古人 D.日耳曼人（蛮族）

某同学在网上查资料时发现如下一段民谣："还我江山还我权，刀山火海爷敢钻，哪怕皇上服了外，不杀洋人誓不完"，此民谣应出自（ ）

A.太平天国运动期间 B.义和团运动期间

C.辛亥革命期间 D.北伐战争期间

国家主席习近平3月23日在莫斯科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建馆启动仪式。中共六大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境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在莫斯科召开的原因，以下选项不准确的是（ ）

A.国内白色恐怖的局势

B.共产国际的帮助

C.联俄联共的三大政策

D.苏联、意大利等国共产党的支持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法国的克里孟梭疾呼："我第一是复仇，第二是复仇，第三仍是复仇"。他的所谓"仇恨"起因于（ ）

A.普法战争法国失败

B.意大利与法国争夺北非突尼斯

C.普鲁士参加反法同盟破坏法国革命

D.法国想恢复欧洲大陆霸主地位

下列关于非洲民族独立运动胜利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结束了非洲人民遭受殖民奴役的历史，改变了非洲的面貌

B.标志着世界殖民体系的最终瓦解

C.使联合国不再是一两个超级大国为所欲为的场所

D.使非洲国家走上经济迅速恢复发展道路

汉朝礼制规定，唯有皇帝才能用金缕玉衣。下图是1973年在河北省定县八角廊村40号汉墓出土的中山怀王刘修的殓服——金缕玉衣。据此推断，此人所处的历史时期是（ ）

A.秦朝末年 B.西汉初年

C.汉武帝时期 D.西汉末年

有“冲冠一怒为红颜”的真情实感；又有爱江山甚于爱美人的残暴与贪婪；他反复无常，言而无信，仕明叛明，联闯破闯，降清反清……人生之善与恶，无一不在他身上迸发。此人是（ ）

A.郑成功 B.噶尔丹

C.吴三桂 D.尚之信

毛泽东曾称赞傅作义是“民族的功臣”，“为和平解决各地战事问题和减轻人民的战争痛苦树立了榜样”。上述评价和哪次战役有关（ ）

A.辽沈战役 B.淮海战役

C.平津战役 D.渡江战役

直至今天，在泉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依然能够看到中国现存最古老、最纯粹的阿拉伯建筑风格的清真寺，公元7世纪来到这里传教的两位伊斯兰传教士的坟墓，珍藏于博物馆的数百件14世纪中叶以前中东穆斯林的墓葬石刻。这些史实不能说明（ ）

A.是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见证

B.中国很早就奉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C.是阿拉伯国家对我国文化侵略的见证

D.伊斯兰教徒在传播宗教的同时也传播了文化

“文武将吏，擅自署置，贡赋不入于朝廷。虽称藩臣，实非王臣也。”该材料引自《旧唐书》，所反映的实质问题是（ ）

A.君权与相权的矛盾

B.中央与地方的矛盾

C.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的矛盾

D.文臣与武将的矛盾

“琵琶琴瑟八大王王王在上，魑魅魍魉四小鬼鬼鬼犯边。”这副对联反映的是中国什么时期的历史状况（ ）

A.19世纪早期 B.19世纪中期

C.19世纪末 D.20世纪早期

马拉松赛跑是为了纪念斐利皮德斯，他为了尽快传递战争胜利的喜讯，以惊人的毅力，一口气跑完了40余公里，他抵达雅典城中央广场时，只喊了声“庆祝吧，雅典得救了！”就倒在地上牺牲了。在这场战争中，雅典的对手是谁？

现行公历2月只有28天，闰月29天，这个规定与古罗马的哪两个皇帝有关？

题酷答案

TA是：雨果

选择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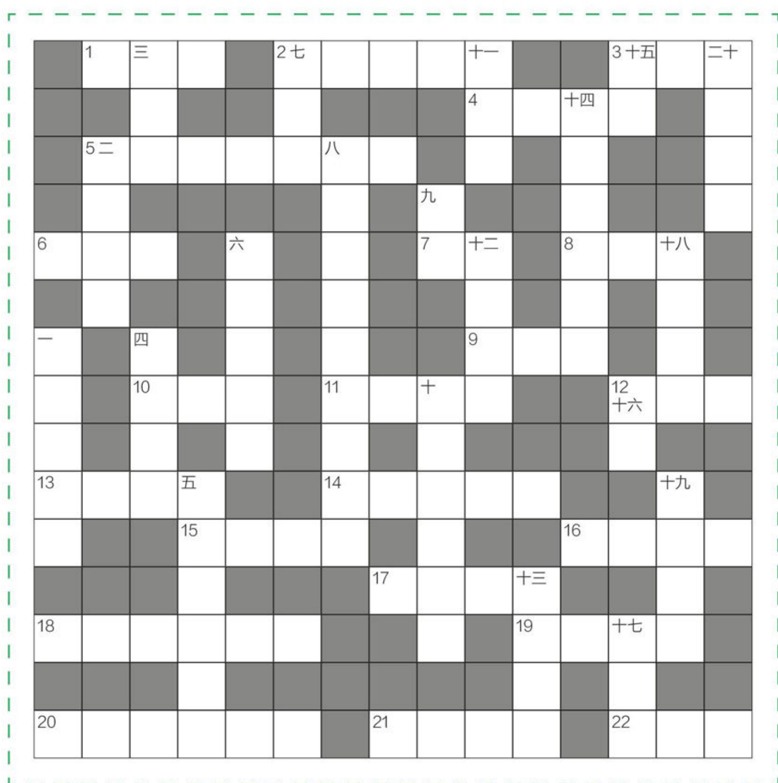
1.（D）2.（A）3.（D）4.（C）5.（B）

6.（C）7.（A）8.（D）9.（B）10.（C）

11.（C）12.（C）13.（B）14.（C）

答案： 1.波斯 2.凯撒和奥古斯都

填字



/本期答案详见57页/

横向

1、本意为“没有的地方”或者“好地方”

2、张学良兵谏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历史事件

3、研究人类社会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相应的经济关系及其运行、发展的规律的学科

4、哲学术语。哲学史上指哲学中探究宇宙根本原理的部分

5、纳粹德国建立的劳动营和灭绝营之一

6、宗教术语。意思是顺服伊斯兰教的神安拉的人

7、三国时魏蜀两国争夺的战略要地，张飞曾在此镇守

8、普希金创作于1824年的一首诗歌

9、唐朝官署名。用于集贤学士之所

10、淡水鱼，俗称“团头鲂”。因毛泽东诗词而闻名于世

11、国际法。指一国国民在外国境内不受所在国管辖，如同处于所在国领土以外一样

12、淮军宿将，官至直隶提督。因在甲午战争中屡屡失败而下狱

13、《官场现形记》作者李宝嘉的别号

14、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现代出版机构

15、中华民国第二届国会。由皖系大佬段祺瑞、徐树铮等控制

16、金庸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的人物，是完颜洪烈手下五大高手之一

17、“文革”期间，军队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等一系列活动的总称

18、世界第一大教堂

19、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成立的，由英法控制的国际组织

20、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之一，拥有158个成员国，成员国贸易总额达到全球的97%，有“经济联合国”之称

21、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领导的在大别山地区举行的首次武装斗争

22、指适用主权国家之间以及其他具有国际人格的实体之间的法律规则的总体

纵向

一、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沈归愚称为“古今第一首

长诗”

二、原意为“神圣的”、“高贵的”，带有宗教与神学意味，一般用来指称第一位罗马帝国的皇帝屋大维

三、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一种形式，为了获取高额利润而从生产到销售全面合作组成的垄断联合

四、唐太宗根据《兰亭序》临拓而成的石刻，因北宋时置于定州州治而得名

五、唐代诗人张固的名句，比喻居住在大城市，生活不容易

六、成语。比喻非常镇静，沉得住气，稳居于自己的位置上

七、淮海战役中，解放军全歼黄维兵团的地方

八、新中国成立前夕，由中共召集、全国民主力量响应、共商国是的一次大会，至今仍然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

九、五代十国时期中控制两广地区的政权

十、法国殖民地。包括今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三国，兼领从大清帝国手上获得的广州湾租界，首府位于河内

十一、卡夫卡短篇代表作，代表了卡夫卡在艺术上的最高成就，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作品之一

十二、政治术语。指国家权力集中由中央政府统一行使的制度，与地方分权的对称

十三、指崇尚武力和军事扩张，将穷兵黩武和侵略扩张作为立国之本

十四、岭南大学前身，由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哈巴安德医生创办于广州

十五、在汉代独尊儒术之后，特指研究儒家经典

十六、近代著名武术家，李小龙的师傅，多次被搬上大银幕

十七、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立的，由美英控制的国际组织

十八、魏源受林则徐嘱托而编著的一部世界地理历史知识的综合性图书

十九、北宋末年宋金联合攻辽的军事同盟条约

二十、成语。出自《庄子》，指有学问的人，一般形容读书多，学识丰富

书情

苏慧廉的温州二十五年

《寻找·苏慧廉》

沈迦 著

新星出版社 2013年3月

我的家乡温州，有很活跃的信教传统，每个村庄乡镇几乎都有教堂。我从小就跟着大人去天主教堂，对教会传统有很深的感受，并且，我喜欢在教堂时的童年。

温州之所以有那么浓的信教传统，相信和英国传教士苏慧廉有很直接的关系。我知道苏慧廉，是从温州好友方韶毅的《民国文化隐者录》中一篇“传教士苏慧廉的人生索引”开始的。

1883年，清光绪九年，年仅二十二岁的英国青年苏慧廉孤身一人来到温州传教，两年后，他的妻子苏路熙也来到温州，俩人在温州扎下根，生儿育女，一待二十五年。

他对温州的文化、教育、医学等都做了很大贡献，创办了温州二中、温州二医、城西教堂、温州艺文学堂等。

《寻找·苏慧廉》一书是温州学人沈迦通过各种史料，以及沿着苏慧廉的足迹，走访他曾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从浙江温州到山西太原，上海到北京，香港到澳门，牛津到剑桥。

《古拉格：一部历史》

（美）安妮·阿普尔鲍姆 著

新星出版社 2013年3月

我们知道古拉格，大多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来，但虚构小说背后真实的古拉格是什么样的？这本非虚构作品对关押了成千上万政治犯的古拉格集中营进行了全纪实描写，再现了劳改营生活的本质。

《共同的底线》

秦晖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年3月

这是秦晖早前《问题与主义》一书的续作，书中从“主义”、“文化”与“部门”的分析中，结合特定的问题来论证“坚守”底线的意义，其中涉及最多的是“共识”与“共同底线”等话题。书中，秦晖对“共同底线”的理解是：“一种常识”，不是第三条道路，更不是折中。

《启蒙与出版》

（美）谢尔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年12月

该书长长的副题叫“苏格兰作家和18世纪英国、爱尔兰、美国的出版商”。话说十八世纪的苏格兰，出版异常繁荣。在那里，阅读成了人们第二天性，“整个英国都被出版物淹没了”。西方文化启蒙运动真正的动机是出版繁荣。

《巴黎烧了吗？》

（美）拉莱·科林斯

（法）多米尼克·拉皮埃尔 著

译林出版社 2013年3月

“巴黎烧了吗？”是1944年8月25日，巴黎解放那天，希特勒在东普鲁士“狼穴”的地堡里，向他的总参谋长约德尔上将发出的责问。作者是两位战地记者，他们翻阅了美法德三方面的军事档案，采访了艾森豪威尔等八百多人，生动描绘了解放巴黎的全过程。

《洪业传》

陈毓贤 著

商务印书馆 2013年1月

历史学家洪业被学界认为贡献最大的是他编纂的64种中国古代文献的“引得”，如《春秋经传引得》、《杜诗引得》等。晚年寓居美国，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陈毓贤是洪业晚年好友，他根据洪业

晚年的各种谈话，写成这部翔实的传记。

《民国的开端：宋教仁评传》

张晓波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3月

今年是宋教仁遇刺百年，很多媒体以此为契机探讨共和及民国议会政党制等问题。宋案是共和走向的一个拐点。本书打破了以往传记类图书的体例，在记述宋教仁跌宕起伏一生的同时，着重分析了民国初期的国家形势，各种势力的争斗，探讨了民国政局背后深层次的历史原因。

《行动改变生存》

寇延丁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年4月

虽然很多人对现世社会有诸多不满与无奈，但多数人选择忍受和沉默，真正能行动的人没有几个。本书记录了25名真正的“行者”，他们的故事很平凡很真实，故事里的人都积极行动，他们坚信，每个人都可以推动改变。

共和的危机

汉娜·阿伦特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4月

这是阿伦特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收录三篇论文“政治中的谎言”、“公民不服从”、“论暴力”和一篇访谈录。书中谈了越南战争、学生暴动、黑人民权运动以及20世纪70年代前期以美国为首的世界性动荡，体现了阿伦特的政治卓识。对政治学界、思想界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书淫艳异录》

叶灵凤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3年1月

叶灵凤是爱书人公认的书话大家，自称“书淫”。这本书是他在上海《辛报》和香港《大众周报》所开的专栏，内容主要是对世界性风俗和性文学相关知识的介绍。在这个专栏里，叶灵凤以性学为中心，旁及中外文学、艺术、史学等领域。

《深夜食堂》（共4册）

（日）安倍夜郎 著 陈颖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3年1月

深夜和吃总有一种让人惦记的联想，微博上有人热衷于“深夜发吃”，各种美食让人馋得受不了。日本漫画《深夜食堂》刮了又一股深夜与吃的热潮。对于每个都市人而言，如果在深夜，有一顿满足的饭食，真是可以温暖疲惫的心。书中的各种深夜食单，让人欲罢不能，欲吃不着，着急啊！

《养只小龙很简单》

（德）贝恩德·科尔赫普 文

（德）詹姆斯·哈斯穆斯 图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3年1月

这是一个乐观的龙爸讲述自己养育小龙的美好经历，真是感受到那种美好和简单。小茶包的到来让我面临了人生很大的转变。书中薄薄几页的小龙人生历程，在自己身上，却化成每日的忙碌与繁杂。

《李看看的自习课之梦》

常怡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3年1月

李看看是个爱做梦的五年级小学生，成绩一般，长相一般，话也不多，特爱犯困。这样的女生在学校往往不会引起同学们注意，但也正因为这样，她可以更好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天马行空地胡思乱想。这本书是李看看一次次在自习课上呼呼大睡后，一个个奇异多彩的梦。

学问

民元“北京兵变”并非袁世凯策划

期刊|《史学集刊》2013年第1期 文章|论袁世凯策划民元“北京兵变”说之不能成立

作者|尚小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在辛亥革命史的叙述中，关于民元“北京兵变”，一直流行的说法是：在得知清帝下诏退位的消息后，孙中山旋即遵守诺言，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紧接着，参议院接受孙中山的举荐，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并请其尽快南下，宣誓就职。袁假借种种理由，不愿南下。于是暗中唆使亲信曹锟于2 月29 日晚制造兵变，在京城内外焚烧抢掠，以此来证明北方局势不稳，自己不能南下就职，迫使南京方面同意其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从而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百年来，此种观点几成众口一词之势。虽然也有少数人对此种说法表示怀疑，或持保留态度，但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特别注意。其实，此种说法并不成立。

蔡、袁会谈的中心，是袁世凯南下就职问题，而非永久首都及临时政府地点问题。由于当时全国舆论几乎一边倒地主张定都北京，对袁极为有利，南方回避了讨论永久首都问题，但又透露出并不绝对排斥以北京为永久首都的态度。而在临时政府地点问题上，虽然临时参议院已经决定设在南京，但为了争取袁世凯南下就职，蔡元培等又表示临时政府地点也可设在北京，袁只要南下完成权力交接仪式即可北返，而不必常驻南京办公。因此，袁为争都而策划兵变已经没有紧迫性和必要性。其实，作为新当选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当时考虑的中心问题是尽快实现南北统一，发动一场兵变只能增加双方猜疑，阻碍统一，因此是绝对不可取的。

袁世凯对南下就职的态度，并非简单的拒绝，而是有一个变化过程。开始的时候，他一方面表示极愿南行，另一方面因为北方人心未定，加之他对南方的想法不甚了解，故又表示不能即刻南下。随着双方函电往返以及南方派人北上接洽，袁对南方的妥协态度有了清楚的了解，加之北方形势发生很大变化，特别是东三省承认共和解除了袁南下的后顾之忧，袁又急于实现统一，于是着手考虑南下路线，并商讨留守人员。

袁世凯决定南下宣誓就职，既是南方让步的结果，又是时局变化的结果，也是袁急于实现南北统一的需要，是从全局出发而做出的决定。然而，长期以来，研究者对于此点认识不足，未能站在南北统一的高度来解释袁的作为。须知，在南方已经做出重大让步的情况下，袁短暂南下就职，不但不会影响其在北方的统治，反而如时人所观察到的那样，“他的影响和权力将会骤增”。但遗憾的是，袁周围的人并不能像袁那样站在南北统一的全局和高度来看问题，他们担心袁南下会损害自身前途和既得利益，故而极力反对，导致袁在确定留守人员时遇到了困难。袁的长子袁克定并且和袁的一些心腹幕僚以及曹锟等亲信将领暗中策划了兵变，以恐吓欢迎专使，阻止袁世凯南下，袁南下之事因此戛然而止。

百年来几乎人人都将袁世凯视为兵变主谋，但被研究者广泛征引的刘成禺《民元北京兵变内幕》，其实是一条假材料。兵变使袁世凯成为受益者，但也给袁以沉重打击。由于发动兵变的是袁的亲信部队，袁世凯的威望在国人心目中大打折扣，兵变次日袁见到其次子袁克文后，即叹曰：“予练兵三十年，威信一旦丧矣。”不仅如此，兵变还使一直对袁稳定局势的能力深抱信心的外交使团大为失望。为了稳定局势，袁试图向列强提出增兵保护北京，结果遭到舆论尖锐批评。更为严重的是，原本与英法美德四国银行团达成的借款协议，也因兵变而中止，使得新政府的建立和运作遇到极大困难，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一个弱势政府。

一战期间东线俄国士兵和德奥士兵的联欢现象

期刊|《世界历史》2012年第6期 文章|《一战期间东线俄国士兵和德奥士兵联欢现象探析》

作者|周国长（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赵士国（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东线和西线曾出现了各交战国士兵之间联欢的现象，联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交战国士兵的一种反战形式，它是在敌对双方士兵拒绝执行军事行动命令的基础之上出现在中立地带的友好行为。联欢在一战的东线战场有愈演愈烈之势，究其缘由如下：

与基督教传统紧密相关。欧洲各国参战的士兵，都归属于共同的宗教信仰——信奉基督教。借助于基督教的共同教义与节日庆典，特别是复活节，象征希望与永生，双方的士兵——教徒们放下对敌人的仇恨，暂且舍弃国家施压于个人的作战任务，求得彼此的宽恕与新

生，得以恢复健康的人性。长时间的与邻居——敌人作战这一现实，是与俄国东正教士兵的道德观念不符合的。“要真诚地善待邻居，每个人都要互助”，这才是村社和世界的和谐之道。正是在这一观念的影响下，联欢被看作宽恕与和解，发自内心忏悔的表达方式之一。

其更深层次原因在于一战对交战双方来说都是非正义的。长达数年的战争给交战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这是前线士兵们联欢的基础。战争的第一阶段俄国损失了 300 多万官兵，这种高比例的人员伤亡给俄国士兵带来沉重打击。这种打击不仅是肉体的折磨，更是一种颠覆性的心理毁灭。“不人道的战争”和“难以忍受的战争”这一体验日夜伴随着俄国军队。“让自己活也让他人活成为共同的信条”，双方士兵逐渐达成默契，共同举行联欢，获得短暂的休战与和平。

联欢这种反战行为的扩散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即使是布尔什维克也未曾估计到。联欢一开始是诸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是，1917 年二月革命之后，东线的联欢“政治化”了：对德国而言，它被看作瓦解俄国军队、取得战争胜利的手段；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则将其与罢工、示威游行一起视作发动革命的手段，其目的首先是摆脱战争，将政权转归到工兵代表苏维埃手中，然后再是被压迫的工农大众推翻本国的统治阶级，走向世界革命。

《清明上河图》的创作应不晚于宋神宗时期

期刊|《史林》2012年第6期 文章|《清明上河图＞创作时间新论》

作者|张显运（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

《清明上河图》的创作时间，目前学术界有三种观点：宋神宗熙宁三年前后； 宋徽宗宣和年间，不早于宣和二年；宋高宗绍兴年间。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创作于宋徽宗宣和年间（ 1119—1125 年） ，不早于宣和二年（ 1120 年） ，因为本年成书的《宣和画谱》对《清明上河图》没有记载。作者依据图中所画各种牲畜的数量，结合北宋京师开封畜牧业及各时期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状况，认为《清明上河图》的创作应该不晚于宋神宗统治时期（ 1068—1085 年）。

《清明上河图》中共有牲畜92 头，其中驴49 头，马21 匹，牛14 头，骆驼3 头，猪5 头。驴的数量占绝对优势，可见其时在京师开封用于交通运输的主要牲畜是驴。图中马匹的数量之所以远少于驴，是因为北部、西北这些传统的适合养马的区域均不在宋的版图之内，而是被辽夏金等周边民族占有，再加之北宋前期战乱频繁，民间有限

的马匹也被大规模地征用。北宋神宗熙宁（1068-1077 年） 以前京师开封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驴，此后，马匹方才取而代之，在交通运输业独领风骚。诸多史料已明确证明北宋后期京师开封养马业之兴盛及其在交通运输业中运用之广泛，再结合《清明上河图》中所绘驴在交通运输业中所占的绝对数量，可以得出这幅画创作时间应该在宋神宗年间或之前，而非在这以后，否则《清明上河图》中应该有大量的马匹出现，因为京师人“熙宁以来，皆乘马也”。

《清明上河图》中城门楼外一个十字路口沿河柳荫下有一群猪，能够看清楚的有 5 头，在街上大摇大摆，旁若无人，没有丝毫惊慌。这一群猪应该是官方所养。史载北宋前期“司农寺掌供猪”，用来祭祀天神或辟邪。由于是用来祭祀天神，这些猪是不能随意伤害的。若是一般市民所养猪逃到繁华闹市，绝对不会这么悠闲，甚至还会遭到官方的打杀，况且民间所养猪进入京师开封则有专人看管：“唯民间所宰猪，须从此入京。每日至晚，每群万数，止十数人驱逐，无有乱行者。”宋神宗以后京师开封官方养猪已被禁止，从而可知其创作也不会晚于宋神宗统治年间。

艺文

小品大艺

馆藏明清扇面艺术展

宋画中的团扇作品遗存至今，是宋代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随着造纸业的兴盛，折扇大量登场，沿至明清两代，几乎所有的文人书画家都有在扇面上写书作画的经历，从而形成了扇面艺术发展的全盛时期。扇面虽为“小品”，实乃“大艺”，从一个侧面彰显了博大精深的中国古代书画独特的艺术魅力。展览精选了国家博物馆珍藏的九十幅明清时期的扇面书画作品，既有王宠、文征明、董其昌等艺坛巨匠的作品，也有吴伟业、孙诒让、林则徐等历史文化名人的珍贵遗墨。

时间：2013.03.29-2014.03.28 地点：国家博物馆

《医生和摄影师》杰弗里·法莫作品大型专题展

展览包含365个由二手图书和纺织品制作的手工玩偶。2009年，法莫在温哥华一家二手书店买了几百本书，用以创作他的大型拼接作品，如今这些玩偶摆满了90米长的展出长廊。

时间：2013.03.26- 07.28 地点：巴比肯艺术中心

美丽台湾—台湾近现代名家经典作品展

展览汇集台湾140多位艺术家创作的170幅作品，是两岸交流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台湾美术展览，这些作品时间跨度自1911年至2011年，追溯了近百年来台湾美术的发展历程。

时间：2013.04.02-04.16 地点：中国美术馆

庞贝和赫库兰尼姆

的生与死

庞贝和赫库兰尼姆曾经是两座位于意大利那不勒斯东南维苏威火山脚下的繁华城市，公元79年8月24日被火山吞灭。展览用200多件展品还原了火山爆发前这里的民居，参观者可以感受当年那里人们的

生活状况，以及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

时间：2013.03.28-09.29 地点：大英博物馆

中央美院美术馆藏

“新中国美术的青年时代”作品展

从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90年代，中央美院对历届在校生的优秀作品及毕业作品的收藏共计700余件，此次展品即是从中精选。这是新中国成长的一种艺术注脚。

时间：2013.04.02-05.12 地点：武汉美术馆

国王与诸侯

展览精心挑选117件（组）珍贵青铜器，多数为河南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包括中国最早的青铜容器偃师二里头出土的青铜器等。

时间：2013.03.20-04.18

地点：洛阳博物馆

纪念张国荣

“继续宠爱·十年·纪念展”

展览以张国荣的音乐、舞台、电影为题分为三个展区，现场立有5米高的张国荣半身像，同时包括他历年于演艺界夺得的荣誉奖项、多张早年的黑胶大碟和多张相片。

时间：2013.03.30–05.01 地点：铜锣湾时代广场

关于鞋与制鞋匠的

童话与传奇

许多童话中都出现过鞋与制鞋匠的故事，策展人试图搜集这些鞋子的形象，与众多诗人、画家和摄影师一起打造一个独特而神奇的鞋的世界。

时间：2013.04.19 -

2014.03.31

地点：菲拉格慕博物馆

话剧《简·爱》

2009年6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开山之作《简·爱》首演，这是夏洛蒂·勃朗特同名文学经典在国内话剧舞台的首版演绎，如今已走过4个年头。该剧由著名导演王晓鹰执导，喻荣军编剧，袁泉主演。

时间：2013.06.26-06.30 场馆：国家大剧院戏剧场

《解药》

两个“六根不净、狼性不足”的中年男人企业家和心理医生探讨生死。剧本还着力展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老北京的民俗儿戏。

时间：2013.04.12-05.18 场馆：人艺实验剧场

话剧《小王子》

童话剧《小王子》是一部阅读量仅次于《圣经》的童话经典，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童话，被很多国家选入教科书，这也是儿艺2012世界经典童话年系列之二。

时间： 2013.04.13-05.01 场馆：中国儿童艺术剧院

话剧《求证》

2001年剧本曾获普利策最佳戏剧奖，托尼奖最佳戏剧奖。凯瑟琳的天才数学家父亲去世后，父亲的学生在整理老师遗留下来的一百多本笔记中，爱上了敏感、狂热和倔强并同样执着于数学探索的凯瑟琳……

时间： 2013.04.18-05.12 场馆：上海话剧艺术中心

胡德夫《大武山蓝调》音乐会

胡德夫被媒体誉为台湾民歌之父与台湾原住民运动先驱。这位白发老人影响了罗大佑、叶佳修、梁弘志、施孝荣、吴楚楚等台湾著名音乐人，被林怀民称为“台湾最动人的呼唤”。

时间：2013.05.24 场馆：上海东方艺术中心

独角戏《我这一辈子》

根据老舍同名小说改编，讲述一个旧时代刑警坎坷而艰难的人生遭遇。剧中有数以万计的台词量，从头到尾的不间断表演。编导说，“这不是一个人的演出，独角戏也可以群星灿烂。”

时间： 2013.04.19-04.20 场馆：广州大剧院

歌剧《图兰朵》

《图兰朵》是意大利作曲家贾科莫·普契尼根据波斯童话改编的三幕歌剧，作者生前未能全部完成全剧，但它依然凭借美妙音乐、东方题材扬名天下。其中男高音卡拉夫的咏叹调《今夜无人入睡》已成了家喻户晓的经典作品。

时间： 2013.06.21-.06.23 场馆： 广州大剧院

黎明女神陶盘

作 者:斯图加特•格鲁普



赤土陶器，高16.5cm，直径58cm

陶盘上描绘的是希腊神话中黎明女神厄俄斯手执马鞭，驾着马车，身子微微前倾鞭策她的骏马。这件陶盘是殉葬品。古希腊人认为灵魂会在破晓之时离开躯体，在殉葬品中描绘厄俄斯形象，可让厄俄斯带领逝者的灵魂前往阴间

（本组展品全部出自“道法自然”大都会艺术博特馆精品展，图片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提供）

鱼饰花瓶





美国，蒂凡尼公司，1877年

银，20.6cm×10.8cm×10.8cm

花瓶上装饰的鱼状贴饰和海藻雕饰，以及环绕整个瓶身的不对称排布装饰图案，均体现了日本艺术的影响，而19世纪70年代正是美国受日本风格影响最深远的时期。这种图案曾于1871年获得专利。花瓶的几何状浮雕花边还纳入了更多的自然主义元素，例如展翅的鹤鸟，樱花的枝条和程式化的树叶

贝壳高脚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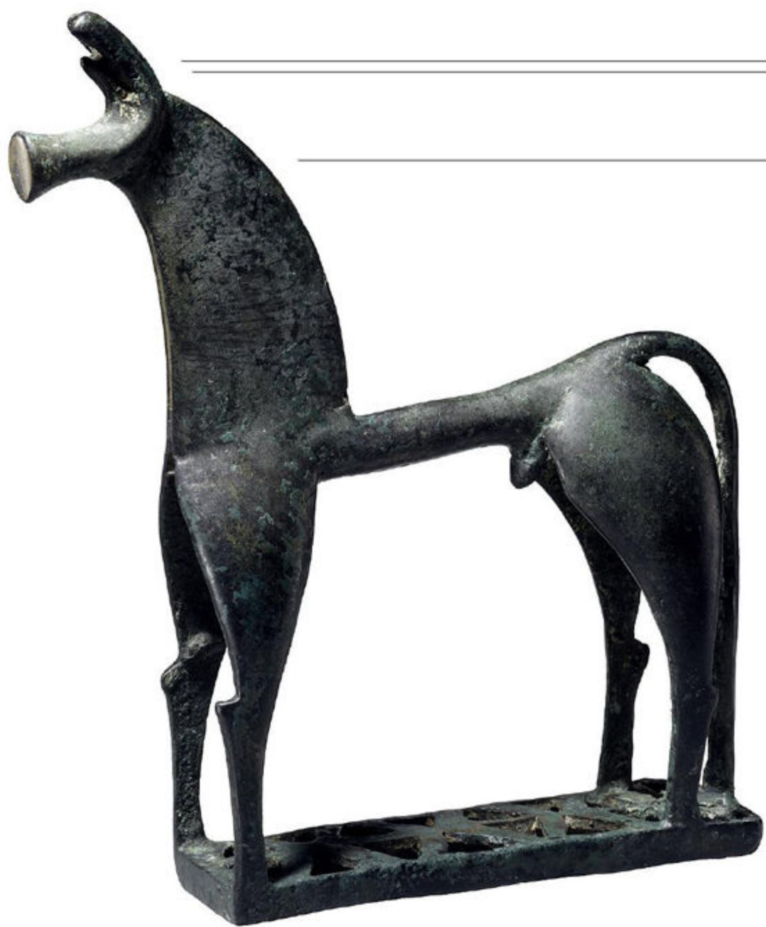
作 者:卡斯帕•班德尔



贝壳、镀银，27cm×14cm×16.5cm

在物品上装饰真贝壳（对于16世纪的欧洲而言，真正的贝壳还是奇珍异宝）的做法历史悠久而普遍。杯上的钟螺贝壳，以及新的带状装饰和杯，都是按照1540年至1550年左右的流行风格装饰的。身披猛狮毛皮，被巨蛇环绕的赫拉克勒斯小雕塑充当了高脚杯的柄脚

马



希腊，前8世纪

青铜，17.6cm×13.3cm×3.5cm

马是希腊几何时期（约前1050-前 700）最主要的图形象征之

一。青铜马匹小雕像被人们供奉在圣殿，作为献给神的供品。这些雕像优雅非凡，线条流畅，完美捕捉到马匹的比例特征，还传神地表达了这种动物的本质特性。这件作品是其中最精美的一尊，代表了几何时期艺术的最高成就

北极熊

作 者:弗朗索瓦•蓬朋



大理石，29.2cm×48.3cm×17.1cm

动物题材的雕塑作为一个流派在19世纪中期的法国达到巅峰，大众对它的喜爱也延续到了20世纪。蓬朋担任过奥古斯特·罗丹工作室助手。这件《北极熊》是他生前创作的已知12件小尺寸北极熊雕塑之一，广受欢迎

衣橱



赫脱兄弟公司，1880-1885年

黑檀樱桃木，199.4cm×125.7cm×66cm

这件衣橱是对崇尚平面装饰和直线形态的英国改良设计风格最经典的反映。外形简洁，采用直线线条，“绝无多余的轮廓或不必要的曲线”。衣橱融合了多种非西方元素。比如表面程式化的花卉和叶状图案源于日本装饰，柜门嵌板上装饰着的花朵，似乎要飘落到底下的虚无，也反映了日本设计的理念